史家高华

熊景明 徐晓 主编

1954~2011

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价
依然挣扎着，担起重负
高华走了
带着他的困惑和遗憾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帮助我们解开了一个谜团：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接受并且长期容忍一个极端专断的领袖；为什么能够形成并长期保持有组织无个人、有集中无民主、惯于滥用暴力与“政治批判”的文化；为什么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能够成为政治与社会畸型发展的国家。

——于风政

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不是不需要信仰，恰恰相反，只有具有坚定信念的人，才能既有犯禁的勇气，又有甘于寂寞、不趋时流、摆脱名缰利锁而致力于爱智求真的恒心。高华在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秦晖

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依然在挣扎中担起重负。世人皆道无知者无畏，而知者有畏，依然选择了咬紧牙关前行，反而显出中国知识人的书生本色。

——许纪霖

幸存者有责任承担起死者给人们留下的巨大的精神债务，每一个祭奠高华的人都有义务签下这份生死契约：抗拒遗忘、抗拒说谎、抗拒伪造。

——金雁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ww.chineseupress.com
HONG KONG, CHINA

ISBN 978-962-996-539-6
9789629965396

史家高华

◎熊景明 徐晓 主编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史家高华》
熊景明 徐晓 主编

© 香港中文大学 2012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国际统一书号（ISBN）：978-962-996-539-6

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学
图文传真：+852 2603 7355
电子邮递：cup@cuhk.edu.hk
网　　址：www.chineseupress.com

Gao Hua, The Historian
Edited by Xiong Jingming, Xu Xiao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539-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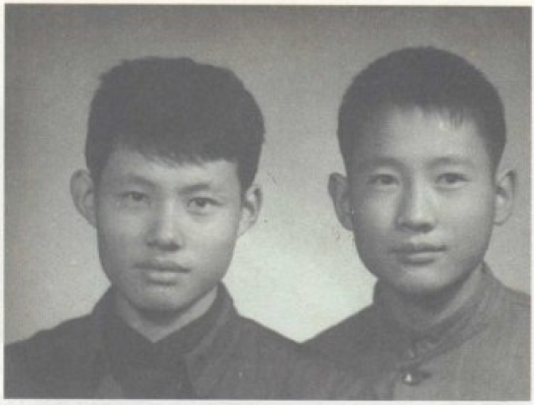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史家高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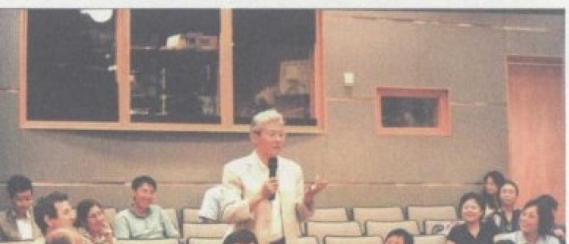


① 高华父亲高启发曾在 1946 年加入地下党
② 少年高华
③ 两弟兄
④ 南大草地
⑤ 初为人父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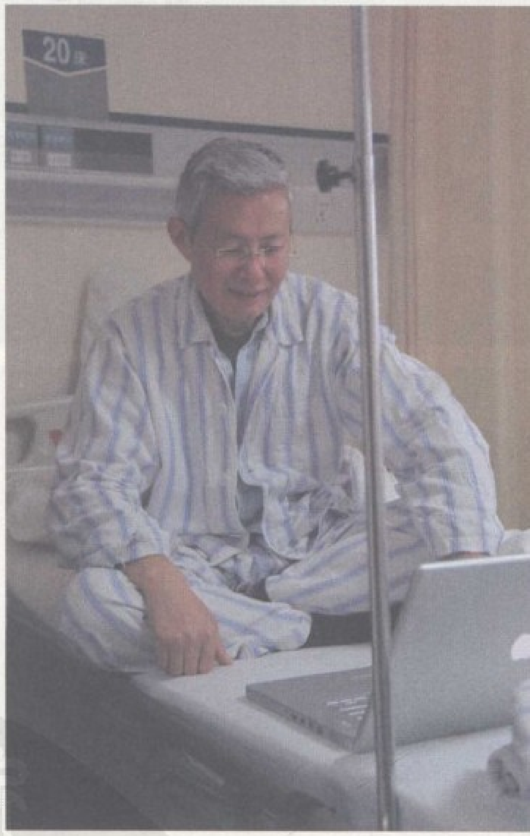






PDG





①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周末行山，香港
② 与南大中美交流中心学生
③ 研讨会，香港
④ 拜访李锐先生
⑤ 家中书房
⑥ 住院，上海









PDG



① ⑤
②
③
④ ⑥

① 高华夫妇与义子小孙
② 中心方法学训练营授课
③ 与吴敬琏、穆军等，香港
④ 与关信基、沈志华，香港
⑤ 病中出席研讨会，香港
⑥ 与杨东平、武克钢、金雁、谢泳、李永刚、熊景明等，中心行山，香港



PDG









① 与常成，上海
② 与金大陆、陈映芳、王维江等，最后一次出游，上海
③ 与李公明，延安
④ 与秦晖、金雁等，香港

PDG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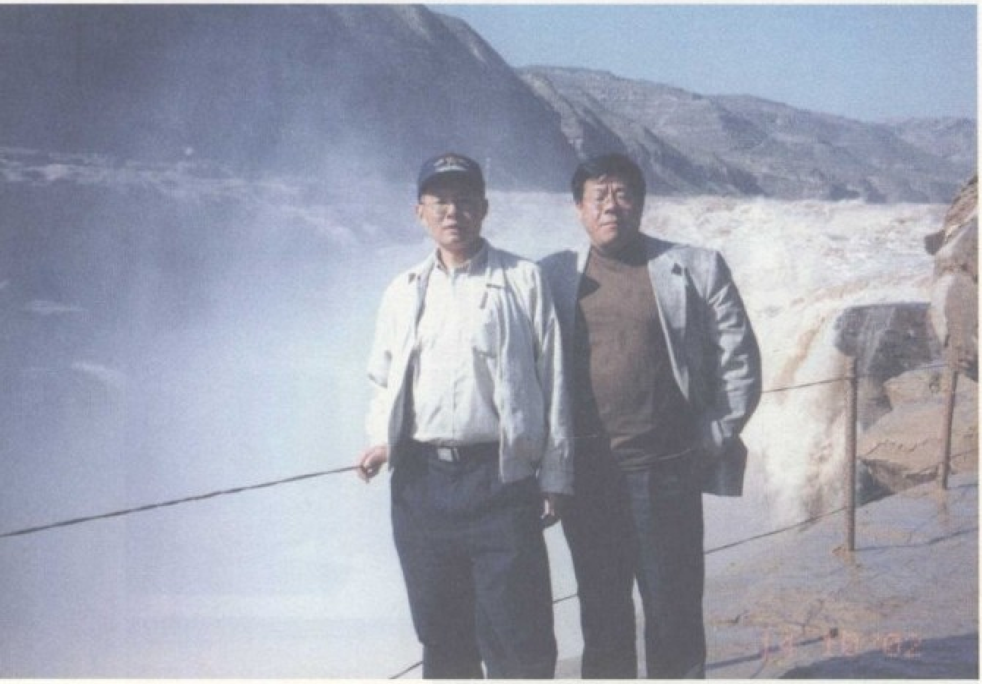
① ⑤
② ⑥
③
④

① 与杨奎松夫妇、沈志华、李丹慧
② 与于凤政、袁伟时等，珠海
③ 与袁伟时等，广州
④ 与何清涟、朱学勤，夏威夷
⑤ 与胡杰
⑥ 与钱钢、黄駿、李永刚等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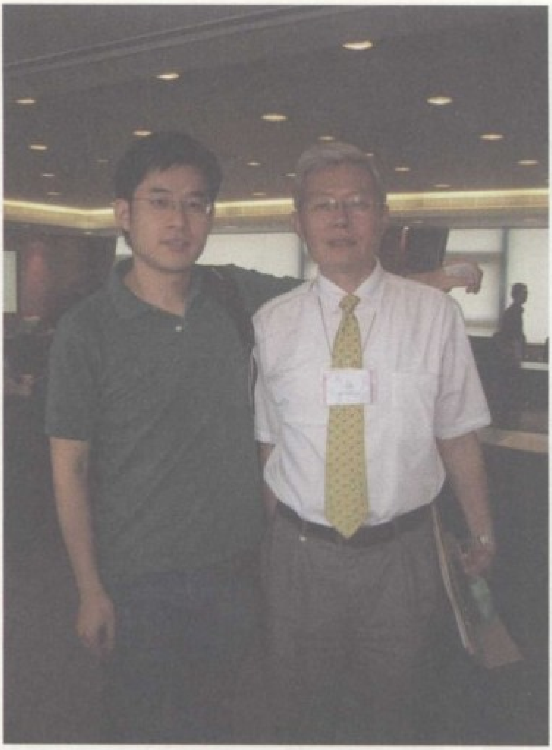






① 与萧功秦、姜超
② 与萧今、刘青峰、熊景明，中心出游，香港
③ 与许纪霖、金观涛等，香港
④ 与张鸣，云南

PDG











① ④
② ⑤
③

① 与柴子文，香港
② 与靳松
③ 与高欣、周孜正、刘握宇等，南京家中
④ 与陈方正，香港
⑤ 与陈方正、章诒和等，香港

序

陈方正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

高华一挥手走了，留下天边一抹彩霞。过不多时，熊景明编成这本集子，让我写序，我没有多想就答应下来。可是，翻阅他这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仰慕者的文章之后，发觉自己恐怕是最没有资格，也最不适宜来担当这个角色的人。道理很简单：这本集子的作者和高华一样，都是从中国近大半个世纪的苦难中走过来的，都具有相同时代、背景、经历、感受、信念和期待，无论目前的际遇、工作、环境如何，却仍然掩盖不了底子里的沉重和直面当今中国的执着，那应当是在“革命烘炉”中熬炼出来的印记吧。而我自己，毕竟是缺乏那种经历和印记的，对中国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一切，纵然并非旁观者，也只能够算是边缘人。因此，由我来为这样一本集子执笔写序，总不免予人以隔雾看花或者血性不足之感。当然，中国的事情很复杂，所谓大风起于萍末，变化往往就从边缘开始，近现代颇不乏先例。那么景明派给我这个任务，也许还是有她的道理的。

我初次知道高华，和杨奎松一样，也是因为读到他那篇《北京政争与地方 —— 释读〈江渭清回忆录〉》。此文是 1997 年 7 月投到《二十一世纪》来的，当时刘青峰是此刊物的编辑，金观涛和我也积极参与工作。大家看到此文，感到它的严谨、细致和深度，颇为惊讶，很议论了一阵子。此后不久，青峰和他联系上了，经过往返磋商和办理各种手续，终于邀得他在翌年八九月间到中国文化研究所来访问。此时他出访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归国不久，又刚刚获得南大的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行箧中还带来了以十年功夫写就的延安整风研究书稿，因此显得神气清朗，兴致勃勃。虽然他原定的两个月行程格于"中美中心"授课时间的限制被迫减半，不免略感意犹未尽，美中不足，但也和中大各方面建立联系，颇不虚此行了。

首先，他成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坚作者：在来访前后短短一年间，就一口气发了四篇文章，其后陆陆续续，统共总有十篇左右，成为这本刊物在当代史方面的一面旗帜。更重要的，则是他和观涛谈妥了书稿的出版。研究所内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是 1993 年成立的，最初由我负责，翌年交由观涛主持。他在青峰协助下，推动"专刊"和"集刊"两个丛书系列，短短五年间已经在"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牌子下出版了将近十种著作，在组稿、编辑、制版等各方面都很在行了。高华提出把书稿交由中心出版，我们自然很高兴。观涛阅稿后提出一些修订意见，主要是将叙述调整得更为客观、含蓄与平和，他也欣然接受。其后不到两年，《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即已面世，刚好赶上新世纪的来临，而且不到一年，它就名满海内外，风行一时，成为中心最畅销的书籍。

最后，中文大学还有个"大学服务中心"，那本来是美国学者为研究中国大陆情况在六十年代设立的机构，其后二十年间收集了大量当代中国资料，除了书籍以外，还包括报章、杂志、年鉴、方志，以至海报、内参等等。在 1980 年代末，由于香港回归中国在即，中心的主办方急于为这批资料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几经考虑和谈判，终于决定把它们一股脑儿转

赠中大。[01]同时，曾在此中心工作多年，后来又转到中大来的熊景明，也顺理成章，成为中心落户中大之后的实际负责人，并且以无比热情和劲头来经管它的大小事务，推动它的发展。在1998年春季假期，金、刘、熊和我四人相约去泰国度假，回来后变得相熟。跟着高华来了，大家时相过从，他很快就为服务中心的资料所吸引，日夕倘佯其中，流连忘返。这中心本来是为西方学者设立，但此时改革开放已久，国内学者外访成风，景明把握时机，为他们筹划经费和提供种种方便，访客都有宾至如归之感，中心名声遂不胫而走，成为大陆当代中国研究学者的麦加。这样，很自然，翌年高华应大学服务中心之邀，再次来港访问。他这趟逗留两三个月之久，自谓来到了“吐露港畔的精神家园”，此后往返频繁，不在话下。

在那一段时间我自己负责研究所的工作，相当繁忙，和高华并没有深谈机会。记忆中相聚比较悠哉的一趟，是借着他老师伍贻业来访，一道去粉岭的赛马会乡间会所，寂寂无人的夏日午后，在花园浓荫下漫步，谈天说地，偷得浮生半日闲暇。事后他告诉我，这位短小精干，双目炯炯有神的学者出身金陵回族领袖世家，解放后曾经一度沉降到社会最底层，改革开放后才获重生，返回南大讲坛，而他自己的历史志业，就是得其启发。我在2002年退休，卸下肩上重担，那年深秋去北大赴汤一介教授之约，随后应东南大学之邀，南下金陵。这是我儿时入学读书之地，印象深刻，但只不过两年，就随家人仓皇南迁，二十四年

01. 1988年中心加入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编者注)

后初“还旧国”，恍若隔世。此番重来，江山无恙，胜景依旧，更得高华兄相陪，到玄武湖漫步半日，儿时在此划桨荡舟，荷塘采莲等旧事，一时涌上心头。也就在此会，他心血来潮，向我透露了凄凉家世和惨痛往事，我只能无言以对。跟着，意想不到，走下草坪斜坡时，他颠踬一下，把脚扭了，而且伤得很厉害，赶快让同行学生去张罗膏药。我问是否旧患，他承认的确不是第一趟了。我心一动，冲口而出道，那可得注意，可能有其他原因吧，别一蹶不振啊。他瞿然一惊，点头称是。三四年后他再来中大，脸上遍现红潮，气喘加剧，我拉他去看保健处的赵医生，诊断为严重的心早搏，再三叮嘱回去得认真治理，他却好像早知如此，表现无可奈何的样子。再隔数年，赵医生记起此事，追问他的近况，我以当时病况据实相告，相对黯然。

高华在 2009 年六月底最后一次来港，出席中大历史系举办的“共和国六十年国际研讨会”。此会颇具规模，大陆、西方和港台学者云集，极一时之盛。高华在首日作了“国共之争为何国民党失败？”的主题发言，勾勒全局，条分缕析，显示了他一贯的扎实、全面、老到。会后我天真地问道：“但你提出的那些具体原因好像都没有必然性，都不是本质的。说到底，共产党的胜利，最后是否可以简单归结为在两党决战中，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厉害，也就是眼光更准，手段更灵活狠辣？”他想了一阵子才回答：“也可以这么说吧。”我追问：“当时毛指挥共产党能够那么得心应手，如臂使指，不正就是因为经过了延安整风吗？”这趟他答得非常爽快：“那当然啰。”

我之所以会那样追问，其实并非偶然，而是因为我父亲六十年代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其中有这么几句话：“说组织，国民党的组织松懈极了。说斗争，国民党的斗争温和极了。这是国民党的弱点，也是国民党的优点。国民党在大陆败于中共之手，播迁到台湾，是弱点的暴露。”父亲从二十年代加入国民党，三十年代加入国民政府，以至 1949 年结束政治生涯，辞职退隐，对国民党有长期观察与深入了解，这几句话痛定思痛，无疑包

含了相当的道理。不过，这样说来，两党之间胜负的关键，到底是在于领袖的高下，还是在于党本身的差异呢？其实，这两种可能性是二而一，密不可分的。和毛泽东一样，蒋介石也在党内翻滚多年，经过无数斗争、较量，方才在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成为无可争议的党领袖；此后他们也都反过来，以个人气质、理念、权势，来重新塑造党的规律与格局 —— 毛发动延安整风，蒋推行“复兴关中央训练团”(1940–1943)，如出一辙，虽然后者已被遗忘，但两者的目标、规模其实都很相近。在这个意义上，领袖即党的化身，党亦领袖意志的体现。

不过，这些看法无论正确与否，都不那么重要了。毕竟，革命岁月和伟大领袖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的历史使命也都完成。令人略为感到不安的是，对许多人来说，《红太阳》一书之所以引起震撼，并不仅仅因为它揭露和描绘了历史真相，而更在于它所隐含的道德谴责和现实批判。这很自然，无可厚非，但我们往往也因此忽略了另一种历史真实。那就是，在我们这古老大国，历史与文化包袱之沉重，以及传统政治理念之狭隘贫乏。在延安悲剧的深层，恐怕毋宁是这种意识上的束缚与局限，更多于个人的邪恶，在起决定性作用吧！民族英雄凯末尔激励国人，打败希腊入侵大军，拯救土耳其于濒临灭亡之际，当选大总统后，更把这古老的神权君主帝国，改造成彻底俗世化，以民选议会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可以说，他为土耳其做到了相当于蒋介石、毛泽东加上胡适之为中国所做或者要做的事情。然而，他却解决不了土耳其政教冲突的根本问题：在他之后社会动荡，政变频仍，如今他的立国原则被废除，为他守护宪法的军人被逮捕、受审、投狱，此后国家伊于胡底，谁也

无法断言。小小土耳其历史与文化包袱沉重如斯，中国的革命家、当权者不更要感到“万牛回首邱山重”吗？

有人把赵北瓯的名句改为“江山代有英豪出，各苦生民数十年”，旨哉斯言！因此，对伟人，我们总要细究他们的作为与居心，看清他们的真实面貌，从而也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好恶、爱憎与感触。不过，“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却也不可不意识到，昔日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者，在内心深处亦何尝不是其时代与陈旧意识的傀儡。毕竟，未来还是要由今日无数平凡人从现状出发，凭借点点滴滴努力的累积而得根本改变，而得开拓新运。高华兄地下有知，对此也会认为“可以这么说”吧？

很可惜，最近两三年他的病势一直没有起色，朋友数度策划接他南来散心，都未能成事，以上这许多想法再也没有和他讨论的机会了。前年十月到上海看世博，趁机坐快车去探望，但来去匆匆，说不了几句话，只感觉他精神、兴致不错，脸色比前进步，想是休养得宜之故。去年四月中到南京开会，机会难得，又逢景明、胡杰夫妇都在，大家相约聚会。这回他明显消瘦了，脸色发青，但兴致不减，坚持带我们到秦淮河堤岸上，在漫天飞舞的不知是杨花抑或柳絮中散步远眺，然后到附近的馆子晚饭，尽半日之欢。翌日意犹未尽，又到同一馆子小酌，南大图书馆的陈君也来了，他口才便捷，为我们说故事下酒，举座欢笑竟夕。这些往事，今日断断续续地记起来，心里不由得泛起静安先生的句子，“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

2012 年初夏于用庐

目 录

序 言 / 陈方正 · xix

壹 史家高华 · 001

常 成：朴素而深刻，率直却入微 · 002
陈意新：夸父追日，不息不休 · 011
陈映芳：跨越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隔 · 019
陈永发：南港忆高华 · 025
崔卫平：共同的信念 · 029
董 健：向“伪历史叙事”挑战 · 033
高全喜：历史揭示的宪法主旨 · 038
李公明：历史研究何为 · 040
林 达：独特的高华 · 046
刘 瑜：像一滴水一样 · 053
钱永祥：“家国心事”与“新价值” · 058
秦 晖：作为历史学的“党史” · 061
苏 阳：突破封锁线之后 · 069
杨奎松：呼唤年轻一代的高华 · 078
于风政：欣慰的是，我们还有高华 · 087
袁伟时：高华留下的永恒 · 094

贰 高华其人 · 099

贺　军：追寻消逝的时光 · 100
何清涟：在历史黑洞中发亮的萤火虫 · 108
胡　杰：愿时光倒流 · 113
金大陆：学术之树常青 · 120
钱　钢：海阔天空，赤诚相见 · 132
宋永毅：世风日下中一介传统书生 · 137
王维江：难忘高华 · 140
萧功秦：天堂里的高华 · 145
熊景明：千山我独行 · 156
许纪霖：知者有畏，依然直行 · 162
徐庆全：一本书的高华 · 166
颜世安：君子坦荡荡 · 178
杨小彦：高华与摄影 · 188
张　鸣：近代史学界塌了一个角 · 192
张　宁：金陵当哭高华没 · 197
周　实：射日者 · 203
周永明：相识相知三十载 · 205
周志兴：高山仰止 · 209

叁 高华吾师 · 213

柴子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214
黄 骏：传道 授业 解惑 · 217
姜 超：逝去，如秋叶般静美 · 221
靳 松：认识你，三生有幸 · 226
李巧宁：师门受教琐忆 · 232
李永刚：知遇之恩 · 241
刘握宇：你为我们开辟混沌，照亮内心 · 244
刘彦文：你的远行使人何等伤痛 · 250
张一文：高老师，来生还为你带饭 · 255
周孜正：先生最后的时光 · 259
甘思德：异化不了的学者 · 270

肆 痛失高华 · 275

南京追思会发言节选 · 276
北京追思会发言节选 · 286
悼词 · 302
挽联 · 316

附录：高华生平及主要著作 · 322

壹 史家高华

朴素而深刻，率直却入微

常成

高华老师逝世前六天，即2011年12月20日，我和他最后一次通话。他关心我寻找教职的情况，同时提醒我与他的一位即将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也正在求职的学生联络交流。最后，他叮嘱我向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询问收藏沙飞影像档案事宜。讵料这短短的五分钟竟成永诀。

三年前的同一日子，因为奇妙的机缘，我认识了高华老师。2008年12月20日，我偶然经过上海华东师大老校区，决定去参观历史系，特别是著名的冷战研究中心。到了人文社科大楼，才得知历史系早已搬到闵行新校区，这里只有一间办公室留守。我惊喜地在这里发现了一张内部通讯录，一眼就看到高华的名字！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他已到华师大任教。我立即拨打电话，接听的正是高华老师。我告诉他我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历史系的博士生，在导师周锡瑞先生的史学史课上，刚刚读过《红太阳》，有很多感想和问题，想向他请教。

当我来到高老师的临时公寓，开门的是一位满头银发、谦和质朴的儒者，这与他在著作中所展现的那种手术刀般锐利冷静的气质，仿佛有很大的不同。不知不觉中我们从下午三点谈到六点，从中共叛逃者史料的考证

谈到中共高层回忆录的辨析，从斯诺、谢伟思的陕北经历谈到西方史学界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误读与想象，最后谈到重写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意义与可能。当晚告辞后我走在大街上，仍觉得如沐春风。

自此以后，每次回大陆我都会到上海或南京看望高华老师。每次与高华老师的交流都是一种知性的享受，也是品格的滋养。我时常忘了我们是在讨论残酷的革命与战争，而被他朴素而又深刻，率直却入微的人格所感染。[01]

一部挑战革命神话体系的著作

《红太阳》是高华的第一部专著，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至今已第十二次印刷。该书彻底颠覆了中国与西方学界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理解，迅速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史经典。

毋庸置疑，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次政治运动，其直接的结果是中共实现了组织与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为1949年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共官方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定义是，一次全党范围内普遍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对运动中出现的大面积残酷的审干、肃反和抢救却避而不谈。

西方学界的理解也与官修历史惊人相似。六十年代，施拉姆(Stuart Schram)在《毛泽东》一书中认为，整风运动旨在"协调个人的'自觉行动'和完美的社会纪律之间的冲突"。[02] 在美国反越战的浪潮中，赛尔登(Mark Selden)于1971年出版了《延安道路》，歌颂群众路线、民主参与、减租减息等社会改革。作者依赖康普通(Boyd Campton)翻译的整风运动学习手册以及《解放日报》，采信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比喻，称"整风运动

---

01. 傅聪原文"at the same time passionate and serene, profound and simple, affectionate and proud, subtle and straightforward"，傅雷译。见《傅雷家书》，1962年3月14日。

02. 引自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ed*]，（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84–185页。

不是一场清洗运动……重点是改进工作，迎接新的挑战，而不是针对个人。”[01]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下），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增加了少量有关丁玲和王实味的描述，但依然没有涉及到整风背后的审干与抢救运动。[02]

1997年，哈佛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发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之三（1961–1966），提出了一个概念：“延安圆桌”的终结。其实他的整个三部曲一直暗含“延安圆桌”的假设，即在延安时期，中共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为首、但相对平等的精英领导层。恰恰由于麦克法夸尔对延安的这种浪漫想象，使得他对文革根源的考察只能倒推至1956–1957年的“百花齐放”与反右运动，而不能想象文革的根源可能在延安，以至于贯穿三部曲的“路线斗争”解释也愈发不能自洽。最终，在2006年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合著的文革史《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延安圆桌”这个概念遂弃置不用。而赛尔登在1995年再版的《延安道路》的后记中承认，他所颂扬的延安“民主主义萌芽只不过是中共所支配的群众路线和政治动员的组成部分。……由于我在早期研究工作中的疏忽，在我总结出来的‘延安道路’中又掩盖了专横与倒退的倾向”。[03] 可以说，西方学界对延安整风的解释已经完全过时。

而《红太阳》的出现，贯通了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各个重要环节，其锐利的解释力不但穿透从中央苏区“肃AB团”（1930–1931）到延安整风运动（1942–1945）的中共党史，而且贯穿整风之后的内战、镇反、反右和文革，以至当代的政治逻辑。该书通过对1942–1945年间的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和过程的深刻剖析，解释毛泽东如何根据其理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与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党内残存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转换中共原有的“俄化”气质，最终

01.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第188、191页。

02. Lyman P. Van Slyke, “The Middle Years 1939–1943,”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 *Republic China 1912–1949*,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87–692.

03. 同注01，第310页。

将中共意识形态全盘毛泽东化；与此同时，毛运用权谋与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领导层，建立以毛为绝对主宰的政治体系，最终达到了“君师合一”的无上地位。[01]

高华认为，毛泽东成功的秘诀在于其“融‘道’（思想、理念）、术（策略、方法）、势（地位、权力）于一体”的政治斗争模式。毛泽东在“道”与“术”方面都有相当重大的创新。早在整风运动前的1938年秋冬，毛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逻辑严密，言简意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完全契合中共干部党员的心态，极具正当性和鼓动性”。然而，其主要精神在于，“吸取、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的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现代农民大革命”。[02] 虽然这一创新在抗日救亡时期具有正当性，但负面后果也相当严重。在这种“打江山，排座次，论功行赏，坐江山”的农民造反传统与斯大林制度的合力作用下，等级差序制度在延安以物资分配的形式明确和固定下来，这就是被王实味所批判的“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制度。在延安，自1940年起，“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罗曼蒂克式的平均主义时期已经结束，中共已进入到强调等级差序的新时代”。[03] 等级差序制度不仅体现在物资分配上，也体现在新闻保密与分层次阅读的新闻制度上。

毛泽东的另一发明是思想改造之“术”：在没有退出机制的强制环境下，借用儒家内圣之学强调的自省自新理念，对思想改造对象“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方法锻造‘新人’”。高华指出，“毛泽东的‘新’就在于融理论灌输和暴力威慑于一炉，配之以强有力的组织措施，给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制造了一座强大的压力场，使其在反复震荡中蜕尽‘旧我’，

---

0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2012年第十二次重印），第xii、180页。
02. 同上，第179页。
03. 同上，第243页。

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很多经历过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的“新人”，学会用毛的概念来思考和行动，“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01] 革命政治前所未有地深入灵魂，几近完全占领了个人的思想与生活空间。

高华强调，延安整风的重要性在于其持久严重的思想与制度后果：通过整风审干所确立的概念、模式与制度，“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02] 等级差序制度和思想改造模式这两大毛式发明相辅相成，影响最大。诚然，延安整风不是一场斯大林式肉体消灭的“清洗”。延安的知识分子只要接受规训，通过思想改造，成为“新人”，就会被接纳入党。随着中共的不断扩张，他们同时也从等级差序制度的底层向上流动，成为领导精英。他们成为宣传、文教领域的领导者，从延安时期的被改造者变成革命胜利者，“监督别人进行改造的领导者和整人者”。“很多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没有任何道德和心理障碍，就把当年他们蒙受的那套方式，再施加给原国统区的人们，直到革命深化，他们被更革命的人打倒。”[03] 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讽刺。

思想改造彻底消灭了延安知识分子独立思想的动能，他们在等级差序制度里的向上流动性也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既得利益者，而完全垄断信息的意识形态，又为他们一切符合毛意志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理由。

一个现象充分说明思想改造的成效：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老人鲜有对那段经历进行深刻反思或者批判的，相反，他们往往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怀旧与感念。据我所知，一位“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刚到延安就被关押审查了半年。然而，今天他仍对那段历史三缄其口，哪怕是面对身为历史

01.《红太阳》，第 423 、 436 页。

02.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阅读历史，认识中国〉而作》，刊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怀念高华教授”专辑网页： http://www.chineseupress.com/gaohua/index.html。

03. 同上。

学者的家人。他坚称，“那段历史，只有中央级别的专家来访问，我才能谈”。这仿佛是党性压倒人性的一个注脚。高华曾经惋惜自己没有机会对亲历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诚然，他们的口述肯定会让《红太阳》内容更加充实，但是受访者可能不会有太多反思。能够幸存到上世纪末的延安老人都是幸存者中的幸存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经历一生的思想改造，也在等级差序制度里获得利益，使他们自觉地保守延安的秘密和这个制度的其他秘密。

在官修的史书上，自延安整风开始的十余年是中共历史上仅有的一段没有“路线错误”、没有污点的历史。然而，《红太阳》不但有力地摧毁了这个革命的罗曼蒂克神话，而且指出延安整风其实奠定了后来各种政治运动的制度与思想基础。这不啻是对整个革命神话体系的根本挑战。这个挑战者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担当。

追求自由的灵魂

高华生于1954年，成长于这个等级差序制度的底层，政治早熟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惟有接受规训，收敛个性，才能赢得安全，有机会向上流动。然而，他仿佛天生就有一个“追求自由的灵魂”，在阶级斗争的喧嚣中他饥渴地读书求知，想要探寻世界的真相。[01] 1978年高华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便萌生要写书来揭示延安整风真相的愿望，随即开始收集资料。从此时到1991年动笔，他花了十二年；到1999年最后交稿，花了整整二十年。

高华没有申请任何项目经费，也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档案馆的机密原始档案。在浩如烟海的已公开资料中，他反复地“对各种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02] 逐渐得出了一幅日趋完整、愈发有解释力的延安整风历史拼图。

---

01. 高华：《革命年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5页。
02.《红太阳》，第653页。

1991年8月19日夜，高华在家中铺开纸笔，开始《红太阳》的写作。那天苏联正发生八·一九政变，广播中播放着苏联国歌与爱国歌曲。他回忆道："我感觉到我应该写！……写作是个很长的过程，我并没有立即想到出版的事。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要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摆脱内心各种各样的禁忌"。太史公曰："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高华一介文弱书生，向来谨小慎微；然而面对无可抹杀的史实，他义无反顾地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与禁忌，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高华无愧于史家的称号，也无愧于他那颗1979年在课堂上听司马迁《报任安书》时激动的心，那颗几十年未曾改变的赤子之心。

人道的关怀

虽然《红太阳》有力地颠覆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神话，高华却又在后记中表示，自己"心中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01] 在该书出版十周年之际，高华回应读者指出的这一矛盾，认为"书中所显现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02] 其实革命历史本身的矛盾正好印证高华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立场。

我认为《红太阳》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高华所表达的价值关怀："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03] 高华对中共革命与国民革命的目标——即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有深刻认同，但他同时认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是社会每一个个体的自由、独立与幸福。所以他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手段有深刻的批判。他反对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标——革命或其他——就可以不择手段。

01.《红太阳》，第655页。
02.《〈红太阳〉出版十年感言》。
03. 同注01。

虽然高华长期研究高层政治，洞悉权谋，却并不沉溺于权谋。他痛恨权谋政治，真正关注的是普通百姓的生命史。在回应遇资州（刘小枫笔名）“党内整风‘干卿何事’”的质疑时，高华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切与老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是不应加以置评的。”[01] 正如杨奎松教授为悼念高华挽联所言：毕生沥血春秋笔；敢为苍生问不公。

高华一贯钟情于对“小人物”的研究。他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关怀的视野之内”。“强调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对我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重要性也许不是多余的，研究者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还要注重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他时常引用费尔巴哈的话：“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高华认为研究当代史应该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叙述，通过考察他们在革命、战争、解放、改造中复杂差异的经历，探寻自由、人性对他们不同的意义。“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这也是历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02]

高华相信，如果充分利用民间历史材料，即使在档案没有全面开放的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也大有可为。2007 年，他完成了《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又名“小人物，大历史”），并计划进一步的研究。[03]

三年前高华老师在纪念红色摄影家沙飞的研讨会上曾经说过：“沙飞的结局是不幸的，他永远定格在 38 岁，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倒下，使他没有成为领导干部。这看起来遗憾，其实也没什么，这使得沙飞永远是一位本色的人。”因为沙飞留下了珍贵的摄影作品，“沙飞具有永恒性，他真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一颗在祖国的天空中永远自由飞舞的沙

01.《〈红太阳〉出版十年感言》。
02. 高华：《革命年代》，第 299 页。
03. 同上。

粒'"。[01] 我想，他说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

高华老师的生命虽然定格在57岁，他一生清贫，永远是一位本色的人。他也是永恒的，他真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继续"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作者为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

01. 高华：《革命年代》，第299页。

夸父追日，不息不休

陈意新

高华以一部《红太阳》名动学界，我们因之有了一段不同于正统叙述的党史。如果说圣歌《东方红》是以千万遍吟唱“他为人民谋幸福”而告诉人们陕北的毛泽东以天下苍生为怀，《红太阳》则是以对史实的千百遍梳理向人们展示出另一个“他为自己谋权力”的毛泽东。高华正巧在毛泽东的诞辰日离世。人们想知道毛的历史，特别是1949年之前的毛，绕不过高华的书。

如果细读《红太阳》，可以发现，高华没有特意贬低毛，反而对毛的个人的“本领”评价很高：在江西苏区军事同志中，毛“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为刚强，且最善用兵打仗”。[01] 笔者与高华相识于南京大学，亦曾在闲聊中听其当面举证和评说毛为“绝顶聪明之人”。这些公开和私下的表述证明，高华不是一个存心要诋毁毛的人。

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历史有强烈兴趣的人不知凡几，中国的或外国的，专业的或业余的，正史的或野史的，却为什么未曾有人写出一本如《红太

0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第11页。

阳》一般扎实、厚重的大作?

高华首先想弄明白的是父亲的命运,这是高华研究最开始的诱因之一。高“长在红旗下”,[01]但应“愧为黑孩子”。作为“右派”的儿子,高是红朝贱民,小时候“被禁止参加庆祝国庆17周年全市小学生游行”,[02]长大了亦不能参加革命群众在马路上欢迎共和国重要外宾的队列,必须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一齐集中在小房间里”读报纸。[03]向往革命却“不准革命”,文革风起云涌时他“不能参加这场革命”。[04]他更是阶级斗争弦上的惊弓之鸟,当文革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时,其父要逃命,他本人则对文革的红色恐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05]革命时代的生活对高华而言是窒息,“没有希望,没有绿色”。[06]

由此,高华写《红太阳》便如夸父追日一般,顽固得很,一定要追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探索众多普通民众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根源。高把写书的动机说得很清楚,“‘文革’中所发生、暴露的一切,以及自己生活的感受”,使其“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07]“‘文革’中的一切”带给高的是那种寻常百姓窥视了一点儿高层内幕的震惊,一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感。没有受歧视的辛酸,没有那“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没有作为一个好学生却被革命强加了“原罪”的追究,他恐怕也不会执意去写《红太阳》。

高华研究延安整风运动而非党史上的其他重大事件,也许有他的偶然性,但他就像医生诊断病人,从寻找病灶开始,直达要害。延安整风是共产党整自己人,是毛以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去统一全党。整个运动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检讨作风、提高思想认识,而在于“审干”。在审干中,每个

01.《红太阳》,第651页。
02. 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自序》。
03. 同上。
04. 同注01,第649页。
05. 同注01,第648页。
06. 同注01,第650页。
07. 同注01,第651–652页。

党员和干部必须在政治上被排队，需向党以书面形式详细且不断地交代个人历史和对党的不忠，并在随之而来的“反奸”中接受党的审查。个人反复交代的历史常会有叙述上的偏差，偏差成为被怀疑的依据，依据成为“逼供信”的由头，逼供信可将疑案变成铁案。如此，一个时期内延安搞得“特务如麻”。[01] 最终，多数被审查者通过“抢救运动”而“得救”，得救后凝结在心底的则是对党和毛主席百分之百的忠诚或恐惧。审干通过残酷无情的过程，剔去了一切不纯的成份，建成了毛泽东主义者的队伍。

作为延安整风的伟大传统，审干从此便以“政审”方式成为共产党的常规制度，贯彻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而政审的对象涉及每一个人，无论党员与非党员，控制他们的思想和言论。生在新中国的高华，和许许多多家庭背景不纯正的少年儿童一样，都是审干这一方式的受害者。从幼年起，高华不知填了多少表格，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栏里填写老一套内容，每一次不啻是在提醒这个少年，记住自己是有“原罪”的“贱民”。1963 年，在读小学时，他被重点学校南京市外国语学校录取，但却因政审通不过而被拒之门外。成名后的高华在谈到共产党的“革命叙述”时开门见山地指出：“革命叙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区分“我们”和“你们”。[02] 政审无疑是区分这二者的有效手段。假如没有毛之后的改革时代，高华及其同类可能永远是革命者阵营之外的“你们”。

高华的经历和动机也决定了《红太阳》的研究方法。没有革命者身份的高华，在研究延安整风中显得慎之又慎。他没有办法接触到档案资料，只是从公开出版的资料里老老实实地披沙拣金。这种搜集资料的方法在出版物电子化之前是相当困难的，以此方法一点一滴地拼凑起延安故事的全景，实在需要愚公移山般的毅力。实际上，以高华的谨慎，能得到点档案资料也未必会用。他明确知道自己是在私修党史，把时钟回拨二三十年，

---

0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8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 652 页。
02. 刘芳：《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高华访谈录》，财新《中国改革》，2011 年第 11 期。

坐牢和杀头都有可能。即便在《红太阳》成书之后，党史也还只能从正面写，只能由正确路线的代表来写；党的秘密只能由党所信任的人享有，享有的多寡得看级别。若利用了档案资料，恐怕一不小心就会触犯"国家机密"，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在公开出版物和图书馆的收藏资料之外，高没有使用其他资料。只有理解了他的经历和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十几年来他毫不犹豫地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大量的书籍资料，"躲进小楼成一统"，在简陋的书房里，细心地核实和印证每一条资料，思考和研判自己的每一个论点，甘愿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01]

《红太阳》有700页之多，它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简要之，一，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早期，毛在江西草创了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但却受到了党内王明等留苏的教条主义"国际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派"的排挤，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与恩怨，而毛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二，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1941年，毛逐渐在党的最高层确立了自己作为军事和政治领袖的地位，并通过深沉老辣的手法和谋略击败了"国际派"和"经验派"，乃至把政治对手逼到恐惧和屈辱的地步。因为尚未建立起绝对的权威，毛没有满足。三，1942年起，毛在全党发动了整风运动，通过与刘少奇的结盟彻底击溃了"国际派"和"经验派"，启用康生为助手，开展了人人过关的审干运动，借延安文艺座谈会把自己的思想铸造成党文化，终于把共产党驯化为可以绝对控制的组织。四，整风运动结束，毛终将所有的权力集于己手，并进一步成为全党公认的思想领袖，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享有了"毛主席万岁"的无上尊荣。《红太阳》所叙述的延安整风，一言以蔽之，是毛通过各种政治和思想的手段无情打击对手，而使自己的权力上升到顶峰的故事。

高华叙述的价值首先在于其与正统叙述的不同。正统叙述通常认为延安整风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实践毛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中共终于扬弃了理论教条，"使马克思主

01.《红太阳》，第657页。

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创立了指引中国革命胜利的指导路线。基于整风运动，中共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总结，党员得以认清党在历史上犯错误的根源，辨别党的正确路线，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终于让全党实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至于审干中的“大量冤假错案……它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并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并纠正。[01] 党史的正统叙述也影响到了西方的史学界，例如美国学者赛尔登在其所著的《延安道路》里就对整风运动表达了赞赏，认为它完善了中共的“群众路线”，使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得以发展。[02]

《红太阳》在正统叙述和赞赏派的颂歌里横插上一杠子。例如，正统叙述指出，毛为整风运动编辑了党的文献汇编《六大以来》，以便党员和干部学习毛在1928年－1941年间怎样代表着正确的路线与左倾路线斗争。高华却指出，毛在编辑《六大以来》时，对一切有碍自己形象的文字作了删除，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1931年－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文字，并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个别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脚。[03] 换言之，毛并没有一贯代表正确路线。再如，正统叙述认为，整风中有大量冤假错案，但党员和干部都以深刻的自我批评求得了党内的团结，这种批评精神“成为整风中最令人感动的一景”；[04] 赞赏派赛尔登则根本不认为延安整风有政治清洗。高以大量的事实证明，整风中的反奸和抢救运动是如何在肉体上整人，在精神上折磨人，让“最感人的一景”成为无稽之谈，让延安整风露出其残酷清洗的本质。[05] 实际上中共中央在1943年6月承认，审干反奸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各级干部一万多人中，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将近一千人；7月中旬中央在延安把审干反奸推向了抢救运动后，半个月里

01.《毛泽东传》，第625、655页。另可参看中央党校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02. 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03.《毛泽东传》，第630页；《红太阳》，第202页。
04.《延安整风实录》，第448页。
05.《红太阳》，第470–556页。

又挖出了特嫌分子一万四千多人。面对这样的数据，恐怕没有哪个历史学家敢说延安整风不是一场清洗，更别谈在整风中逼供信、“车轮战，大会批斗，小会劝说，互相检举，个人坦白，指名问供”大行其道。[01] 毛自己也说得很清楚，“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02]《红太阳》通过与正统不同的叙述，至少让我们知道。在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统叙事后面，有一个令人惊惧的延安整风。

《红太阳》的另一重要价值是，理清楚了中共党史后续的发展线索。高华非常正确地把《红太阳》一书的副标题定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基于对大量资料的细心阅读和对中共众多重要人物的严谨考订，书中展现了众多清晰的“去脉”。这些“去脉”对我们理解此后的党史特别重要，是在其他党史著述里难以读到的。比如，在整风中，中央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认为陶铸的妻子、学员曾志的历史有疑点，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将曾志的结论拖了两年，使得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陶铸十分不满。甚至当面批评过古。所以，五十年代陶铸主政广东时，在开展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中撤了古大存广东省委书记和副省长的职务，将古定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并在全省千人干部大会上逼古写下“决不翻案保证书”，结果古至死也没有机会伸冤。[03] 一饮一啄，岂非前定？若非高华在《红太阳》中将这些来龙去脉细细道来，我们又岂能轻易知道党内高层许多积淀了多年的恩怨？高华梳理出的“来龙去脉”，对中共制度史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 年 9 月，为全面整风，毛成立了中央总学委，亲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并冻结了政治局，以免其碍手碍脚。多年后毛发动文革，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成了文革小组的顾问，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形同虚设。高华理清这一“来龙去脉”让我们懂得，中共党史上有许多老戏新唱，对党史悟性太迟钝者如刘少奇等，只能落得悲惨结局。

01.《延安整风实录》，第 374 页。
02.《毛泽东传》，第 652 页。
03.《红太阳》，第 531 页。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第 248–249 页。

尽管《红太阳》是一部史学良作，从学术角度而言，它依然有两个方面可供商榷。一是高以个人权力斗争为主线来审视延安整风，而非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主线来写。事实上，即便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叙事，也往往有“两本账”。正如在“大跃进”确立经济指标一样，公开的为明账之外，有一本内部的暗账。[01] 如果只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去看待延安整风，人们将永远只能看到党的“明账”，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延安整风中满是计谋、血泪、惊恐和残酷。王明等国际派并非是鞠个躬便信步走下了台，而是在毛的纵横捭阖中被逼下了台。这本暗账展示毛在攫取权力中的奇正攻袭和康生建立的肃反体制的嗜血疯狂。

二是高华呈现给读者一个令人恐惧的毛泽东，而高对毛的判断很多是基于揣测。杨奎松说“我非常欣赏他对延安整风中党把中下层干部改造成‘新人’的方法、路径及其经过的深入考察，但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特别是涉及到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例如在前述陶铸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处理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延安时期的曾志事件是陶古之间长期隔阂的初始原因，但却没有实在证据以断言陶惩罚古是在为曾志报一箭之仇，因为当事人从未如此亲口说过。不过，历史研究中对人的思想和心理活动的研究，不会因缺少实证就不进行了，它可以通过对一个人的行为范式及其背景进行分析而做出合理的判断。

结合其他历史研究著述来看，《红太阳》对毛和中共高层几位领袖的评判是准确的。这当然不仅有赖于高对史实的细致掌握，还有赖于高多年来“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象之中，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02] 说白了，多少年来高华天天颠来倒去地进入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刘少奇、康生的角色。演练多了，判断也准了起来。例如，高认为毛有深沉的心机、残酷的手段、刚愎的个性，这些

0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 682–700 页。
02.《红太阳》，第 654 页。

都是比较主观的判断。重要的是毛的这些特征不仅在延安整风中体现，还在日后不断被历史事件一再证明：在庐山会议上拿下彭德怀，在文革中毁掉刘少奇和林彪。周恩来知道毛有多么恐怖。1975 年 6 月，行将油尽灯枯的周仍不忘亲笔给毛写信，为自己从遵义会议四十年来“不断犯错，甚至犯罪”感到“真愧悔无极”，希冀毛能高抬贵手，在自己死后放自己一马。[01] 什么样的毛能让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周恩来怕成那样？周的亲笔信让我们相信，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来看，高华对毛的描述是准确的。说句大白话，有谁能架得住别人二十年如一日地天天揣摩自己？

高华和夸父还真有些相似。夸父追日，不休不息，追到了太阳落下的地方，最终夸父死去，太阳依旧每天在天空挂起、落下。高华追日，劳心劳力，追到了太阳升起的地方，最终高华离开了，主席却每天还在纪念堂上班、下班。高没有把主席拉下神坛，但他让人看清了坐上神坛的并非都是圣贤；神坛上并不只有光明，它亦有黑暗。

作者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校区历史系副教授

0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第 12–13 页。

跨越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隔

陈映芳

高华教授的去世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一次特殊的冲击，这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包括我自己。我与高华并不熟识，可是前一阵，我一次次跟我的学生们提及高华的去世，说起他的研究的意义，难以自抑。

我想，许多学者可能跟我一样，除了对高华的学术成就由衷敬佩外，由高华的学术品格和研究历程，照见了自身的岁月及心迹，想到了中国知识界正在经历的蹉跎，不能不感慨系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历史学曾是中国大学文科中的显学，中国近现代史更曾得时势之宠。虽然那之前的三十年中，史学界曾是“革命”的重灾区，如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所控诉的，“每次政治运动来临，就拿历史学家开刀祭旗”。然而意气风发的年轻学子们，多以为历史不会再演，相信自此以往，执史学之器，可解中国社会的迷与惑，更能接递文化学术之薪火。

可是形势比人强。八十年代的风云让人们意识到，社会并不存在自然而然的发展轨道。与此同时，面对各种新思潮、新方法的涌人，思变求新，成学界一时风气。正是在那时，理科背景的金观涛和刘青峰破门而人，以

一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给史学界带来了极大震荡。犹记得，为了解陌生的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当时的史学研究生们找来“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等，生吞活剥，呀呀学新语……

潮涨潮退，水落石出。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外来文化冲击、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雨摧折，以及那以后国家对学术体制的再统制后，当人们以为有志于中国现当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代学人早已飘零四散时，大家却看到高华及其他几位学者的出色成果！

笔者自己，虽然也曾在那个时代修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但作为77级的小字辈，懵里懵懂，对那些带着沉重历史感和强烈思考冲动的大同学，以及那些具有学术自觉的学界新进们，既缺少了解，也无法共鸣。但是，却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与不同年龄层的许多学者一起，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种焦躁不安。凄惶之中，再难维持自己的专业兴趣，终于转向社会科学。

今天来看中国学术界的那一代学者，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依然坚守在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当代史领域而成就斐然的，不乏其人。但许多人已经与时俱进，转向诸如社会史、新文化史等领域，如高华等人坚持在现当代政治史，特别是中共党史，且执著于艰难追寻历史真相的人少之又少。我有时不免会想，像这样的研究，研究者即使具备持之以恒的学术使命感，以及非凡的政治道德勇气，他们又是以什么样的能力，去超越理论、方法等各种障碍或诱惑的呢？

我们不难理解，在当今中国大陆，学者倘以独立之精神，从事现当代政治史或中共党史研究，会面临什么样的政治压力和条件限制。但我觉得，高华研究的难得，还不止于此——在学术界，还有另一些东西会对学者构成难以抵挡的压力和限制，如来自于学术共同体的对于方法论的质疑，以及观点、理论创新对于学者的诱惑，等等。如果没有对这些问题的自觉意识和超越能力，那么，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即使是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

即使是在较少政治禁忌的研究领域，也未必真能以“揭示真相”作为始终不渝的学术使命。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学术圈，高华的研究成就依然那么引人注目的原因所在。

“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学家是不幸的。科学及科学规范毫不留情地占据、切割着历史学研究的固有阵地。”在金观涛和刘青峰合著的《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一文中，两位作者第一句话就直接道破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者面对的困境。其中既包含了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学者希望掌握新理论、新方法的紧迫感，也包含了他们要解密中国社会演化规律的使命感。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可以说，对西方科学规范和各种新史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中国的学者，特别是更年轻一代的学者，早已不再陌生。但非常遗憾的是，“揭示真相”逐渐成了不少人避而远之的过时理念，或者被一些人视作落后于时代的“传统史学”。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现当代”，本身就很难超越政治而被纳入史学的范畴。

对这些，高华又是如何面对的？这几日我在网络上寻找高华教授的学术信息，读到了他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及思考问题的一些阐释，让我对他的史学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一次访谈中，高华谈到，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说过，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这样的观点也被不少历史学家所认可。对此，高华认为：

> 如果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话都不无道理，距今较近，治史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写出“信史”的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对距当下不甚远的过去，史家也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时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远的过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又都是相对的时间的概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归根到底，

> 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也。

学者应该忠实于内心的道义准则和学术理念，突破方法及资料条件的限制，去探究社会及其历史的奥秘。今天的学界，到处充斥着浮躁的“为了理论的研究”以及“有形无魂的学术”，高华教授的史学观对于同时代和年轻一代的学者，无疑具有及时的警示与启迪意义。

想到这些，部分原因是由于我最近正重新拜读高华教授的《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从中获得了一些新的启示。

《身份和差异》是本薄薄的小册子，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相类似，出版在香港（由香港亚太研究所列于 USC Seminar Series No.17,2004年）。我是200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问时得到这本著作的，后来，又有一位有心的年轻朋友自香港回上海时带给我一本。据作者介绍，2001年3月至4月，他“以《‘阶级出身论’和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的题目，申请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做访问研究，利用该中心收藏丰富的当代中国史资料，对自己原有的研究文章进行了修改、充实，最后完成了这项研究”。

这本书由前言、“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区分敌、我、友：以“政治分层”重建社会（1949-1953）、强化革命专政和政治分层的细密化（1953-1956）、追求全面“纯化”的新世界（1957-1965）、结论几个部分组成，共69页。从题目、结构和内容含量来看，这很可能是高华教授另一本大著的框架设想和初步成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留下相关的手稿或研究笔记，但觉得，这项研究对我们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及政治系统的运行有极重要的意义，对了解高华的学术实践，也是不可忽略的角度。

虽然高华曾说过，“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但在这项研究中，高华实际上以他的方式，面对并处理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分层”是社会学重要的分支领域，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学主

流学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这个领域的研究多以宏观的制度分析或数理统计为方法特征，且以国际比较为重要的分析手段。有关中国的社会分层状况，包括1949年以来的社会分层制度的演变脉络，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国内外许许多多的研究成果了。但是，一些被回避的问题始终存在：如果我们不能将“身份”——包括户籍身份、职业身份和政治身份——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制度中的性质、地位、形成机制以及它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讲清楚，如果我们不能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分层系统背后的政治逻辑说明白，我们真能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做出恰如其分的说明吗？

高华在《身份和差异》中，以史家的敏锐和真诚，直接切入中国社会分层制度中最特殊也最黑暗的深层——政治身份歧视制度在当代中国的形成脉络和机制。有关这项研究的学术发现及意义，读者们自会有各自的解读。对我而言，这本著作让我意识到，学者固然要受到规范与格式的束缚，但规范与格式不应该构成学者逃避真问题的理由。对于隐蔽在“社会主义平等制度”背后的“身份制”，特别是被各种历史叙事所覆盖、没有什么现成数据留下的政治身份歧视，如果我们以所谓规范的制度分析方法或统计方法为研究的方法前提，如果缺乏潜入历史深处的勇气和能力，那么，研究者其实是很难将这些历史事实建构为学术命题，并梳理出其脉络和概貌的，即使人们对那些历史事实拥有普遍的记忆。

在这项研究中，高华借助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理论和视角，却没有囿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束缚，而是秉持史家追踪历史真相的一贯理念，以他对现当代中国政治历史以及中共党史、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等的研究积累和洞察力，有效地突破了支配性历史叙事以及研究资料的限制。《身份和差异》为我们厘清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政治身份歧视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基本脉络，并对这一制度背后的历史因素和政治机制做了深刻的剖析。我们单是从最后的注释、文献中，就可以一窥其“上下探究”之艰辛，其拼接、还原历史之不易。

不仅如此，高华的这本著作，还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殊为难得的历史切肤感。学者是否应该在学术研究中渗人、表达自已的价值或感受？对此，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高华教授的这项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这个议题的思考和讨论。他关于“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的见地，应该是有感而发。我们知道，高华教授本人曾是政治身份歧视的当事者。在这项有关政治分层制度的研究中，作者无疑会倾入自己的情感。个人的历史创伤体验，或许会影响到研究者的立场和角度。但是，就像我们从犹太裔学者对纳粹主义的研究中看到的那样，学者自身（或相关群体）的受害记忆，不仅可以构成他们追究历史的独特的动力源泉，还让历史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有了另一种可能：在面对所谓客观叙事的同时，可以感受到人类社会演绎的各种历史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这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应该感谢高华教授——他的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分层研究，让我们在以模型、数据等为工具，以制度及功能等等为问题指向的有关社会分层的社会学研究之外，看到了另外一个无可替代的重要文本。这个文本可以成为被工具化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解毒剂，也可看作学者如何跨越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隔的重要参照。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教授

南港忆高华

陈永发

高华患癌症以后，数度传来病危的消息，每次他转危为安，我心中都有“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温暖感觉。去年秋天，趁造访南京之便，特别与同事杨翠华前往他的学校公寓探视病情。我们在他堆满书籍和资料的房里坐了十几分钟，听他谈近况和病情，还站起来俯望窗外他每天散步养生的公共庭园，漫漶的记忆中那是一小撮低矮树丛围绕一座凉亭。久未谋面，他谈兴甚佳，坐在狭仄的客厅里，讲就医用药的情形。还记得他提到一种癞头蛤蟆的偏方，我对中药偏方向来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但当时只是高兴他的病情已在控制之中，不像前阵子病危消息在我脑中所激起的种种联想。天予其才，必不夺其年。这次电脑突然传来高华消息，一开始就是“沉恸哀悼”四个字，入眼顿觉冰凉麻木。

高华是这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最杰出的几位中国革命史学者之一。他研究毛泽东的崛起，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已被许多人视为经典的著作中呈现出矛盾感情：一方面高度肯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革命，也高度肯定毛泽东的领导能力，但另一方面却因为在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使命感背后，发现列宁同样在斯大林身上发现的好斗、倔强、专断、凶暴和残酷性格，故有否定中国共产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倾向。

毛泽东有不良的性格，小权可分，但大权势必独揽，凡是认为正确的道理，绝不容许下级提出异议或挑战，凡是向他提出异议或挑战的下级，也必定被他以雷霆万钧之力反击，或透过逼供信加以肉体消灭，或透过思想改造加以慑服。他的手段翻云覆雨，且以万物为刍狗，冷酷无情。高华并未把毛泽东性格中这个不良倾向讲得清清楚楚，但是藉着中共军队前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的回忆，告诉读者，早在1930年代初期，军队高干何笃才就已发现毛泽东这令人难以放心的一面，鱼与熊掌难兼，故于毛泽东和朱德的权力斗争过程中，最后选择支持性情宽容和缓的后者。不幸的是，毛泽东透过其后不断的党内斗争终于取得了中共这个民主集中制组织中的最崇高地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扩大和垄断思想、军事、政治、政策和组织等五大方面的领导，甚至以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典范，效法列宁和斯大林把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做法，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同时他把自己变成中共建党以来一贯主张正确的领导人物，在不断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取得思想诠释权，也取得其他所有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

毋庸置疑，毛泽东发挥其领导才能，终于把中共铸成有高度共识和钢铁纪律的战斗性组织，表面上“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全部”三个民主集中制原则并重，实际则是“下级服从上级”一个原则独大，并由他这个没有上级的最高上级任意解释何为多数、何为全部。高华没有任何机会进入中共中央档案馆阅读秘藏文献，可在反复咀嚼官方公布和民间出土的各种新资料之后，竟然也把红太阳升起的整个过程勾画得异常条理和清晰，尤其对思想斗争后面的权力运作描写得十分生动。他清楚地告诉读者，毛泽东究竟如何攀抵中共的权力高峰，成为中国万民顶首膜拜的惟一红太阳。当然，在厘清红太阳升起的过程中，高华也从毛泽东的性格方面解释了何以其晚年难免犯下“大跃进”和文革两大错误。

中共迄今为止仍然视垄断历史诠释权为重要立国原则，根本不容许这样一本书籍在中国大陆问世。幸运的是中共实行一国两制，1997年香港

由英国殖民地回归祖国之后，邓小平保证其“马照跑，舞照跳”，书籍报纸也照旧享受大英帝国给予的出版自由，所以2001年香港书店会出现高华大作热卖的状况。中国大陆当局管不到香港的出版社，却仍然视高华的书为毒蛇猛兽，下令海关严堵其流入大陆。因此想读此书的大陆读者，只能靠走私偷带，或是靠相当猖獗的盗版了。

高华的大作出版在拙作《延安的阴影》成书四年之后，其实在他之前，我也曾研究毛泽东与“富田事变”前后肃反的关系。虽然有共同的学术兴趣，但是我们却不认识彼此，应该连对方的名字都没听说过。1991年初的大雪天中，我从巴黎偷偷进入中国大陆旅行，在南京大学曾蒙高华的老师、太平天国史学者茅家琦先生接待，很可惜茅先生没有为我介绍他这位即将冒头的学生，失之交臂。

我注意到高华这个名字还是因为他1999年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对拙作《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的第一版提出严正批评，为深陷史料丛林中的我指点迷津。后来怎么认识，坦白说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成为朋友之后，曾邀请他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客，也曾聆听他讨论毛泽东时代阶级论的演变，还请我的老朋友林能士教授邀他不远千里到政治大学历史系讲学，零距离接触台湾学生和社会。听他聊天真是享受，只是他是老烟枪，坐不到半小时定要到室外抽口烟。2009年夏，我更曾为近代史研究所邀到他晚年所著最重要的一篇文稿——《对拙著〈红太阳〉一书批评的总回应》。这篇文章主要是与深具反省精神的“老延安”何方先生商榷，也可以说是他大作出版十周年的纪念文章，有点火气，却让我更加了解他写这本书的最初心情和一些背后预设。

高华还曾经花大功夫研究1950年以后的台湾历史，并出版过一些相关著作。这是他老师茅家琦主持的一项计划，也激起他全面了解蒋中正和蒋经国父子在毛泽东统治中国时期所作所为的热情：到底台湾是怎么走出一条中国现代化的路？其实，他愿意应邀到台湾讲课就附带着重要的目的：亲身体验一下台湾的政经环境和风土人情，并为其未来写作搜集有关史料。

我不知道他究竟搜集到什么史料，只知道他趁便阅读了大量台湾早期的“匪”情资料。他告诉我错得离谱，太多一厢情愿成分，没有太多史料价值。

高华所以要研究五十年代的台湾，其实跟他研究“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之动机一样，都是对中国近代命运的关怀。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研究过蒋中正为何会在1940年代的国共内战中一败涂地。2009年夏，他在云南休养了几个月后来到香港，参加“新中国建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老友重逢，特别高兴。几年不见，只见他满头银发，脸色白里透红，光泽鉴人；金边眼镜，穿白色格子西装，显得年轻俊美。当时我以为他已完全摆脱了肝癌梦魇，暗自为他高兴。他为我们报告国民党为何在大陆失败，口若悬河，神采飞扬，详细内容已记不得了，但是全场听众无不为他的分析和讨论所倾倒，我总算是真正见识到他的演说天才了。难怪他教过的政治大学历史系学生都对他赞不绝口，既可以学到台湾学不到的中共革命史，更可以享受他讲课的精彩。

高华发现肝癌前，曾经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所罗致。此事后来不能如愿，他又因病情不容劳累，想在南京大学里面换一个职位，从历史系转到高等研究所做研究，却再度因为当局所谓“政治问题”而无法遂愿。其实，高华有什么政治问题？他只是关怀中国历史命运的学者，以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探索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尽历史学者的本分而已。如果他跟一般历史学者有所不同，只是他以探索中国近现代命运为志业，研究做得特别仔细，故事讲得特别精彩，说理也特别清晰罢了。

现在他走了，我脑里有不同时期的高华身影，但以2009年夏这一天的高华为最明晰。他那天表现出来的学术真诚和追逐历史真相的执着，以及他的演讲才华，始终让我难以忘怀。我失去了一个可以切磋学问的好朋友，金观涛主编的十大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少了一个拔尖作者，而史学界从此更失去了可以照耀中共党史掩盖下历史真相的一颗明星。天意难知。

作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所研究员

共同的信念

崔卫平

高华先生去世的第二天，在三联书店的新年聚谈会上，我见到了章诒和老师。她说自己已经买好去南京的飞机票，前往送高华一程。当时心头一热。章老师古道热肠，侠义真情，为人肝胆相照，平时已多领教，但千里迢迢去见一个永远闭上眼睛的朋友，还是让人非常感动。后来得知，许多学者朋友，从不同的地方启程，专程去了高华的追悼会，当天下午还举行了追思会。

一般人们喜欢将最多的赞美，授予那些遥远年代的人们，因为这些早已经沉入地下的人们，不会再来分享在世者的荣耀。而高华得到同时代人们的如此肯定，得到同年龄学者的高度认同，这是他所享受的最高荣耀，也是这个人应得的。在他生病期间包括生命最后的日子，他一直与周围朋友们有着密切的交往，与他们继续交谈，秦晖先生甚至有一个访谈他的计划。遗憾，还是死神走在了前头。

高华的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2001 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人曾携带该书在首都机场被海关罚没。经过专家学者的进一步鉴定，最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撤销了最初的处罚以及一审判决的结论。这是2003年的事。支持这个判决的有一个基本事实：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以及许多文化单位，这本书可以公开借阅。这是一本惹是生非的书，也是一本石破天惊的书。

朋友们并没有过多地强调高华的勇气。在众多悼念文章中，不只一人提到了高华的谨慎、小心翼翼，尤其是他的恐惧。这位堪称一代天骄的当代学人，并没有从这个时代获得某种豁免权，能够摆脱普通人不得不忍受的那些。他多年的朋友许纪霖提醒人们，不要以为高华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但在种种纠结之后，他选择的依然是直行，是对良知和历史的担当”。许纪霖认为57岁逝去的高华，其病情及发展与他的著作发表之后承受的压力有关。张鸣也认为每个人都有恐惧，但是高华的恐惧对他本人的影响更大。

当高华被恐惧所困扰，他是一个忠直的人，忠直于自己周围的世界，捕捉到其中诡异的气氛。而他的朋友们如此谈论他，则与他分享同样的世界、同样的感受。尽管内心恐惧是一种难以启齿的东西，但是在这种谈论中，人们超出了他们的个人掩体，来到了一个共同的世界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艰难晦涩的东西，而不是看起来光滑无瑕的东西，保证了人们最大的现实性，也保证了一个人的人性：他能受伤害，他的人性是柔软的，而不是对环境采取无视或无动于衷的态度。

体认这种现实性，并非仅仅意味着力量的丧失，意味着行为的瘫痪，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境地，相反，是在现实性的条件之下，寻找人的力量和可能性，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这便是高华给人们做出的启示。许纪霖恰当地指出：“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依然在挣扎中担起重负。世人皆道无知者无畏，而知者有畏，依然选择了咬紧牙关前行，反而显出中国知识人的书生本色。”

这个传统的称呼——“书生本色”，放在高华身上的确最为贴切。这本在当代历史研究中如此重要的著作，没有列入任何一项国家研究计划，没有申请一分钱官方研究基金。本着一介书生求真、求知、求学问的精神，

高华拂去了那段历史身上的尘埃，也褪去了这段历史在今天依旧鲜艳的油彩。以这种方式，高华维护了知识界不媚权贵的高贵传统，也维护了知识人在金钱及欲望面前的尊严。借用另一个传统词汇，高华延续和继承了知识人“清流”这个脉络。

关于这些年高校如何被各种各样的科研计划所“贿赂”，一些教授们如何被各种课题经费所“购买”，已经为太多的人们所谈论。利益总是分化的，不同的利益将人们切割成不同单元，分散成互相隔离的小小原子，他们互相之间不能分享，也不能分享这个世界。甚至在某些学术领域，既没有共同认可的学术概念，也没有让人提神的共同话题。朱学勤在南京高华追思会上提到了“第一学术圈”和“第二学术圈”的划分，感谓九十年代之后，“八十年代最后一年开始形成的‘第二学术圈’将逐渐瓦解，被体制内‘第一学术圈’分化吸收”。

人们对于高华的认同，则是价值观的认同，是认同知识分子的本分（“书生本色”），是再次回到作为一个知识人的出发点，而不是以权贵或者金钱为出发点。围绕着高华的聚集和谈论，也许释放了比这些朋友们个人行为更多的东西，那就是知识界再度寻求自己的标准，作为知识人的标准，建立知识人的底线与共识，并呼吁更多的人们加入进来。

看看悼念高华的那些挽联，你会发现，这里也许是一个临时的共同体，有能量在人们之间热切地传递，有强有力的精神纽带将人们凝聚。它们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阿伦特所说的：“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利期待某种光明。这种光明与其说来自理论和概念，不如说来自一些男男女女在其生活和工作中，在几乎各种环境中点燃的不确定的、忽隐忽现的、通常是微弱的灯光，它照亮了尘世的时光距离。”

其中“男男女女在其生活中”这样的表达，令人动容。称之为“价值”，不是写在书本上的，而是浸没在具体生活的交往当中，是可见的和活生生的。惟其有价值内涵，才令生活更加鲜活。南京学者范泓回忆了当天下午还去看望了高华。高华被输了好多血。范泓帮助他用棉签按住那个针眼，

这时候高华的凝血机制已经很差了，他关照范泓按住的时间“要长一点”，并说别人的血进入自己的身体“感到痒痒的”，范泓因此“差不多要流泪了”。万万想不到的是，当天夜间高华撒手而去。

邵建对高华说的是：“你没有办完的事，我们接着做。”稍后几日，在北京举行的小型追思会上，金雁女士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她在发言中表达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契约”：“活着的人永远受那些死者的委托，欠死者的一笔债务。委托和债务是生者和死者之间的道义契约，生者作为幸存者，有责任承担起死者给人们留下的巨大的精神债务，每一个祭奠高华的人都有义务签下这份生死契约。”这份契约的内容关于：抗拒遗忘、抗拒说谎、抗拒伪造历史。前赴后继的人们，靠着某个共同的信念而紧紧连结在一起。

一群人在一起，形成某个圈子，若是没有共同价值，共同的理念，就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对于知识人尤其如此。这些人是通过分享在他们之间更为久远的传统、价值和概念，他们互相之间才能够分享、辨认和认同。在提倡“重构社会”的今天，知识人的学术标准、学术价值、学术共同体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它们不应淹没在一般的标准乃至物欲横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重提“知识界”这个话题是有意义的。

如果知识界能够坚持自己的标准，树立做人做学问的某些共识和尺度，一般人们或许会说，这个世界还不至于完全令人绝望，还有一些人在坚守。这个领域中并非人人都想成为高华，但至少可以做到让身边的高华不至于感到如此巨大的压力，让他们能够安心做学问做研究，让年轻学子能够真正学到一些东西。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向“伪历史叙事”挑战

董健

高华之死，令我悲痛，这悲痛压在内心深处，如铅似冰，既沉且冷。其实，近几年来，我年老“心硬”，加之患目疾难以读书，人已似死去一半，对生之留恋已大为淡漠，对死之悲感也已麻木，故对亲朋之死，多淡然处之。但此次高华被万恶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却难以抑制一种巨大的悲痛，因为我们太需要他了——单就正在蜕变成官场和商场的中国大学来说吧，现在多么需要像高华那样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学者来为失魂的大学招魂啊！

我最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要想知道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否堕落和衰败，当首看它大学的精神状态。要想知道大学的精神状态，只要看看大学校长和教授的言论就差不多了。清华校长发出政治誓言：大学要“精忠报党”，吓得老校友资中筠（一位当代颇有良知的学者！）不敢回母校参加那官味十足的百年庆典。北大校长则拒绝人类普世价值，不敢面对中国教育的严重问题，高调鼓吹文化民族主义。两校的教授中都有为文革、“大跃进”唱赞歌，为极左路线叫好者，种种丑态，不一而足。面对如此文化颓败、道德滑坡和精神萎缩，大部分知识分子失语，保持着思想奴隶的沉

默，这时我们更加渴望一代知识分子的新觉醒，因此也就更加惋惜高华这样的学者离我们而去。如果再给他十年八年，他定会有更精彩的史学著作问世，去打垮那些专制主义权势者所御用的“伪史学”。

我与高华同在南京大学任教，我在中文系，他在历史系。文史不分家，学问之道是相通的。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们在思想、精神上的沟通，多发生在大学受到政治干涉、学术自由受到权势与主流意识形态压迫的时候。文革结束以来的三十多年，大学和学术界的处境当然比文革前的十七年及文革十年间要好一些，毕竟是有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高层批准的历史问题决议的允诺嘛，但是，马列教条、“共产主义乌托邦”、极左路线……表现为一种新的文化专制主义，形成一种“压迫”力量，束缚着大学教育、学术、文艺等等。当这些东西与不健康的“市场”结合起来时，它们对人的戕害就更加可怕了。我和高华以及他的朋友们，都切身感到了这种压迫，每次相遇相谈，必然各抒所感，内心得到极大的快慰。要知道，近三十多年来，大学的教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沉沦；有的暴富，有的赤贫；有的雄踞“中心”，洋洋得意，有的被挤压在边缘，苦苦支撑；有的是“体制”所喜欢的“大左派”，有的是“领导”和“官儿们”所忌恨的“右派”；有的在做买卖，只有少数在做学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交到高华这样的朋友，不是一件大幸事吗？

高华是建国六十多年来敢于向“伪史学”挑战的第一人，但不是唯一者。大约是在2000年冬天，我去北京开会，去拜访我十分敬佩的李慎之先生。那时李慎之先生正因为“风雨苍黄五十年”这篇敢于面对历史真实，也就是敢于挑战“伪史学”的光芒四射的雄文而被责难、被“调查”，甚至传闻他已被捕。见面后我急着要知道他的安危，他淡淡地说“没事”，却随即把话题转到高华的大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他说：“高华送我的书，被我的一位延安时期的老战友借去不还，说还要再读一遍。请你叫高华再送我一本。”据李慎之先生说，那位老战友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亲历者，他说高华书所写都极真实，揭出了许多过去被政治宣传所掩盖、扭曲了的真

相。深刻的历史教训便是从这敢于面对历史真情的叙事中产生的。我把这叫做“真历史叙事”，与此相反的是“伪历史叙事”。后者只能制造历史谎言，起到“洗脑”、“愚民”的作用。我觉得，仅就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而言，这种谎言就有很多，直到今天它还受到一些人的辩护。

记得在与李慎之先生议论高华大作的过程中，我曾向李老指出 :“高华在书的‘后记’中说到，延安整风中形成的一些政治运作的思想和手段，直接影响到 1949 年建国后的历次运动，有人曾建议高华沿着原有路数，写建国后的一段历史。您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不就是以散文的形式，续写了高华的书吗？”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一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为长篇历史专著，一为短篇抒情散文，一者出自史学界的新秀，一者出自学术界的老手，共同发起了向“伪历史叙事”的挑战，把御用的“伪历史叙事”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大喜事、大好事。那时，八九风波以来的压抑和悲观还沉在我心头，李慎之先生鼓励说 :“一批新人已经起来了，他们是大有希望的。”记得他讲到学术界的新希望时，提到了秦晖、徐有渔、朱学勤、刘军宁以及高华等等。

高华出现在南京大学，亦非偶然。中国现代大学的兴起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现代大学的精神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想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一回事。这就是“五四”时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然而 1949 年以后，年年庆祝“五四”，我们却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大学成了执政党的政治工具，科学与民主消失，迷信与专制当道。知识分子沦为精神奴隶。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在 1958 至 1967 年间自杀者竟有七人之多，而自杀的原因大都是“革命”形势下的思想苦闷。他们只能在日记中偷偷表露对“革命大好形势”的不满。当时被说成是“大逆不道”，今天看来全是大实话。文革之后这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奴隶的地位，但再也不像以前那么驯服了。他们从被文革失败所撕开的专制体制的裂缝中看到了自由表达思想的可能。从 1977 年开始，真理的生产者不

再在中南海，而是在大学里，在学术界。真理生产者也不再是官僚，而是学者、文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转折。

从 1978 年到 1991 年，仅在南京大学就发生过五次“重大思想事件”，每一次都遭到当局的严厉查处和批评，但结果却是令官方十分难堪的。事关“真理标准”讨论的那一次，人尽皆知，这里不谈。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批判，由应学犁（蒋广学）撰文发起，当时遭到胡乔木的下令查处，但现在看来，对的是南大，错的是胡乔木。第三次是许志英发文论述 1919 年为新旧民主主义分界线不准确，也遭到胡乔木的严厉批判，并有不少学界同仁迫于胡的压力而来“围剿”许志英。现在许的观点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常识了。第四次是哲学系学生马丁（宋龙祥）谈市场经济的文章，受到胡乔木的指责和批判，现在马丁之说也已成了常识。第五次是 1990—1992 年，南京大学坚决抵制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发动的“清理文科”的政治运动。当时南京大学压力很大，但南大文科受到了保护，事后看来，这抵制是完全正确的，连教育部的人也不好意思再谈当年“清理文科”之事了。高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红太阳》不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胚胎期吗？

病魔只能夺走高华的自然生命，却无法泯灭他精神生产的成果。高华参与的对“伪史学”的挑战并未结束。一批新的史学家正在为“真史学”、“新史学”兴起而努力。他们重续古代良史董狐的精神，发扬现代启蒙思想，揭露一切历史谎言，追求历史之真，把历史的真面目交给当代大众。要认清未来的改革之路，必须重新审视近百年的历史。一股挑战“伪史学”、重写百年史的潮流正在涌动。走在这个潮流先头的史学家，如袁伟时、李锐、何方、辛子陵、雷颐、许纪霖、杨天石、章立凡、杨奎松、张鸣、安立志等等，都是我十分敬重的学者，也大都是高华的师与友。他们正在把史学从僵化的意识形态和腐朽的专制体制下解放出来，他们将以历史之笔从那无形的（文化的）“柏林墙”上挖下一块块的砖。物质的“柏林墙”已经倒了二十多年了，文化的、精神的“柏林墙”也正在一天天地解体、坍塌

下去，尽管有些人还在为之修补，但它总有一天会不可避免地消失在现代文明清除垃圾的行动中。

高华，你在短短的57年中，已经做得很好，就无憾地去吧。到另一个世界，你会见到李慎之、朱厚泽等思想解放的前辈、先导，共论中国的思想、精神问题。你大概不会忘记：当2001年李慎之先生来南京大学讲学时，你第二次当面送他《红太阳》，他老人家笑了笑说："精神的柏林墙，又被你捅了个大口子。"我永远记得李慎之的笑容和你的笑容，这笑容叫一些人——想在思想上奴役人的人——害怕。

作者为南京大学前副校长

历史揭示的宪法主旨

高全喜

高华教授走了，一如一年前蔡定剑教授的离世，令人忧伤不已。一说到高华，人们自然会想起他的宏篇巨制，它标志着一个历史学的时代。因为这些年自己跋涉于宪法学，我对高华著作的解读，不同于历史学的视域。在我看来，高华的著作以及他的思考，具有独特的宪法学蕴含，或者说，他的延安整风和毛泽东研究，对政治宪法学别有一番指导意义。

前不久我参加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会议，与许纪霖教授谈到他们学校几位中国现代史的教授，高华、杨奎松、沈志华，及他们殚精竭思所勾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于理解现代中国的立国之宪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国家总有自己的国家纲纪，不是宪法就是别的什么，它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中一言九鼎，势如破竹，不可抵挡。中国的宪法虽然可以写在纸上，中看不中用，但肯定还有另外一种实质上发挥强大作用的“宪法”。它们在哪里呢？高华他们的著作可以隐微地为我们开启一扇探其奥秘的门。

中国宪法其实与毛泽东思想有着一体性的关系，而这个思想的历史生成与高华的研究若合符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搞清楚延安整风运动，搞清楚高华的研究主题，也就对于中国宪法之政治性、阶级性、革命性、组织性有了历史的理解，对中国宪法本性有了真切的理解。我不知道高华对此

有何高见，一直希望到南京和他谈谈，从他那里得到一种历史学的评点。

然而，这个念头再也无法实现了。严搏非在南京追思会上说，五十年代的一代人开始去世了，我们六十年代的一代人该如何呢？时间过得好快啊！

1840 年以后的中国近现代史，鸦片战争以降，我们经历了三个半中国，一个是晚清开始到 1912 年的中华民国，其中辛亥革命是转折性的标志；第二个是 1927 年开始的中华民国，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共两党的斗争。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与毛泽东思想的崛起，决定了第三个中国的建国方略；此后，大陆中国作为主体，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而中华民国在台湾，则经历了专制独裁、民主宪政，至今这两个政治体还没有“宪法”性联合起来。对于真实地理解近现代中国，高华的著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样说，不仅是指其历史学价值，而是从政治学、宪法学来说的。中国共产党是以革命建国的，革命的正当性来自中国革命史，来自共产党的历史叙事，灵魂就是党的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高华历史学的独创性，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的话语，用一个客观性的史家的卓越见识与缜密的实证材料，揭示了这个现代中国的生命密码。

我从高华的笔锋中，读到的不仅仅是多年前风雨如晦或金光闪闪的历史，而是宪法背后的那股魔力——一种塑造中国国家本性的力量。也许高华并没有宪法学的意识，但他有良史的洞察力和正视幽暗的勇气。都说人民主权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根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高华的著作似乎并没有简单地服膺于这套说教，因为他看到的不是人民的个体，而是一个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苏格拉底被雅典的民众判处死刑，因为他亵渎了雅典的神灵。翻读着高华的著作，不禁黯然神伤，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个老大的中国是否走出了自己的神灵世界？我们是否已经不再需要一个救星了？对于现代中国公民来说，高华的著作无疑是一部宪法教科书，他启蒙我们走出神话世界，做一个自由担当的个体公民。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历史研究何为

李公明

历史学家高华的离去，形成了一次震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公共事件，强烈的良知、情感和学术关怀撞击着人们的心灵。在高华离去的背影中，人们的目光穿越学术体制而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巨大悲哀，感受到自由独立精神与学术良知的无比珍贵。可以期待的是，高华留下的学术遗产和思想效应，将会对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尤其当代史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是笼罩着革命硝烟和历史迷雾的地带，是真相与谎言搏斗的战场。有道德良知和深厚研究功力的学者在极受限制的条件下熬炼着自己的火眼金睛，以学术上的艰苦努力不断地突破禁区、超越藩篱，而在客观上推动的，不仅仅是该领域的学术进步，更是社会思想的进步。高华取得的学术成就固然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座丰碑，其在学术上求真奋斗的心路历程更有激励来者的思想价值，这也正是在悼念高华的思潮中最为人们所感动的。

早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当下的中共党史研究格局已经形成了三大板块：一是体制主宰下的主流话语研究体系，仍然在精心建构原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解释文本。高华曾对八十年代的主流研究体系做过这样的概括："在中

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甚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但也必须看到近十多年来的某些变化，在这种体系中也部分地出现了重视运用史料和轻度修正解释话语的趋向；二是以海外学界为主的研究话语，多是以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的理论为解释框架，角度多元和观点新颖是其重要特征；三是站在民间立场上的独立学术话语解释系统，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新一代学人的学术良知与研究功力，它强调的是以客观中立的立场和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为前提，对史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细心的考辨，避免由意识形态产生的有意或无意的“历史误读”，以求揭示历史真实、警醒世道人心。在这板块中既有体制内的研究者，也有体制外的自由写作者。但是身份在这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学术品格上相互引为同道，相互切磋。俯瞰这种学术景观是我们思考“现当代史何为”的基本前提，由此可以把高华的中共党史研究定位为民间立场话语体系中最优秀的代表。

但是，在上述三大板块背后，还应该看到，当下学术体制及学术资源的分配状况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对整体的研究事业产生严重的阻碍力，这也是高华的离去引发的“现当代史何为”的重要思考。在《红太阳》初版的“后记”中，高华自述：“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这种窘况与体制内科研经费黑洞之触目惊心相比，形成极大反差。

2005 年 5 月，广东美术馆举办“毛泽东时代美术展览”，研讨会在延安举行。我作为学术主持人邀请高华出席并做专题演讲，他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到延安，令我大为吃惊；在延安参观的时候，高华对各处史事如数家珍，更使我感叹。一位以研究延安整风运动而闻名于国际史学界的学

者竟然在体制下得不到任何资助，在这种状况中坚持做自己的研究，是需要有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的。在其著作《革命年代》的后记中，高华自述："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止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进入新世纪后，资本和权力的扩张使得思考的空间更显得逼仄，面对着渗入到大学校园的项目化、数字化、标准化的压力，只能自我放逐，而埋头读书和研究，成了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径……"这对于理解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心路历程以及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形成有着重要价值。

从高华的境遇可以看到，在权力化、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语境中，真正的学术规范、自由的探索精神、独立的学术立场，难有立锥之地。在政治学、历史学这样的人文社科领域，许多被知识界和社会公众争相阅读、反复讨论的学术专著根本不可能从被垄断的科研机制中获得任何研究资源，研究者的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高华的现当代史研究在思想上的巨大感召力首先来自于他的学术良知和道德勇气，从理想主义的道德批判精神到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品格，这正是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赖以建立的稳固根基。在民间立场的研究话语体系的入口处可以刻一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作为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历史学家，高华的学术遗产首先体现在学术性方面的巨大超越，这是连体制内的一些主流史学家都不得不佩服的。这种超越来自于高华一贯强调的学术研究原则：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穷搜博采、细心考辨、谨慎运用的史料观，以求还原历史语境而避免"历史误读"、严肃揭示历史真实的研究宗旨。关于当代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他在"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见《革命年代》）中有比较全面的阐释，他的经验和识见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借鉴。他认为"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他指出政治人物的文集都为事后所编，并非完全意义上

的历史原件，在使用时要小心、谨慎、考辨、核查。领导人的年谱也一样，他认为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回避敏感问题。而在文革中由红卫兵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则很有价值，其中收入的毛泽东的讲话大都未编入大陆出版的各种毛泽东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在延安时，我也曾向他请教关于文革中红卫兵出版物的资料可信性，他认为绝不能因为其民间性而忽略其重大价值。他在文章中强调要有史学研究的基本功底、小心的鉴别与判断和史识的修养和眼光，才能“真正读懂这些语意曾被膨胀或修饰的浩如烟海的史料”。

《红太阳》对此有更深入的阐述：“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八十年代以后，官方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阅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在这里，中国的生活体验和对史料的广泛涉猎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有时候阅读海外学者的大著，虽然常有框架、观点之新颖的收获，但也时常会感到由于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而造成的隔膜。

非常难得的是，《红太阳》能够运用目前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资料做出如此深入和充满洞见的研究。显然，在像高华这样有深厚学术功力和求真求实精神的学者面前，企图以封锁资料来阻挠历史研究的步伐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就这个问题我也曾与做过党史研究、出版了《革命人》一书的单世联兄有过讨论。我们都认为，就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和学术成果而言，已经可以使研究者解决对历史问题的基本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基本评价。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高华对公开史料的卓越运用和深刻识见是极其令人叹服的，他为仍处于威权时代中的研究者树立了很好的范例：即使只依靠公开出版物，通过精心的辨别和研究，也可以对当代中国历史的真相与谎言、

历史人物的伟大与卑劣、历史发展趋向的光明与黑暗等等根本性的问题做出判断。

在分析高华的学术遗产时，应该看到高华在“史料关”之上有着更基本的价值观作为研究的动力，这更是回应“现当代史何为”的核心命题，是民间写作话语体系的安身立命之处。关于价值与情感的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在《红太阳》的后记中，高华这样写道：“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我认为这种情感和观念是高华真实的想法，也是对目前悼念和评论高华时出现某种过于简单化、标签化的回应；二是他对自己的现当代史研究的价值关怀做出了明确表述：“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我想这两方面是认识和评价高华的基本要点，也是在“现当代史何为”的价值观问题上的很好表述。

在研究模式上，高华分别对“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两种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革命叙事’仍有其重要意义，它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人们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的问题。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可以把不同的认识框架置放在一个平台上，为叙述者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在这个开放性的平台上，一种中立、客观的历史观，即‘灰色的历史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或许能够成为人们认识、分析历史现象的新的工具。”（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五十年代历史研究为例》）因此，史学界也有人把高华看作是“新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也为“现当代史何为”提供了新的思考。

最后，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现当代史何为”思考还有重要的一环，即“修辞策略”的问题。在后威权主义时代的史学写作中，有写作经验的作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了“修辞学家”，高华在这种修辞景观中更是难得的高手，其笔法之简练、修辞把握之准确和重现历史氛围之生动，都使人佩服不已。这既表现出探索的自由、学术的尊严，同时以建设性的努力推动着不可阻挡的学术独立的潮流。从中可以看到，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在后威权时代的史学写作已经走向成熟，正如史料的封锁无法阻挡探索者敏锐的目光一样，文字的“过滤”也难以阻隔在修辞策略推动下奔涌的思想交流。

高华走了，但他写的书会有更多人读，会从深夜一直读到天亮——读书的人都相信天一定会亮的。一位历史学家的离去成为他所书写的历史中的一页，作为历史学家还能祈求有更好的告别仪式吗？

作者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

独特的高华

林达

圣诞后，正在旅途中。收到景明来信，说高华走了。

她同时向几个朋友转达了高华最后的问候，她说："高华情况恶化后，口很干，电话来了，都由太太代答。这天他接过电话，问我，圣诞节到哪里去玩？然后让我问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将一个个名字念出来。"

景明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她很懊悔："我是那么笨，完全没有想到他是道别，失去最后的机会告诉他：高华，我们爱你。"我想，她不是没有料到，是内心拒绝相信。高华病后五年里，景明每隔两三天会打电话去问候，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会以最轻松得体幽默的方式化解和安慰。假如偶有几天没接到景明电话，高华反而会担心她出什么事了。如高华夫人说，景明是上帝给我们送来的天使。在高华面前，她是最无须懊悔的一个。

我是痛悔的。尤其收到来自天堂门前的问候，心被瞬间穿透，留下一个永远不敢回望的处所。得到的太多，回报的太少太少。那种感觉，就像回想自己已经远去的亲人。相信这样的感觉很多朋友都有。行文至此，深感语言贫乏。此后一个月，我一直不由自主地看有关高华的消息和文章。

常常想，同代人里，高华为何如此与众不同，没有一个人如高华那样，能得到那么多不同类型朋友的敬重；他的成就似乎在把他推到高处，他却始终很自然，就踏踏实实留在地面，没有一点点虚饰，真实、干净。有朋友试图在寻找塑造他的文化因素，我发现，没什么道理可讲，别人也学不来，是上帝就把他造成这样，对高华，一切只是顺其天性。

2010年底，高华病重恶化来上海检查。我恰在上海探亲，就和朋友一起去医院探望，顺便一起吃饭聊天。去之前想到他的病情，我们不由紧张。可面前的高华还是原来那个透亮的高华，心态健康、积极光明，就像没有病。高华不是“硬汉子”，紧张害怕难过都有，他只是给自己划出一条线来，就能做到不跨越过去。见面后，还是他的历史话题，还是对历史细节的啧啧惊叹和称奇。探视变成了愉快聊天，聊得我们忘记了他的凶险病情。照料他的孙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对高华的照顾尽心、周到、细心。看后来的追悼会录像，那个难以控制想去唤醒高华的，就是小孙。饭后他起身去厕所，因腹水起立缓慢，看他小心移步的背影，听小孙匆匆谈检查结果，我们的心骤然落入谷底。高华回到桌旁，从我们不会掩饰脸色而猜到话题，就主动和我们聊了几句自己的情况，平平静静。

所以，不论何时提到高华，我不由提到的都是他的“人”，而不是“学”。而高华是以其学术成就而成为高华的。高华有他独特的学术轨迹。

我一直对景明说，高华其实是个特别老实的孩子。高华曾回忆，在文革中的1967年，他看到街上的大字报有“叶剑英讲话”，说毛主席要活到一百五十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的脑袋轰的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了。”他赶紧去找了自己的小朋友贺军，告诉他这个消息。他们讨论下来，才一致认为，这不可能，这“违反了科学常识”。那年高华将临十三岁。

走过那个时代的孩子都会同意，童年的高华和贺军并不寻常。在1967年，家庭受到文革抄家和冲击的孩子不计其数，但是，因此就能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不要说小孩，成年人都属凤毛麟角。而对待一个毛泽东

高寿年龄的细节上，又看得出他不但还是个孩子，而且是个认真老实的孩子。

高华是天生对历史好奇，看他从小的阅读方向，入迷地细心琢磨历史、时事中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是天生素质。可是，是什么决定了他的研究专题？感谢景明转来了高华学生黄骏找到的资料，让我看到高华内心深藏的情结。

那是高华父亲年轻时代的故事。父亲的好友殷毅为父亲写的个人史《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高华为论文集《在历史的风陵渡口》写的序言中说："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十二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夫的舅舅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这样的青年，很自然就希望改变社会不公，容易被左翼思潮吸引，他在1946年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由于学了报务，最后他作为共产党间谍，进入当时首都南京的国民党情报机构核心，国防部二厅所属电信总台，此后又进入南京警察厅本部电信科总台。这经历几乎就是电视剧《潜伏》主角的翻版。

1949年以后，高华的父亲任职南京市军管会公安局电信科副科长。五十年代初，南京开始对原来地下党彻底清理整顿，和高华父亲一起被送苏州审查的有十个干部，其中八个是分局和局级干部，结果，其中九名被当作"敌人"逮捕，有人后来死在狱中，几十年后又全部平反。高华父亲虽幸免入狱，也在1954年被开除党籍；在1955年毫无证据地被定为"国民党特务"，调去小学教书；1958年在没有任何"右派"言论的情况下被定为"右派"，被殴打，发配农场劳动；在1966年的文革，为避免被打死，他离家出逃，高华那年十二岁。这是自己的父亲，共产党的功臣。共产党这样残酷地对"自己人"肃整残害，入迷于历史的高华要寻找谜底，这和张鸣研究土改一样。高华只有参透了延安整风、张鸣只有厘清了土改，他们才可能安心地转向其他历史选题，那是他们生命中必须先解的情结，而龙应台，百转千回，也必要倾其心力走向《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高华父亲就是一个“后延安整风”的牺牲者。

高华是个老实人，在胡杰的采访中，他承认自己认知的过程：“那本《革命年代》是我二十年写的文章的一部分。这里面有些变化，有些没有变化……立此存照，让读者可以看到哪些变，哪些没有变。这几十年，我讲的五零年代，就是我成长的（时期），长期我们受到主流思想的影响，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也是对这种影响在审视它、重新观察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它再见。”

1999 年，高华在写完《红太阳》之时，他的否定是有限度的。他有清楚的价值取向 ：“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同时，他不仅对红色思潮的大量参与者充满同情——他们就是他的父亲，而且，他“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他的否定是聚焦在党内“极左思潮”、“权谋政治”下内部整肃的“观念和范式”。他父亲遭遇的整肃，正是这一套路的翻版。我想，这是高华在 1999 年的真实认知。一方面，他清醒地看到红色思潮是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他也还在告别主流影响的大半途。但是其后，高华的一系列研究如《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等等，其否定已经完全超越了政党内部整肃，而扩展到他父亲在遭到整肃之前，也参与其间的那场旨在颠覆法治的革命。他在为他父亲参与的革命所迫害的灵魂和被镇压的冤魂伸张正义——那里有张鸣的父亲、胡平的父亲，有他许多好友们的父亲 ；待高华在其最后岁月读到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的反应特别强烈。在他俯首痛哭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会想到 1949 年自己父亲的潜伏，他是此方的孤胆英雄，彼方的内奸罪人。那千千万万如他父亲一样的人，怀着美好理想，却误陷一个注定要进入的悲剧。而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另有一种超越“敌我”的价值在。高华写道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大陆的许多读者，……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

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此时的高华，早已经和父亲参与的革命，和“主流影响”，彻底割裂。

高华的写作是平衡的。你可以看到偶有内心强烈的触动欲跃出纸面，但他天性的温和及学者修养令他克制。我也在想，为什么读《红太阳》，一点读不出高华当时的认知局限，它无疑能够成为传世之作？谜底就在于老实的高华要求自己“求实求真为依归”。高华写道，“我认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因此，高华的著作只从“实证研究”角度作分析性论述。虽然他认为对这段历史作理论分析也“极为重要”，但是谨慎的高华“又担心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他着力于细节记录、“个案研究”。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便不由自主地超越了他的局限。假如他不在后记中强调，读者甚至不会感受到这种局限的存在。高华记录的史实在说话，在突破这个局限。

高华走后，我重读高华这七百页巨著，条理如此清晰。他选择延安整风为主要对象是极为明智的。因为延安整风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全套整肃套路，它涵盖了整肃“观念、范式”的方方面面，配合编织的天罗地网已经成熟成型。而它的结局恰是绝对个人权威的确立——“红太阳上升”。但是，高华的严谨纪实，同时在指点一条他自己并没有用理论去阐述的清晰路径。

延安整风是一场内部整肃，而它是1930年至1931年“肃AB团”的一个扩大翻版。它的依据是国际红色思潮的理论，确立一个超越传统法治中“罪与非罪”概念的阶级敌人概念。这个敌对阶级，就是有产阶级。红色思潮起于西方工业革命突发的劳资冲突，所以“敌我”阶级对立中，资产阶级成为“敌”，产业工人成为“我”。红色思潮涌入中国后，高华指出，它演变为一场农民革命。毛泽东的党变为“农民党”。也就是说，地主富农，甚至在极端时期任何有地产的人，都可能成为那个“敌”，而国民党被认为是“代表了”有产阶级，才成敌对政党。而党内“土地政策”的“极左路线”和非“极左路线”之争，只是这个“敌”的群体是只含“地富”，还是再划入中农甚至一切有土地者。毛泽东曾主张没收所有私有土地。

于是，传统社会“罪”和“法”的概念被颠覆。不偷不抢不杀人放火，但合法拥有土地者，是“有罪”的敌人，杀了这样的“私产拥有者”，可以是阶级斗争的正常行为，所以这样杀人可以是“无罪”的。从“土地革命”（或者叫“土地改革”）切入的对“法”的颠覆，这是中共党内整肃的理论根源。任何人只要被划入这样的“敌人”阵营，就可以被任意杀戮。

高华让我们看到，甚至在“肃AB团”两年之前，最早的内部整肃，即毛泽东在1928年领导的“洗党”，打击矛头就已经“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而“肃AB团”的借口就是：“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地富路线”控制，并且可以“给负责人任意扣上‘富农帽子’”。“洗党”起于在内部“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那些被戴“富农帽子”、被当作“地主富农”整肃的干部，当然不是真的拥有土地的“真地富”，而是被指控其思想立场站在地富一边，推行了“地富路线”。此刻，说不清道不明的“思想路线罪”，对被整肃的干部，已经可以是遭受酷刑和被处极刑的借口了。沾上“地富”二字，就获得了高华所说的“镇压的正当性”。

高华的如实描述，让我们看到一条线索，延安整风之前是“肃AB团”，“肃AB团”之前是“洗党”，再轻轻一扯，就可以扯出关键：起源于西方的红色思潮理论在为中国共产党内整肃异己提供“观念”：每一个红区的建立，“打土豪”都是第一要素。

地主富农成为可任意处置的“敌人”群体，成为受迫害的核心。法律被彻底颠覆后，定罪失去标准。有罪群体和罪名就可以任意扩大，只要和无限扩大的罪名沾点边就可以是死罪。罪名可以是有产者，可以是有产者的子女，可以是有利于有产者存在的政党，可以是有利于保存有产者的路线甚至想法。“肃AB团”时，红军“群众”有“动摇”、“表现不好的”，都“应捉拿”、“究办”了。那是个人人自危的可怕社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名红军内肃出了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为革命出生

人死的红军遭遇尚如此，遑论“外人”。

发端于苏俄的逼供、酷刑、杀戮、划罪提供了肃、整“范式”，再结合中国式“个人权谋”的娴熟运作，从打土豪、杀地富，发展到内部肃整，尤其是延安整风，高华展现了不断操练至炉火纯青的细致发展过程，令人信服。

1949 年，五万万四千万中国同胞，许多扭着刚学的秧歌舞迎来延安。他们对这段延安历史毫无了解，对这套“观念和范式”实质意味着法治消失毫无概念，所以也不会料到，他们从此再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安全。他们没有去延安，延安走向他们。还是从土改开始，红区打土豪变为全国性土改，开始搅动漩涡，延安进入城市，敌人的罪名也在扩大。从此大家身不由己，一批批被慢慢卷入被一次次整肃，漩涡越转越快，卷入的人越来越多，直至文革深渊。成千万成千万的人，没能幸存。更可悲的是，幸存者也还是一脸迷茫，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大家又速速接受解释：噩梦只是起于中国偶遇几个坏蛋搅局，现在一切拨乱反正，可以高枕无忧。

1991 年，文革结束十五年。父亲已经平反，高华进入红后代的行列，而且是红色功臣之后。随文革后“平反”的逐步展开，父辈恢复名誉，这是许许多多红二代的共同经历。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忙于准备接手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一些人利用家族优势拓展事业，许多人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也有一些人，在筹备将军子女合唱团，歌唱悠悠延河水、巍巍宝塔山，颂扬父辈起于延安圣地的荣耀业绩。

此刻，只有那个独特的高华，老老实实读了太多太多真实的延安故事，他在简陋公寓的一个写字台前坐下，一个老式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红色先驱苏俄的崩溃。

高华展开稿纸。是时候了，他要写出这段几近淹没的历史，领我们，他现在和未来的朋友们，领他的同胞们，去看看他们灾难的源头。

作者为旅美作家

像一滴水一样

刘瑜

想赞美一个人纯真时，我总想起一个比喻，“他就像一滴水一样”。

在我眼里，高华老师就“像一滴水一样”。有很多人认为高华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而研究党史，对此我当然毫不怀疑。但是我私下认为，对于高老师来说，与社会责任感同样重要的，是对历史真相孩童般的好奇心。《红太阳》一书的后记中提到，他 9 岁时就对《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10 岁时就开始关注中苏论战，12 岁就无师自通学会了“领导排名学”……想想大多数人以及自己十来岁时的兴趣所在，我不禁感慨：高华是个天生的历史学家。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帮助他克服恐惧、清贫、孤单，写出了拨云见日的史论。也是这种好奇心，让 57 岁的他身上依然有 9 岁儿童的纯真。

我只见过高老师一次。2010 年 12 月，我从一个好友那得知他重病，于是邀约了几个好友同去南京看他。

那次见到高华老师，他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谦和，笑容灿烂，谈起党史时神采飞扬。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疾病面前的尊严感。我们去看他时，他已经被诊断肝癌三年，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身体极其

虚弱，甚至在我们与他交谈的过程中，需要时不时用手微微顶住腹部，似乎是在扛住突袭的疼痛。但是他脸上完全没有一个重症病人的期期艾艾，好像我们不是在一间病房里，而是在一个咖啡馆里，一群年轻人围着一个长辈谈笑风生。由于他的病情，我们没有久留，但短短半个小时的交谈，话题却很快跳到苏斯洛夫、王鼎钧的回忆录、文革史……高老师对这些如数家珍，又似一个博物馆长在领着一群孩子参观他心爱的博物馆。

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看望一个陌生的病人，这在我的人生中迄今是唯一一次。之前我和高华老师没有任何私交，我甚至从未去过南京，鲁莽地跑去看望他，纯粹是出于一个读者对一个作者的敬仰之心。更确切地说，是义务。

2003 年左右，我逐步确立了将“毛时代的群众路线”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之前我对毛时代的各种史料虽然略有所知，但有限的知识七零八落、散乱无章，没有一根可以把它们串连起来的线索。虽然也在师友的引导下读了一些中外学术著作，但始终云山雾罩。此时，我读到了高华老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对于当时的我，犹如在一个神秘洞穴里摸黑前行时，突然手里被塞进一把手电筒，一下子看到了洞穴里的来路和去路，岩壁与潜流。说看望高华老师对我是义务，是因为一个黑暗中迷路的人，应当感谢那个往她手里塞进一把手电筒的人。

很多人认为《红太阳》是一部传世之作，我认为这个说法毫不夸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华能够接触到的史料极其有限，所以若干年后，随着更多档案解密，也许这本书里的某些史料细节会过时，但我相信这本书的价值却不会因之动摇。因为此书的价值不在于史料方面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而在于它敏锐的问题意识——通过剖析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红太阳》揭示了中国革命最核心的“秘密”：中国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

哪怕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极其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在政治动员的规模、程度与可持续性上，其他国家都

与中国无法相比，而这种空前绝后的政治动员又与共产党“思想改造”的能力密切相关。正是人们的“灵魂”被改造了，才使得革命的血雨腥风得以狂飙突进。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最独特的地方，在其洗脑之成功——以至于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毛时代的中国几乎不需要秘密警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监视以及人的自我监督已经足以支撑这个制度的运转。

在《红太阳》一书里，我们读到了这种思想改造的“配方”：资源的垄断式供给＋全面改写历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闭＋观念的强制灌输＋在群体中孤立个体＋暴力威胁；以及这种“思想改造”外科手术般的“程序”：封闭的学习文件 -> 组织群体对个体进行批评与攻击 -> 自我羞辱式的检查与“交心” -> 必要时的惩罚甚至暴力惩罚 -> 纠偏阶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这一套“配方”与“程序”，在以后历次整风运动中屡试不爽，甚至被日常化和制度化，效果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亿万颗头脑中只有一颗可以自由运转”的悲剧。

很多人将《红太阳》看作一部“射日”之作，意即它解构了毛主席的神话。不错，高华的确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细腻的分析呈现了“红太阳”的权谋之术。在高华笔下，毛就像马基雅维利笔下的那个君主，同时有着狐狸的狡猾与狮子的凶猛。

他的政治策略正如他的军事策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避实击虚……但是，《红太阳》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它甚至不仅仅关于一场运动，在最深的层面上，它是对人性的一次深描。在书中，毛的每一次胜利，都由“围观者们”的冷漠、嫉妒甚至贪婪推波助澜。那个著名的句式似乎也可以用在这里：“当他打AB团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AB团；当他打王明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明；当他打王实味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实味……”从这个意义上，《红太阳》不仅仅是一本剖析“王道”之书，更是一本关于人性幽暗之寓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左祸”起源，有各种隔靴搔痒的看法：有的认

为左祸始于文革，有的认为始于反右，更远的追溯到土改，但在高华之前，极少有人去碰触“延安”这个神话。美国学者 Mark Selden七十年代出版九十年代重版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也对“延安模式”做了浪漫主义的诠释。直到今天，“延安精神”在很多人眼里，仍然代表着理想主义、官民平等和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正是因此，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思性分析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说很多人的研究是将一个神话故事的枝节剪去，他却是将一个神话连根拔起。不少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文革。进一步倒推，如果没有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就不会有“大跃进”的成功；再推，如果没有土改镇反的成功，反右也不可能如此顺畅……在这个倒推的过程中，高华则走得更远：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毛主席万岁”。今天很多人鞭笞文革中的“人性沦丧”，却对延安时期的“理想主义”赞赏有加。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华的研究显示，延安整风中的人人过关“向党交心”，与文革中万众一心挥舞红宝书的场景，不过是多米诺骨牌第一张与最后一张的关系而已。

然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只是高华老师的一面。勇气与严谨的结合，才使《红太阳》成为经典。因为解构“红太阳”的神话，自然冒犯了诸多神话信徒，一些恼羞成怒的信徒至今仍在攻击高华。但事实上，真正仔细阅读高华的书与文章，就会发现，高华绝不是一个偏激的“愤青”。他持重温和，细密精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评价历史人物总是引导读者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这是为什么高华老师需要精耕细作十多年。在档案不解密、资料来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高华老师的写作无异于一个巨型的“填字游戏”——他需要不断从已知的信息中推导未知的信息，而这种推导最终依赖于他对浩渺史料的掌握、比照、揣摩和衔接。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和另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叠加来看，也许就否证了第三个人回忆录中的不经意的另一句话。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出现暗示了某个信息，而另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缺席则指向另一个信

息。正是对史料精细的把握和分析，将高华锻炼成了一个党史知识方面的“福尔摩斯”。有朋友告诉我，一位有机会接触绝密档案的学者曾感叹，高华在没有读过档案的情况下所推理出来的历史图景，竟与他看到的档案所揭示的图景惊人一致。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我不清楚，但数十年苦心研读已使高华成为党史研究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却是有目共睹。

《一九八四》中，历史是不断被改写的——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不同的历史，于是历史就像橡皮泥一样不断被揉捏、被塑造成“政治正确”的形状服务于现实政治。在《红太阳》中，延安整风的成功恰恰依赖于毛对党史的“重塑”——纷繁复杂的党史被归结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史，而“正确路线”的最卓越代表自然是“红太阳”本人。今天，权力的巩固仍然借助于对历史的改写与屏蔽。历史一层层被擦掉，或者被涂抹，失忆的人群也因此成为价值的木偶。

高华这样“不识时务”的历史学家则是在带领人们出走，突破对记忆的这种封锁。据说《红太阳》一书，是高华在深夜的厨房里，就着昏暗灯光写出来的。我想象那个画面，觉得无比动人，仿佛看见一个地质学家在翻山越岭，搜寻过去留下的遗迹，试图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湖泊，那里曾经有一座冰川。《一九八四》里，男主角温斯顿发现一个和自己一样怀疑历史被伪造的“同类”时无比惊喜，他举杯对那个人说：“为了过去。”不知道高华老师是否读过这本书，如果读过，读到这里也许会心有戚戚。是的，不是为了“美好的未来”，不是为了“欣欣向荣的今天”，他的努力仅仅是“为了过去”，为了一就是一，而不是零或者二，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的过去。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家国心事”与“新价值”

钱永祥

有些书，叙述的故事有如梦魇，惊悚的气氛令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产生生理上的恐惧感觉。以前我读库切的《等待野蛮人》或者赛尔各的《图拉也夫同志》，读完之后逃回现实，都有松一口气的侥幸感。但是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那感觉特别不愉快、特别生理（physical）：我的鼻子里老是缠绕着一股淡淡的血腥气味，令我有点作呕，合上书依然不散。我当时想：作者在如此不愉快的主题与资料中长年浸淫，并且写成一本大书，性格上怕也多少变得不很愉快吧！

等我结识高华本人，才发现他是一位温和友善、相信身边有好事好人、有点天真乐观但又很认真的人。研究党史的阴暗面，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梦魇伤痕。我们交往不深、不频繁，但是2004年他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半年，我们来往确实比较多。我内人曾陪他去参观《联合报》编辑部。2004年的大选日傍晚（也就是3·19枪击案的次日），他在我家一起观看选举开票。可惜的是，那段期间他说的话，我记得的不多，印象最深是他说台北跟南京有些街景很相像。

在那之后，我们很少联络。这中间，我听说他患病，自然盼望他静心

调养，更不愿意打扰他。

到了2010年4月间,香港周保松先生转来熊景明女士嘱托的高华文章，我才设法与高华恢复联系。那篇文章题为“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发表在我主编的《思想》第15期。2011年4月底，高华又将他读王鼎钧先生回忆录的感想写成《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寄给我，在《思想》第18期发表。4月初我去上海，趁便与王晓渔兄结伴去南京探望他，那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身罹重病的高华，会挑选龙应台与王鼎钧这两本书撰写读后感，并且让我们在台湾发表，并不是偶然。高华写道：“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龙应台的书正是发掘这批“失败者”中小人物的命运；王鼎钧书则是这样一位“失败者”的亲笔自述。但是高华为什么对这几百万从大陆逃难到台湾的“外省人”发生兴趣？他自己的南京背景也许不无关系，但主要是他想要重现1949这个历史年份，想捕捉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历史转折的“意义”。毕竟,用高华的话说,1949年是一个“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对“时间开始了”的新中国如此，对狼狈紧张惊魂未定的台湾也是如此。

我自己对1949的变局也充满关注与迷惑。由于身在台湾、身为中华民国的公民，我的问题是：要不要承认、接受1949年的革命？怎么承认？道理其实并不复杂，这里所谓承认1949，不过就是承认现实罢了。可是从那个庞大的现实出发，我在台湾的生命史，便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叙述方式，从独到统、从左到右、从国民党政权到中共政权，不一而足，却都不是我能安然接受的选项。如何承认1949，同时能摆脱该年份的大局面所规定的几个选项，于我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高华生在新中国，成长生活于钟山风雨苍黄中，从海峡彼岸关注1949，立足点与心情感受与我不可能一样，但两岸前三十年的坎坷颠簸历史尽收眼底之后，他与我不约而同地从那一段历史出发，展望出路。他是

历史学家，深知历史是不可能被切断、被遗忘、从零开始的，因此出路难免受制于历史所给的条件。但他并不像多数历史学者那样“冷眼看尽世情”，反而比我这个因为读哲学而患有“逃避历史”职业病的人，更多了几分素朴的殷切与信心。（这也是他身上的一项迷人特质所在。）他毫不忌讳这三个字读起来带有童音，只是明白率真地追问“新价值”如何在台湾萌芽成长，也针对大陆“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新价值”——这是高华摆脱 1949 困局的出路所在。

十年之前，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后记”中，“新价值”就已经在召唤。高华写道：“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但他又说：“如果说本书的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对中共革命抱持深切的同情和理解，自然高度认同 1949 的结局；但是对五四新价值深以为然，又要求扬弃 1949 的先天、后天之不足，为当年的失败者终能振作而鼓掌，为当年的胜利者坐失历史契机而惋惜，但是，盼望失败者与胜利者携手继续前进的心情则一。这种态度，在今天的两岸形势之下，可找得到道德资源来铺陈、经营？

我猜测，这些围绕着“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的思绪与关怀，陪伴着高华的最后几年，直到去世。他在去世前一年所写的一篇文章，结尾处引录“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表达了他的未竟抱负，也正是他留赠无数朋友与读者的自画像。

作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作为历史学的“党史”

秦晖

高华走的那天我在郑州，当时有个报纸要发纪念专版，打手机向我约稿，还托我再约几篇。2011 年 12 月 29 日我从郑州直接到南京为高华兄送行，次日的场面十分感人，这里就无需多说了。在追思会上我又约了两篇，不料回到北京报纸就来道歉，说是关于高华的文字不让发了。真作孽呀！

高华走了，对我来说这实在突然。尽管早就预感到有这么一天。就在 25 日我还和他通了电话，告诉他我想到南京看他。一些朋友建议我们长谈一次，把他未能写出来的一些想法通过这种方式记录下来。我跟他商量说：知道他的身体情况一次不能谈太多，我可以在南京住几天，每天谈一点。他说也很希望这样，但是眼下不行，因为他的病情有了些新情况，过些日子再说。我知道，他说的新情况是指病情恶化，但是电话中他的声音听起来还很洪亮，很有底气的样子，也就想他说的“过些日子再说”，可能真的是还有机会。

可是晚上与刚从南京回来的张鸣兄通电话，他告知了他了解的情况，并且难过地说，恐怕不会有这个机会了。我听了心里真是非常难受，但是当时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二十多个小时，他就与我们永别了。电话里听

到噩耗，简直不敢相信。高华只有57岁，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年龄通常都还算是年富力强的。他走得实在太早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在改革前处于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下。这意识形态本来也不能说一无是处，所谓意识形态其实无非就是一种信仰，一套价值取向，其他国家包括西方的人文学科也不能说就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价值观的作用也未必一定是负面的。不仅人文学科，就是自然科学在西方的发展也与宗教有关，从托勒密到哥白尼、牛顿都是宗教情感强烈的人物，他们的研究也都是在追求“上帝的真理”的热情下进行的。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各种实用的技术很发达，但形而上的科学体系却因为“没有用”而乏人问津。这个所谓“李约瑟之谜”的答案就在于宗教。正是形而上的信仰——不一定就是基督教，从古希腊人的逻各斯信仰到思想自由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都是如此——使人对那些“没有用”的学问注入了无限热情。

而特定的价值观也会产生特定的问题意识，以及看问题的特定角度，这些都是人文学科产生知识增量的巨大动力。尽管强烈的价值取向也会遮蔽许多问题，形成先入为主的各种先见或偏见，但是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下这不要紧。只要偏见是多元的，并非只允许一种偏见独尊、称霸，甚至“罢黜百家”，搞思想垄断和异端审判，那么各种偏见就可以在自由争鸣中相生相克，互纠互补，使人兼听则明。这就是所谓各种“深刻的片面性”促进思想和学术进步的道理。

在西方历史上，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曾经得益于神学的启迪，但是后来却出现了“科学沦为神学的奴婢”的积弊，以至于需要经历启蒙运动来实现思想解放。其实，那句话确切地说应当是“科学沦为神权的奴婢”。没有独尊的“神权”，神学本身并不能妨碍科学的独立性。相反，无神论下独尊的“王权”不但能压抑人文学科的发展，也同样可以、甚至更有可能使自然科学成为奴婢。苏联的李森科主义就是一个例子。

改革三十多年来，我国虽然因为信仰之外的原因一直没有搞“非毛化”，

但“红太阳”走下神坛的历程也已经几十年了。然而几十年来对毛泽东的学理性研究一直兴不起来，其中的障碍也很难说是信仰本身。如今的“红太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虔诚敬畏的对象，而是“有用”的工具：他既是打击异己的“金棍子”，又是获取权势与利益的“敲门砖”。于是，我们今天的学术一方面已经高度市场化，为了种种好处而争课题、要经费、评职称、上评委，成为搞学问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很多真正有价值的真学问仍然被冷落。因为“危险”，也因为“没用”。

而高华正是甘冒“危险”而坚持搞“没用”之学的佼佼者。许多人已经指出他在《红太阳》等著作中挑战禁区的勇气。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也应该指出在如今这个时代，这种“犯禁”的风险毕竟比改革前小多了。事实上，高华因“犯禁”也付出了代价，如几年前他曾有调往上海华东师大之举，因遭到政治干预，结果铩羽而归，这对他的伤害不小。但他毕竟没有直接面临文字狱式的打击。更伤害他的恐怕是那些来自所谓“学术界”一些人的流言蜚语，说他只有这么一本书，论文也不多，而且都不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从来没有课题，更得不到什么什么级别的大奖。总之，无非是说他做的那些研究得不到主旋律的承认，因而不能带来世俗利益，是“没有用”的东西。

因此，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不是不需要信仰，恰恰相反，只有具有坚定信念的人，才能既有犯禁的勇气，又有甘于寂寞、不趋时流、摆脱名缰利锁而致力于爱智求真的恒心。高华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如果说中国的史学过去曾经受到“神权”的束缚，那么不难理解，现代史就是史学中被扭曲最甚的领域，而现代史中的“党史”就更不用说了。在我们的官定学科目录上，中共党史这门学问所属的一级学科甚至不是历史学，而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换言之，党史不被认为是历史，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这当然就很难实事求是。

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门学问也成了求真求实者们最有开拓潜力的地方。这些年来，在新材料发现和思想解放两个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现代史成为

史学中进展最大的领域，可以说是群星闪耀，而高华则是最早闪现光华的星之一。可惜的是，如今他又成了最早陨落的星之一。

我原来想，现代史如今到处都是可开拓的问题，又已经有了那么些有成就的开拓者作为榜样，这次来为高华送行的年轻人也非常多，他的事业后继有人应该不成问题。但在南京的追思会上杨奎松兄的一番话却使我很受打击。他说他们这批人现在很担心后继无人。因为如今在大学立足越来越靠核心期刊文章和申请项目，而在现代史、党史这种领域，讲真话的人是很难申请到项目和在核心期刊发文的。高华的研究就基本上都发在大陆之外，《红太阳》也是在香港出的，他也从来不申请项目。我们这些人已经过了那些坎（指评职称等），可以不管那些了，可是现在年轻人要是不管那些，在高校就难以立足。偏偏党史这类研究又十分依赖档案等内部资料，如果不是已经立足的研究者连查档案的证明也很难开出来。不像研究儒家什么的就凭那些经典，没在高校立足的业余爱好者也能搞出点名堂。所以年轻人很少能接他们的班，他们的弟子虽然不少，但能坚持下来不改行的很少，他很担心后继无人。我听了这话，十分郁闷。

现在像袁腾飞这样的年轻人不按官方口径说话很大胆，但如果不仅是发发牢骚而是要讲史实，那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很多话未必有确凿的根据，不是他们不想研究，而是由于资料封锁。我们不像民主国家，有制度规定一定时限之后公务档案必须开放给公众阅览。没有一定身份你根本没法去查档案，而当局只公布对宣传有利的资料。面对这种状况怎么办呢？

我想到两点。一是在实事求是方面实行大人物小人物同等尺度的要求，老百姓对头头的指责如果偏离事实，其所应承担的压力应该与头头对老百姓指责偏离事实同样。如果我国大量“上整下”的冤假错案里，领导人不承担责任或只承担微小责任，就不能把重大责任加之于“下怨上”而偏离事实者。例如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有根据吗？如果这根据与事实偏离而他可以不负责任，袁腾飞对他的指责与事实偏离也应当如此。“同等尺度要求”的另一个体现是：指责偏离事实应当承担的责任应

当与吹捧偏离事实所承担的责任相等。如果吹捧领袖可以不顾事实而不负责任，那么要求别人为指责领袖偏离事实负责任就不合理。这与平民百姓之间的日常褒贬是不同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的好话过分一点没什么，说他的坏话过分在某些情况下就应当被追究诽谤或名誉损害的责任，这是因为好话不会造成伤害，而坏话则会伤人。但对于公权力人物就不一样，对公权力人物的褒贬实际上是一种公共事务评论，两个方向偏离事实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是一样的，所以承担责任也应该一样。

第二点就是垄断证据的一方应该负举证责任。比方说现在所有档案都垄断在你的手里，你又不让我查，那么我猜疑你（猜疑也要有根据，但那与“证实”所需的证据是不同的，猜疑可以捕风捉影，证实就要铁证如山）做了某事，你如果否认，就要举证证明无此事。而我只要举出怀疑的根据就够了。这种“举证责任倒置”是民主国家舆论监督、限制权力的有效办法。当然，这并不是提倡对权势者不信任乱怀疑，更不是以怀疑代替严格证实。同时这只是舆论监督的原则而不是实证研究的原则。作为史学研究者是不应该没有充分证据就轻率乱说的，但老百姓发牢骚你不能要求他们必须掌握铁证如山。这可以促使权势者比一般老百姓更加自律，也可以促使他们公开信息尊重老百姓的知情权。正是因为垄断证据就要负举证责任，统治者就不敢无限制地封闭、乃至销毁档案了。民主国家会开放过一定时限的公务档案供公众查阅，就是基于这一压力。

当然，这是就社会公众而言应取的态度，即如果有人对垄断信息的统治者捕风捉影，公众应该要求统治者提供信息，负“无错举证责任”。但是这并不是研究者应取的态度。研究者是不能满足于捕风捉影的，哪怕以受到信息封锁为理由。所以如上所述，这只是舆论监督的原则而不是实证研究的原则。史学研究当然是要讲实证的。而由于有上面讲的那些困难，中国现代史、党史的研究者就比一般的史学家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工作。

克服上述困难的路子无非是两条：或者是努力去寻求途径与机会打破资料封锁，从尘封的档案中揭示历史的真相。这除了主观努力以外，有时

真的要靠机遇。像杨奎松、沈志华、王海光等教授都是这种努力和机遇叠加而造就的现代史大家。与他们相比，高华得到的这种机遇并不多。

第二条路就是以出众的史识和分析能力，在公开的资料中辨析出历史的真相。这正是高华的强项。《红太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本奇书，奇就奇在全书丰富的史料基本上都取自公开发表的报刊书籍资料，并没有用什么深宫秘档、内幕爆料。但这些确凿无疑的史料在他卓越的史识发掘下，却令人恍然大悟：真相原来如此！而且更有趣的是，高华这本书出版时很多材料还未解密，可是解密后，却常常是证明了高华当时的判断。很多年轻朋友都告诉我，这本书是他们的启蒙读物。它不仅使他们知道了很多长期被遮蔽的事情，而且使他们体会到什么是一个史家所具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当然，有的卫道士对此是很不服气的。高华去世后，就有人进行了这样的指责：

> 就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自序（秦按：应为后记）中，作者承认：七年心血而成的这部历史著作，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他无法得到更为重要的原始资料。事实上，正如他所讲的，有关延安整风的绝大多数档案文献都没有公开。就是俄罗斯已经公开的四十年代档案，与延安整风有关的也极少。此外，由于此书不是研究课题，仅是他个人的兴趣，所以他也没有能力对曾经参与延安整风的在世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既无重要原始资料，又未采访参与者，居然写了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结论只有一个：否定伟人。这种“历史”教授干的事，令人无法理解。

此公当然无法理解，因为他想不通，体制性的资料封锁和垄断如此严密，怎么就挡不住真相的“泄露”？难道权力不是万能的么？只要不利于自己的“绝大多数档案文献都没有公开”，寻求真相的努力也不被官方立为研究课题，当然就可以一手遮天了。然而，如果“绝大多数档案文献都

没有公开”就不能“否定伟人”,那么在不公开这些文件之前你又凭什么“肯定伟人”呢?

高华不是袁腾飞，严谨的史学家也不能仅仅从事舆论监督者这样的使命。在高华这本书后的征引文献目录中列举的文献多达五百余种，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由中共文献研究部门编辑整理、公开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当然，与“绝大多数档案文献都没有公开”相比，这些已经由我党公开的文献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可以相信，与“敌对分子”专门搜集攻击我党的炮弹相反，这些由我党自己公开的文献都经过严格的挑选、审查和编辑处理,是被认为有利于我党正面形象的。如果从这样的文献中都能找到“否定伟人”的论据，难道那些没有公开的“绝大多数档案文献”就只能存在“肯定伟人”的论据？倘若如此，封锁这些文献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高华研究专著的实证性比袁腾飞的批评性言论强得不可以道里计，但如果有人要否定二者，“举证责任倒置”的要求却是同样适用的。我前面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那些人对袁腾飞的否定尚且不能服人，他们想要否定高华，那就更是蚍蜉撼大树了。

我与高华是2000年在香港第一次见面的，当时《红太阳》刚刚问世。后来我们在南京、北京、悉尼、台北、昆明等地多次见面，天南地北地聊过很多。我觉得与他已经发表的著述相比，他实际上还有许多想法和心得没有来得及见诸文字。当初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他分工撰写的那一卷，也没有来得及写成。虽然他知道自己身患绝症后，由于担心延误集体项目就辞去了这个工作，但同仁们仍然寄希望于他的康复，很长时间没有换人，而他自己实际上也一直没有放弃研究。

但是这些都已来不及成文了。因此在得知他病危后，一些朋友才有了希望以谈话录音方式保留他的思考的想法。虽然这一次没有见着他的面，但在过去的交往中，他的确讲过一些非常睿智的想法。

在我们相识不久，有次聊天时他就提到：建国伊始，毛泽东那一次访问苏联，待了很长时间。这是一次奇怪的旅行，各种传说也很多。但是高

华提到了一个细节，则是很少有人注意的。他说虽然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王稼祥等等在毛泽东访苏的前后都频繁地去过苏联，但唯独毛泽东在苏联的绝大部分时间，除了最后几天周恩来赶来签订条约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毛身边一个高层都没有，只有他的秘书之类。他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一个国家第一把手，做最重要的国事访问，应该是有一个团队的，为什么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呢？甚至中苏最高层会谈，苏联方面是以斯大林为首的一批政治局委员，中国方面就只有毛泽东一人。为什么？

高华说，他觉得，这是因为毛不想让他的高层同僚，看到他在斯大林面前的那种样子，讲简单一点，就是严重有损他的形象。所以他身边都是一些低层的人，所有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没有带去。我觉得他这个判断确实非常独到。很多人都知道毛在那个不同寻常的时候，在苏联呆了那么长时间，也都觉得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后来，我看到了苏联方面的科瓦廖夫回忆录也提到这个细节。科瓦廖夫的判断与高华类似："毛泽东不知道他同斯大林见面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他担心他的威信可能受到损害，不愿让中国同志看到这样的场面。"但是科瓦廖夫的回忆录，尤其是中译文，是很晚近（我记得是 2005 年）才发表的。我和高华谈话时（记得就是在 2000 年左右），他应该并没有看到这个回忆录。但是关于这个细节，高华观察非常仔细。

诸如此类的观察，高华还有很多。但是可惜这些东西他都没能在纸面上留下来。我们、后人应该把他这个未尽的事业继续下去。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突破封锁线之后

苏阳

[一]

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仅仅写到1945年。在给这部鸿篇巨制作结的时候，作者轻轻点到文革，惜墨如金地只用了几十个字。他提到刘少奇"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跟彭真、陆定一等几位延安整风时期的迫害者们一起，成了受迫害的对象。[01] 其实，借助高华锻打出来的主题，读者很容易续上红太阳升起后三十年的中国情状。以迫害和被迫害为例，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安排了一个叫古大存的干部专门做代表发言。古大存的讲话充满激情，为延安整风中血腥的"审干"和"抢救运动"大唱赞歌 。[02] 然而，他自己在五十年代初的政治运动中，从广东省省委书记变为"反党集团"的头目。整肃古大存和其他广东干部的总帅是陶铸。[03] 陶铸本人在文革伊始，也就是古大存含冤而死的那一年，

0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第643–644页。
02. 同上，第639–640页。
03. 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

先是以毛钦定的红人身份调到中央领导文革，旋即被打成全国“最大的保皇派”，次年开始被拉着在北京的大会小会上被批斗，1969 年在软禁中死去。[01]

迫害当然不局限于高层人物。深度和广度往往触目惊心。高华引用毛泽东本人文章的记载：1930 年末在江西苏区，斗争运动在四万多红军中查肃了四千四百余名“AB 团”分子，“其中几十个‘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02] 后来的延安整风当然不仅仅触及思想。如果说王实味的处决反应了其惨烈的一面，高华从薄一波的回忆录挖掘出来的文字则可以显示镇压的广度：

> 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住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03]

读者可以轻易看到，这个暴烈的传统在 1945 年以后的中国的延续和升级。据古大存的秘书杨立记载，1952 年广东土改复查查处广东各级干部 6515 名，占干部总数的 5.2%。他们的罪名是“和平土改”。土改运动继而转向血腥暴力，“硬追硬逼，捆绑吊打”，据 1953 年统计，仅粤西地区一年自杀 1165 人。[04] 暴力传统随历次运动升级：镇反的滥杀，反右的扩大，后来是文革的种种极端（包括对地富分子不分男女老幼的集体屠杀）。

通过书写 1945 年以前的历史，高华已经刻画出毛治中国的灵魂和基

---

01. 郑笑枫、舒玲：《陶铸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02.《红太阳》，第 17 页。
03. 同上，第 530 页。
04. 杨立：《带刺的红玫瑰》，第 130 、 143 页。

因。对其的识别和刻画，为我们认识 1945 年后的中国提供了钥匙。虽然作者也对毛的性格，以及这些性格特质对历史事件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红太阳》却不单是又一本写毛泽东的书。高华不仅写出了毛泽东，更重要的是写出了毛主义。一旦写出了毛主义，1945 年以后的政治历史就不写而写了。这就是《红太阳》的精彩之处和超人之处。换言之，如果说作为历史学家的高华就在他的字里行间，那么还有一个藏在文字背后的高华值得我们去理解、去感念。纪念高华的挑战之一，是读懂作为政治社会学家的高华，读懂他对毛主义的描摹，读懂他对毛主义成因的探索。

高华有名，但同时又容易被误读。一些常见的阅读习惯，在读者与高华之间设下迷雾。比如 2000 年在《二十一世纪》期刊上登的一个书评，曾引起高华本人关注。他在后来给《红太阳》写“出版十年感言”的时候，还专门回应了这位化名遇资州的学者。[01] 遇在他的书评里说：“‘延安整风’尽管相当残酷、极左、阴谋，其实相当必要。”“毛泽东不愧为真正的政治领袖……从党的生命和使命来看，毛搞整风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可谓历史危难中的当仁不让。”“说到残酷，现实政治有过不残酷的吗？”“所谓极左，不左还算共产党吗？”[02]

这些评论反映出来的道德是非观，是以胜负功利为历史评价的准绳，显然跟高华以人道生命为准绳不同。这样的分野不是学术问题，不值得争论。但除此之外，遇资州这些话看似有道理，学理上也至少代表着三重迷雾。

第一重迷雾，把功过评判当作史学的主要目的。中国治史的一个传统里，事实为评判服务，所以评判作品水平高下的标准，是最后对人和事下的“定论”是否“公允”。这样，一本写毛的书，中心议题好像就应该是回答毛是否道德，是否伟大。虽然高华本人也在书里嵌入了价值评判的主题，认为延安之路背离了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但是主导他选择材料和组织路径的，不是评判，而是解释。这一点我在下文详议。

01.《〈红太阳〉出版十年感言》。

02. 遇资州：《谁是“我们”及其“敌人”》，《二十一世纪》，2000 年 8 月号。

第二重迷雾，混淆意识形态和手段。且不说无数左派政治力量其实反对暴力，更不消说左派意识形态里的暴力主张一般对外而非对内。就拿使用暴力的中共来说，暴力使用的强弱在不同时期有天壤之别。太阳是逐渐升起来的，暴力也是一步步变得更加广泛、更加惨烈。遇资州所谓“现实政治没有不残酷”之说，无法解释为什么1937年之前中共在遇到政策纠纷时往往用民主讨论的方式解决，也无法解释为什么1976年之后，以暴力迫害为基本手段的群众运动就逐渐消失了。

第三重迷雾，拿非原则的暴力迫害混同于原则性的敌我斗争。毛主义政治迫害，受害人并不是他们所宣称的马克思阶级分析意义上的敌人，而是依据便利，依据当时权力斗争的派系而定。每一波运动的标准不同，同一次运动里标准也不停在变。绝大多数被害人都是无辜的。

高华分析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他对人和事的道义评判，如上文提到的他对民主自由精神被遗弃的感慨，也不在于他对毛个人权谋策略的归纳，如毛的所谓的两面性和“势”、“道”、“术”。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对毛的“升起”以及以此相连的斗争文化的形成，提出了全新的、细致的、多层次的解释。

文革爆发的时候，也是高华开始思考学术问题的时候，毛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斗争文化在中国更是肆虐到了顶点。文革开始几个月内，毛就轻松地在1966年8月的会议上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从位子上踢下来；全国群众在他神奇的魔棒下相互厮杀。如何理解毛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官修历史提供的解释是，毛泽东的一贯正确，所谓“毛主席用兵真有神”；庸俗的社会学指向国人的封建皇权思想；庸俗的历史学则是以毛的“邪恶”程度来解释悲剧和荒唐的程度。高华的解释运用了相互融合的两条进路：其一，毛的权势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是过程发生论；其二，毛的权势之建立与另外一个社会现象——斗争文化的建构相互依存，是社会变量关系论。

据高华记载，1937年刘少奇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存在极大的分歧，当时的首脑张闻天并没有把他打成反党的“敌人”，更谈不上向基层群众深

挖什么分子。延安整风以前，政策讨论和组织变动的基本模式还不是在精英和群众层面同时搞“路线斗争”。这种模式萌芽于毛本人在江西苏区搞的 AB 团斗争。二十世纪 20 年代末的这场运动起因于毛要解决他的政治竞争者，赣西游击区领导人李文林。这里面既有政策之争，也有权势之争。上文说到，AB 团运动整肃了 10% 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很多人被处决。下面两段话对反复经历了运动的中国人来说是多么熟悉：

> 赣西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到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赛维克化。（红四军《前委通告第一号》）[01]

> AB 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绝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拷打审问忖度其说法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 AB 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赣西南特委紧急通告》）[02]

这种把权力争夺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模式在延安整风中逐渐完善，并成为全党政治生活的基本模式。到 1945 年七大以后，这套基因就像装完待用的计算机程序一样融入中共机体。难怪后来的运动，几乎就是对过去的克隆。难怪上文提到的遇资州惊讶地写道：“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使真相大白：原来‘整风运动’跟我经历过的文革没有什么两样。”[03] 这种惊讶，应该是很多读者的普遍反应。造成这种惊讶不是偶然的，是《红太阳》的解释力使然，是过程发生论的功效。

从社会变量的关系论来看，把毛的权力上升放在与斗争文化形成的关

01.《红太阳》，第 13 页。
02. 同上，第 15 页。
03. 遇资州：《谁是“我们”及其“敌人”》。

系里分析，就避免了过分强调毛的个人因素——无论是他的能力、策略，还是道德。换言之，这提供了怎样理解个人因素通向权力顶峰的中间变量。通常人们爱把毛主义里面的个人崇拜理解为“克里斯马”型的权威，即权力源自毛本人的极大魅力，以及群众中存在的强烈的跟随需要。《红太阳》对毛的能力的肯定以及对其权谋的叙述，给这种理解以一定的支持。但是，我们同时可以读到，毛从长征到整风，每一步都把个人的影响力做出两种外在的安排。在组织方面，他不断把他得到的优势传化为党的正式的组织规则（比如在党内排名，三人制还是一人制等等），同时，通过惩罚异己和安插亲信，还给党组织加上了非正式组织的维度。在文化方面，毛逐步通过刘少奇等亲信推广他的政策理念和理论基础，垄断对历史的书写，显示唯有自己一贯正确。与之相配套，在基层培育了一套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的程序，并与政治迫害相结合使之更为有效。如此，在高华的分析里，毛的权威不是天赋的魅力，而是克里斯马、法理权威和传统权威三者的组合。三者相互强化，共同增长的过程，就是“红太阳”升起的过程。

[二]

对历史背后理论问题的自觉，使高华有了驰骋的自由空间，避免了一些常见的误区。高华的与众不同，固然因为他的勤奋和才情，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相对自由的心态，一种在无数限制和威胁下难得的自由心态。跟大多数当代史学者相比，他更能够避开思维的陷阱，远离精神的禁锢。

很多写毛和毛时代的人，虽然也有勇气突破禁区，研究不被当局恩准的题目，但他们往往在突破封锁线以后，仍然处于无形的束缚之中。这是一种自我束缚。第一个误区是拿党的长期宣传形成的“公论”做研究靶子。他们提出的所谓学术问题，往往是被宣传搅迷了的伪问题。以文革研究为例，近年有一些很好的学者醉心于探讨周恩来、叶剑英等德高望重的人物在文革中的行为，从而“发现”他们其实也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更有一些学者用功

去索证林彪的品德。显然，这些“学问”之所以表面上显得有价值，完全是因为官修历史中周恩来和叶剑英以高尚面目出现，以及林彪背负恶名。其实，共产党的总理（周）和军委副主席（叶）积极参与运动，或者一个被共产党清除的人物（林）有些可取之处，无非是些常识而已。第二个误区是过于纠缠善恶的道德判断，试图用毛的恶，或者制度的恶来解释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的悲剧。这种取向，必然延续共产文化里的敌我对立叙事方法，妖魔化所要描述的对象。有一本著名的写毛泽东的书居然用大批判时候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中共官员有多坏。第三个误区是写给大众而不是写给专家。而大众品味自然对问题的提出和求证都没有学术要求，给低劣作品的生产提供了空间。造成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有关历史被官方冻结，大众有广泛的兴趣；二是因为禁区的存在使得规范的著作寥寥无几，似乎没有什么标准存在。

高华则不同。他没有停留在对官修历史的甄别上，没有把历史停留在一个个善恶或者权谋智略的故事上。从这一角度看，高华是国内学者中能够突破思维禁锢，提出有价值的问题的佼佼者。《红太阳》等著述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切入了问题的深处，完全得益于高华自觉地、有意识地回避官方语言所引发的问题。在《红太阳》一书前言里，他这样写道：“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主流话语系统中有关整风运动的论断展开辩驳……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叙述和解释。”所以我看，不以辩驳中共宣传为研究目标，应该是高华获得治学自由的秘密之一。

2008 年《国际中国研究评论》发表长文评述《红太阳》一书。英文学术期刊登载长文评介一本用中文出版的书，这是罕见的。作者 David Chang 称，高书“无论在资料和分析方面都是历史研究的杰出成就”。[01] 社会学家傅高义教授是研究毛时代中国历史的先驱之一，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出版了影响深远的巨著《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我就是在该书上第一次读到上述有关陶铸整肃古大存

01. David Cheng Chang, “Gao Hua, Hong taiyang shi zenyang shengqi de (How Did the Red Sun Rise over Yan’an? A History of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15 (2008): 4, pp.515–521.

的广东历史。他这样称赞高华的工作："高华善用迄今可获得的资料，将史料的原始素材，如此完美地建构为学术表述。"在追思高华的时候，他称高华的去世"使当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失去一位最杰出的学者"。另一位中国历史研究大师周锡瑞也有极高的评价，他说："作为一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他在著作中寻求理解毛时代中国的组织原则，包括他所成长的'文革'时期。"《红太阳》一书是"客观冷静、实事求是的典范之作"。

[三]

说到自由，不能不提高华受到的限制。我和他仅有一面之缘。对他著述背后的工作和生活，我只是听到很多传说。高华于所在的制度和组织处于边缘，所要面临的种种限制，不难想见。

我和高华短暂交往的一个场景，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熊景明老师请我们和高华一起吃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看上去令人惊奇的正常，一点不像是被诊断患有肝癌好几年的人。江南儒生的白面，却有粗密刚利的头发。白面和头发之间，双目炯然。说了名字以后，他说他读过我写的一篇关于文革的文章，还夸了它。我想说些怎么佩服《红太阳》的立意、架构和写法之类的话，又觉得那样太俗太拍马屁。问了他的健康和治疗后，我寻思着怎么来问我要问的问题。嗫嚅之中，饭就吃完了。

中文大学建在崇山峻岭之中。奇石险势，深堑难关。我们这些来访问小住的人有时候调侃说，这里更适合打游击而不是做学问。但是在这个安静的、没有烦扰的环境里，不见得有无限的自由。至少走动起来特别不方便：无论从图书馆到餐厅，还是从住所到教室，都要"行山"，攀爬越级，气喘吁吁。晚饭以后，夜幕降临，路灯亮起来。香港的八月，闷热得像蒸笼一样。那天还似有似无地下着细雨。我们所住的雅礼宾馆门前正好有一段难得的平坦路面，一二百米长短。高华就在这一小段平路上走路，来来

回回，一遍又一遍。他笑笑对我说："我这样的身体，不能停下锻炼。"

在繁华闹市的尽头，在癌症的阴影下，高华开辟了一小片自由的空间。此时他正泰然自若地利用着、享受着这一点点的自由。远处有迷蒙的海湾和迷蒙的楼群，稍近处不时传来高架桥上汽车的轰鸣。

作者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副教授

呼唤年轻一代的高华

杨奎松

[一]

最早知道高华病危的消息，是读到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黄凯平12月2日夜里的来信。信称他已是到了病危之时，来日不多了。想到高老师正是学术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诸文字，和高老师的学生商量后，希望能有一两位同辈学人与他长聊几次，每次录音，既为高华老师留下他的思考，也让学界少些遗憾。因此，他们分别联系了秦晖和我，秦晖已经答应尽快前去南京，想知道我近期是否方便来做这件事情。

凯平的来信让我很吃惊，因为不久前我还和高华通过电话，一两周前他还表示想要我帮他在华东师大再招一位他认为很不错的博士考生。因此，我有些疑惑地答复凯平说，我很愿意来做这件事，但，一、我要弄清楚这个消息是否准确；二、我要知道这是否是他和他家人的想法。

我所以没有马上承诺去做这件事，不是怀疑高华病危的消息有假，而是内心里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曾经两度照顾过病危的患者，非常

清楚身为家属在亲人病危时的心情。越是危重的病人，就越是需要休息和避免交叉感染的危险，太多外人的探视，特别是长时间的交谈，只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危险。家属总是希望会有奇迹出现，事实上我也亲历过这样的奇迹。因此，我在回信中特别写了这样一句话希望他了解："说到底，高华固然是我们大家的，但最主要还是他的亲人的。"

的确，这是我由衷的想法，而且我真的不觉得他会这样快离去。

[二]

我开始与高华联系去南京探视的事情，在电话里他的声音依旧很洪亮，还在关心那个准备跟他读学位的学生，"你来，我正好可以和你说说那个学生的情况"。

由于华东师大这边的几位高华的老朋友也都想去看他，需要协调时间，而大家的时间一直凑不到一起，最后拖到12月16日才成行。同行的仍是此前探视时的几位：沈志华、李丹慧、张济顺和我。仍有一两位教授想去，但因事没有同行。

病床上的高华同我们上次探视时几乎没有两样，虽因黄疸面色略黄，人稍显削瘦，却仍旧谈笑风生，双眼炯炯有神。据他和太太讲，癌症控制得一直非常好，至今都没有发现有转移的情况，这次住进来主要是肝的功能出了问题，出现了黄疸，连输了三次血之后，黄疸已经明显消退了，目前的治疗主要是保肝，即设法使肝功能恢复正常。

25年前我因感染急性肝炎不仅住过院，出过黄疸，一度还发展到病危的程度，当时浑身上下像是涂了厚厚一层黄色粉末，一碰都会往下掉似的，因此看到高华黄疸的情况，真的觉得他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

两年前我们在香港开会时，太太曾给高华拍过几张很不错的照片，这次来的时候，太太特别要求过来再拍几张，做一个相册送给他。但看到半躺在床上的高华，我还是多少有点犹豫，因此小声问高华的太太小刘："能

和高华合个影吗？”

没想到高华听到了，大声说：“可以。”说着，便侧身要坐起来。我连忙问：“行不行？”高华笑得很开心：“没问题。”他指挥小刘把床头摇起来，后面塞上枕头，挺直身子坐起来，并且一边叫小刘帮他把头发梳梳好，一边对小刘介绍我太太说：“她技术很好的，非常专业。”开始拍照时，他还特别叮嘱：“不要把被子照进去，只照上半身就好。”

每拍一张，太太都会把相机上的缩略图给他看，他总是赞不绝口地给予肯定。他和太太特别叮嘱我太太，记得把香港会上的照片一块儿发给他。

临走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和高华握手道别。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等着你一起来做当代史呢！”

离开病房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比来时都多少有些兴奋。以至于小刘送我们到电梯口的路上，我们没有一个人问小刘，大夫私下里说过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还有下次……

[三]

16 日去探视过高华后，我 17 日就去了北京，18 日晚上在《看历史》杂志的一个颁奖晚会上，见到了高华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原负责人熊景明。景明也多时没有见过高华了，向我仔细询问了高华的情况，并为我们看到的情况感到宽慰和高兴。然而，她不经意间讲出的一句话却让我非常吃惊。她说，这次高华住院后大夫曾估计说，高华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听到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凯平月初来信所言并非高华学生的猜测，而是有大夫讲过这样的话。想到当年住肝病医院时，同病房和隔壁病房先后去世的两位病友，前两天还好好的，过两天人就不在了，不禁又开始担心起来。尤其想到高华夫妇很想要看到那些照片，更是有点不安。

19 日，我和太太按计划去了香港，24 日晚上回到上海。第二天我就

叫太太赶快加工冲印高华的照片并订做相册。太太忙了近两天，26日傍晚才弄好。27日一早，我们就叫了快递员上门，准备抓紧把相册发出去。

上午9点刚过，快递员按响了门铃，而我书房里的电话也几乎同时响了起来。我叫太太去开门，自己进书房接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我是高华的学生，高华老师……去……”我的头“嗡”了一下，没有听清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直到听到“30日上午举办告别仪式……”，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当时的我，一边听着电话，一边想起太太正在把相册交给快递员，一时间不知所措。

放下电话，我在书桌前闷坐了好长一段时间，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出高华那俊逸方正、微微带笑的面孔，更觉得自己做错了些什么：没有把他未发表的思考录下来；没有让他看到他特别想要看到的照片……

说到高华的病，我内心里最感纠结，甚至会感到愧疚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高华的工作调动问题。

[四]

我是2003年到华东师大来做特聘的。来后，我一直很注意为华师大引介人才。第一个引介的是沈志华，第二个就是高华。

对于沈志华来华师大，我做的具体工作不多。但对高华，我一直在两边做联系和推动的工作。

因为我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民国史研究较多，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民国史的人比较熟悉，知道他们内部人事关系较复杂。高华在南大取得博士学位后，也算是民国史研究队伍中人，却始终融不进南大民国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职称的解决也不顺利。尤其是他的《红太阳》在香港出版后，各种意见纷纷嚷嚷，一时争议不断。在重视民国史研究、轻视中共党史研究的南大历史系，他的处境就更显尴尬。

鉴于我初来华师大时，现当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华的能力、学问和声望，肯定极有助于华师大现当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便主动联系高华，尝试动员他调来。对于高华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我与校方探询一下可能的解决办法。在时任党委书记张济顺教授的全力支持下，这件事很快就顺利运行起来。记得当时为高华孩子的问题、太太工作的问题，包括他来上海临时住所的问题，每件事都直接请示张书记和学校有关部门的领导，然后挨个部门去跑。光是他的临时住房，从最初房管处提供的一室，换成他所希望的两室，我就跑过好几次。房子的内部设施、水电煤气的具体情况，我也专门去一一检查过。

一切谈妥后，高华夫妇一起来华师大的那一次，我领他们去看了在华师二村定好的临时住房，两口子当时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我也以为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为了最后落实高华夫妇调来的事情，那一年我推迟了去日本的访学。事情办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停留了半年时间。这期间，我得知小刘已经在华师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学也同意高华调来上海了；在学校帮助下，高华家已在新校区附近买好了新的房子……

然而，当我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的工作调动被迫停止了。

这里我不想复述我所得知的导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说，这个消息对华师大、对我来说，再难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样的创伤，而对高华来说，这一消息则不啻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无论我们做多少补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华师的教职、招生及相关待遇等等，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华原来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过部分肝硬化的情况。同时，高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开，但如许纪霖所言，他个人及家庭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尽管事情发生后，他当面开解我们说“没关系”，

但还是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内心承受的压力实际很大。这不仅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处境，而且因为他的工作调动早就成了一些人热炒的话题，个别人甚至在网上对他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如今调动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风言风语，这对他本来就有病灶的身体显然极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谁能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帮了高华的倒忙呢？！

[五]

在中国，成了争议人物，有时会莫名地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即使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人也不例外。高华之成为争议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调动也会被一些人拿来“诛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华成为争议人物，源于他那本《红太阳》。其实，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看起来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时间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讨论陈独秀“右倾”是“投降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文章，都不能公开发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为陈独秀做翻案文章，否认陈独秀“右倾”，也不再敏感了。

涉及到毛泽东的历史问题，今天固然还会有一些敏感与不宜的政治禁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年出了太多像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样同为大陆出身的人写的批判书之后，今天大概很少还有人会认为高华这本书太过激烈了。

我和高华都是七零届毕业生，都在底层干过八年，当工人，站柜台，都是在文革后最早考入大学读书的，我们有着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他本来是学历史出身，又在历史学界工作，却转来做中共党史研究；我是学党史出身，转到历史学界工作，却仍旧坚持主要着眼于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两人不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党史学界，都属于边缘人。因此，我们成为好朋友，多少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我和高华其实在毛泽东研究或中共党史研究上，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出在他的《红太阳》前面，一直到高华再版他的书，他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书，也没有针对我书中内容相同但叙述不同的史实进行过讨论。我们不是没有交换过意见，其中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们在中大图书馆下面的咖啡馆里足足讨论了两个小时之久。我注意到他修订后的版本仍旧没有多少改变，便很直率地说明了我的看法：我非常欣赏他对延安整风中党把中下层干部改造成“新人”的方法、路径及其经过的深入考察，但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特别是涉及到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以后，围绕着和他书中个别史实有关的资料问题，我们还有过几度讨论。

高华《红太阳》一书无论有多少值得商榷之处，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政治问题扯到一起。

实际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红太阳》给他带来了荣誉，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困扰。

[六]

和今天大多数人不同，我对高华的了解和认识，不是因为他的那本成名之作，而是因为他在《红太阳》出版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涉及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

上个世纪末，我才刚刚开始对新中国建国史研究发生兴趣，对建国以

后党史、国史的许多情况都不熟悉。国内这时研究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机构和一般研究人员，也多不做实证研究，更鲜有微观史研究。哪怕是当时已经出版了大量回忆史料，国内、国外认真阅读、考证和研究者，也寥寥无几。不用说，国内外历史学界，那个时候更没有人会来研究这种当代史问题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华可以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和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我最早读到他的一篇论文，是 1998 年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的释读前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回忆录的文章，题为“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这篇文章非常漂亮。他结合江渭清回忆所涉时段的各种文献史料与史实，把江的回忆与其他相关领导人的回忆资料详加比照考辨，用他最擅长的悟性与敏感，把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问题串联起来，进而把中央政争与地方大员之间的复杂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让人叹为观止。

我时常想，以高华的研究经历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绝不应该只留给我们《红太阳》和《革命年代》这样两三本著作和二三十篇研究论文。他所以成果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学问态度严谨和对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他选择的这个中共党史领域，材料的获取和成果的发表都太过困难。甚至于，他的国史，亦即他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论文，绝大多数也都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的资料，发表也大都只能选择在海外的学术刊物上。当他一本书被认为有严重问题之后，他在大陆发表文章和出版著述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为什么他当初不选择去做那些风险较小、又容易出成果的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偏要转到这个极为敏感、获取资料和发表都极端困难的党史、国史研究领域中来呢？

对此，高华在《红太阳》后记里是这样讲的：基于父辈的经历和历史的阅读，他始终能“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始终“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

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然而，文革前后的种种经历，对诸多人间惨剧的耳闻目睹，对大量与时俱变、真假难分的“路线斗争”说法的极端困惑，又使他产生了太多怀疑与不解：为什么革命会变成这样？！正是因此，他“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

这也恰恰是我们今天仍旧在这一行里继续坚持着的不多的几个同龄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点。

改革开放、上大学、读历史、留校做教学研究工作，最终为高华打开了这扇可能通向历史真实的大门。只是，即使是在后毛时代，即使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对于像高华这种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历史的学人来说，这条道路依旧坎坷难行，甚至随时都有因一本书，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难和灾难的危险。

高华走了，带着他的困惑和遗憾。

中国会有年轻一代的高华跟上来吗？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欣慰的是，我们还有高华

于风政

我知道高华这个人是在2001年。这年1月，我的《改造——1949年至1957年的知识分子》几经周折，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大概是3月份，一封读者来信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位读者说，把我这本书与南京大学高华老师写的《红太阳》连起来读很有意思；高华研究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运动之“源”，而我研究的建国初期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则是延安整风运动之“流”。这封读者来信很短，仅寥寥数语。我从他的信笺文头判断，这位读者可能是南京大学的在读研究生。他还告诉我，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的。

我自以为对国内现当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领域的研究情况比较熟悉。长期以来，这个领域几乎不存在什么独立研究，称得上“信史”、“良史”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屈指可数。香港出版的这个领域的图书，除了某些重要人物的回忆录以外，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也不是太多。但是，这位研究生专门写信告诉我有高华这样一个人、有《红太阳》这样一本书，必定是这两本书的重要内在关联深深地触动了他，使他产生了要告诉我的冲动。

随后，我便设法托人从香港买这本书，但久未如愿。一直到2004年

9月，我因公去香港，才在一家书店看到这本书，拿过来翻了几分钟，我就断定，这确是一部多年来少见的、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巨著！高华这个人了不起！2006年上半年，经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女士引荐，我两次邀请当时在该校历史系任客座教授的高华来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分校做学术讲座，一次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次讲苏南的土改运动。两次彻夜长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红太阳》不仅是高华教授人生的一座丰碑，更是荒芜凄凉的当代中国学术园地里的一棵参天大树。《红太阳》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高华教授的贡献则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

《红太阳》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于，它通过大量可靠的历史资料，理清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复原和再现了当时的复杂历史场景，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实内容与本质，从而清晰地、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毛泽东如何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建立党内绝对一致的思想与统一精神，使自己成为党内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唯一的、神一般的革命领袖。《红太阳》给了我们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不但帮助我们理解了延安整风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迅速壮大并走向胜利，也帮助我们解开了一个谜团，这就是：以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的新中国为社会理想，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接受或长期容忍毛泽东这样一个极端专断的领袖；为什么共产党内能够形成和长期保持一种有组织无个人、有集中无民主、习惯于滥用暴力与“政治批判”的文化；为什么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能够成为毛泽东一手遮天、呼风唤雨、肆意妄为、没有民主法治、没有人的自由与尊严、政治与社会畸型发展的中国。

每一个像高华和我这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是一个“神”绝对统治和支配的国家，那二十多年间发生的种种事件，今天来看，如同梦幻一般，不可思议！共产党以给农民土地为号召赢得了革命，中国农民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而

土改后没几年，毛泽东就发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让农民乖乖地交出了土地，直到今天都没有还给农民。革命胜利前，共产党曾郑重宣布保护民族工商业，支持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建国后没几年，就强迫工商业者敲锣打鼓“自愿”公私合营，“进入”了社会主义。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在国共斗争中，因为厌恶国民党的专制与腐败，相信与追随共产党，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新中国，然而，革命刚刚胜利，毛泽东就发动了一连串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如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和陶行知的运动、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的运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及“学术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运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仅用了八年时间，便从精神层面与思想、文化意义上消灭了清末到民国时期形成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团。从 1959 年的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把斗争的主要矛头转向共产党内。六十年代初期，他发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把许多小说、剧本、电影、戏剧打成“大毒草”，矛头直指党内的文艺干部。1964 年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把农村基层干部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1966 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利用暴烈的红卫兵运动，摧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党组织和党政机关，打倒了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干部，关停了全国所有的学校和文艺团体。学生斗老师，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多少善良的人、无辜的人、本应受到社会广泛尊敬的人，包括毛泽东的许多“亲密战友”和无数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横遭批斗、羞辱、殴打、关押，含冤受屈，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国社会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遭受灭顶之灾，国民经济近于崩溃。那是一个封建专制复辟的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1949 年至 1976 年间发生的这些给中国人民、也给共产党人带来深重灾难的政治运动，无一不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而他这些个人决定，有些经过党的领导集体事后确认，有的连事后确认都没有，却在中国和共产

党内畅行无阻，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在这二十多年间，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成了毛泽东试验其乌托邦式社会理想的试验田，十亿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被毛泽东随心所欲地“运动”于股掌之上。在毛泽东眼里，国家是他个人的天下，可以为所欲为；党是他个人的工具，他指向哪里，党就要打向哪里；工农大众、党员干部、青年学生，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读“红宝书”，唱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封建式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达到极端。然而，数千万同胞或死于饥饿，或死于迫害，对这些苦难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毛泽东却仍然被亿万中国人山呼“万岁”，恭祝“万寿无疆”；在他的错误已朗若白昼的时候，莫说普通的老百姓，就连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也不敢流露出丝毫不满，否则便死无葬身之地，这是怎样的一位领袖，怎样的一个国度，怎样的一个时代，怎样的一个政党，怎样的一种政治！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始终是一个谜，局外人无法解，局内人也感到茫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执政党和知识界曾有过一定的反思，甚至看到了毛泽东极端个人专断的根源是党内长期盛行的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也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缺陷有关，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反思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事件发生后戛然而止。

《红太阳》解开了这个谜。它告诉我们，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唯一的“神”，具有魔幻般的力量，绝对主宰着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的命运，根源就是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找到了、形成了一种绝对控制人、统治人的方法，这就是“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的方法”，将革命队伍的每一个成员都改造成绝对相信和服从领袖的“新人”。高华教授认为，毛泽东锻造“新人”的方法，是列宁斯大林的若干概念、方法加中国的内圣之学。说白了，就是以暴力为后盾，强制“洗脑”、“换脑”。与斯大林的清党与肃反方式相比较，毛泽东发明了“思想改造”和群众暴力；与历代封建统治者相比，毛泽东不是捧别人的东西如儒家学说或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经典，而是把自己的思想规定为神圣与至高。经过这番“改造”的新人，失去了独立人格、

独立精神、独立意识、独立思想、独立追求、独立价值，变成了革命这架机器上的一个只有一定功能、没有自己的生命与思想的螺丝钉。党的领袖是唯一一个可以有思想、有权力向这架机器发出指令、操作这架机器的人。按照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革命队伍，如果领袖英明正确，则革命无往而不胜，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如果领袖不那么英明正确，则会带来灭顶之灾。民族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握于领袖一人之手。延安整风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建国后中国人民承受的巨大苦难、执政党遭受的严重挫折，就是证明。

建国后，毛泽东把延安整风的经验作为一项“法宝”推广到全中国，以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这两个精英群体为重点，持续地通过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对整个民族进行“改造”。这些运动，除了完全延续延安整风的一套做法外，打击的人群更加宽泛，强制性更加突出，方式方法也更加暴烈，特别是在强迫人低头认罪、自贬自辱和大规模使用群众暴力方面，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持续“改造”之后，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被彻底改变，甚至失去了思维的能力，无论从精神的层面还是物质的层面，个人的存在都毫无价值，也毫无空间。唯一的存在是党，更准确地说，是党的领袖。不但政治生活极端畸型，民族文化丢失，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生态都完全改变了。有几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几乎变成了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思想、鄙弃文明、崇尚无知与暴力的民族。1978年以后，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批判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党和民族并没有完全走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阴影。

所以，高华教授的贡献，不仅仅在学术领域。他通过对延安整风的独立研究，解开了中国政治的最大谜团，指明了中华民族重建自己的文化、重建文明的政治生活、重建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恢复人的独立、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一个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要求的、真正受到党员和人民大众拥护的执政党，也必须对延安

整风运动以来形成的党的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根本的改造。所以，说高华有“历史贡献”并不为过。“历史贡献”这种美誉专属于党的领袖，同样是延安整风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的成分。

高华的贡献还在于，他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保存了“脸面”。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如果还能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话），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没有出息的一代。相比于清末和民国时期起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我们这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混饭吃的“文化人”，除了极少数佼佼者外，大部分人甚至没有好好读过四书五经，看不懂文言文，传统文化的传承基本中断；课堂上、会议上天天讲马克思主义，其实没有多少人认真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写文章、做演讲，言必称希腊，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系统地研读过西方的学术文化经典。在全球化的时代，大部分教授们的外语水平大大低于民国时代的前辈与世界各国大学的同行，没有能力及时获取外国的学术信息。经过三十年的休养生息，我们还没有完全恢复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精神，还不会和不敢独立思考，谈不到有什么创新能力，拿不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经济迅猛发展、物质主义泛滥、政府控制一切资源、大学高度行政化的时代，大学教师们为了晋升职称、应付考核、积攒买房或孩子的教育费用而不得不以拿“课题”、做“项目”、做兼职耗费青春，甚至为了争得一官半职而匍匐于权力与体制之下。更可悲的是，文革结束三十多年了，我们却始终走不出几乎与生俱来的恐惧。我们害怕学术研究触及敏感问题，或学术立场、学术观点政治上不正确带来严重后果，如论文不能发表，著作不能出版，晋升职称受到另类对待，正常流动受到莫名其妙的阻拦，有些平时你有意见、与你有矛盾的领导、同事很可能把这些上升为政治问题、立场问题而置你于死地。追求真理、忠于学术，是学者应有的品格，这谁也不会否认，但是，你自己可以为追求真理和学术不计名利得失，但是，如果失去了稳定的工作与收入，你的家庭、老人、孩子怎么办？有人说写出好书，内地不能出版，可以拿到港台出版。岂不知在境外出版政治不正确的书是要入“另册”的？不少有思想、

有学问的人，大都述而不作。他们的思想和学问，多表现在朋友间的谈话和与学生们的非正式讨论中，不愿形诸于文字，主要原因就是恐惧。特殊的成长环境、教育与文化修养的先天不足、物质待遇的相对贫困、职业的缺乏保障、学术与出版自由的缺失、无时不在无法摆脱的恐惧感，使得我们这一代学者中的绝大多数人，仅为稻粱之谋，甚至为五斗米折腰，沦落为可怜的犬儒，也就不可能在学术史上留下什么传世之作。我真的不知道五十年、一百年后的学者们如何评价当下这个时期的中国学术史（至少是直接或间接地与政治相关的各个学术领域）。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还有高华，还有《红太阳》。高华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忠于真理、追求学术、摆脱了物质诱惑和恐惧感、自甘清贫、自甘做边缘人的学者。所以我说,高华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保存了“脸面”。我们要感谢他！

当然,《红太阳》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的某些缺点或局限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从井冈山到延安时代，中共党内斗争的本质不是权力斗争，而是政治路线之争；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逐步确立在中共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主要原因不是他的政治手腕高人一筹，而是他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战略、策略,在实践中是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太阳》过分注重“权术”在毛泽东走向神坛中过程中的作用，未免失之于偏颇。当然，高华教授并不接受这种批评，我也是知道的。无论《红太阳》有多少缺陷或可商榷之处，都无损于它独特的、巨大的学术价值。

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应当以史为鉴。从事史学研究的人，要写出良史、信史，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缺一不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抱持良史的史德尤其不易，其间充满了艰辛与风险。但是，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只能像高华那样，义无反顾地走下去，除非我们真的自甘堕落。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高华留下的永恒

袁伟时

高华走了！预料之中，而又那么突然！

2009年，你最后一次来到中山大学。朋友们热心策划，让你在广州多住一段时间，与朋友们好好聊天。其实是生怕你突然离去，把满肚子来不及说出的话带走了。不幸，这个用心良苦的计划没有实现。

你没有带走的是留在每一个朋友心中的永恒友谊！不管交往的机会多寡，朋友们都知道任何时候你都是可以信赖的。即使小事，都会得到你的帮助。2002年，我应邀到东南大学讲学，你立即在南京大学安排了一场公开报告。会前会后周到的安排，包括生活细节上的帮助，至今记忆犹新。

你没有带走的是阴暗的时代印记。你几次来到中山大学讲学，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引人深思；但总觉得有些地方欲说还休。人们心中都明白，有个幽灵在你头上盘旋，在狭窄的巷道中前行，不能不提防意外的袭击。2007年，你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的一切手续都办完了。最荒唐的意外来了：不准离开南京大学！教职向全世界公开招聘，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大学的常规。有谁知道，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一家中国的著名大学，竟然不能自主在国内聘请一位教授！半年之后，发现你有癌症！是巧合还是有内在

联系？医学上也许有争议，不过，我深信这是长期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长期精神压抑和突然阻击三个因素汇合带来恶疾。

你乐天的微笑后面有忧伤。当然不仅是由于个人的遭遇。

二十世纪，那么多残暴的屠杀和冤屈！灾难来自何方？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从美国人威廉·席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到德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的《纳粹德国：一部新历史》等宏篇巨构，一系列的影视，把实况和根源大体说清了。

日本军国主义的真相世人也知道了。

斯大林的专政社会主义，尽管依然有人山呼万岁，但档案公开和原苏共负责人的控诉已把黑幕揭穿。史家们的研究更把74年的苏联史刻画得淋漓尽致！

后者祸延中国。国共两党黑暗面的根源都在苏联。国民党党国体制制造的灾难，人们耳熟能详。几代中国人被告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代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大标语，至今还高挂在中南海的大门上。可是，从井冈山开始到反右、大饥荒和文革，那么多冤魂和饿死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飘荡，没有真相何以服众？人们渴望了解从反AB团到十年文革的真相。许多人在努力。不把一次又一次灾难的制造者请下神坛，二十世纪中国史就是一笔糊涂账。例如，反AB团事件，时间上早于苏联大肃反，而其残酷性也不输后者；而在唯一正确路线代表的光芒笼罩下，有谁敢于怀疑或背后议论都会给自己带来大麻烦。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的教师们以巨大的勇气和责任感，从原始资料的收集开始，冲破想象不到的困难，不但编出完整的资料，也写出严谨的论文，使这个大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高华利用了这类学术成果。更多的是筚路蓝缕，爬梳浩瀚的史料，剔微显幽，战胜困难的环境和无所不在的思想压力，剑指核心，一代枭雄及其追随者和反对者的真实面目，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读懂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懂得了五分之一人类身心被控制的奥秘，人类历

史上绝无仅有的人为的最大灾难的根源也会了然于心。这既是顶尖水平的学术著作，又是催人猛醒的号角，而其体现在字里行间的献身精神和严谨的学风，又是照亮后来者前进道路的火炬。

清扫昨天中国的重任远未完成。承先启后，有你的榜样在，后继者必将纷至沓来。

“追求自由的灵魂，但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声浪不断升腾喧嚣的严峻的世界里，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彰显出张力。”（高华：《行走在历史的河流》）57年的岁月，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太短促了！可是，这些时光又是那么光辉，在当代史学史上镌刻了永放光芒的一页！

作者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贰 高华其人

追寻消逝的时光

贺军

12月27日，西雅图的梁侃在我的留言机里告之，高华长眠了。我脑子里一团浆糊，想给他的妻子刘韶洪打电话，却又怕听到对方伤心的哭泣声，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安慰她。后来电话接通，刘韶洪没有哭，但我感觉到她的悲哀与失落，她似乎不愿多说，让赶去安慰的世安兄与我交谈。

我和高华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的5月，我到日本，本不想回国，突然有一股想见高华的愿望，当然还有我老娘。联系后才得知，他正在上海治病。当高华知道我要去看他，笑声是欢畅的。可惜，第二天下午他就要回南京，时间太短暂了。

那天见面后，他罕有地伸出手和我握了一下，悠然道："老贺，老朋友了！"他要求斜躺着和我说话，我哪能说不，自小他就喜欢这样，何况现在。神聊之际，我想抽烟，欲去开窗，被他阻止说，哪有那么讲究！我在交谈中得知，他已经写了十几万字有关林彪及其事件的研究，生病后无法完成。我深深的惋惜，林彪事件是文革史上最为诡异的谜团，很多地方讲不通道不明。接着他告诉我，他近来研究的题目是有关华东军政大学对留用人员和青年学生的改造与分配。这真是一个好题目，亏他想得出，做

好了，可以成为对1949年以后洗脑和思想改造的探源。期间，他嘱咐家人联系床位，一边到南京后直奔省医院，给我的错觉好像是他在为一个熟人操劳。

后来我陪他到了上海火车站，还像以往一样闲聊。等他要进站了，我突然觉得前所未有的无奈和无助，语言是那样的苍白和笨拙。我说："高华，要保重啊，下次回来见！"他点点头说："我会的。"当时，我微笑着转身离去，现在回想，眼睛有点湿润。

童年

我和高华相识，是因为我是他弟弟高小宁小学四年级以后的同学。我和小宁放学同路，不知不觉，就认识了其兄高华，其姐高慧。认识高华之初，我还是个毛孩子，他比我成熟得多。不久，我见到通缉他父亲的告示，正惊魂未定时，学校乘虚而入，到我家告状：与"右派"的孩子过从甚密，思想复杂。于是，家里发出了"隔离令"，不许与高家的人来往！我当然没听，不是什么道德勇气，也不是什么觉悟，而是一个孤单孩童对友情的依赖。

高华在其书后记中提到，当他看到先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的特大喜讯时的惊鄂与疑惑，来和我交流。我们首先有一种挫折感，先主席当时才七十来岁，到我们八十多岁时他还在掌舵，人一辈子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真没劲；其次是对可能性的怀疑。高华喜欢看报，大小字报、党报、参考消息，站着看，躺着看，渐渐地居然炼就了"火眼金睛"，能从枯燥的社论、人名的排列、外电报道中看出玄机，往往挺灵验的。

考试

1978年高考，高华和我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是：怎样考数学？高华会打算盘，我只会做一元一次方程，听了几堂数学补习课后，决定放弃。

那时，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风靡一时，读了让人感到，只要猜中了“1 + 1”，四个现代化就实现了。我俩有点急了，到招生办打探。接待的人可能正幻想如何猜中 1+1 吧，对我俩说：不考数学是不能上大学的！徐迟如果不懂数学，怎么能写出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呢？出门后，高华说：徐迟如果懂数学，怎么能写出报告文学！

大学毕业后，高华被分配到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为了考研究生，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我给他出主意，尽量请病假。但是，什么样的病是叫人看不出，又必须休息的呢？我对他说，痔疮！于是找同学开了病假单。一天，我正和高华一起准备，他的领导来体恤病情，他太太开的门，高叫："董主任来看你了！"无疑是在提醒高华。只见他几个健步迎到门口，与之寒暄，并引入卧室，半个小时后，送领导时，我看到他作步履蹒跚状。事后，他说，当他和主任一握手，心想，坏了，痔疮病不能如此矫健如飞，并埋怨我，没提醒他，逗得我笑岔了气。

我没见过高华流眼泪，然而他提及过两次“流泪事件”，让我难以忘怀。一次是 1982 还是 1983 年，研究生的考试，专业都好，就是外语一门未过，对于一年的辛勤付诸流水，他很伤心。用他的话是：枯坐着，两行泪水悄然淌下。第二次是 1989 年的夏天，我到南京，本想和他闲聊，散散心，他显得郁闷，告诉我：六月里的几天，他流了泪。是啊，谁愿意见到那样悲惨的结局呢！我猜想，这次可能不是悄然，而是涌出。

书

高华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是借书给我看。七十年代初，高华被分配到新街口附近的“杨子衫袜店”工作，几近八年岁月。我和小宁因同住长江路，上中学时又是一个班，一直保持联系。一天，小宁往我书包里塞了一本书，悄悄说，回去看，两天。那是哥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看完后那过瘾劲，简直像饿得头昏眼花的乞丐，坐在干净的面馆里，吸着小笼汤包里的油。直

觉告诉我，小宁是二手供应商，高华才是真主儿！

晚上，我借还书的机会，去了他们家。高华斜躺在床上和我交谈，可能是站柜台太累的缘故吧。（现在想来，高华以半躺的姿势与我聊天贯穿了我们交往的始终，以后又扩展到他的同学兼好友谢建平和蒋宁身上。）使我无比惊讶的是，他已经读了那么多书！那一晚，他从外国文学聊到中国近现代文学，吐出的书名有上百种之多，这书都是从哪儿弄来的？至今使我涂抹不掉的印象是他的总结，他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一生，读书不会超过五六百本，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可以超过两千。这么算来，还未弱冠，他已经朝百分之一进发了。

从此，高华的家成了我的“五十一号兵站”，看书、谈书、议时政，遐想乃至搞笑，成了我们在那枯燥干瘪年代里的一种乐趣。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家里有藏书的，不是被抄被烧就是自己怕事销毁；图书馆成了档案馆，人们知道有书，但不能看；新华书店更如清汤寡水的馒头铺，不含一点油水和荤腥。

高华曾在其书的后记中提及书的来源：南京第九中学是个重点学校，文革时被勒令搬至农村，校图书馆的一大批书被堆放在一位留守人员的家中，足有两房间。高华没提到的是，其一，他非常幸运，这两房大多是文学社科类书，如果是数理化的书，他肯定傻了眼；其二，每次还书时，高华就在名点心店里买两个鲜炸出炉的油球，四分钱一个，不要粮票，一予己，一赠老人，老人在欢喜中哪分得清上次借出九本还是八本？毕竟在当时，下午吃点心是市革委会主任才有份的事。

那时他还搞到一张单位的集体借书证，不过也没什么可借，旧版《鲁迅全集》就被他借了还、还了再借。记得1973到1975年，为批判苏修，一批从苏联出逃者在西方写的书在内部出版。高华有所耳闻，与我一起到南京图书馆借书。从寒暄中可以感到，高华常和借书部的工作人员打交道，但当他问那批书可否开后门一阅时，对方断然拒绝：不行！那是县团级以上才能借的。我顿时觉得羞愧，自己太瘦弱，又衣冠不整，连领导的警卫

员都不像。然而，高华处事不惊：我们单位可以出证明。对方迅速回答：你们单位不是县团级！我赶紧溜到门外，不久却听到里面传来冰雪消融般的笑声，原来高华给她预留了两双出口转内销、称之为“等外品”的袜子。

高华嗜书如命，一生只送过两次书给我，一次是他的书，还有一次是在万不得已时割舍的。那是1996年在华盛顿，他要回国，行李太多，郑重其事地将三卷本的《毛泽东年谱》塞到我手上。看出他的依依不舍，我说，今后给他带回去。他知道我根本做不到，说：不要跟我“比大胡划”！（南京八十年代流行语，即含有坑蒙拐骗的胡言乱语。）

2000年，他搬入新居，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书房。2001年我到南京，他请我吃饭，坐在一家高档饭店里，他感叹说：“老贺讲究啊，普罗大众的地方他会不满的，但高档的地方，菜都是微量元素。”饭后，我们到他的新居。他有点疲惫，我说：你躺一会吧，我参观一下你的书房，这几年我很多书都没买着。五分钟不到，就听到他在喊：“刘韶洪啊，去看看老贺在干什么。”刘不紧不慢地说：让他看好了！意思好像是我们刚请他吃过饭，他总不会明抢暗偷吧。又过了五分钟，他实在撑不住了，嚷着要我出来，否则下床。以前借书给我，因为那也是他借的，不还等于绝交；现在书是他的，借等于送。

爱情

应该是1974年，高华在同学聚会时，重新发现刘韶洪，从而展开了他们的姻缘。所谓重新，可能因为初中毕业时，刘还太小，是个黄毛丫头；或是学校里男女同班不说话，一说话就是“小纰漏”（南京土话，即小流氓）。高华回来后很激动，把他的发现和父母弟妹说了，我也在旁。高华的评价是：好看，喜欢看书，对文学有兴趣。

高华年轻时，按香港人说法，应算是个“靓仔”。他谈吐不俗，有才华，“右派”家庭的压力也没有导致他走向软弱或萎缩，反而在他的性格中注入了

一种刚性特质：是我的，就争取，不相予，就抗争。

刘韶洪第一次来到高华家时，我也在。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红扑扑的脸，一双飘忽的水灵灵的大眼睛，进门的气息犹如刚烤出炉的山芋，既香又甜。我和小宁少不更事，想赖着不走，看看高华是怎样“花”她的。他父亲看不下去了，朝我俩眨眨眼，拉我们一起出门。高华不久就抽上了烟，谈恋爱，是一项烦恼的工程。烦恼我管不着，吞云吐雾吸引了我，使我痛下雄心：哪天摆脱我父亲的掌控了就抽烟。

又是一个八年吧，他俩结婚，邀请我和谢建平等几位朋友在南京新街口的大三元摆了一桌婚宴。年轻么，只要能起哄，有好东西吃，就能从梦中笑醒，何况高华大喜。不记得哪位学医的混蛋告诉我，喝酒前吞两片小苏打，酒量倍增。结果，喝下去的洋河大曲发酵成雁荡啤酒，在我腹中漂胸中荡，至今不知，高华的婚宴是如何结束的。

酒

高华一生不喝酒，因为从青年时代起，他的肝脏化验指标就不稳定。1985年寒假前夕，他大醉了一次，从此不沾酒，还染上了不碰酒的坏习惯。1995年他从上海赴美国，我给老娘下了“死命令”，让他带两瓶白酒来！第二天，老娘来电告状：高华不肯带。顿时，我那玫瑰花般的幻想变成了一地鸡毛。高华居然浪费指标，不肯为我捎酒救渴。他来到波士顿，我责问他时已经有点仰天长啸的感觉，可他却轻描淡写地说：喝酒对身体不好。我反驳道：抽烟危害更大，你不是还在抽？他笑起来了，说：你不也抽嘛。

高华有个习惯，出门在国内外，一定要给妻儿买礼物，且有充分的自主权去决定礼物的形式、内容与贵贱。不像我，买什么，在老婆看来就不是什么。1996年在华盛顿的三天两夜，高华把这种高度的自主权发展到了巅峰，买来的礼物装满了一个大箱和一个特大的旅行包。高华对妻儿如此的重情重义，在我老婆的脑海里扎下了根。前两三个月，我从欧洲回来

后，发现她逢人就说，他有个同学叫高华，在美国时很困难，回国时还大包小包送老婆儿子，我这老公呢？带回来的是一堆脏衣服！当时高华还没有走，我很后悔没打电话告诉他：对刘韶洪，他是个好丈夫，对高欣，他是个好父亲。

病

五年前，当我第一次听说高华查出有肝脏恶性肿瘤时，希望最终是一个“大乌龙”。我到南京去看他，听他叙说查病经过，还及时到上海做了病灶冰冻手术。看着他那“鹤发童颜”、侃侃而谈的模样，我有了某种自信。果然，一年多后，上海有个权威说：谁敢说高华的肿瘤是恶性的！消息传来后，我打电话给他：高华，你诈和啊……然而，幸运最终没有落到高华头上。先是他母亲去世，事后他告诉我，母亲住院时，他天天送饭，母亲去世后，天天失眠。然后，听谢建平说，高华开了刀，切出来的病灶，经化验，是“那个东西”。高华生病期间，从头到尾，我打心眼里佩服他的从容和泰然。

高华是国内几个把中共党史当学问来做的凤毛麟角者之一，在这方面他具备特殊的“慧根”、敏锐的洞察力和解读能力。然而有一点，不熟悉他的人可能不知道，而这对他又非常重要，那就是在这领域的探究，每一个发现，每一个新论，都会使他兴奋、舒坦和愉悦。他找到了他的乐趣。据说，哈佛的史华兹教授在写毛的专著时，写了后章改前章，循环往复，没完没了，以致于他夫人要把他的手稿藏起来，才得以完成。看高华的书，你会觉得他在如数家珍，向你娓娓道来，刘韶洪呢，则在旁奋笔疾书记录，然后交给别人打字。读书、教书、写书，是高华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从这一角度，我有点宽慰，这一生，高华没有委屈自己。

对我个人来说，与高华相知相交，少年时，是我的幸运；青年时，

是我的知心；到了中年，就有点魏晋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境界了。那么，老年呢？他过早走了，成了我的伤痛，因为我再也见不到他那给一点阳光就光辉灿烂的笑容，听不到他那一惊一乍的忽悠了。行文至此，泪水涌出。

作者为高华生前好友，现居加拿大

在历史黑洞中发亮的萤火虫

何清涟

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全天候 Monitor 将近两年，其间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与高华认识大概是在 1991 年。那一年，许纪霖与三联书店的陈达凯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化史》。当时思想界经历了“六四”事件之后的焦虑与彷徨，这一举动算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参与者都很有热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参加会议者有贾新民、孙立平、高华、毛丹等 20 余位。会上讨论写作大纲时，高华特别认真，提出不少看法，让在座诸人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并集数位作者之力的《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后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似乎当时还获得不少好评。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十年，正是中国大折腾的时候。学校条件清苦，知识界人士下海，到企业客串，忙得不亦乐乎。我在深圳也换了好几次职业，

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报社，中间还去过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有点时间就做点研究。与学界朋友除了互观文章之外，很少有机会见面。及至与高华再见面时，已经到了 2000 年。

那年 10 月左右，我接受南京大学—约翰斯 · 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去了一趟南京。此行见了不少朋友，其中当然有高华。那几天高华正好在中心有课，每天只要有机会，我们必在一起或长或短地聊一会。我们所治之学虽然完全不同，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政治的看法却有许多相通之处，海阔天空地聊了许多。

当时，我们正好各出了一本书。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辗转了 14 家出版社之后终于在内地出版，而他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却只能在香港出版，对于中国的“出版自由”、“学术自由”之类的体验自然是同病相怜。我当时的处境已经相当恶劣，除报社被迫将我停职降薪之外，在国内发表文章也不可能，隔壁还住进了“贴身保镖”全天跟踪。但我不想谈这些徒增他人负担的糟心事情，于是问及他的处境如何。他告诉我，由于董健先生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比较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异己，因此南大的小环境不错；他顺便告诉我，也正因为南大学风开明，因此这次由钱乘旦教授出面，在南大主校区举办一场我的演讲，由于担心有关方面阻止，决定在当天才发布消息。不过，他的学生告诉他，大家已经先期一天通过电邮互相转告，届时来人可能不少。

那天在主校区演讲完毕后，我去高华家看望他的夫人与公子。因为是晚上去的，记得是栋老式楼房，进门方知高华的生活很清寒。当时教育产业化还刚开始，学校教师的住房条件差，一套房子分给两家住。当我参观他的厨房时，他告诉我，他那本书稿就是每天等到大家不再用厨房后，在那张小餐桌上完成的。想象着他数年来趴在那张桌子上，每晚就着黯淡的灯光伏案写作的情景，心里不免难过，于是半开玩笑地说：今后写高华轶事时，一定要将这段故事写出来。

我还告诉他，因常向国内朋友推荐这本《红太阳》，内地朋友们理所当然就将找书的任务落实到我头上。我前后总共从香港买过二十多本送人。香港书价贵，每本将近200元港币。所以我对高华开玩笑：再送下去，我们这些住在香港与深圳的朋友们就要破产了。

我认为《红太阳》是一本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体的杰出著作，必定能够留传后世，一直想为这本书写篇书评。后与萧功秦聊及此书时，才发现他是此书的真正知音。一谈到高华与这本书，他充满惜才之情，甚为推重。我想，我非历史学者，即使写书评，未必能写出功秦的水准。于是只在那篇“历史的吊诡”（《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后记）中简单介绍了这本书及我的一点理解。以后我看到功秦写的《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文，很庆幸自己没有写，因为无论如何，在评价高华这本呕心沥血之作上，我不具有功秦那种专业眼光与评述能力。

那几年，高华常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于是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过了大约半年，到了2001年3、4月份左右，高华结束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给我来电话，希望在深圳停留几天。作为朋友我自当接待。但我当时每天出入都有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Black List。这情况我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说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动。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大概8月初到美国国会参加了一场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听证会。高华其时在香港，听到这消息，给我打了个电话，“原来朋友们设想两三年之后环境宽松些，你还能回来。但你到美国国会作证，

就不能回来了”。言下颇有惋惜之意。我当时因为刚摆脱“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生活，甚是疲累，而且知道凡没有这方面体验的人，无法知晓其中的痛苦与无奈，于是简单告诉他，我既然出来，自然不作短期内回去之想。我理解高华的心思，因为好些朋友都曾说过，一位学者离开了自己植根于斯的土地，有如树木被拔地而起，将失去学术生命。我自己也曾犹豫过，只是在2000年7月中旬那场带累了儿子的车祸之后，我才下决心离开。

我与高华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6月在美国夏威夷。当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夏威夷大学举办了一场《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与先生程晓农也一道与会。我们到达时，高华与朱学勤已经先一天到达。旧友重逢，自然非常高兴。在数次或长或短的谈话中，他的一个观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界人士正流行将体制外积累的资源（即声誉）化为体制内的资源（即职称、待遇等），而且这是校方与学者本人都很乐意接受的局面。此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证实了高华这一对现实的敏锐观察。

这次会议还让我有一个收获：领教了高华的演讲才能以及他驾驭史料的高超能力。高华在会议期间共做了两场主题演讲，一个是“革命时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对建国后教育的影响”，另一个是“从二十世纪初教会学校的历史看外资办学的前景”。这次研讨会上口才极好者不在少数，吴国光、朱学勤都是善于驾驭演讲的高手，尽管高人不少，高华那张驰有致、条理清楚、言之有物的主题演讲，则让与会者强烈感受到他的学养之深厚。

高华是个极看重友情的人，偶尔表达，总让人感动。那次在夏威夷开会，高华是第一次见到晓农。临别前，高华悄悄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这次见到晓农，我放心了。他是个谦谦君子，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此后多年我们只在听闻他生病后打过一次电话，但互联网时代，因常能读到彼此的文章，也不觉其远。28日晚上，我给高华家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他的儿子高欣。我向高欣做自我介绍说，“你可能不知道我，我叫何

清涟，是你爸爸的一位老朋友，现住在美国。”高欣立刻回答，“我知道，你是何阿姨，十多年前来过我们家。我爸爸常常提到你。”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才算是说完了几句安慰之词。晚上，竟终夜难眠。

高华英年早逝，中国的史学界与思想界，痛失栋梁；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怎样来总结他的研究于中国历史学的意义呢？网易微博上，我发出一条“悼高华”的微博后，有一位网友回应说，“高华有如历史黑洞中的萤火虫，如今飘然而去”。初看这句话时，我愣了一下，怎么就是一只萤火虫呢？但转念一想，觉得真是酷评，相对于中国那长达五千余年的漫漫历史，相对于那充满了谎言与文饰的历史黑洞，高华对中国共产革命那段特殊历史的分析，不就像是一只萤火虫吗？不仅是他，还有我，以及其他同代学人，如果都能够像一只萤火虫那样发光，也许今天的中国会多些光亮。

作者为中国人权（纽约）高级研究员

愿时光倒流

胡杰

高华去世后，大脑中挥之不去的五粒字："愿时光倒流"。我相信这是冥冥上苍的提示，要我编辑一部高华的纪录片。遗憾的是，作为纪录片工作者和高华的好朋友，时间和环境没允许我完成纪录他生活和思想的拍摄计划。

第一次见到高华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熊景明老师对我说，她的两个好朋友都住在南京，竟不认识。就这样，2005 年 5 月的一个傍晚，我们在南京一个光线温暖的茶社见面了。高华精力充沛，学养深厚，思想深邃；性格开朗谦和，笑容细腻亲切。在那之后，我遇到历史问题，就会去请教高华老师，他则总是条理清晰地为我讲解问题的来龙去脉，告诉我谁写过什么书，在这个领域有些怎样的研究。

我习惯去哪都带上摄像机，自然也在和高华相聚的时候拍下了他和他的朋友们。因为熟悉了，拍得行云流水，十分随意。有朋友说，高华爱玩，其实我觉得高华不管对现实、历史和大自然，都有一种新奇感。我拍过他和朋友们放声唱歌，还拍过克钢、肖今夫妇邀请我们去彝族山寨参加火把节时，高华像一个顽童，独自举着两米长的火把，神情专注地在夜色茫茫的山路上行走。

采访高华

仅有一次比较正式地采访高华，是在2009年11月。我知道他在上海做了肝脏手术，便从四川成都赶到上海，先和从美国来看望他的、圣地亚哥大学历史学博士候选人常成会合，然后同去一个叫长海一村的居民区。[01]

那个居民楼里正在装修，电锤声连续不断，开门的是高华的义子孙斌，高华的爱人小刘也在。（小刘这个名字是跟着景明老师叫顺嘴的，其实，她和高华是初中同学，我应该叫刘老师）手术后的高华感觉有点单薄，但平静安然，穿浅蓝色衬衣，外罩驼色毛衣。他幽默地说，我现在是与床为伍。

这是个一居室的单元房，40W的日光灯管贴在天花板上，清冷的光线撒下，完全不适合读书。床很简易，床头和紧挨床头的椅子上摞着书。餐桌上也摆满了书和瓶瓶罐罐。上面有一本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我们便从此书谈起。

他说，龙应台的这本书，最重要的方面是历史观，人民史观，站在普通平民百姓的角度回望历史。她说自己不管什么正义非正义，不讨论这些东西，不去讨论这些宏大的字眼。她是看，这次战争带来的破坏离乱，对普通百姓生命的摧残。你们不同党派彼此征伐，各为利益，各有各的价值观，但是这一切中间隐藏了多少不义、不公和对普通人生命的践踏。她表达出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同时也是质疑胜利或失败。这个质疑价值很大。六十年来，我们很少看到对内战的反省。我当时看了很感动。她的那些材料，类似的材料我也看过很多，最重要的是建立在这种材料基础上对这段历史的一个新的解释。这样一种新的角度、新的观点非常值得人们重视，她能有这种史观是很了不起。

我也问了沉重的问题：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里，我看到

---

01. 高华做了肝部分切除手术后，我和胡杰商量，打算拍一组高华访谈。许多细节，现在还不方便讲。我在2009年11月15日给朋友的邮件中写道："胡杰被大雪困在公路上两夜一天，通车后狂奔，时速120–180公里，日行千里赶回南京，今天如期到上海。幸亏他没出什么事，否则我会一辈子不安乐。"（编者注）

你是完全认识到极权体制这一点，但是你书中没有用极权这个词。

高华说，我没有。这个词长期以来都有一个预设，一般被指认为两种社会现状。一是德国的法西斯体制，二是苏联斯大林或者共产党的一种体制。那么，特别是在二战以后，德国这个体制已经被消灭了。在这本书里面，我一次都没有用极权这个词，我当时想过的，要不要用这个概念来概括我所描述的这个现象？我想我暂时不这么急给它一个定语。我就是把现象先描述出来，让世人评说。

我问，我在看林昭资料的时候，她居然能够在狱中，也就是1960到1966年这段时间，就说，中共政权是极权专制。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词的时候，心里紧张得砰砰跳。我不知道她在狱中怎么就有这样的判断，她的思想资源来自哪里？

他说，首先，她的资源跟她读的一些东西有关系，她在北大学习期间，肯定读过一些普通人接触不到的东西，例如苏共二十大的一些材料。当然这仅是我的推测。其次，1956年、1957年以后，内部参考报道的，英美对苏共二十大报告的反映里面，大量地用极权这个词。第三，是林昭性格使然，她的思想具有决绝性和彻底性。极权这个词，是共产党最不能接受的词，用了这个词。你就和体制决裂了，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看八十年代，那时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出现过这样一些词，什么苏联东欧集权体制，全部是用集中的集，而不用极权的极。极权这个词在中国能公开登堂入室，到现在几乎还没有。八十年代这个词汇（出现）是跟一个美国学者、芝加哥大学的邹谠有关系。他用巧妙的语言学转换，比如他说，威权主义、权威主义、绝对主义、后极权主义，什么什么的，慢慢过渡到这个词。极权在中国语境中出现不是一天的事情。首先从1985、1986年邹谠到北大做报告，开政治学讲习班，慢慢把这个词给它换个词。以后又到米兰·昆德拉、哈维尔，这跟崔卫平的努力有关系。崔卫平在翻译哈维尔的作品时，把极权这两个字直接点出来了。所以，林昭在那个年代用这个词，表明她的思想走得很远，或者是她的一个彻底性。实际上，她应该知道，用这个词是

非常危险的，是在刀锋上跳舞。这个词碰到中共的神经，它不能接受。

我又问，那时候阿伦特的观点有没有进入到国内？

高华说，在国内没有。应该讲，曾经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内部出版的一些书里面，(比如)内部出过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我自己在图书馆里看过《英美资产阶级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上下两册，里面有过极权这些词。它特别写到1949年以后，苏联极权体制在新中国的体制里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体制是斯大林时的极权体制。但是内部出版物用的这些词，林昭能不能看到，我不能判断。所以，林昭的思想资料是从那儿来的？今天还需要继续研究。

我们也会聊些轻松的话题，那时唱红很热闹，就连和尚、道士都加入了唱红歌的队列，文革时期也不曾见过。高华说，在公园里唱红歌的退休的人，我想不是认为红歌有多么好听、多么正确。而是想到他们自己，他们那个群体，在那段过往的岁月，想到那些艰难时世，而不是红歌感染了自己。上海的生活是最资本主义化的，而另一方面也在唱红歌。它们交织在一起。而组织唱红歌的，是继续讲执政的合法性。

因他刚动手术不久，我们商定好，采访不超过一小时，以免影响他的休息。中午，小刘在小厨房里炒了两个菜，一个是西红柿，一个是青菜蘑菇。她说，刚到上海时，是住在三家合住的单元房里，三家合用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厨房。医院只是做手术，一个星期就要出院，其他的治疗和检查就要在医院边上找地方住下来进行。

楼上的电锤一直铿锵震响着。高华很悠然地说，这没什么，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中。慢慢在康复，也在看书，也在和朋友聊天，我觉得也可以了。我不在意的，破破烂烂我根本不在意的。

心怀感激

也是在那天的采访中，高华夫妇如数家珍般向我报了一大串名字，我

听了很感动。那是高华在上海手术前后，给予他关心的一部分人。我按照高华生前的心愿，大致整理如下。

小刘：他生病两年，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老师，一直把高华的情况向高华的朋友和关心他的人汇报。然后有很多人关照他，在精神上、经济上给他很大的支持。胡杰你们夫妇俩经常到我们家来。[01] 人在生病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有人来，给你一种精神的鼓舞。

高华：在美国的李晓林，在台湾的龙应台、陈永发，在瑞士的张宁教授，真的非常好！法国的南柯力教授也发短信给我关心慰问。上海还有许多朋友，像萧功秦、许纪霖、金大陆、朱学勤和能近基金会的朋友，都来看我。

小刘：还有沙飞的女儿王雁女士非常关心高华。

高华：复旦大学的金光耀，上海社科院的王维江来看望过，还有华东师大的张书记多年来对我非常关心。就是我出院的前一天，张济顺书记、杨奎松、沈志华，还有沈志华的夫人李丹慧，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都到医院来看望，都非常关心。

小刘：南大历史系的书记和工会主席，还有系里的两位老师在高华手术那天来看高华。当时，高华在重症监护室，虽然没见到高华。但我们很感谢他们。

高华：最让我感动的是许倬云先生。许先生对我身体特别关心，他谈了自己一生都在疼痛中的感受，另外，他谈了台湾一些病友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我来上海治疗的时间里，许先生给我来过几次信，询问了治疗情况。他还给南大的领导打了招呼，谈了我医疗报销等具体的情况。后来，南大书记也通过系主任陈谦平带话表示关心。

小刘：还有香港的陈方正人特别好。

高华：还有罗恩惠，她一直很关心，写了很多信。她的好朋友、香港的余俊豪医生请他在上海的同事，多次来电话询问。华东师大的张书记

---

01. 不知道是否巧合，许多次打电话给高华，都碰到胡杰夫妇去看他。高华说，生病的这些年，来得最勤的就是胡杰夫妇。(编者注)

介绍了长海医院的主任医生、博士生导师，这位医师和我的主刀医生是同事。还有钱文忠帮忙，还有凤凰卫视的杨锦麟请刘长乐出面，凤凰卫视常驻上海的记者，专门到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找院长。上海著名的一个文化评论家朱大可也请朋友帮忙，找到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方方面面不同渠道的朋友一起帮忙(都是为了这次手术)。医院的杨广顺教授医术高明人也很好，特别是他有一个团队，给了我很好的照顾。这个医院的技术是非常优秀的。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小刘：还有煌哥，周继煌先生真的非常好。热情邀请我们住在他上海的女儿家，因为交通的问题我们没去。还有季风书店的严搏非、杨小榕等等，都给予了帮助和支持。

高华：我的学生周孜正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我在手术前他就特别关心。

小刘：第一次高华住在中山医院的时候，他的博士刘德军陪着我们过来。这次在这里住院，在南京的范骏、胡清宁、陈声玥、孙云，专程从南京、从镇江赶过来。

高华：在上海的学生，他们时时过来，像马立民、刘彦文、经先静、姜超。在路上横跨上海，来一趟要两个多小时。经先静已经做妈妈了，孩子很小，她让她母亲熬了鱼汤送过来。姜超的爸爸妈妈是我们多年的好朋友，他们特地送来鸽子、甲鱼和做汤的原料，都让我很感动。

小刘：我们来上海看病，是南京的陆明霞特地开车送我们过来的，还有这里的邱格屏。

高华：邱格屏是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她和她的先生、孩子一起来看望，还主动提出来，我们回南京时，要把我们送回去。

小刘：熊老师在高华生病中是最关心的，她说，她是消息总汇。而且，我们在中山医院住院时，她是每天一两个电话，真的让我们感到非常温暖。我当时就跟熊老师说，你是我们的天使。她说，你们也是我的天使。

……

但由于我的记录不全，有一些遗漏。这篇稿子完成后，我请教过小刘。她说：还有好多人没有写上，如北京的江荣生等等，他们始终在关心高华。在此，我要在这里加上一句：感谢没有提到名字的朋友们，同时也请他们原谅我。

纪录片《让时光倒流》是我们回头凝望我们和高华共同行走的那段历史。那段历史并没有走出我们的灵魂，它就贴在城市的墙上和地沟油流淌在一起。它依然睁着眼睛，在亿万献身革命和被革命吞噬的白骨中呼吸。是这个历史学家用锋利的手术刀，精心地剥离着附在我们灵魂上的阴影。我们为什么会对一个历史学家这样热爱，在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为独立纪录片导演

学术之树常青

金大陆

[一]

2011年10月15日，我和光耀教授到南京完成文革人物访谈后，去看望了高华。上午电话联系时，感觉高华的声音有点轻，我心中有点“紧”。见面后看到他瘦了些，依然精神，心就放“宽”了。我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精装本递给高华，说我是一定要亲自送上门来的。他说已知道你这本书出版了，题目很好，很有意味。

这是我第一次踏进高华的家（前几次都是找一个茶馆聊天），高华带我们看了他的卧室、书房，不大，干净、整齐。原来这个富有使命的历史学家的许多精彩论述和见解，都是在这儿孕育，创作的。高华正在住院，但每晚都回家住，家里安静踏实。令人感觉高华很恋家，恋家就是恋生活、恋生命。一个有担待的人恋家，这两种情感的融合，没有大格局是盛不下的。那天，小刘坐在一张小矮凳上静静地听我们聊，很轻松，很愉快。

两个月后竟然传来噩耗。我恍惚，心有点抖。12月27日当晚，在我

平素记的《文革工作日志》中，竟情不自禁地反复粘贴“我真的对高华的病情不敏感！”，所记如下：我真的对高华的病情不敏感！为什么不敏感，是实在想不到高华会离我们而去。我真的对高华的病情不敏感！上午，手机铃响，我听传来的声音是：我是高华的学生，我立刻想到是高华的那位胖胖的男学生，许多年前就是高华派他来取文革资料的。那时，高华大概正准备写作《红太阳是怎样降落的》（我这么称呼）。我真的对高华的病情不敏感！我还反复问你是那位胖胖的学生吗？是来取过材料的那位吗？直至对方说我不是，我是高华家的小孙，是在上海陪高华看病的小孙，与你见过面的，我还没有明白过来。我真的对高华的病情不敏感！其实，这时应该敏感了，应该紧张了，但一点都没有。我真的对高华的病情不敏感！我竟然还问你有什么事？

突然，我感觉那边小孙的语气低沉了，小孙说高华昨晚去世了。疼痛，从内心深处袭来的疼痛，有点抖。我真的对高华的病情不敏感！两个月前，去南京采访的时候，还和光耀抽空去看望了高华，感觉高华精神爽朗，生命长驻。前些天还想到元旦要给高华打电话，恭贺新年。前些天与赵修义教授去松江查看文革遗址，因赵住在师大二村，还讲到高华生病时我也曾来过二村，赵说与高华是神交。我真的对高华的病情不敏感！为什么不敏感，是不愿高华离我们大家而去！

一天恍惚，没写几个字。给光耀、庆全、筱才、吴驷，维江、兆奇，还给熊月之所长和赵修义教授打电话。我真的对高华的病情不敏感！心一直有点抖。网上有人说：天妒英才，还有人联系12月26日胡思乱想……难道真是天诛吗？我说：大道指天啊！

我立即给熊景明老师发邮件，我要到南京送高华。所中同事王维江曾为五十年代知识分子改造的课题请教过高华，维江伤感地说，他正以《史林》编辑部的名义给高华写贺卡，我的电话铃响了……他也要去南京送高华。

12月30日，高华的追悼会。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同道们围在大厅里。当我走近高华的时候，见他躺在鲜花丛中，耳边一直回响着他朗朗的带着

一点南京音的称呼："大陆啊……"以后再也听不到了。小刘说：金大陆老师，你来送高华啦！我的眼眶立刻湿润了。我是很少很少在公众场合流泪的人，大概几十年都没有过！

在追悼会现场，相遇的上海学者有曹树基、萧功秦、许纪霖、朱学勤等，但第一个是陈映芳。我知道陈映芳已经从华师大调往交大了，数月来，我一直在期待有个机会，亲手将《非常与正常》送给她。我大声对陈映芳说：真没想到是在高华的追悼会上遇见你啊！陈映芳愣愣地看着我，她不明白我的意思——其实，这里面是有缘份的。2006年的春天，正是陈映芳向熊景明推荐了我，我才得以在中大与高华相识了。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12月30日那天，是我的生日。回来后我在《工作日志》中写了一句：以我62岁的生日面对高华57岁的祭日，伤痛之情，难以平复，唯一的指向就是：怀念朋友，珍惜生命，勤奋工作。

[二]

2006年4月1日上午，我到达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景明老师已在那儿等我了，她告诉我高华也在中心。我不认识高华，但知道他，读过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而且我手中的这本是高华拿到样书后第一个送出去的签名本(签送给姚大力教授的)。对我们搞文革研究的来说，读《红太阳》是必需的，否则很难理解晚年毛泽东在"两件大事"中的纠结，以及许多事件、事变的来龙去脉。

当天下午就是中心的远足日。我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吴毅教授走出雅礼宾馆，看见百米之外的大树下站着一个腰板挺直、满头华发的人。吴毅对我说这是高华，当时给我的第一个直感：这是一只在森林中飞翔的"白头翁"。

相互介绍后，高华竟然知道我搞过"老三届"研究，我说现在为课题做《上海文革社会史》，以准备《上海文革日志》和文革人物《年谱》。一路上，

高华向我讲述了即将于5月份在美国纽约大学召开的关于文革40周年会议的一些情况，并表示我能搞清上海文革时期的衣食住行很有意义。当时，我不知道高华的研究已进入文革，有涉足（林案研究）晚年毛的打算。只是感觉他人很随和，信息量很大，谈得很投机。

就是在那天，还发生了一件后来被景明津津乐道的“上海好人事件”。远足中途休息的时候，高华说腰伤犯了不能坐。我是打球时腰部扭伤贴了膏药来香港的，便说我带有奇正藏药，景明说那你赶快给高华送去。回到雅礼宾馆，我还对高华说一会就给你送来。谁知我回屋翻遍行李不见那几袋伤药，急出一头汗，赶紧给上海的太太打电话，原来这恼人的膏药忘记在茶几上。我嘱咐太太一定快件寄出。第二天上午，我在中心碰到高华和景明，闷头不吱声，心中十分不安，转身便直接给在《深圳特区报》任职的学生打电话，叮嘱她无论如何利用报社的往来专车买膏药送过来。一会儿，景明果真找我要药来了，我当时满脸通红，嗫嚅着说明情况。景明大声说，你们一个腰痛不好意思开口，一个又找不到药不好意思解释。她赞我急他人之苦，解他人之难，其实我为自己失信颇为不安。

不久，景明约我和高华去她家作客，还安排我俩出席在中大和香港大会堂剧院举办的纪录片节。不久，《炎黄春秋》的徐庆全到了，这个性格豪爽的“达人”带来了许多有意思的话题。于是，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团队白天在中心工作，傍晚在操场散步，不时还有台湾学者、外籍学者加入进来，古今中外，谈天说地，甚是热闹、欢喜。

我知道高华写作《红太阳》，一定程度上源于文革时期的经历和感悟，阅读和思考。这种回溯性的历史追问，是将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命运串联在一起，看其中种种关系和格局的缘起、排布和演变，确实需要大勇气、大情怀、大智慧。

我更知道高华写作《红太阳》的态度是学术的。因为面对“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包含“继续革命”）如此尖锐和尖端的问题，任何服务于某种要旨的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任何追随着某种利益需求而情绪化的辩护，都

是经不起历史之锤敲打的。作为一个崇尚秉笔直书、读《报任安书》而内心激动的历史学家，必然以据事言理、求真求实为依归。

学术的态度不仅是严肃的也是冷静的，诚如高华在《红太阳》的“前言”和“后记”中所说：“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披览高华《红太阳》研究题旨中的这些关键话语，谁能说这不是一个学者真诚而透辟的研究呢！所以，在中心这段不长也不短的时日里，我和高华时常谈论一些从同一政治文化中延伸出来的，文革的材料和话题。

一天，我做完文革题材的午餐报告会后，高华对我说，他正和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一个项目，主题是从 1949 年到 1981 年的中国，他承担了 1969 年到 1971 年的分册。这正是中共九大到林彪爆炸的那一段。我承认正是林案击毁了我对文革的认同和想象，我脱口而出：这不就是写作《红太阳是怎样降落的》吗？！我清楚地记得高华靠在一排书架旁，看看我，没有响应。我立刻领悟到：高华是谨慎的。面对如此重大而复杂的题材（甚或是如此复杂而艰难的研究环境），谨慎的态度在层面上是智慧的，在底座中则一定是以学术为支撑的。其实，不管是作为自然人，还是作为政治人，只要进入历史学的轨道，任何伟人的“升起”和“降落”都是正常的、真实的。而只有让伟人回到学术的真实，伟人才是真实的伟人（那些为伟人涂抹色彩的非学术的行为，只能是侮慢伟人）。高华还对我说，此地的优

势是可以放开讲，但资料的局限性仍很大，并希望看看我的一些研究。我答应回去后将已发表的文革社会史的文章打包传来，高华说未刊稿也行。

在中心，我知道高华的心脏有点毛病，景明是高华的“知心姐姐”，若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她还帮高华请过香港的医生。高华的烟瘾实在太大，不一会儿就和庆全兄乘电梯下楼去了。看他俩吞云吐雾，一副陶陶然的样子，有时候我和吴毅碰上了参与聊天，也在旁边吸着“二手烟”。景明总是冲着他俩诉说吸烟的危害，他俩总是回应一张灿烂的笑脸。

谁知，高华的心脏没有出问题，肺部没有出问题，却是肝脏出了大问题。

[三]

回沪以后，我整理了一个材料包给高华。间或便有些邮件往来。

2006年11月14日，收到《二十一世纪》杂志第十月号，其中有高华讨论林彪事件的文章。2007年3月17日，我接到高华邮件，希望提供《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等相关资料，“供急用”。我立即回复“同意提供”，并又电话沟通了高华派华师大博士生来复印的安排。在当天的《工作日志》中有如下记录 ：“12日完成‘深挖洞’时还想到与高华沟通，果真就有了联络，属灵犀之通。”我知道高华的又一部重要著述开笔了，且确实是进入了文革的主题。文革这个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人类史上的重大运动，需要学术界作出详尽而周至的描述，严肃而认真的解答。我期待高华的成功。不久，高华的那位高高胖胖的博士生就来复印资料了，他就是在追悼会现场指挥大家排队进场的那位，现在我知道他叫周孜正，并读了他在病房陪伴高华的一些记述。他对高华老师的敬爱和顾念令人感动。

仅仅过了一个月又十天，2007年4月27日，我打开邮箱，惊悉景明发来的邮件 ：高华疑似肝癌！希望上海的朋友帮忙！我立即给景明回复 ：但愿是虚惊。若确切，将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接着，我又与萧功秦联系，得知高华已由华师大张济顺教授的关照，入住上海中山医院做癌症的介入

疗法。5月2日下午，我与姚大力一起去看望了高华。他面色红润，精神爽朗，心理状态也调适得很好。我以为属早期发现，是早期治疗，不会再有太大的问题了。那天，高华告知我，他参与中大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国史研究的丛书，已写作了十多万字，完成了“清队”、“一打三反”等重要章节。确立了“建立新秩序”的构架。我知道高华的这本著述不太可能在短期内问世了，但我仍然期待着。

8月20日收到高华的邮件，如下：

> 七月中，我又去上海中山医院，经CT检查，发现肿瘤已被封包住，医生说不需再做，待这月底去复查，几次检查，验血都是正常的，问题在CT。现在我的身体还比较稳定，从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前不久全家还应朋友之邀去云南避暑一阵，由头就是庆贺景明荣休。代问大力。

我回复如下：

> 知道你数次检查均安全，十分高兴。对一个有社会担待的人来说，活着，活得安全，很要紧。因为你已不是为自己活着了。景明坚持游泳就是榜样。我现在每周打两次球，只求出汗。你可散步，品茶，不吸烟，不喝酒，不拖拉检查，不会有问题了。大家都祝福你。大力正在普陀山庙里读佛经，开学回沪后，我会转告你的消息。不知你那本《红太阳是怎样降落的》（我这么称呼）进行得如何了？地久天长，不必着急。上半年，我写成“深挖洞”、“野营拉练”两文（以上海为中心），有些材料或许对你有用。

2007年，对高华来说，对高华所承担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来说，真是巨大的不幸。

[四]

2008年，对高华来说，或许是稳定的、平静的，甚或是乐观的，但我相信隐约之中的担忧和紧张总是存在。

这一年我还和高华共同参加了两次学术活动。一次是所中同事王维江博士与德国汉堡大学有个关于五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科的重建的合作项目，希望我牵线请教高华。我询问高华的身体情况并试探是否可以应允，高华一口答应。那天是7月16日，我和维江还有一德国教授在南京一茶室与高华见面，具体谈论的内容已模糊了，但高华说到他的研究无法申请任何课题，不可能有一分钱的资助，使我深为感叹。确实，高华的研究关涉到中共的领袖和政治，但有关管理部门为什么分不清“政治的学术”与“学术的政治”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呢。前者的政治是统辖学术的，即学术是服从于政治的；后者的政治是学术的对象，即学术是指对和破解政治的。况且，越是因为政治的复杂，事理的复杂，人性的复杂，越是要坚持学术的立场。如此才能跳脱到一个清醒而独立的位置上，如此才会有独树一帜的创造和价值，如此才是学术的本分。我为高华不经意的一句话默然疼痛。事后，维江计划由高华带一研究生去汉堡大学演讲。

另一次学术活动是11月份，参加交大历史学系曹树基教授主持的“革命与战争”讨论会。那次会上曾就史实和方法论发生数起争论，记得高华的发言稳重而平和。那次也有学者从方法上质疑我文革社会史的“下端”研究，会后，高华认真地对我说：你的研究路数是对的。11月份已是深秋初冬了，高华给我的感觉并没有畏寒怕冷，仍然声音洪亮，身手敏捷，完全不似一个病人。直至2009年4月，高华还来电询问出席汉堡会议需提交大纲之事宜。

大概突变就是发生在宽松之时。2009年9月30日晚，惊见高华邮件，说这次复查的结论不好，节后要到上海手术。同时要我通知维江，汉堡的会议肯定不能去了。10月2日，再见高华两个邮件，说片子证实不好。不久，高华入住上海东方肝胆医院。我和维江去探望等待手术的他。高华不像个

病人，还反问我的研究情况，我说了《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的进展、体例和计划，高华高兴地说要早日看到我的成果。但高华没有提及自己的那本国史著述，我也不敢提及。探视中，我悄悄地注意到，每当有医生、护士进房时，高华的神情会略显紧张。人啊！毕竟这一刀也是生死关头。

术后，我和光耀带着鲜花去病房祝福高华，见高华的枕边放着许倬云的书，小刘说高华离不开书。我们共同祝福高华又闯过了一关。

[五]

2009年11月1日，接到景明的邮件，提议从高华开始，启动“历史学家访谈系列”，帮助他倾吐观点和思想。第二天上午，景明又直接打来电话，再谈采访高华的事，并认为这对疗伤（包括身心）和学术都有意义。景明人在香港，且比我们都冷静，深远。我知道高华第二天就要临时出院，等待第二次微创手术。我赶紧与光耀联系，由光耀派了位研究生带上录像器材，随我赶赴医院。

那天的事来得很突然，因没有准备，只是为高华做了一段“开场白”的录像。记得高华谈到近日在病床上读许倬云和龙应台的书，为其澎湃的气势和深深的人性所打动，国共两党要集体地面对自“抗战”胜利后的这段历史，它再也不是什么胜者或败者的历史了，而应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历史。高华说术后的疼痛他没有流泪，但面对大江大海般的民族的悲情他流泪了。史家有担待，小处有探求，大处有情怀。那天高华送了新书《革命年代》，在出租车上我翻阅“代自序”，为一个细节所震动：1967年文革的第二个年头，高华一个小学生，扒货车从南京到上海，在南京路、外滩留连两天。而此时此刻的我，一个中学生，正扒着货车从上海去重庆。多么相同的奇特而惊险人生经历呵！

当晚，我给景明发送邮件（同时转发庆全），报告情况如下：

> 接到你上午电话后，我即与高华联系，他非常赞同“历史学家访谈系列”的创意，并答应我下午即去。因为我想赶在明天出院前，将高华手术住的31床的环境拍下来，这十多天也是他生命的重要时刻，并顺便谈谈如何立个提纲，如何操作等。下午3时半，我与高华搞了一个半小时的录像访谈，主要谈这件事的缘起，算是开个头。录像开始前正巧主任查房，主任说高肝功能已全部正常。我不会让高华产生“来日无多”的感觉，反而高华说我每每去，总给他带来好的消息，请放心。

11月16日，又接景明邮件，说几个年轻的学者看望高华后感觉良好。我立即回复如下：

> 一直在等待高华第二次做微创手术，但愿一切顺利。上次在31病床启动性地为高华做的录像，保存在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处，现在有高华的学生来，可否让他们带回去，将来整体运作时可供参考和使用。现在已近九点了，已不方便与高华联系。

此后，我又与维江、马军（所中同事）去看望了高华。那时，高华租住在东方肝胆医院后面的出租房里，等待第二次入院。那次，我没有忘记景明关于采访高华的叮嘱，但我没有开口，高华也没有开口。他不开口，或许是怕给我们添麻烦，我不开口，则是心里总横亘着一个障碍（尽管我说过，不会让高华产生“来日无多”的感觉），生怕有种“不吉利”的搅扰。最近，读到杨奎松教授悼念高华的文章，也提到没有在最后时刻完成对高华长谈的遗憾。而杨教授没有抓紧，大概也是存在这种不愿浮想的心理障碍。现在想想景明老师是对的。

那天，告别高华后，我和维江、马军默默地在马路上走了一段。眼看一个中国现当代史的开创学者，一个以求真求实为学术生命的教授，就这么冷落在一间民房里，心中很不是滋味。

[六]

自2009年秋天的手术后，高华时而会来上海复查，或去上海龙华医院坚持中医治疗。因我和光耀教授有一位主要的采访人物在南京，所以也会与高华在南京见面，并保持邮件与电话的往来。

记得有一次与高华聊起《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的情况，我说一直在进行，曾辑录过一个《张春桥〈文革〉年谱23例》给庆全，都是独家的材料，大概是体例的问题，庆全那儿也不能用。我还听光耀说香港中大出版社正在关注张春桥研究的选题。高华告诉我刘××是"张迷"，"张迷"有成片的趋势。高华说他寄希望于我的年谱，并认为是更重要的更有价值的。这只是一般的工作闲聊，我无意也不忍拜托高华为我去做些什么。不久，却意外收到高华的邮件，是他写给中大出版社甘琦的，其中专门说了我的研究："从各方面讲，他都是一位非常合适的人选，史料功夫和分析能力都是上乘的，我郑重推荐此人！"我感谢高华对我学术研究的认同和信任。一个重病之人，没有缠绵病榻，而是始终关注着学术，关注着现当代中国的大情节、大问题。现在，高华去世了，我将在《张年谱》正式在中大出版的时候，在扉页上题写"谨将此书献给朋友高华"。

2010年6月5日，我和光耀利用采访的间隙，与高华在南大附近的茶室见面，沙飞的女儿王雁也在座。查那天的《工作日志》记："与高华见面。高脸色红润，音色洪亮，不会有什么问题。聊天很愉快。晚动车回沪。见中大景明老师邮件：13日到上海，届时高华正巧要来上海龙华医院。

6月14日下午，与景明、高华，还有上海的朋友维江、陈映芳等相约在外滩。熊月之所长宴请大家。席间，熊所长悄悄对我说，高华很精神，一点都不像个病人。而后，我带领大家夜游了黄浦江。江风习习，两岸的灯光璀璨迷人，但大家只是乘游轮转弯看了几眼，拍了照片，更多的时候都是围坐在一起娓娓而谈。谁也没有认真地思忖过什么，直至这次维江把照片发给我，我发给景明老师，她说夜游黄浦江是高华最后一次"游玩"——我很伤心，又有点宽慰。

两个月后的 8 月 30 日，我的电脑中出现了景明的邮件，如下：

高华因消化道出血住进医院近十天了。是肝硬化引起的食道静脉曲张(据说 50%的肝硬化晚期病人都是因此引起大出血而亡)。医生说他的静脉曲张情况严重。下周正好有这方面的专家到南京开会，故医生提议由专家替他做封盖曲张部位的手术。他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手术。手术有风险，不做的话，也随时处于危险状态。听起来他的情绪还稳定。

我的回复如下：

很焦急，很担忧。我会打电话给高华，给他鼓励和祝福。我问了有关人士，好像还是应该手术，否则随时有危险。不是你们来上海时，他还很好吗？脸色也很好。祝福高华。

2011 年 12 月 26 日，高华终以肝衰竭大出血而谢世。

在我与高华交往不长的近六年的时间里，高华有近五年在抗癌。他的乐观和坚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高华对学术所持的抱负、勇敢和睿智是大家共享的财富。然而，我进一步要说的是（在一片痛悼声中，我不愿引述网上来自不同向度的叽咕）：高华不是某种政治符号的代言，更不能成为某种政治价值和政治伦理的抵押。高华就是高华，高华就是他自己。高华是学术的，学术之树常青。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海阔天空，赤诚相见

钱钢

高华走了。他走后的许多天里，我一直在回想：是哪年哪月哪天？在哪里？我们曾谈过什么？我自认和高华是相知相得的故交，但屈指算来，交往竟如此之少，我们见面不超过十次，其中半数是众人聚会。

2000 年 5 月 20 日，上海大学召开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朱学勤邀请我参加。他当时正筹备 1949 年以来当代史的研究计划，想参照费正清剑桥史的编撰方式，约请专家分专题论述。他和我商量能否参与研究灾害史或军事史，并告知，会请葛剑雄写行政区划史，高华写政党史等。那几年常听学勤提到“高华”这个名字，知道是位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著名学者。头一天未见高华，第二天他到了。

高华热情随和，一见如故。我还真以为这是头一回见面，他却说，12 年没见了……他提醒，1988 年，我们曾在“京丰宾馆会议”上相遇。

“京丰宾馆会议”算得上历史事件，其正式名称是“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1988 年 11 月 10 日到 13 日在北京召开。虽有李锐、于光远、李慎之等高官到会，但实际上是由北京国防经济研究会、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经济学周报》共同举办的一次罕有的民间论坛。时值政治

体制改革涨潮期，二三百位学者（还有企业家）集聚一堂，我认识的有孙立平、郑也夫、刘东、曹远征、萧功秦、周舵等人。此会宏论滔滔，大会、小会、会场外、客房，到处听到慷慨激昂的讨论，其间新权威主义派与激进民主派还爆发了激烈论战。而最让我难忘的是会上特别浓厚的史学氛围，许多人在谈“明治维新”、“洋务运动”、“戊戌”、“五四”。

我才想起那次在萧功秦住处见过一名叫高华的南京大学教师，但印象较淡。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了姓名地址，也告诉我，他在研究延安整风。隐约记得，这人谦和，沉默，坐在床边，听情绪激动的萧功秦对曹远征讲述袁世凯的功过（当时体改所的曹远征似对“开明专制”发生兴趣）。此时在上海大学，当我将眼前这位蜚声海内外的党史大家（他刚刚在香港出版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12年前那位低调的南京学者联系在一起时，心被触动。12年，好一个厉害的磨剑人。

我和高华的交往，是从2000年5月21日下午才真正开始的。寒暄数语，我们就直奔要害，讨论起“1963年林彪的病情”、“毛泽东为什么抛弃他的嫡系罗瑞卿”等问题。那时我渴望向他倾诉，向他求证。两人关注点相近，彼此又毫无保留，完全信赖对方。我们干脆缺席大会，在会场外的长椅上切磋甚欢。我看出高华的关注点已转向1949后的党史，特别是林彪、文革。

2001年4月初，高华经广州去香港，恰逢林彪之女林立衡在穗。两人都想见见对方，我从中牵线安排了见面。我们还参加了一场特别的宴会：几位林彪麾下的将领见林立衡，其中有文革中新疆第一把手龙书金、吉林第一把手王淮湘。高华乘直通车赴港前，我们还用半天参观了黄埔军校旧址。

这回相处，我对高华考证史实的一丝不苟有了直接的印象。我在军队21年，半数时间当《解放军报》记者，离开军队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搜集研究林彪资料，但困难重重；加之卷入不同媒体，此事时断时续。我对高华说，林的历史，可裁为三截。首段为1949年前，中段为建国到“九大”，末段的核心是“九·一三”事件。现在首段已无禁区，媒体、书

籍乃至电影，都已为“军事家林彪”正名。末段最关键处，在于高层资料解密和当事人说出真相，否则历史难写。而资料较为易得的中段，人们似乎兴趣索然，但我极为看重，其中包括军队如何卷入政治这一问题。我说我想攻中段，高华支持。

在广州见他一个多月后，我们聚首南京。我所任职的《南方周末》举行“校园行”活动，我和同事们来到南大。高华是倾力帮助南周的诸多学者之一，他特意向钱乘旦教授引荐，邀请我在钱教授主持的大型讲坛上作公开演讲。这是2001年5月17日，我的讲题是“南方周末与新闻改革”。那晚我和在座师生情绪都有些激动。高华坐在第一排，不时向我会意地点头微笑。结束时，他和我握手许久，说：“钱钢啊，讲得好！”

然而仅几天后,《南方周末》遇到麻烦。和此前已经多次发生过的一样，我们的报道出事，班子调整。我的常务副主编职务被免除了。不过从新闻一线退下，使我有机会重返历史研究。应熊景明女士邀请，我在2001年8月访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在那里从公开出版的资料入手，继续研究“林彪中段”。我借鉴金观涛、刘青峰两位教授的关键词计量分析方法，尝试对已有数码光盘的《解放军报》作话语分析，写成《红色政治词语的勃兴和流变（1956–1969)》。2002年5月，我到南京大学和高华详细讨论该稿，得到他许多中肯的意见。

2003年春我到了香港大学,在一次聚会中见到高华。那天是他的生日，景明在寓所附近的餐厅邀朋友们相聚。当时听大家祝贺高华50岁，我还纳闷，他小我一岁，怎么会先我进入半百？后来知道，其实是他的49周岁生日。那天我发现高华的头发突然白了许多。

时间提速了。我开始在港大主持中国传媒研究计划，虽仍对历史入迷，但被新闻的河流越卷越远。高华则咬定他的目标，步步推进。我在学术刊物上读到他谈大饥荒、“四清”、文革、林彪的多篇论文。他逝世后，我从网上看到他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两次演讲——“毛泽东何以发动文革”和“再探林彪事件”。

高华在演讲中说，近年来，有关林彪的许多新材料被披露，许多新的解释有价值，多数论著表现出对林彪很深的同情，但一些研究偏于主观。他认为，研究者应该保持和研究对象的距离，特别不能对亲属的解释照单全收，要纵深研究体制。我对这些话深有同感。高华的新课题难度极高。今天党史研究仍被人为禁锢，解密时代尚未到来。

坦率地说，他对文革和林彪的研究，还没有重大的突破。我在看两个演讲视频的时候，时而叫好，时而不安。高华对史料有特殊的悟性。但我能看出他遇到史料阙如的瓶颈，也能体会，面对年轻人时表达的不易。会场上的笑声，有的让我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可能他的某些表述，造成了脸谱化效果甚至误读。高华对史实有强大的逻辑建构能力，但这种能力也可能固化思维。我们以独立的态度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是否也应该与自己的定见保持距离？

可以肯定，继《红太阳》后，高华已有下一部力作的攻坚计划。我听到了磨剑之声，可惜没有机会再和他切磋。我注意到他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两次演讲都在 2006 年。一年后，他被查出肝癌。

病中的高华，对我一如既往地关注。很惭愧，我对林彪的研究几乎停顿，他寄予希望的红色词语论文也未及修订发表。2008 年春，我使用传媒话语研究方法，结合亲历，写了一篇《红心的故事》，贴到网上，算是那项研究的一份作业。那时奥运火炬传递风波引发抵制家乐福之类的风潮，网络上满是“红心”。4 月 27 日，我正行山，接到景明的电话，她说，高华来电话，推荐你的文章！不数日，汶川地震。我的焦点再次回到自然灾害。我埋头检索分析，用三个月写出《地震预警问题初探》。2008 年 8 月 31 日，我给高华发邮件：

> 高华，你好吗？非常想念！
>
> 我用了许多时间，陷在地震史料中。附件里的文章，请指教！
>
> 钱钢

两天后，他回复：

钱钢，

大作读毕，一看就知道，你花了很多功夫和心血而写成，全文严谨实证，极有说服力，最好能发表在南周或经济观察报，让更多的人看到。

高华，9，2

这是一个重情义的朋友，真挚、温暖。我想起高华，就能感受到他的鼓励和期待。我们相见的最后一面，在2008年1月17日。那天，萧今开车带高华夫妇、熊景明到港大，参观陆佑堂、图书馆，中午陈婉莹请大家聚餐，我和龙应台在座。下午，我和他们一行去了浅水湾、赤柱和山顶。在车上，他和访问港大的年轻学者郭宇宽一路交谈。我注意到罹患重症的他的些微变化，在那天日记里记述对他的印象：“朗声地笑，一如既往地谈（种种历史细节），惟一能看出不同的是，他拍照，拍景致，被拍。留恋……”

我一幕幕回想起和高华的交往，次数屈指可数，每一幕却都栩栩如生。这不是祭文。我试图借此较准确地记下这位史学家的几段个人史料，我更想像从前一样，和他快乐随意地交流，海阔天空，赤诚相见。

2012年1月15日写于香港大学

作者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世风日下中一介传统书生

宋永毅

在海外的华裔学者中，我算是和高华来往不少的了。2006 年春我去香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讲文革的课，他是主持人。以后又一起在雅礼宾馆居住，少不了在一起煮酒论史，纵横中外，没日没夜。有一天高华问我对他的印象，我冲口而出："你身上'小资产阶级'的传统书生味，大概隔一条马路也能闻出来。"高华知我爱开玩笑，便当作幽默而默认了。今天细想，还真是点到了高华兄一介传统书生的本色。

照理，我们这一代人是被文革切断了与传统文化所有联系的一代。但是我和高华一接触，便为他的儒雅而狷介、宽容而耿直、谨慎小心又不失良知的性情感染。他给我的感觉，绝对是我们这一代"红卫兵"、"知青"出身的学者中的异类，至少更像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院里熏陶出来的。

当时我主编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出版后获得了好评，也有异见。本来这是学界的常事，但个别学人仗着自己的关系背景和手头有的几份绝密文件，对数据库的收藏进行过分的挑剔，又不肯捐献自己的资料出来。对此，高华很不以为然。以高华兄的实证根底，他当然知道我们资料收集的不足，也对我直言过。但是他认为既然这是一项筚路蓝缕、

泽被于整个学界的基础工程项目，大家就应当补台，而不是拆台，更不能借批评为名来抬高自己。高华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些年来，经他之手或和他有关的默默无闻地捐献给我们项目的珍贵文献，就有数百篇之多。这种自觉的胸有全局的团队精神，在今天的国内学界大概已经很少见了。

但高华毕竟生活在人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当代。有时他那种传统书生气，会给他带来不小的误会。记得一位史学界同仁给中大出版社投了一部有关文革的书稿，因为高华是该出版社的常任审稿人，便也托了他帮忙。高华对出版文革研究著作一直有着宽容、热诚和责任感，便一口答应了。如果按当今国内学界的规矩，既然答应帮忙，便应一概说好话的。但最后他的评语虽然也有很多肯定出版的褒誉，却又一一指出了不足之处。那本大作最后没能在中大出版，使作者对高华产生了不小的误解。因为两边都是我的朋友，我听说了这一消息后，苦笑连连，心想：高华啊高华，你这个“传统书生”也太不与时俱进了呵！

高华在和我一起论史时，对明代东林党人“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人生信条一直推崇不已。尽管高华为文一向非常谨慎小心，但论及一些历史事件的本质，他从来是鞭辟入里、直捣黄龙的。记得2006年的一个春夜，我们谈到1967年1月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刘少奇，都认为这是毛在打倒刘后，故意玩的“猫戏老鼠”的游戏。但是我提到刘少奇当时向毛提出的要求其实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矫情。它们是：辞去《毛泽东全集》主编；允许带妻儿回乡种田；一人承担责任，不要为难广大干部。这些要求很容易给政治权术老手的毛泽东造成一种刘不甘失败的韬晦之计，而且夸大了全国干部中的刘系人马，进一步造成“一月革命”中对所有当权派的乱斗乱打。高华虽然也同意我的看法，但补充了一句说：“到了那种场合，即便刘少奇一进人民大会堂就一路跪哭到毛泽东面前，毛也是不会饶了他性命的。”他随即举了毛在延安整风中极端阴暗的报复做例子，真使我有一时拨云见月之感。

高华在九十年代来过美国做短期访学，在他得知自己的肝病后，一直想再来美国看看，尤其是他惦念着当年在华盛顿没能参观完的许多一流博物馆。为此，我在2006年和2008年两次邀请他来美开有关中国当代史的学术会议。他一开始都是一口答应，但最后都道歉不来了。说老实话，他的爽约也曾使我不高兴，因为给他凑出一笔旅费也不是一件易事。但当我听说真实的原因是，他怕因为参加了内容敏感的会议而被有关方面停止对他癌症的贵重药物的使用，心中不由掀起一阵阵不间断的绞痛。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世风日下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一个儒雅谨慎的重病中的书生，连参加一个追溯历史真相的学术会议，都要担惊受怕到无药治病的程度!

2011年12月26日，我在一批朋友们的群发邮件中获悉高华英年早逝的噩耗，不由心潮澎湃，即刻回复："高华是一个对历史真相的孜孜不倦的探索者，他的精神永存！"——权以此句作这篇悼文的结尾吧。

作者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难忘高华

王维江

我的研究领域不是共和国史和党史，无资格在这里谈论高华先生的学术成就。正因为如此，在2008年有幸结识他之后，我更多是以忠实“粉丝”的态度，关注他的研究和他的健康状况，时常浏览他的个人网页，不敢多给他写电邮和打电话。后来他的个人网页看不到了，只好期盼着他来上海复查身体的时候，见上一面。与高华先生的五次见面，深刻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承其学生小周的推动，我把这些记忆写出来，聊表缅怀之情。

结识高华先生，一下子就被他的人格和风度所吸引。那是2008年6月，我和当时汉堡大学的舒秦教授（Prof. Dr. Yvonne Schulz Zinda）以及柏林自由大学的博士生陶阿美（Marie-Theres Strauss）所组成的课题组（该课题由德国DFG基金资助，题目是“五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科的重建”）一起，赴京采访了四位老先生，其中何方先生回忆了自己在延安整风中的经历和他对该运动的评价和反思。在返沪的火车上，我想到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作者高华——由一个人格独立的学者来认定一个人格独立的亲历者的证词，应当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这一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五十年代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正巧敝所的金大陆老师是高华先生的老友，承他热心联络，并陪同我和舒秦教授于7月16日前往南京拜访，大陆老师在火车上转达了高华的要求：一是见面的地点选在他家附近的一座茶馆，二是不要录音。我听了有些意外，感觉即将要见到的高华先生或许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我甚至担心此次访谈的效果。

走进茶馆，高华先生带着笑容迎了上来，白色的短袖衬衣和浅灰色的裤子简单干净，无框眼镜后面的眼神清澈柔和，虽满头的银发，红润的脸庞显示出生命的活力，我一时无法将他与肝癌患者联系起来。

谈话自然从何方先生的访谈录起头，尽管与何老先生的看法大多契合，但高华先生平静的语气，微笑的面孔，很快缓解了话题的沉重。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始终以“老人家”来称呼自己所研究的对象，这样的称呼出自他的口中，未带丝毫的戏谑。

怕他受累，谈话只持续了一个小时多一点。我们邀他吃晚饭，他答应了。他吃得不多，因为肝病，有些忌口。吃饭不是目的，他是在尽地主之谊，尽可能延长谈话，让我们不虚此行。

虽然没有酒助兴，我们依然谈得投缘，舒秦教授邀请他参加课题组拟于翌年在汉堡大学召开的Workshop，他痛快地答应了，同时又谨慎地询问：“是否可以携妻子同行？她的费用自理。”舒秦教授说，没有任何问题。

乘夜车返沪，车上，我对大陆老师说：“高先生学问好，待人好，风度也好。”

第二次见面是在两个多月后的9月22日，他来上海复查身体，大陆老师做东，在五角场的一家餐厅聚首。高华先生的兴致很高，因为主治医生倾向于否定他患有肝癌的结论——面对疾病，他求生欲、乐观和理性兼而有之，令人动容。那时华东师范大学在师大二村还给他保留着一套小房子，我家就在华师大附近，返程时我们同坐一辆出租车，我先送他，他过意不去，下车后执意陪我在二村里走了一圈，说这是为了饭后消食。

第三、四次见面，他已被确诊为肝癌，来沪做手术。术前我和大陆老师、

金光耀老师去看望，他的神态一如既往，面带微笑，看不到一点气馁和忧伤。术后他住在医院附近的出租屋里，我和同事马军随大陆老师前往探望，房间很旧很暗，也很拥挤，走道里搭着一张钢丝床。高华先生依旧微笑着，只是脸庞已不再红润。问起来沪治疗的费用，高华先生微笑着转换了话题。

第五次见面已是2010年6月14日，聚会是大陆老师安排的。他一直在外滩的档案馆查资料，碰头地点就在档案馆的大厅。那天下着小雨，夏季温度非常舒适，一眼看到高华先生，背着双肩包，配着月白色的衬衣和米黄色的裤子，朝气蓬勃，毫无病容和倦容。他招呼着同来的熊景明女士、陈映芳先生，还有几位旅居西班牙的华侨，我觉得他像是一位好客而尽职的资深导游。那天的天气很配合，夜游黄浦江，微风习习，一点也没有夏季的闷热，船上游客很多，我们人多势众，竟然抢到一张桌子，大家围坐在一起，古今中外地闲聊，还一起合影留念，我充当起了摄影师，高华先生特意关照："维江，你也来拍一张！"这是我与高华先生唯一的合影，弥足珍贵。最珍贵的，是他顾念别人的心。

此次别过，我和大陆老师都说，高华病好了，没事了。我们多次提起，有空再到南京去看他，可一直没有行动。大陆老师在自己的工作笔记中痛陈："对高华的病情不敏感！"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与大陆老师的"不敏感"相比，我则近乎麻木！

2011年12月27日，我正在所里写信，给高华先生的贺年片写好三四分钟后，大陆老师的电话来了："维江，高华走了！……"高华先生走了，给我留下了不少遗憾和自责：

2008年年底，欧洲的圣诞节已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舒秦教授发来糟糕的消息，由于经费不足，计划中的"五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科的重建"Workshop不得不取消。我知道，舒秦教授费尽心思，一家接一家地跑基金会，可谓"沿街乞讨"，但最终还是有近三万多欧元的缺口。高华先生那一阵子忙着在医院照顾自己的母亲，知道这一消息后，反过来安慰我们说："不要觉得过意不去，你们已经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大

家能理解。”小周也是会议的参加者，一定是高华先生的缘故，他在那年的平安夜发来电子邮件：“您和您的同事为这个会议的准备已经付出很多，辛苦了，特地来信向您表示谢谢！”这让舒秦教授很感动。现在看来，即使将来还有机会补上一场Workshop，但没有了高华先生，缺憾已无可弥补。

2009年6月，我研究五十年代的第一篇习作发表在《炎黄春秋》上，14日，就收到了高华先生的电子邮件：“将五十年代的历史学家做三个分类，很准确也传神，写得很好，可以写成一本书啊，”

我很敏感地发现他最后一句话的标点不应该是逗号，猜想他是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打字，所以才会有笔误。不忍打扰他，我只是礼貌地感谢他的鼓励，而没有顺势向他请教我的一大堆问题，这是我麻木症的又一证据。

不久，《炎黄春秋》编辑部转来四川一位学者的批评函，网上也有愤青般的非议。我突然意识到高华先生平日行文处事谨小慎微的可贵，这一研究领域特殊而敏感，哪怕论文本身是科学性的，仍难免引出歧义和枝蔓。我无意抬出高华先生的评语为自己文章的不足辩护，而是要感谢他的鼓励，让我有勇气继续在这一领域继续研究下去。只是距离“写成一本书”的期许，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9年，经大陆老师提议，敝所已向高华先生发出邀请，趁下半年来沪复查的机会，来所里做一场学术报告。结果此次复查改变了一切，不久他就被推上手术台。

自责已不能挽回遗憾，我想在高华先生周年忌日的那一天，把那封未能发出的贺年片，焚化在他的墓前。

附：高华先生为汉堡会议发来的论文提纲

胡乔木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新规范的确立

1949年后，胡乔木作为毛的秘书，直接听命于毛，成为实际上的中共意识形态领导人，在一段时间里，胡乔木直接统领中宣部，而在更多的时候，退居幕后，在其它部门，例如公安部的配合下，以周扬、胡绳等为助手，“分兵把口”，领导和布署全国社会科学各相关单位的改造和重建。其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为“破”，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和对大学的院系调整，以及关、停“旧学校”、“旧刊物”，将建国前的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全部摧毁；二是“立”，将苏联经验和毛泽东思想全面运用于社会科学各相关单位的制度和思想、业务建设中去。在胡乔木的领导下，以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杂志、《新建设》杂志为基地，对哲学、文学、历史学、新闻学等进行全面改造，建构起毛氏社会科学的绝对统治地位。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天堂里的高华

萧功秦

你知道，真理绝不会头戴皇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它绝不会在敲锣打鼓声中，在鲜花与掌声到来，它总是在偏僻的角度里，在哭声与叹息声中诞生。你知道，经常受世界历史浪潮冲击的，总是一些普通人，而决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

——费尔巴赫

高华走了，我得知消息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想象着他在天堂里的情景。我想象着那是天堂里一个湿冷的、雾濛濛的早晨，他正坐在一条长椅的一头，穿着一件很厚的大衣，另一头空着无人。他有点寂寞，一定会有很多话想说。

高华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在1978年在南京大学读历史系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历史系的本科生，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见面，而且无话不谈。我每次与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故意带着沉稳的官腔，“老高呵，过得怎么样呵，不错吧？”他也总是故意压低了声音，用一种同样夸张的慢条斯理回答说，“很好呵，老萧呵，

你也不错吧？”于是我们开始海阔天空谈起来。他睿智、理性、幽默，有极高的悟性，有超人的记忆力与广泛的知识面。他常常会发明一些自造的绝妙新名词，例如，他把“四人帮”时期的“老干部”称之为“老一无”，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简称。

每次他到上海，我会骑着那部破摩托车，去华东师大二村他暂住的老屋去看他，畅谈几小时后，再沿着那黑洞洞的旧式水泥扶梯下来，他会目送我开着摩托车消失在弄堂的黑暗中。除了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外，2004年我在台湾一个月访问期间，他正在政大任教半年，我们天天有机会在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去重庆南路逛书店，在小馆子里吃馄饨，欣赏品评一家家小店招牌名称的文化内涵。只要我们中谁有参加某次会议的机会，我们都会争取让对方也参加这个会议，这样我们总能住在一个房间里，在风雨对床中继续海阔天空。

如果有人问我印象中高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以说，他是把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人情味和自由主义的人生价值追求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人。他的安身立命、待人接物、为人处事，充满着儒家的那种温良谦让风范，而在价值取向上则是一个地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假如有谁要我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高华那本关于延安整风的史著的价值，我会说：“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二十世纪中国浪漫革命中的残酷与美丽，那你只要读一下高华这本书就可以了。”我多次在上课时告诉学生，高华这本书应该可以作为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献给未来一百年子孙们的一个礼物。它反映了我们这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的真实的、真诚的思考。后代可以通过这本书知道，我们从极左灾难中感悟到什么，发现了什么，我们希望什么。在经历过文革那种文化专制主义以后，我们是怎么通过批判过去，而面向未来的，未来的人们很可能把他放到史学大师级里面来。我觉得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地位会逐渐地呈现出来。

一个人，一本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华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正如我在这本书的书评中所写到的，本世纪20年代进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开始具有苏俄式的罗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经历一场延安整风洗礼之后，中国革命从一个罗曼蒂克的翩翩少年变成更严酷、更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务实，既具有诗人的抒情性格，又具有斯巴达式的坚韧,既充满中国式的大同理想,同时又略带传统农民的偏执气质。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转变。在争取新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价值、思想、生存态度、情感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凡此种种可以统称之为文化或民性的东西，均逐渐地、然而却是决定性地发生巨变，如同九曲黄河大转弯一样，这个拐角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风陵渡”，就是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是中共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事件，用高华书中的话来说，这一政治运动“奠定了中共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经由这一整风运动而形成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基本范式，对中共革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后，中共又把这套模式施之于全国，深刻地改变了国人的命运。然而，这样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国内外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官方几十年来，构筑了对延安整风意识形态的解释话语，对历史真貌大大简化并予以重构，从而与史实有了相当距离。完全可以说，高著是迄今为止，在这一研究领域最全面系统并独具匠心的大作。

高华的这一部史诗之作，述说的正是这样一个从西方工业社会中孕育出来的、作为西方文化异端的左翼革命，是如何在中国本土化的；这种左翼革命是如何摆脱了苏俄布尔什维克文化模式的影响，从而具有了中国坚实而粗犷的农民革命的特色的；革命中异化出来的极左主义，如何渗入到

我们的政治文化与思维中，并在后来发酵、膨胀并给我们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高华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说故事人，以沉稳而克制的语调向我们述说着宏大的历史故事，他以历史事实的自然的逻辑，来征服读者，那是一种常识理性的力量。高华善于捕捉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性细节，字里行间都能反映出当年氛围，使人们阅读此书时似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那位当年在延安街头身穿皮夹克溜狗的康生形象，我至今还挥之不去。

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最困难的方面之一是史料问题，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涉及许多可以理解的禁忌，有关档案开放极其有限，整风领导机构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的档案基本未开放。当年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记录更无从查阅。所幸的是，近二十年，官方也少量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高华则以其特有的敏锐，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甚至可以说，作者几乎穷尽了一切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书所附的三十多页参考文献就可证明他在史料收集方面的努力。据我所知，为了对极为分散的史料进行收集，高华花了整整十年的工夫。

最为难得的是，高著所用资料几乎都是公开出版，作者能够从大量的不被注意的资料中爬梳鉴别，点滴归拢，并发掘其新意。书中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严实的资料的基础上。高对史料的真伪也做了大量的考辨工作。高著据事言理，而非凭空想象，对自己所作的论断，他还采用不同的资料加以佐证。他整整十年如此洗磨，我常常在想，未来公布的档案资料，可能只会进一步证实或补充该书的论断，而难以推翻其整体观点。

一部深刻的历史著作，必然是具有多义性的，并为不同的读者从不同角度解读提供了充分空间。这是历史本身的具体性与丰富性相结合而形成的。可以预料，读完本书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读者以为，这本书对延安整风客观地考察过程中，有意无意中发现了中国革命中的极左思潮的根源。事实上，读者可以惊异地发现，文化革命中那些斗争方式、思想风格与人们的行为态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早已经被康生等人驾轻就熟地运用了。这一发现对于我们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警惕我们政治文化中的不良遗传

基因，是大有益处的。一个不会反思、不善于从挫折与苦难中获得经验的民族，一个把伤疤当作浪漫的艺术来美化的民族，注定是不成熟的。

从高华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可以看出，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这痛定思痛之后进行的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线，他肯定了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重大的正面价值。在他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格一面持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与警惕。也许正因为如此，本书隐隐透露出作者的某种思想矛盾。正如人类历史上一切复杂而深刻的事件一样，延安整风运动也充满了矛盾的一面，毋宁说，作者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

通过高华的这部著作，我们可以感受到，二十世纪就是理想主义的世纪，是乌托邦主义焕发出无穷魅力与光环的世纪，也是革命以其自身的逻辑来试图改造人性的世纪，是“建构理性主义”给予人们新生活的意义，同时又摧毁着人们的诗情梦幻与追求的世纪。而高华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对那场逝去了的伟大革命的沉痛反思，是对未来人们内心踊动的革命冲动的一种预先的警示，也是新一代的人们，面对这个美丽的反复无常的革命女神的无言审视。

中国新实证主义史学奠基者之一

我曾在南京的追思会上说，他是中国“新实证主义史学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二十多年来，高华与许多与他经历相仿的学者，在经历过七十年代的插队、基层劳动、八十年代大学启蒙洗礼、九十年代的改革大潮的冲击之后，在二十多年的治史过程中，逐渐地、不约而同地、不自觉地形成相同的研究风格。我把这种风格称之为“新实证主义”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还有杨奎松、沈志华、韩钢等人。

为什么叫“新实证主义”呢？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它一方面与一般意义上的实证主义一样，通过对史实的发掘，将真实的历史客观地原原本本

地呈现出来，用常识理性去感动人、去说服人。高华特别强调“反对过度解释”，拒绝用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对自己发现的东西予以人为的美化与丑化。它一定要从材料当中、从史料当中，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新实证主义研究和一般意义的以考证为基础的古典实证主义又有区别，新实证主义有一种当代人的价值关怀与理念贯穿其中，它关注的是关涉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实，而这种历史真实正是我们民族反思与理性培养的基础。高华的延安整风研究可以说就是新实证主义的史学的奠基之作。

悟性、边缘状态与精神自由

我认为，高华身上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点，这两个特点相结合，是高华在事业上成功的关键。我把这两点提出来，希望对青年一代的学者能有点启示，第一，高华具有史家中极为罕见的、可欲不可求的直觉、悟性或洞察力；第二，是他在自甘边缘状态而获得的学术自由境界。

要说明高华的悟性如何了得，我先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杨尚昆的儿子，读了高华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初读〈杨尚昆日记〉》一文以后，专程到南京来找他。杨公子对他说，我到南京来，就是因为对你发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对我父亲如此了解？我曾经问过我们家族所有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认识你，但是你写我的父亲确实非常真实，你把我父亲的内心写活了。你到底是认识我们家什么人？高华说，你们家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就是看你父亲的日记。

通过阅读日记，把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点活，这就是“悟性”在起作用。史家的悟性是从有限的信息中，还原事物整体的那种能力。悟性是一种直觉，是一种理性以外的认识能力，用我的话来说，那是一种通过非归纳的方式，从瞬间感觉到、领悟到、“跳跃”到事物的未知部分的那种能力。一个悟性高的研究者，可以通过相对有限的史料信息，在对生活经验的把握的基础上，通过一种类似于“想像力”的合理推导，大体上还原历史客

观事实，他能从大量信息的蛛丝马迹中，从被淘洗的史料的“垃圾堆”里化腐朽为神奇。一个平庸的学者读一百本书后得出的结论，一个有悟性的史家读十本书就同样得出了。高华身上的这种悟性、洞察力、直觉，在我们学术界是非常罕见的。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悟性的种子，只是我们长年累月的科班教育中把它给扼杀了。

高华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虽然在体制内，但始终甘于自我边缘化的状态。二十多年来，他从不申报官方的课题。虽然体制掌握着非常丰富的稀缺资源，但因为体制有它的实际功利考虑，如果完全按照它的规则与要求去搞研究的话，可能会丧失对于学者来说最宝贵的精神自由。而保持一种自我边缘化的冷静，不在体制内追逐中心地位，无疑将无法获得体制内的许多好处（包括丰厚的科研经费，提升职称所需要的核心刊物发表文章的数量等等），你就不得不去过一种清贫的、曹雪芹式的孤独生活。然而，正是这种边缘状态，却使你获得更多思考的自由，真实地达到了儒家所说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境界。

事实上，处于自我边缘化状态的学者，只要有足够的毅力与勇气，就可以过上一种充实的精神生活。如果他能克服一个一个的难关，他的成果无疑远远大于处于体制中心地位的、不断在制造成堆学术垃圾中消磨岁月的学者。此类官僚化学者，退休后将会发现，原来的荣耀场面突然一变而为门前冷落车马稀，这时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而那些自甘边缘状态的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官方资源对他的吸引，由于他没有按官方规定的角色去立事行事，故保留着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与学术研究的多向性，因此能自由地发展出多种才识。这种自我边缘化，也有助于一个民族文化具有更多元性格，我希望高华在边缘状态中追求真知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格力量，会影响我们更年轻一代的学者的自主选择。他们在高华身上看到，选择一种独立的思想者的生活方式，是值得的，有意义的。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高华。

高华并不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对于凡人的物质生活，他也会

有羡慕之情。他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热爱生活，也会欣赏、享受生活中的愉悦，热爱那些美好的东西，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他由衷地羡慕那些在悉尼海滩阳光下自由蹦极的人们，他感叹说，一个人能始终这样无忧无虑该多好。他身上表现的责任感与他作为一个世俗生活中的普通人的性情，总会有一种纠结，一方面，他有一种自我认定的史家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口号，而是通过他的不得不处于清贫状态的自由治学来体现，另一方面，这种自由的获得，又不得不失去许多东西，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深刻的矛盾之一。

病中的情况

高华在四年前得病后，我曾到上海中山医院三号楼探视高华。那时他刚动了手术。他早在 1992 年患过几个月的乙型肝炎，这可能是致癌的诱因之一，此外，这与他嗜烟可能也有一定关系。他在病床上说，虽然晚了一点，但从此要把烟真正戒了。他告诉我，他得病的原因，很可能与他最近写作文革政治史中的七十年代初那一部分有关。他说他好几个月里天天搞到晚上一二点，烟一根一根不间断，好不容易才写了十万字，没有想到把自己的肝给严重得罪了。

后来我特地从书店里给他选购了一本有关肝癌知识的书，不过我永远没有把这本书送给他。因为拿回家一翻，那本书讲得太可怕，说肝癌被称为癌王，一旦进入临床期，那就只有两个月了（孙中山就是如此）。这样的书是绝不能给病人看的。不幸中的小幸是，他的肝癌很可能是属于相对而言活跃程度较低的那种，所以他能在后来坚持四五年之久。

在他患病后，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你得好好保重，中国不能没有你，我是从民族利益来跟你谈这个问题。"他笑了，笑得与过去我们听到的一样爽朗，也许是他得知患病噩耗这些天以来第一次笑。后来，小刘（高华的夫人刘韶洪）告诉我说，他为了这句话很感谢我。我对小刘说，高华有

一种特殊的第三感觉，他能从历史中剥离出埋于历史深处的真实来，这方面他绝对是天才。小刘说我过奖了，我说我三十年来见到过多少国内外教授，但我从来没有称别人是天才过。

其实，他有时与我谈的看法中，有许多比《红太阳》里写的更精彩，我总是提醒他让学生把他的话录下来，他都没有足够重视。真担心这些精彩的东西很可能有许多不再能变成铅字了，一想到这些，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不会在他面前谈。

那次病床前的谈话过程中，他起身要去方便，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他这个姿态语言也许无意中透露出他进入人生最后战斗的决心。谈了四十分钟左右，我发现他想睡了，就起身告辞。

这四年多以来，他在电话里总是说，生上了这个病，这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去应对就是了，但他又表现得绝对不悲观。我经常用这样的话来鼓励他：我们的理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以现在的理性判断你生的是癌症，但很可能并不是癌，或者只是所有的肿瘤中恶性程度最低的一种，甚至是介乎良性与恶性肿瘤中的一种，否则肝上生的肿瘤怎么会有四年之久呢？这话他也愿意听，希望保持乐观的判断去努力，说不定能够发生奇迹。他最欣赏的一句话是秦晖到他家来看望他时说的，后来一直给我引述，秦晖说，"当没病活，当有病治。"在他看来，有时候对疾病要有一种漠视，这样就更能用乐观的精神去做一些积极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又可能会帮助我们渡过一些难关和困境。

网上流传说，高华是在贫病交加中过世。这一点也可以顺便澄清一下。事实上，他以自己的作品感动了很多人，四年来，有很多他并不熟悉的朋友与崇拜者，都愿意在经济上支持他帮助他。当然，话说回来，四年可不是很短的时间，医疗费用非常高，而且即使别人愿意帮助他，他也从不会主动开口，具体有什么需要，别人也不一定知道，这种情况造成一些经济上的窘迫，我想还是可能的。

二十年只是一秒钟

后来，在南京静养一段时期以后，他的病情又有所恶化。他住进了上海的长海医院，在开刀的前一天晚上，我与他在医院里散步，因为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所以我就干脆把一层纸捅破了。我对他说，你可能有两种前景，也许生命中的奇迹会在你身上发生，我们所说的不治之症，很可能并不发生在你身上，另一种可能是，奇迹并没有发生，你可能比我们这些朋友先走一步，早走十年二十年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从生命的历史长河来说，按照地球十亿年这个生命历程来说，按比例，人生中的十年不过就是一秒钟。我们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钟而已。但是你的这本书，却是有超越一个人的生命时间长度的价值，它会被后人记住，并获得启迪。你留下的著作一定会超越你的个体生命。

其实他对自己的生命前景早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他听了我的这番话以后，一点也没有觉得突兀。他说谢谢我。后来小刘不止一次告诉我，他很感谢我说的这句话。

高华的思想与学问已经进入人生最成熟的阶段，他计划中的延安整风一书的修订版至少要增加十五万字。然而，令人痛惜的是，连修改这本书的时间他都没有从上天那里争取到。高华经常会脱口而出一些精彩的观点，有时一句话就比一些著作等身的官僚学者一辈子写的厚书还要有价值。我近日在翻阅过去的日记时，就读到日记中记述下来的高华对我说过的一个观点，他说，毛曾经也想过做一个好皇帝，但生性刚愎自用，党内又缺乏监督，闯了大祸，造成了大灾难，毛又恋权，就总是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前面一个错误，于是祸越闯越大……这样精彩的观点虽然很多，可惜再也不能形诸于文字了。

前不久在南京的追思会上，最触动我的，是老友严搏非的那段朴素的话。他说，“其实，我们都老了，离死也不算远了，该写的快点写，该说的快点说。”他说的是大实话，虽然我们在精神上可以鼓励自己说，我们永远年轻，但造物主给予每一个生命的时间就是那么多，每个人当然希望

自己活到一百岁，但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能做的事先做起来，不要留下高华那样的遗憾。

我想象着，高华就坐在天堂里的那个长椅上，天堂的清晨一定和我们这儿一样，也有点清冷，刚下过雨，还有点湿。他刚去不习惯，还有点寂寞，我们总有一天也会到那里去，还会在那长椅上继续与高华长谈。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千山我独行

熊景明

圣诞假日最后一天早晨，窗外海天一色。打开邮箱，竟然有五封邮件带来同一噩耗：高华走了。他的学生传来记录他最后几天的日记，“高老师今天精神很好，头发也整整齐齐，也许是便血之后，高热退掉了，肚子也没有原来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师旁边，轻声读圣严法师《智慧100》中解《法句经》的一小则文字，经文曰：无乐小乐、小辩小慧，观求大者，乃获大安。我对高老师说，高老师一直是持大历史观，注意历史的延续性，从大处着眼看透历史，难怪内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静坚强得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谓‘乃获大安’。高老师躺在那里笑了”。

12月26号，高华在这个与他的研究极为相关的日子去世。《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对现在中国历史和政治文化的最佳解读。这部书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十二次印刷，并出了简体字版。他的研究完全取材于公开出版的资料。众多学者公认，这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重大成果”。

“此书是一部研究延安整风的历史专著，书主旨在于回答中国革命的

领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内获得认可和确立的。这是一个关乎中国历史命运的全局性问题。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言：'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01]

这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之作，"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辨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零散的个人回忆。他善于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捉其间的内在联系，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此书志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而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高华没有获得一分钱的研究经费。他白天看书、构思，晚上写。为了不影响睡去的妻儿，坐在厨房里一张小桌子前"奋笔疾书"。小小一张台已足够，高华写作时，桌上不放参考资料或笔记。"这样避免抄任何人的思想或文字"。一件军用棉大衣，抵御不了南京冬夜的寒风。没暖气，窗不严。深深进入写作状态的人，就像舞台上进入角色，凛冽寒意被排在感官之外，身体则吃不消。几个冬天，高华均感冒不愈，之后心脏受损，再之后肝脏受损。

他的书出版前，受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来，顺便做最后校对。要不是约他周末去行山，他说爬高坡走远路不行，谁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问题。正值茂年，虽早生华发，却面色红润，神采奕奕，衣装搭配得体，总是笑脸迎人。几年前，他已经病入膏肓，香港一位治疗肝癌的医生见到他说，旁人看到我们俩，一定以为我是病人，你是医生。

高华太不像病人了。肝癌病人平均寿命6个月。高华对待疾病冷静镇定，就像对他的历史研究。这个历程艰难的"项目"延续了将近五年，令所有医生惊讶赞叹。到最后的日子，周围的医护人员都被他感动、感染，

01. 陈彦：《理想是怎样失去的》，《二十一世纪》，2001年6月号。

全力以赴将他从生命的边缘上一次次拉回来，似乎相信奇迹可以延续下去。

打电话时如果聊到病情，治疗方案，讲到末了，他经常会问，“你看，我是不是很平静？”“对，你完全像是和我讨论学术问题。”有一阵，他的病似乎稳定了，准备到外地开会。祝贺他，答道：此病是不声不响的，鬼子进村静悄悄。去世前一周，高华开始便血，他调侃地对太太小刘讲史，叙述孙中山抵北京后，在医院连续出血好几天，然后突然不出血了。孙的部下很高兴，其实乃大崩溃的前兆，6天之后，又大出血，溘然逝世。一贯与他驳嘴的小刘说，“你怎么读历史其他不好好看，却记住这一段呢？”“我也不是特意看的，不过顺便眼睛扫到了。”学生日记里说：“很是佩服高老师的镇定和超然，虽然便血不止，到晚上第六次的时候，还是和高欣、我开玩笑：‘又来了，又来了，还来势汹汹……呵呵！’他从容面对，精神很好，一边在床上便血，还一边就新播的《新亮剑》和高欣、我讨论东北战役国军的失败，陈辞修的清廉和迂腐。”

两周前，高华家属几次接到病危通知，他特意不让告诉朋友。我心里明白，打电话讲讲八卦新闻，说起《看历史》杂志举办的评奖活动。他问我，去年是竹叶青酒赞助，今年他们找到哪里资助了。“我的天，高华，你怎么所有事都记得那么清楚！”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但怎能接受如此清醒的头脑将停止工作。

“小刘批评我疏懒了，我没有呵”，“当然，你一直勤奋”。2009年深秋，高华在上海做手术，切除近一半肝脏。回到南京，写成一万七千字的长文，“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且评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且谈历史。“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01]

---

01.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领导者》，总第34期，2010年6月。

这其实是高华自己做学问的态度，他从来带着感情走进历史；怀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揭示史实真相。

过去两年中，高华接受了几次访问，最后一次是《中国改革》记者刘芳就教于他，关于革命话语的长谈。[01] 高华以革命话语为线索，将纷杂、生动的历史事实串起来，清晰地展现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他分析了党派之争中，武力与计谋之外，决定胜负的民心归依后面的可悲的简单事实，即渴望变革的知识分子如何掉进乌托邦的陷阱，然后不由自主地充当了欺骗大众的角色。当然，也因为出现一位集高层政治斗争计谋和底层地痞流氓的手法于一身的关键人物。他将无数历史细节信手拈来，将观点分解在冷静客观的学术论证之中，思维如此精妙，哪有一点病人的影子。

和高华聊天就像和历史对话，不明白他如何可以将当代中国每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将每个历史人物还原得活灵活现。2006年高华到中大历史系任访问教授期间，参加了中心频频举办的午餐研讨会。如果题目涉及民国以还的历史，坐在听众席上的高华提出问题和评论，知识不亚于台上讲者，见解则往往更胜一筹。可贵之处在于，他十分照顾讲者的自尊，态度谦卑，善于肯定别人。有一次，一位研究福建文革时期农民造反派的学者来演讲，高华与她对话，顺便列举福建几个农民“战斗队”，指出，其实农民造反不成气候。他在我书架上看到一位朋友父亲的诗集，说，此人在山东某县做官时，给共产党捐了多少多少大洋，后来如何如何。这些情节，此书并无记载，都是高华储存在大脑中用之不竭的历史素材。

高华认为，如果只把握了历史细节，最多只是个史料专家，而探索历史后面的思想，建立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更有意义的追求。这样的人才称得起历史学家。这本书的书名《史家高华》道出各个撰稿人对他的评价。但显而易见，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对资料的把握、对历史运行的逻辑和因果的通达、他的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那年，海外出

01. 刘芳：《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高华访谈录》，财新《中国改革》，2011年第10、11期。

版了一本讲述一位领导人物最后几年的书。我请教他对此人的看法，他答道，此人臣服于他的上司。如果上司认为某人好到 70 分，他按 80 分来利用；上司觉得坏到 70 分，他会以 100 分坏来对待。对历史人物作出别具一格剖析，是高华的特长。听他畅谈历史，褒贬历史人物，往往令人沉醉其中，可惜没有记下他无数妙言妙语。

能将研究和演说能力集一身，相当于会写剧本也会演戏。高华在南大十分“卖座”，还因为他是出色的讲者。开夜课，“本校的政治、哲学、法律等系的学生，外校的理工文科、从学飞机设计到学服装设计的各色人物，受到高老师魅力的感召，都有来南大串堂听高华课的。”我最后一次听高华演讲，是 2009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历史学家齐聚一堂。高华没有半点病容，一贯地抑扬顿挫有节，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大概由于多年教学的习惯，重要的字句会重复一次。会后，台湾学者陈永发感叹道：大家就是大家。

打电话到医院，高华身边常常有他的学生，许多专程从外地回到南京来陪伴他。高华对我最后的嘱托，是替他的一个刚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留意工作。“围绕”在他身边的弟子，有的十多二十年前就毕业了。一位 18 年前便成为高华学生的周孜正在日记中提到：“一个月之前他（另外一位学生）来电问我情况，声音哽咽，并取消了以前冬天不回国的惯例，圣诞一放假，就从美国飞回来了。见到他之前，心里面不由一阵难过，每年他回来，我们总是约好，一起从扬州和无锡去看高老师，大家聊天吃饭，多少快乐时光，仿佛一家人。”高华去世前一天，“聊天到 6 时许，高华催我们回去，我已经订了晚 8 点回无锡的车票。只能依依惜别，高老师还是躺在床上向我们挥挥他的大手，提醒我们带好钱包钥匙等。在南京－无锡的火车上，我总是在想着这 18 年来那些往事，和高老师一起去买书、看电影、听讲座，历历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复”。

有人预言：高华离去，未来一年，对他的思想的整理必然形成气候。这件事，只能指望这些多年追随他的学生去完成。有人致敬：高华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历史真相的追求者，他的精神永存！在海外中国学术研究的网

上平台 C-Pol 上，有教授发布消息说：中国最伟大的一位社会科学家高华逝世。

所有高尚的理想、理念，都须由个人的具体行为，对人对事的点点滴滴去检验，去分辨真伪。高华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孝顺父母，关心身边人，尤其是他的学生。高华不是完人。他性急，为人与行文有时过于谨慎（其他缺点得由他太太补充）。有朋友道，高华的学术成就可谓立言立功，而他对待疾病的超强意志和冷静，立大德也。

一位对现代中国历史和政治了解最深，梳理最精妙的学者，正当英年，没来得及将他的研究和见解完全留下来，就走了。他故世之后，我只梦见过他一次。他在书房里，四壁书架。他手捧着《红太阳》，面容凝重地说，“四卷书，只完成了一卷”。高华离去，令我们如此不舍，因为他带走太多，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

高华做手术后，胡杰和我明白他来日无多，计划组织一系列访谈。首次访谈，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博士候选人常成就《红太阳》请教他。此事才开头就受到干扰，没有能系统地进行。万幸的是，高华在病床上，回答写作初衷中时，留下几段独白。今日读来，好像壮士从容就义前的赠言：

“我记得我真正动笔的那天，是俄国 1991 年的八·一九事变，八·一九事变的那一天。我家里还有个老式的收音机，我在听紧急委员会的临时通告，一会儿苏联国歌，一会儿苏联爱国歌曲，一会紧急委员会通告，我在听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开始写红太阳第一章。而且，我感觉到我应该写！

“写作是个很长的过程，我并没有立即想到出版的事。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要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摆脱内心各种各样的禁忌。

“《革命年代》里，我讲的是五零年代，我成长的这个时期，受到主流思想相当大的影响，自己在写作过程中，在审视它，在重新观察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和它说再见。”

作者为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负責人

知者有畏，依然直行

许纪霖

江南的冬天，阴沉沉的冷。北来的寒风传来了噩耗：高华教授在 12 月 26 日深夜，悄悄地走了。

消息是那样突兀，让朋友们猝不及防。高华的病已经多年，但每一次的病情加重，都被他的坚强与乐观超越，以至于我们都相信奇迹会一再出现，顽强的生命意志能让他走得更远。病榻中的高华，总盼着再去一次台湾，说是去治病，但我猜，恐怕他想在来日无多的生命里，去台北会会老朋友，看自己所爱的宝岛最后一眼。朋友们因此还为他募捐，祝福他在来年的开春一遂宿愿。但是，春天尚未到来，高华却倒在凛冽的冬寒之中。

高华兄，难道你真的走了吗？

我已记不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真正深入的交往，也是从一个寒冷的冬天开始。21 年前，一帮在绝望中彷徨的学界朋友，决定参照《剑桥中国史》的模式，携手重新书写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现代化史》第 1 卷。二十余位作者之中，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占据了四位，都是高华热情推荐的。从此宁沪之间，常来常往，有了密切的互动。这个时候，高华研究的虽然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但真正的兴趣却是二十

世纪的中共革命。

高华的父亲在1958年“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令他从孩童时代就蒙下了阴影，早早被打入另册，考取外国语学校却被拒之门外。文革之初他亲眼目睹父亲因躲避杀身之祸而离家逃亡，家门口贴满了捉拿父亲的通缉令。家与国的命运如此残酷地纠缠在一起，使他从小就对政治充满了好奇与敏感，早早萌发了对伟大领袖的怀疑。当文革的阴霾终于散去，国家恢复高考之后，高华报考的第一志愿便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他要从诡秘的政治风云之中捕捉孩提时代一直笼罩在心头的疑问：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悲剧，究竟源于何处？

高华成长于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他的骨子里渗透着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独有的精神气质，即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大问题、大命运的刻骨铭心之关怀，这种关怀与生俱来，深深融入到血脉之中，是那代知识精英安身立命之所在。作为历史学者的高华，由此而自觉一种历史的担当：像太史公那样，秉笔直书，为后人留下历史的真相。差不多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他就默默收集资料，为后来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艰苦的准备。稍微懂一些时务的历史学者，大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中共革命的研究。因为按照标准尺度写作，会违背学术的良知，而一旦说出历史之真相，不仅发表困难，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当年的高华不是糊涂之人，也非莽撞之辈，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从事的，是一个在世人看来属于高风险、低收益的研究，很有可能一辈子躺在抽屉里面，藏之名山；即使发表了，不仅于职称晋升无补，还会带来无穷麻烦——后来证明果然如此。他曾经有过犹豫，也与我吐露过内心的天人交战，最后他说：“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的个性没法让我放弃追究真相、说出真相，这是我的宿命，我认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良知在心，犹如神之召唤。什么是历史学家？真正的史家风范正是这样的，著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还原历史的真相，哪怕撕破了皇帝的新衣。

历史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粹的技艺，缺乏生命和社会关怀的乾嘉考据只是史学的末流。高华在精神上所继承的，是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的史家传统，这种传统是史学的，又超越了史学，自觉担当起天下的重负，为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的正当性。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差不多十年寒暑，高华都沉浸于此。他从各种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日记、回忆录当中反复爬梳，回味思考，逐渐整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权力网络。他对人脉细节烂熟于心，犹如自己家族内部的典故。1999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恰巧刘小枫、钱文忠和我都在那里。每次聚在一起，大家最期待的节目，就是请高华为我们摆龙门阵。我们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他，他似乎百问不倒，每次都用生动细致的史料为大家一一解惑。那些历史记忆就驻扎在他的心里，信手拈来，皆成痛史；犹如老树上的年轮，斑驳离奇，又历历在目。

虽然高华烂熟史料，但他并不认为个别的史实能够代表整体的真实。我最敬佩高华的，是他的贯通能力，擅长将支离破碎的个别史实，编织成一个个令人信服的历史图景，从复杂诡异的权力表象，洞察背后的深层逻辑。一个能够将历史读通的史家，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一个有智慧、有深度的知识人。我常常惊叹他不曾有过从政的经历，也非贵族后裔，何来如此老辣的内幕观察。我以为，除了掌握大量史料之外，他的天才想像力和对人性幽暗的敏锐，亦是不可缺少的助力。

我与他关怀相近，亦常常有热烈的争论。相比而言，作为政治史家的他，注重的是一代枭雄毛“王”的面相，而作为思想史家的我，更偏好毛“圣”的一面。圣与王、神与魔之间，既是一念之差，又同为一个角币之两面。争论的结果，我常常从高华的魔性分析中所得甚丰，他也承认毛有其圣的另一面。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他参与翻译的墨子刻先生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对此已有深邃的分析。不过，以其对家国历史的沉痛反思，他搁不下历史魔性对中国的摧残，毕其一生与其奋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要以为高华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其实他像大部分中国书生一样，有自己的畏惧，也有一己之顾虑。但在种种纠结之后，他选择的依然是直行，是对良知和历史的担当。这担当因为有畏惧和顾虑相伴显得格外的沉重。我敬佩他的，并非英雄式的义无反顾，而是凡人意义上的自我超越。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依然在挣扎中担起重负。世人皆道无知者无畏，而知者有畏，依然选择了咬紧牙关前行，反而显出中国知识人的书生本色。书生非英雄也，乃是有可爱的迂腐，明知有苦头要吃，仍然不像聪明人那样识时务者为俊杰，而是傻傻地执着于内心的真与学术良知。

正当高华的研究进入佳境，癌细胞却一步步地吞噬着他的躯体。他一次又一次被病魔击倒，却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不，即使他躺在病榻上，在精神上也从来没有倒下过。他的乐观、坚强和生存意志感染了每一个去看望他的朋友。一个星期之前，见到他的朋友向大家报告的，依然是“精神状态不错”的好消息，以至于我们都错以为还有下一次再见的机会。然而，就在 2011 年即将翻过的时候，他骤然而去，决然告别，将自己坚强的微笑留到了最后。

生命如樱花一般短暂，人们总是在追求某种永恒。佛教徒超越轮回，基督徒洗涤与生俱来的原罪，而儒家所追求的，乃是历史中的不朽。对中国知识人来说，有一段留得下来的文字，有一种让后人向往的精神，有一缕超越时代空间的情怀，那便是不枉此行的人生了。高华兄，你做到了，你对得起你的一生，我们为与你同属一个时代而骄傲。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本书的高华

徐庆全

在中国社会进入到泛娱乐时代之后，浮躁之风弥漫于社会各个层面，一向被认为宁静的学界，也不例外，“量为先、质为次”的学风，成为社会浮躁之风的助力，真正下潜的学者少得可怜。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就是这“少得可怜”中的一个。

我的题目说“一本书的高华”，并不是与“量为先、质为次”的学风相对而刻意抬高他，也不是说他只写了一本书——但与现在“著作等身”的学者比，他也是著作“少得可怜”的一个——只是指出一个事实：这个当今党史学界最著名的专家之一，的的确确因为这一本书而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威名。

由书识人

初读高华，是 2001 年元旦。那时，我被迫离开参与创办的《百年潮》杂志，可以静下心来读点书。首先读到的就是高华的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读罢，那震撼无以言说，“近来始

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高华这本书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印证。

高华？我先后做编辑的《炎黄春秋》和《百年潮》，都是刊登中共党史人物和事件的刊物，在这七八年的编辑生涯中，竟然不知道他是谁。后来与高华熟悉起来了，与他谈起当年的感受，他笑呵呵地说：也不能怪你啊。在《红太阳》出版以前，我虽然发表过一系列的学术论文，但那都是在学术圈内的刊物上。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大致保留着同样的阅读习惯：一旦一个作者走进你的视野，就不会轻易走出去，他的作品就成为寻找的目标。此后，我常搜寻署名为“高华”的文章来读，并寻找高华的有关信息。亦步亦趋之际，也了解到高华的研究领域：一路从民国到共和国，从左翼文化到领袖人物，从一个历史事件的点，到一个历史断代的面，由点及面，到最后触类旁通。他所做的，不仅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同时包含着对当下和未来的关照。

我回到《炎黄春秋》杂志社后，几次与高华联系，希望他能为我们写点稿子，但始终没有与他通上电话。2006年3月2日，我接到了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邀请函，邀请我到中心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学者。中心的助理主任熊景明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中心有许多学者来过，现在高华就在。我很高兴，当即发邮件索取高华的E-mail。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高华的邮件：“熊景明老师把你的信给我看了，我很希望你早点来香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她和我几次谈起你，我这学期在中大历史系客座，平时就在‘中心’看资料。”

一位著名的学者如此礼让，让我受宠若惊。此后，邮件往还，就渐渐熟悉起来。他不仅允诺给我写稿子（3月20日即给我发来他为胡伯威《青春·北大》写的序言：《“思想”的累与痛》一文），还愿意在我赴港的申请表上担任“推荐学者”。我4月10日到香港与他见面时，仿佛已经是老朋友了。

奖掖后进

高华与我一样，有一个被当今社会认为不良的嗜好：抽烟。在香港，我们这个不良嗜好成为众矢之的。在中心，烟瘾上来，我们俩就一同到楼下；参加学者聚会的饭局，一同到餐厅外吞云吐雾。我倒庆幸自己与高华有同样的嗜好——与他交谈大多是这个时候进行的。

交谈的话题，首先是他的《红太阳》一书。我说，古人说“十年磨一剑”，而从你书中的后记看，从文革期间你注意到“延安整风”这个词，到2000年这本书出版，你是三十年磨一剑啊。高华说，人这一辈子所走的路，与年少时候读的书有很大的关系。我在后记中追溯了自己的读书历程。古人说，读书使人明智，那是指你会读书的时候。年少时读书，倒是让人困惑的时候多。等你有机会或有能力弄懂的时候，这些困惑就会一个个冒出来。我是文革期间读到一些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小册子，才注意到延安整风运动的。1978年上大学后，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材料。看得越多，困惑越多，似乎有好奇心驱使，想要解开这个困惑。这个过程又有十多年，直到1991年才开始动笔。写作过程又是七八年。

我问：你知道这本书在国内外的反响吗？他答：知道一点，不过我不大关心。我倒更关心每年的版税。这幽默风趣的回答，让我们俩都开心大笑起来。

高华很关心我的研究。我告诉他，我来香港，主要想利用中心的资料，补充修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始末》一书。我说，你在《红太阳》一书中，也谈到了丁玲等文人在延安时的作为，对我启发很大。

让我没有料到的是，高华对我的这个研究兴趣盎然。他追溯了自己对丁玲命运关注的历程：我知道丁玲的名字还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本旧杂志上读到姚文元一篇批判“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长文，几十年过去了，那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两点：丁玲有一个“反动思想”，叫作“一本书主义”；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自那以后，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不久文革爆发，在那混乱和知识贫瘠的年代，我通过各种努力去寻找书本，读了包括丁玲的小说和散文在内的许多“五四”时期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1970 年，我又从一本旧刊《文艺报》上读到《再批判》和随刊登载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而此前读到的造反派编印的《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类小册子上明确写道 :《再批判》为毛泽东主席在 1958 年亲笔所写。

1978 年，我考入大学，虽然学的是历史，但对丁玲其人其事和二十世纪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一直抱有兴趣，我去中文系全程旁听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还长期订阅一份《新文学史料》。丁玲复出后的新作如《“牛棚”小品》、《杜晚香》、《魍魉世界》等，我几乎都曾找来翻看。我还买了丁玲的文集、自传、游记和有关她的几种传记及研究论著，包括大陆、海外和国外学者写的不同版本。

我关注丁玲和革命文艺史，都是出自思考的兴趣，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关系、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当我读了一大堆丁玲的作品后，我的困惑仍然没有得到解答 : 丁玲分明是一个左翼作家,为什么会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和“大右派”? 丁玲如此追求革命，可是为什么“革命”会和她一直“过不去”，一定要把她吞噬? 丁玲蒙受了几十年的苦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她不能像巴金等人那样，对“革命”作出反思? 若干年后我再看丁玲,竟然发现她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张力，如此具有戏剧性，她的一生凸显了二十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 : 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

高华说，我没有看过你的书稿，不知道你是否把关注点落脚在这里。只有把关注点落脚在这里，你的研究才能站在制高点上。

高华的一番话，让我非常惭愧。我这本书只是采取“纪事本末体”的方式，希望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根本没有提升到丁玲和革命的关系，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等的高度上。我立即恳求他抽

出时间看看我的书稿，并像老师指导学生那样给予教诲。他说，不要紧，慢慢来嘛。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他都在看我的书稿，并把他意见提供给我。作为一名海内外的著名学者，高华如此提携我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学人，幸运和感动一直铭记在心。在高华的指导下，我重新修改了书稿。这大大超过了我预期的时间。从香港回来后，高华仍然通过邮件多次指导。当我修改后觉得可以拿出来送给他审阅的时候，我同时冒昧地提出了请他作序。高华爽快地答应了。

在拙作进入发排阶段后，高华给我发来的一万多字的序言《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他以丁玲的命运和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为切口，寻找出“革命惩戒机制的内在逻辑”这一命题。在高华看来，革命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一直是一对难于解决的矛盾：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知识分子却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最高代表——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知识分子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平等”，对敬仰和服从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

在革命和知识分子这样不可避免的矛盾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就定然会出现悲怆的结局。而丁玲一生的经历，她命运的起落沉浮，伴随着高华冷峻的叙述，就慢慢绽露出带着政治印痕的生命轨迹。而这种生命轨迹，又成为解剖其他知识分子命运的参照。

高华往往能从一个历史事件本身的发展过程，揭示隐匿在其后的历史普遍发展逻辑，并进而由点及面；从单一个体的命运起伏，勾勒出一代人的生存轨迹。他为拙作的序言，就是这样从丁玲个体的命运勾勒出在中共党史大背景下一代文人的命运。

关于《革命年代》

在香港与高华的交谈中，我常常说到读他某一篇文章的感受，并建议他结集出版。他说，有朋友也一再催促，他已经编成了一个集子。这就是2005年在香港出版的《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我拿到书后发现，里面并没有完全展示高华的研究成就。我告诉高华，他说，以后有机会再出版吧。这个机会很快就实现了。201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新史学丛书”第二辑中，收录了高华的论文集，书名为《革命年代》。尽管大多的文章以前看过，但我拿到书后还是一口气读完，并情不自禁地写了书评。

《革命年代》收录了高华近二十年所写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写于2008年11月。全书共分五辑，前两辑主要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后三辑主要研究延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文章所论及的，无论民国政府的南京十年，还是中共在延安的新话语体系，以及1950—19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看似都是一个个“点”，但细读起来，都是历史的横断面。而“革命”就成为这多个横断面的连缀。在高华看来，“这些问题发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革命是破坏一切秩序，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他对那个远去的革命年代的思考与追索，最后串成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两大主线：一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一条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两条路径虽然差异甚大，但目标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追求建立一个现代化民族独立的国家。

同样的目标，同样是“以革命的名义”，国共两党的结局却大相径庭。高华的思考，把读者带入历史深处的隧道。在《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一文中，高华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被称之为“火红的年代”的话语体系入手，上溯至苏联革命话语体系与毛泽东革命话语体系的关联，考察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而伴随着这套革命话语体系的建立，中共“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革命党人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占据

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取得胜利，毛泽东从延安的权威话语成为新中国的权威话语，以及此后的“继续革命”，种种历史现象，都可以从这种思考中得到启迪。

从一定意义上说，高华这一代人也是“革命年代”的产儿，是吮吸着革命的红色乳汁畸形成长的一代人。有论者评论说，当大多数人都只在通过当下体验生活时，真正的思考者却能超脱自身的不幸与苦难，在知识积累和命运变迁中形成对历史的看法，从而具备现实洞见力与穿透力。从这个意义而言，高华提供的是一种深刻的认知。同时，他不图功名的回望姿态也凸显出了当下日益稀缺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在高华的视野中，河流水面如镜时，那是蒙太奇般纠结着的历史与现实的幕布；水面波涛汹涌时，那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鉴往知今。如此，“革命”一词，就顺理成章由历史走入当下并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不论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告诫，还是加缪的“美丽不能创造革命，然而总有一天，革命将需要美丽”的向往，“以革命的名义”总是与血泪、痛苦、死亡和激情与理想相伴随。与李泽厚式的“告别革命”的呐喊相比，高华仍如流水般的平和：“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我对生活其中的那个已经远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纪念。”淡淡的，浅浅的，却透着一个历史学家的勇气和睿智。

苍天不公

2007年4月25日，我接到熊景明的邮件：“高华怀疑肝癌，有幸在例行体检时发现，他今天就往上海中山医院求诊。”我感到震惊。这样的命运，真是苍天不公啊。后来听说高华病情稳定，令人惊喜。更令人惊喜的是，他在11月29日到北京来了。11月30日，我赶到他下榻的国宾酒店。从外表上看不出他的病。他依然关心学界，关心思想界的事情。他告诉我，想利用在北京这段时间见见朋友。我说，你想见谁，我帮你通知，我当司

机，饭局也由我安排。现在想来，高华在北京这短短的几天，还是很愉快的。他见到了一批朋友，也感受到了朋友们对他的关心。即使在病中，他也没有忘记学术研究，仍然托我给他找了一大堆资料带回去。

从那时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又过去了。高华的病情时好时坏的消息，一直牵动朋友们的心。很多人都希望高华将比《红太阳》更精彩的看法留下来。据说文革史研究专家金大陆兄与复旦大学的几位朋友专门与高华谈过几次，并录音录像。但因种种原因，整理稿至今也没有出来。

2010 年 12 月 15 日，我和熊景明一起到四川大邑参加《看历史》杂志的一个活动。本来，高华也担任这次活动的评委，也应该莅临会议的。他没有来，他的病情成为朋友们关心的一个话题。景明在主持会议时，特意向大家报告了有关高华的两个消息：1、高华病情稳定；2、《红太阳》一书即将出简体版。

12 月 5 日，在得知高华病情严重时，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杨锦麟在博客中专门发了“为高老师祈福”的帖子。这同样表达了我们的心声！

关于“一本书的高华”

高华病后，我一直不知道该为他做点什么，只有在邮件中表达自己的关切之情。可是，现在把往来邮件再看一遍，发现我的问候也少得可怜，高华谈自己的病情次数也不多，多数是谈学术方面的事情，或者他给我书单我给他找书；或者他在北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办——轻松得不像一个病人。但是，我想为他做点什么的念头一直有，指望关注他的学术研究可以给他带来一点慰藉。

《革命年代》出版以后，我写过两篇书评。我把书评传给他并写信说：“花了 10 天的时间，读了你的《革命年代》，有些当然理解不透，但感慨是很多的。写了一篇书评，刊于今天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书评’栏。呈上，若有暇可一阅。想前年你来京时种种，心情倍感黯然。保重！”

2007年11月30日，高华到北京来，尽管从精神状态来看，他看上去不错，但言谈之间，体会到一丝沉重。我问能否通过肝移植治疗。2010年12月中旬，参加完《看历史》杂志在四川的活动后，我给大陆打电话，得知高华的病情不能说是稳定，至少是时好时坏，心情就更加不好。为他做点什么吧，我对自己说。《一本书的高华》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高华的“边缘人生”

我和高华交往，始于2006年4月。在此后我与他数年的交往中，尽管不论在交谈中还是在邮件中他常说我和他是“好朋友”，但我从来不敢往这方面靠——就年龄来说，他是我的兄长；就学问来说，他是我“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导师，称呼他为“高华老师”已成为习惯。“一本书”笼罩下的高华，让学界的人敬佩，更让我这样在学界晃荡的人敬畏及好奇。敬畏不用说，好奇是，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人，怎么能那样洞穿历史？

对于这个问题，高华并没有正面作答。他说：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托尔斯泰说三代造就一个贵族，是讲只有到第三代才能摆脱一代的贫穷、二代的奢华，开始真正有不贫困、不奢华而有学养的生活。历史印记的延续也大致如此。我们父辈是活在革命的语境下，至我们这一辈算是第二代，带着革命的印记走入学术语境，对历史的研究不免有这种印记带来的价值取向。换句话说，父辈的革命语境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是我们二代的困惑。到我们下一代，或许既可摆脱一代人的革命印记，又可扬弃我们二代对历史的困惑，可以在真正的学术语境下进行研究。你可以设想一下，若那时有《红太阳》这样一本书，还会有你所说的敬畏吗？我还会因为“一本书”而这样生活吗？

“一本书”让高华陷入到什么样的生活？高华没有说，但我的总结是，高华陷入到了一种“边缘人”的生活。其实，“生活在历史当中”的高华，第一代的印记，已经开启了他“边缘人生”的序幕。

1958年，高华咿呀学语时，父亲被打成“右派”，他懵懂无知时已经带上了“右派”的烙印。在革命的政治语境下，“右派”子女的身份使他自然而然的成为主流社会的“边缘人”。殆至文革，“右派”被归之于“黑五类”，政治印记更加浓厚。而高华承受得更多。父亲被通缉，为了逃避杀身之祸，只好逃亡。高华的记忆中，仍然内存着当时父亲逃亡后的境遇；门口贴满了通缉父亲的大字报——“野蛮、恐惧”，这是高华给我讲述的语言。

在这种阴影下，高华避开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躲进小屋“成一统”——读书。那时，一切是革命的，连能看到的书都是如此，没有书可读，大字报和揭发材料也读得津津有味。1978年，高华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选择的研究方向是现代史。这一研究方向的确定，注定他要成为学界的“边缘人”。

虽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需要，对党史进行拨乱反正，党史和现代史热了一阵子。但是，这种“热”，大多仅限于官方的政治需要。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阐述过这一现象，并称之为是“国家话语体系”下的研究，而“民间话语体系”下的研究，则充满了“雷区”。对现代史或党史的事件和人物的研究，牵涉的面大，涉及到的人多，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而导致政治上的干预。我熟悉的人中，唐宝林先生对陈独秀的研究就是如此，就因为他锲而不舍，力图从学理上还原陈独秀，但多年来“伤痕累累”。

高华也想这么做，不过，与唐宝林不同的是，他一头扎进书堆里去，真正遵循“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训言，从1978年至1991年，皓首穷经13年，使他成为党史研究的“百事通”，也形成了他从学理而不是从政治需要出发梳理党史的思维逻辑。

1999年，高华完成《红太阳》一书后，就陷入学界“边缘人”的处境。书无法在大陆出版；书中的主要学术论述分拆开来，也多半在学术刊物遭到冷遇。后来，虽然《红太阳》一书在海外影响很大，高华的学术地位也

不断上升，但他倒越来越成为所在学校的“边缘人”，要不是得到学者董健的帮助，他的处境一时很难改变。我和董健前辈有很深的交往，相互也谈过高华的一些事情。董健曾担任南京大学的副校长，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因学术观点不同而打压异己，他的影响还在时，南大的小环境不错。高华的书在海外虽然声名鹊起，但大环境如此，高华“边缘人”的地位很难彻底改变。他从来没有主动申报过任何一项国家课题，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研究不可能纳入国家课题。

像董健一样，也有一些人想改变高华学界“边缘人”的处境。杨奎松兄在为华东师大引进人才时，第一个引进沈志华，第二个引进的就是高华，但引进高华却遇到了种种麻烦。一直到高华去世，他这种“边缘人”的生活都没有什么根本改变。他在世时，萧功秦等人评论他著作的书评不能在内地发表，就连我的那篇《一本书的高华》，在网上也经常被删帖。他去世第二天，应上海一家报纸的约请，我“急就章”地写了一篇小文悼念他，后来编辑告知，上面如何如何而不能发表。北京有朋友约请我写，我把这篇小文又转给他，到大样时也遭遇撤稿。

其实，高华只不过是本着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进行学理性的研究，这个社会让这样纯粹、高尚的人走向“边缘人生”，肯定是社会出了问题。杨奎松在追思高华的文章中说：“高华《红太阳》一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就是针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感叹之言。

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的高华，对历史已经洞穿，其实倒真的并不在意自己的“边缘人生”。当我和他谈起所谓的“边缘人”话题时，他曾

开玩笑说："主体和边缘，只是当下历史与政治困境下的划分而已，若干年后，当这种困境消失后，还有这样的划分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看得更高一些嘛。"

是啊。青史充栋，掩卷后，齿留苍苔者几何？何为主体，何为边缘，不是当下就下得了结论的。高华老师，西行路上不必挂怀了。

作者为《炎黄春秋》副总编辑

君子坦荡荡

颜世安

高华走了。一直不相信这一天真的会来。五年来，暗暗替他担心，又一直怀着一线希望，因为他的坚韧和积极面对，希望能够出现奇迹。

至今记得2007年春天，有一天我和高华、朱剑（南京大学学报）、余斌（南京大学中文系）四个人在阳光广场旁边一家餐厅小聚。当时学校组织的年度体检刚结束，闲谈中高华说到，体检时做B超的医生要他去复查一下。我们也都没往心里去。没想到几天以后去系里，便听说高华在鼓楼医院检查怀疑是肝癌，当时便觉是晴空霹雳。高华性格中有一种极认真的东西，他平时很随意，谈笑风生，温雅而幽默，但对重要的事，会认真面对，全力以赴以求解决。从那时起，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高华一直是以这种认真的态度面对病魔。但他从不慌张，所有最后这几年里接触过高华的人一定都会有这样的印象，他在大病之中从未让人感觉慌乱和绝望，总是平静从容。我每次见到他，他都会告诉我病况如何，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准备如何应对，给人的感觉是，总是有办法的。

2009年秋天，他在上海动手术，割去一部分肝脏。我当时在台北，从学生来信知道这一情况，心里替他难过，知道是到了比较严重的时候了。

年底回南京，立即去医院看他。他明显消瘦，还是像以前那样，向我讲述他所知道的病情。他说，现在就像堵河堤缺口，哪里水要出来就在哪里堵，就是这样了。我知道有一句话他没有说：有一天堵不住了，就随它去。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我熟悉他讲话的风格，那一定就是他的意思。但他还是那样平静，不是听之任之的消沉的平静，是认真面对的平静。他语调平和，感觉与平时没什么两样，仍然时时夹带他那种独有的幽默。

记得几个月前我们去他家里看他，他说北京的朋友联系了一个气功高手，他准备各项指标稳定一些以后（当时天天去医院输液），就去北京跟着练气功。我觉得气功治疗这样的方法，在高华身上说不定真有大用。高华生病以后求生意志很顽强，精神力量也很顽强，能度过眼前这一关，出现什么奇迹也未可知。此后的日子，心一直悬着，又带着一丝希望。

一直到临终前十几天，我和几个朋友去看他，他还保持着那种认真、平静和幽默的风格。那时他已十分消瘦，气色也很不好。因为每周需要几次输血，插在腿上的一根管子就留在那儿，他不仅下床极困难，翻身也困难，可以想象很痛苦。他肯定知道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但一点没有显出无力的绝望感，神色安详，向我们几个人讲述现在的病情和治疗的情况。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告诉我们，前两天医生说，已经发了两次病危通知了。然后他带有调侃地抱怨说，这个医生就站在我的病床跟前这样说，按理讲他不应该当我的面说，他真是拿我当铁打金刚了。我们几个人都笑了一下，内心则非常沉重。我们都是高华多年的朋友，熟悉和他谈话的这种气氛，某种智力和精神力量混合的东西，把过去的岁月和记忆拉到了眼前，瞬间压住了悲哀的感觉。我后来想，那位医生当高华面就讲发病危通知的事，也许真的是因为一直替高华看病，对他的从容平静有深刻印象，才在疏忽中丢掉了医生在危重病人面前通常会有的小心。

那次离开医院后，我虽然从学生处知道，医生认为他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但仍抱着一线希望。直到12月27号上午接到他学生的电话，才知道，高华最终还是走了。心里的悲伤难以言喻！不仅因为一位多年的好友永远

离去，也因为知道高华一定有特别的不甘。这是熟悉他的朋友共同的感受，因为高华有长期的阅读和思考的积累，学术研究正进入黄金岁月，他有许多对近现代史日渐深入的想法，可惜再也没有机会写出来。任何人在这样的岁数辞世都会遗憾和不甘，但高华的不甘非比一般！

《诗经·黄鸟》追念秦国三良早逝，说“悠悠苍天，曷其有极（规则在哪里）？”这样哀伤的疑问，古今一理。悠悠苍天，为何要在高华步入学术黄金岁月的时候，让他离开这个世界？也许宇宙中还有另外的世界，高华的生命在那里还会以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延续。但这个世界需要高华的思考和写作，高华也需要在这个世界实现他内心里长久的想法，可惜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我认识高华是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我们相差一届，我同宿舍有一位贺军，是高华自幼的好友。高华经常来找贺军，有时就在我们宿舍聊天，慢慢就熟起来了。那时不仅我和贺军喜欢和他一起聊天，许多同学也都喜欢听高华讲国共两党的人物关系和掌故。高华对此的熟悉程度，在研究生同学圈子里广为人知。那种知识是很长时间里慢慢积累起来的，可以说是有“童子功”。

高华自己在回忆文章里曾经说到他的家庭，他父亲作为一个南京的老地下党员，在1949年以后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家庭变故对他幼年心灵的影响。一些人往往容易有一种印象，认为高华是因为幼年生活环境的压抑，才特别注意了解现当代史的种种事件脉络、人物遭际。这有一定道理，但我的印象有一些不同。我和一些熟悉他的朋友都认为，高华其实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兴趣。不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那种发愤，而是对影响当代中国人命运的现代政治史有真正的兴趣。（其实司马迁早年搜集材料四处游历准备写史书，何尝不是有极大的兴趣，受了宫刑以后才转为发愤。）听他讲国共两党史事和人物，很少有激于义愤深挖某处的黑暗，或痛诋某人的罪恶，他不是那个路子。他总是娓娓而谈，轻松地理出他所看出的事情本相。揭示事情的本相似乎是他生命本能中的一个极大的喜好。熟悉高

华的人都知道，他其实不是那种义形于色的人，他为人幽默风趣，不是喜欢随便说笑的那种风趣，是用准确的语言把事情的委婉曲折揭穿，又能寓嘲讽于诙谐之中的那种风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高华的成名作，功力甚深，影响极大，语言平实洗练，但我总觉得，好像与他闲谈时的语言相比，火候还是差一些。当然这也许不一样，写学术著作以客观准确为佳。他的口语叙述有特别的魔力，部分来自天生感悟力，部分来自大量阅读，还有部分来自南京市民文化中那种难以言喻的喜剧色彩的调侃诙谐。与他闲聊现当代史真是快乐的时光，那时的文科研究生差不多个个眼高于顶，自大狂妄，同时视时间如命，但是看到高华一来，大家把书一合，心甘情愿一起加入欢乐的闲聊。如果只是长期受压抑的忿忿不平，怎能有如此的魅力。

高华醉心于揭示事实，当然他也有立场，这立场的形成也许有一部分幼年家庭遭际的影响，但我感觉，主要还是来自青少年时代广泛阅读人文社科类书籍。可以这样说，他的立场主要不是党派的和政治的，而是人文主义的。这种人文的视角和立场贯穿在他谈论历史人物事件时的语气中，也贯穿在他后来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中，读过他书的朋友自然会有印象。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那时也会有兴趣跑到近现代史的研究室里面看有关国共两党的一些资料，看到过一些作者从党派、政治立场写的揭露性质的文字，有时有很深印象。但是与高华的交谈获得的印象完全不同。高华评论某个重要历史人物，有时赞扬有时揶揄，但都是出自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感和立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革命党，有特有的革命理念，两党的上层人物往往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有各自不同的革命意识，但作为政治人物在权力场中沉浮，人性中的自私、狭隘和黑暗又常常在不同情况下显露出来。高华的叙述便是在这样的线索中穿行，他有一个深刻的关切，就是人文主义的价值怎样在革命运动中被激发和生长，又怎样因权力搏斗或其它历史原因受到摧折。高华后来的研究和写作，就他的愿望而言，是想尽量站在一个客观的学者立场清理事实，但他的人文主义

的情感和立场始终是很明显的。

研究生毕业时，因为高校大量需要培养年轻师资，我和高华都留在系里任教。高华那时已成家生子，学校给他一间筒子楼里的小房间，大概只有十平方米，他和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住在里面，记不清楚有多少年。九十年代初，学校有一次排队点房，他点到上海路一个两家合住的套房，有一大一小两间房，还有一个小厨房，合用卫生间。他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很长时间。我最近看过一些回忆高华的文字，说到高华居处的窘迫和经济上的困难，有时就说到这个住处如何逼仄。但我记得很清楚，刚分到这个房子时高华夫妇多么高兴。有次我们一起去看房，高华的妻子刘韶洪站在那一大间的门外，反复端详以后，拍着年幼的高欣的脑袋高兴地说：儿子，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高华从那时起有了一个自己的小书房，是个朝北的房子，水泥地，大概只有七八平方米。他十分满足，天天坐在那个小房间里看书写东西，常常一边放着他喜欢的欧洲古典音乐，声音低低的，一边做自己的事。有时我晚上去找他闲谈，音乐也不关掉，就在里面聊天。高华喜欢猫，有时他工作，猫就伏在旁边。他出去散步，猫就跟在脚后面。后来那只猫被人偷走了，高华失魂落魄好几天，跟我说什么事也做不了，并痛心地说以后再也不养猫了。几年以后儿子渐长，需要一间单独的房子，那间小房让给儿子，高华晚上就到厨房的饭桌上工作。外间所传高华的书是在厨房里写出来就是这个时候。

高华那时居住条件、经济情况肯定不是很好，但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工作的年轻教师许多都是那样。一个真正对书有兴趣的人，能有一个安安静静读书思考的环境，不经常被莫名其妙的事情打乱，就是很大的快乐。我记得那时跟他聊到过这事。有句话说做学问要甘坐“冷板凳”，我们在一起嘲笑这话。这话的意思好像是说，人生本来应该“热”，但要把学问做好必须“冷”。好像还伏了一个意思，能够下决心“冷”一段，就能迎来人生的“热”。当然提倡坐“冷板凳”的前辈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

希望后辈不要浮躁，踏踏实实做学问。但是“坐冷板凳”还有“耐得住寂寞”这类说法，实在不是形容学者生活的好说法。一个人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看书思考，与二三好友时时聚谈，这根本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有自己的快乐，就是悠闲、自由和有趣，思考成熟的时候可以有所创造。一个人选择做学者，就意味着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决不是为了学问名声而“耐住寂寞”，为了迎来“热”而卧薪尝胆地“冷”。

当然有些朋友描述高华清贫也是事实，高华一直有经济生活上的压力，希望改变，有时甚至也着急，这都是人之常情。举个例子可知他那时的情况，九十年代上半段，他除在历史系完成教学工作之外，还额外到中美文化中心给留学生代课，主要目的就是挣一份讲课费。那时好像平均每周要上四节课，还要给学生答疑、改作业，区区月薪，可谓辛苦钱。但我想说出我熟悉的另一个高华。他主要的时间还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搞清楚，对此怀着极大的兴趣。他生性没有其它嗜好（大概只有抽烟），就是喜欢看书、思考，这带给他许多快乐。因为这些快乐，他常常是平和、有趣而幽默的。其实不仅熟悉他的朋友，凡是听过高华课的历史系的学生，都会对高华特有的幽默有很深的印象。真正的幽默来自智力，也来自平和静观的生活姿态，常把自己搅到利益纠葛里面忿忿不平的人，很难有幽默感。

高华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写作《红太阳》。关于这本书，他准备材料可能很早就开始了，但决心系统地清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我的印象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如果按常规的方式做研究，他可以申请课题，可以较早发表研究成果，申请职称等等。他早年一系列有关孙科的论文应该就属于这样的研究。但他学术上最有心得之处不在这里，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说到选择研究课题的事，他后来决心丢开可以申请研究经费的课题，把自己最有想法的问题做出来。

促成这个决心有多方面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书生不肯辜负自己的生命。谁也不愿辜负自己的生命，但各人性情不同，生命的展开方

式也不同。高华是一个天生的读书人，他选择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内心认可的真学问，是性情所致。当然这是我的旁观，高华写这本书当然有其它的原因，幼年时的生活经历、长期的思考、一个认真的学者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等等。但我想说，高华的性情决定了他就是要选择做最好的学问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否则，一个人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方式对自己负责，做学问也可以大而空，先捞到好处再说。东汉末年的古诗说："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社会氛围，特别容易让知识人接受这样离乱失败时代的人生醒悟。我们这一代学者总体上的表现，已经显示不少人都是这样的。但高华与许多人不同，他要认真地做有价值的好学问。他开始准备写书是九十年代初，那时写这样的作品，既不能发文章也不能申请经费，也不可能出版（当时尚未想到可以在海外出版），对于争取个人前程来说，完全不合时宜。记得那时他曾对我和朱剑说，他现在不想这些事，就是看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梗在心里，不写出来难受。写出来先放在那儿。这是 20 年前的事了，他的原话记不清楚，我打电话与朱剑核对，大体就是这样的意思，肯定不会错。

很多朋友提到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我完全赞同。我的感觉还有一点，他出众的才华和学识，让他醉心于做出真正好的历史研究，哪怕不能出版也在所不顾。他做这样的工作时真的不是"耐住寂寞"，他是内心里有极大的热情。他那时每写一个部分，都要把全部相关资料再看一遍。然后一个人出去散步，静静地思考，把许多不同的历史记录和回忆资料参照对比，慢慢地在心里追踪事情的真相。他看不到档案，所有相关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清理出来。也许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我也同意，但我特别想说，这在高华同时是一个欣喜、自得的过程。

我的专业不是中国现代史，《红太阳》学术上的成就和得失，我没有资格评判。这部著作已经在国内外有重大反响，将来影响一定还会持续。我想回顾的是高华这个人。高华要写延安整风的书，我们几位来往较多的

朋友一直知道。但是直到他的书写完付梓，我都没有看过其中的章节，因此一直不知道这部著作的内容和可能会造成的冲击。直到快要完成时，我才有点知道这本书内容上的严峻性，担心高华他会遇到麻烦。

高华的性格还有一个方面，是他的谨慎和敏感。对可能的危险，对别人可能带给他的伤害，他都很敏感。惟其如此，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真是显示了他的勇气。记得出版前有一次我和朱剑跟他在一起，知道了他拟定的书名，我们两人都有些吃惊，觉得这书名醒目，担心太刺激，建议他选择更学术化的书名。但他当时好像没有太多的犹豫，说不改了，就这样吧。高华心里一直有一种坦然，他觉得自己是做学术性的研究，不是站在党派立场做褒扬或贬抑，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我想这是一种书生式的英雄主义，一定要艰苦探索挖掘事实真相，同时一定要把自己探索的果实公布出来。纵然事事谨慎，这件事却顾不了那么多。所以我总是想，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是高华个人生命中最有灿烂光华的一段。我不是就这书的成就和影响而言，是就一个人的生命品质而言。

书出版以后，给高华带来很大的学术声誉，也给他带来一些压力。那时我曾听到一些传闻，说有些上层重要人物对这书有很严厉的否定评价。类似的传闻难辨真假，高华不可能没有听说。依他敏感的性格，内心一定是有压力的。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一点问题。一是曾有一位律师从香港带他的书入境被海关查扣，这位律师状告海关，说禁入海关的书目上没有此书，海关查扣无依据。后来律师胜诉。当时这事颇为轰动。但我知道律师开始告状时，高华是很担忧的。那时学者在海外出书，上层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如果因为官司的事情闹大，上面要是对高华的书加上什么定性，就会给他带来很大麻烦，至少会影响他的安安静静的研究。还有一次是北京某重要官方研究机构召开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研讨会，邀请他去参加，他就比较欣慰。他不是想进入官方的研究系统，到里面分享经费什么的，他在意的是，这样的邀请表明官方研究机构（至少是其中一些有决定权的人）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表达政治意见。他一直希望别人(包

括官方）以学术的眼光看待他的书，这符合他研究的初衷，也免于给他带来诸多压力和困扰。我现在回忆这事，说明高华的谨慎和小心，不是想说他胆小。相反，我是想说他的勇气。

2008 年春天，在他查出患肝癌以后大约一年左右，有一次在上海请一位著名的肝病专家诊治，这位老专家怀疑他不是肝癌，可能只是肝硬化。要他注意定期复查。他听了非常高兴，回到南京后有一天散步时遇到我，告诉我这件事，他说他那天听到这个诊断，夜里都没有怎么睡着，“我们都是凡人啊！”这句话我印象极深。高华说的一点不错，他是一个凡人，有经济压力，要孝敬老人，要养家糊口，要还房贷，也要规避风险。可是在学术上他不肯取巧，不肯打马虎眼，勇敢面对事实。这是我们今天悼念他，要特别敬重他的地方。有人曾经跟我说到，高华患肝癌，可能与长期的精神压力有关。我想这是有可能的。高华九十年代初患乙型肝炎，当时不严重，很快就好了，但这可能是最早的病源。后来经济上的压力、工作的劳累、书稿完成以后精神上的压力等等，都可能是最终致病的因素。

《红太阳》出版以后，高华比过去忙碌了，经常去海内外各处开会讲学，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一些是学术界的，也接触了一些中共元老的子弟家属。广泛的交流和对话，更使他扩大眼界，进一步反省和提炼自己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理解。香港中文大学计划出版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其中 1969-1971 年卷本来是由高华撰写，他对林彪事件有长期的关注和思考，一定对这一段迷雾重重的历史，有新的剖析和梳理。可惜身体情况迫使他不得不终止写作。如果假高华以时日，他不知会有多少重头的研究成果出来。即使在患病期间，高华仍然坚持写一些论文和评论文章，看他最后几年写的东西，思想愈加深沉，文笔愈加客观、老到。高华真的是到了一个学者最成熟的时候，却不幸一病不起，再无提笔的机会，伤如何之！

追悼会上，看着安安静静躺在花丛中的高华，不禁悲从中来。高华去世这些天我一直引导自己这样想：高华虽然年寿不长，但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在长短，在质量。高华写出了极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影响了很多人对

历史和社会的看法，他的生命已经质量很高了，应该无所遗憾。可是看着安睡的高华，我总忍不住想起年轻时候在研究生宿舍里他敲门而入，大家合上书聚拢闲聊的时候；想起在他小书房里低低地放着音乐，闲谈各种问题的时候；想起他晚上散步思考问题，一只猫安静地跟在脚边……那个生动的有趣的高华再也没有了，这是任何功业也无法抵消的沉痛哀伤！

高华辞世已有半月，内心一直沉郁难解。本来准备过一阵等心情平静再写纪念文章。高华夫人告知香港中文大学要出纪念文集，嘱我撰文，敢不从命！谨以此简短回忆，献于亡友灵前。

愿高华安息！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华与摄影

杨小彦

2011 年 12 月 30 日，南京天气阴霾。这天一早，我与冯原专程到南京雨花台区石子岗殡仪馆送别学者高华。

最近几年，我们与高华有过几次令人难忘的交往。他是历史学家，我和冯原则主要研究视觉问题，尤其关心图像实践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我们在一起，高华讲历史，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则解释各种视觉现象，他也抱有强烈的兴趣。这使我们的交流自由而顺畅。几年前我们一起到延安开会，三人站在延安枣园门前，注视着领袖与其战友住所的平面图，探讨其中隐藏的奇妙的空间政治问题。高华详细谈了当年住在枣园里的张闻天的遭遇。突然，他脱口而出：政治感冒药！意思是，在整风的严厉气氛下，张变成了运动的“政治感冒药”，稍有不适，他就会被端出来批判一下，以解困境。接着，我们到了当年的“七大”会场，简朴的现场布置同样呈现了令人感叹的空间政治秩序，见证了政治的全面性，落实到视觉上，就成为对观看的一种有效控制。高华慎重地指出，视觉秩序显然被历史学家忽视了，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域。

延安会议之后，我也不断向高华请教，所谈多与视觉政治有关。为了使讨论更加深入，我与冯原干脆私人邀请高华南下，纯粹是休憩，不开会，更不做报告，就三人，开着车子，在珠三角游走闲逛。我们从广州出发，到新会参观梁启超故居，到中山看孙中山纪念馆，到珠海看大海，再返回开平看华侨碉楼。路上自然离不开近代史这个话题。一天傍晚，月光甚好，我们寻到一处江边的大排档坐下，点上菜，要来啤酒。高华开讲惊心动魄的1969到1971，其中的波澜，以及波澜中的险诈、诡计与血腥，和眼前美妙的风光了无关系。其中涉及到了与视觉有关的内容，也就是一张公开发表的照片背后的奇特信息，明白以后只能倒吸一口冷气，甚至大脑皮层也发生轻微的震颤，耳旁还出现遥远的轰鸣。

不久，“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第一次研讨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我特意邀请高华参与。这时的高华真的对革命摄影产生了研究兴趣，对摄影的社会作用另眼相看。他在会上发表了“三种左翼”的观点，引起了会议的强烈反应。高华提醒我们，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除了摄影家沙飞、著名记者邓拓广为人知外，还有一个人我们都忽略了，那就是埋头做宣传组织工作的张春桥。高华指出，革命自然和左翼运动有关，但参加革命显然存在着三种性质不同的左翼方式：个体左翼，集体左翼和组织左翼。显然，沙飞尽管身在革命阵营，但仍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是个体左翼的代表；邓拓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规训程度比沙飞要高，其所表达的是一种集体化的左翼观点，接近革命运动的核心；张完全没有抛头露面，这说明他已经彻底融入组织之中，是组织左翼的典范。他们的结局也令人唏嘘，沙飞1950年因精神失控打死日本医生而被枪决；邓拓是文革开场的无辜祭品，自行了断；张春桥尽管后来位极人臣，但最后仍然逃不出革命的制裁，成为阶下囚，以沉默了却余生。他们的结局似乎证实了某种历史的定数，但又充满了个体的特殊性。

坦率说，摄影界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思考自身的历史，从而印证

沙飞的悲剧性。高华独具慧眼，看出了其中的曲折，但他的观点又具有普遍性，充分说明历史的吊诡，以及隐藏在这吊诡背后的悲剧性质。从这一点来看，沙飞的悲剧绝对不是个人的悲剧，尽管其死要归究于一时的失控。沙飞的意义也在高华的洞察中彰显了出来，让我们对摄影的社会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2010年，高华已经身体不适，不宜出远门了，但他还是接受我的邀请，南下广州，参加由我策划的艺术家张大力“第二历史”的研讨会。张大力用了好几年时间，克服种种困难，收集了一批相同照片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不同版本，呈现出其中的修改痕迹，揭示公开的历史背后的“第二历史”，给人们重新思考历史的角度。我以“视觉秩序背后的一种修改机制”为题，邀请各方学者参与。高华因为对这个问题有心得，不顾重病缠身，从头至尾参与了讨论。

高华此时脸色不好，但精神尚可，言谈之中依然保持了历史学家的敏锐。我询问他的病情，他嘱咐我不要担心，他会积极治疗的。他的乐观多少让我放心，但他的脸色却传达出让人揪心的信息。果然，后来关于他病情的消息不断传来，多数不太好。

高华去世前一个月，我与冯原专门去南京看望他。飞机才降落，就收到高华的短信，问我们到了没有。走进病房，高华安详躺在床上，冷静而清晰地描述着他的病情。他告诉我们，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希望能有好转，然后再做别的治疗。我握着高华的手，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谈起愉快的珠三角之行，谈到江边的大排档，以及那一晚的夜色。其间也谈到了他的研究，尤其与摄影的关系。我们还照了相。高华说，他现在容颜尚好，可以合影。我们都摆出了胜利的手势。

从医院出来后已是夜晚，我们匆匆赶路，没有说什么。心情不好，因为知道高华最后的日子已经无多，心里祷告着，希望奇迹出现。

但奇迹终于还是没有出现，一个月以后，高华撒手离去。

追悼会上，高夫人和我相拥而泣，泪流满面。她失去丈夫，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中国学界失去了最优秀的学者。我从此无法再听到高华谈论摄影。假如他能有更多时间，谁知道一个历史学家进入摄影之后，还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作者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系教授

近代史学界塌了一个角

张鸣

12 月 27 日早晨起来，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说是高华的学生，顿时我的头就嗡的一声。接着听到电话那头说，高华已于昨晚十点走了。

高华的走，我有预感，所有他的朋友，都有预感。早在几个星期之前，他的病情就开始恶化。上星期六我去看他，感觉他的生命在一点点地流逝，当时强忍心里的难受，跟他聊了好些学术和时局的事儿。他的思路还是那样的清晰，对发生过的所有事情，都一清二楚，甚至比我这个健康人还清楚。最痛的感觉，是天太黑。

高华走了，真的走了。长歌当哭，应该是在痛定之后，此时心绪乱如麻，思路根本捋不出个头绪。一个正当壮年、一个史学家最好年龄段的学者，带着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史料和满肚子的想法，就这样走了。说点什么呢？

“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据说是史学界前辈范文澜老先生的名言，但是，即使在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界，这些年来，真正能实践这句名言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很多大牌学者，尤其是有着各种显赫头衔的学者，不是各种长，就是什么江的学者，手上课题一大把，享受

多种高额津贴，多个学校的兼职和大笔的补助。他们最显著的特点，不是冷，而是热，超热。频繁出席各种会议，参加各种评审，大小的庆典，也少不了他们的捧场。而且，这样的大牌，成果也相当多，多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好多做了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的人，公务繁忙，经常一年有小半年在国外，小半年在会议和酒席上，小半年在飞机上，但每年成百万字的著述都能问世。当然，这样热的学者，写出的文字，即使有人代劳，也只能是假大空，不是半句空，而是整篇整本的空。只要把课题费花掉，书出版，寿命也就结束了，不会有人再多看它们一眼的。

不过，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辛勤的工作。中国之大，不乏坚持坐冷板凳的人，高华就是其中一位。

高华是一个做冷学问的人，这个选择，是他自己找的。本来，在民国史重镇的南京大学，他作为一个出道很早的民国史专家，如果选择做民国史，尤其是“抗战”史、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拿课题容易，得资助容易，出成果容易。以他的才华，数年之内，硕果累累，顺便赚大笔的课题费，易如反掌。但是，他偏要一头钻到难做的中共党史里去炒冷饭。在他做延安整风研究的时候，他还住在南大的一栋老楼里，晚上写作，为了不妨碍夫人和孩子休息，就搬一张小桌子，坐在厨房里，一盏20瓦的灯泡，从天花板垂下来，资料铺得满地都是。冬天的南京很冷，风从门缝里吹进来，所以他总是感冒生病。他那本具有世界声誉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十年磨一剑磨出来的。

这个年头，即使是历史界，选择做时髦学问、“歌德”式的学问，即使不一定出名，但利益多半不小。即使利益不大，也肯定没有风险。反过来，如果选择做冷学问，难做的学问，甚至多少带有一定风险的学问，那么肯定会遭到冷遇。资料难找，成果不多，发表很难，因此发表量就少。拿不到课题，评职称就难，至少会比别人落后。一步赶不上，就会步步赶不上，房子、票子、车子就全泡汤。还时常伴随各种有形无形的风险，想换个学校，都做不到。他的病，说到底，也跟他的这种选择有关。毕竟，高华也

是血肉之躯，不可能对外界的压力无动于衷。

他生病之后，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不该做这样让人难受的学问，老看那些令人悲伤甚至哀痛的材料，应该改道去做先秦史，那里的事比较阳光一点。但是我知道，这样的选择，是他受良知驱使的结果。很多学者都有良知，但良知跟饭碗比，良知跟荣华富贵比，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高华不，他一直在遵循自己良知的召唤，即使路难走，即使因此得了不治之症，也无怨无悔。

人们都说，做学者要甘于贫贱，可是，自古以来，守愚容易，守贫难。偏偏只有能守得住贫寒、守得住寂寞的学者，才能做出经得起时代检验的东西。我时常问自己，如果我处于高华的位置，贫寒到这个地步，连书都没有地方放，我还能不能坚持我的理想，做高华这样出力不讨好的学问？惭愧的是，虽然我是高华的好朋友，却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最大的可能是，我会先去挣钱，挣够了钱，再回过头来做学问。只是，我也不能确定，到时候我还能不能坐得下来冷板凳。

跟其他史学界同仁相比，我认识高华比较晚，大约跟我出道晚有关。2003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那是一次我参与组织的我们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高华做我的论文评议，记得当时我写的是一篇讨论土改的论文。此前，已经看过他的《红太阳》，对于当时的我，他就是一座山。

在会上，我们聊得投机极了。会后，我拉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在高华的怂恿下，萧功秦先生还用俄语唱了《国际歌》。此后的来往就比较多了。比较长时间的一次，是不久后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学，高华是那里的常客，两个月下来，几乎天天在一起。他烟瘾大，在办公室怕熏了别人，只能隔一小时下楼抽一支。每次都拉我陪他，我们绕楼一周，边走边聊。

高华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待人彬彬有礼。香港中文大学雅礼宾馆和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所有人，几乎都认识他，他对见过的每个人都会招呼到。一次，居然看见他掏出一包茶叶，送给中国服务中心的扫地工，说是

专门给她带的。每次到达和离开办公地，他都会跟每个人打招呼。跟他在一起，每到这种时候，我总是感到十分惭愧。

2006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同时聘高华和我去那里教半年的书，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没事的时候，我就去听他的课。高华讲课非常有风格，内容就不用说了，容量之大，思想之刺激，每每令人应接不暇。更妙的是，他还非常幽默风趣，声音具有磁性。这样的声音，只有优秀的话剧演员才有。认识高华，也逐渐认识了好些他的学生，每个听过他课的学生，都跟我有同感，也都超级热爱他们的老师。高华和他学生关系之好，每每让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嫉妒。当然，这样的关系，是他用心血浇灌出来的，在他重病期间，在病床上还在修改学生的博士论文，一本厚厚的砖头，近四十万字。

高华上课虽然很幽默，但从不可能让人大笑。他是一个十分审慎小心的人，说话、做学问都很有分寸感，真正能做到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话。如果跟他不熟，你觉得他是一个严肃到有点拘谨的人。即使熟了，开玩笑也相当有分寸。

不过，我却曾见识过他的另一面，一个开朗、风趣的高华。那是在四年前，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女士退休，高华夫妇、秦晖夫妇、武克刚夫妇以及章诒和女士一起到昆明去玩，顺便庆祝熊景明荣休。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节目，我和高华来了个合唱，唱八十年代的广告歌“我们是害虫”，笑得大家饭都快喷了。(在某些人看来，我们的确真是害虫。)唱完之后，我以为节目就完了，结果，他还有余兴，又来了一首五十年代的苏联歌曲——记不大清楚了，好像叫做有个大妈叫瓦里瓦拉。唱完之后，大家一直都在哇哩哇啦。

跟他交往，唯一遗憾的是他不能喝酒，但是，跟他聊天，每每有醉的感觉。高华的声音，是我一生最喜欢听的声音，“醉里吴音相媚好”，就是这个感觉，亲切，低迴，沁人心脾。高华的为人，他的治学，他的教书育人，都是这个感觉。

在史学界，我是野路子的野狐禅学者，如果说，在我这一生中，有点

拨过我的治学的人的话，那么高华绝对算是一个。只是非常惭愧，尽管有这样的良师益友指教，我却时常撒野如故。好在，后来我写的东西，高华十分喜欢，在他生病的四年里，他的夫人告诉我，他们都是我博客甚至微博的读者,看我的博客,是他每天的功课（其实是消遣）。我出版的每本书，都会寄给他。我知道，我写得太多，太糙，总是暗下决心，下一次，一定写一本像样的书让他看。可是，书还没写出来，他人已经走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天，我有幸跟他在一起，他用他对学术的关切告诉我，他不后悔他的选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金陵当哭高华没

张宁

金陵当哭高华没，蜡烛成灰泪无言。茫茫黑夜孤身影，清贫一世救史魂。

认识高华是从他的书开始的。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之前，对国人所书的中国近现代史有一种莫名的排斥。我们这一代人是被用历史当佐料篡编成的意识形态糠团灌大的，多少都患有一点精神性的慢性胃溃疡，一见糠团就反胃。八十年代出国以后，读的书多了，对中国近现代史要么不读，要么就“正史反着看，野史正着读”。记得八十年代中在香港读到徐复观《论中共》一书，最大的震动是我们为什么对自己国家的事一无所知，我们为什么读不到这样的分析，八亿人民（当时的人口估计）每天读报，就没有一个像徐复观这么读吗？九十年代第一次去台湾，那里的整个抗日史完全是另一种叙述，人一下就惊醒了：中国近现代史是一笔意识形态的糊涂账。直到读高华的著作，惊叹我们这一代人中也有这样一位撇开糊涂账特立独行的著史者。高华让我们关注国内的现当代史研究，让很多人恢复了对国内现当代史学的信心。我们都知道在现今的中国，尽管情况日益改善，但基本现实依然是，超越意识形态做近代史难，超越政治局限做现代史难，超越这两个局限做党史更是难上加难。高华竟然能从支离破

碎的历史静脉纹理中扑捉住某些历史的动脉运动方向，借用萧功秦对他的评价，源于他对历史有一种超凡的“洞察力”与“悟性”。

与高华相识则迟至 2008 年。2007 年巴黎开了一个关于“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毛泽东”的国际会议，与会代表中有高华，大家都很期待见到他。可惜他没能来，原因是患了肝癌。也因此，我产生夏天回南京探亲去拜见他的愿望。其实此前我就跟南京的一些朋友提出过这个愿望，但高华的处境模糊地变成一些人的不方便，因此一直未能如愿。

与高华一见如故。之后每个夏天只要回南京都会去拜访他。重病中的他看起来不像病人，声音洪亮，气色红润，说起话来神采飞扬。每次去见他多在下午 3 点之后。他住的龙江小区是南大教师宿舍区，房子不大，在他这一代“功成名就”的国内学者中，这是我见到的最小的住所。屋子里到处都堆着书，但收拾得很干净，全赖高华夫人刘女士。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一般坐下就不动，只就近看他书架上与身旁堆着的藏书，生怕在小小的空间中制造出过多的响动。

一说起书，说起历史事件与人物，他就进入了他的历史藏库，滔滔不绝，如数家珍。我谈及自己的研究与档案馆工作时，他会认真地听，有时还会从书架上找出他认为值得参考的材料给我。每次在他那儿都会呆得过久，有一回他夫人笑吟吟留我吃晚饭，我才意识到我们都忘了高华的病体。回家后父母都批评我不懂事。的确，每次去看他都会忘了是去探望病人。

2010 年夏天再去看他，我们谈到了龙应台新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将他那本递给我，说是学生给他带过来的。我当时还没有看到书，只看过一些介绍，但选择 1949 这一年，并以文学的方式切入这段历史，令人期待。中国内地民间记忆中的 1949，如果开放这样的写作方式，该会是怎样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啊！高华说起了他的父亲，一个地下党员建国后的遭遇以及这种境遇对他成长的巨大影响，又说起他脱离传统的历史训练，转入现代史研究的心路历程。我当时还想起了钱理群那个分离于两党与两岸的家庭，想起了很多很多朋友的故事，想起档案里

看到的型型种种的材料中的个体和他们的家人。临走前高华将他的书借给了我，我答应离开南京前还给他。

高华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写满了笔记。我很好奇他的读法，因此阅读龙应台的同时也参看高华的点评。当时我没有看到高华就这本著作写的札记，从发表时间看似乎就写于我们交谈之前后。我还记得离开南京时因父亲临时入院手术，在去医院的路上给高华打电话，电话那头也是医院，高华的危机状况再次降临。他说这次见不上面了，我说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交南大中文系的钱林森教授还给他，钱老师住在高华隔壁的楼里，又敬佩高华，十分愿意帮这个忙。回到欧洲后给萧功秦打过电话询问高华的情况，一次次的危机他都闯过来，我们都企盼高华不断给我们带来奇迹。

在这种期盼中的2011年，我在日内瓦大学新成立的东亚研究系给研究生开一门题为“书写、记忆与历史”的课，以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为主要汉语读本，同时参照几本法国重要的相关著述进行讨论。其中有法国史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三卷本《记忆之场所》(*Lieux de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97, 3 tomes)、法国哲人利科(Ricoeur)去世前重要著作《记忆，历史与忘却》(*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Paris, Seuil, 2000)，以及一本题为《历史，文学，见证》的文集(Ribard Jouhaud et al., *Histoire, littérature, témoignage*, Paris, Gallimard, 2009)。

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与角度阅读龙应台。高华以史料史实对比法强调该书的历史价值。比如，“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

棠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棠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作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我的阅读中更看重龙应台对历史书写局限性的意识及其表达形态。的确，龙应台的写作中调动了所有历史研究的处理方法：官方文献、档案材料、地方志、当事人的回忆、历史地图、数据材料、书信、照片。然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十分敏锐地意识到写这段大历史的个体局限。事实上，那不只是作家写历史的局限，也是史家治史的局限，能意识到这一点并在写作中返身自省，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质。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序言，从19岁的儿子采访母亲开始谈历史记忆的代沟问题，反观自己19岁时对父母生活历史的冷感与无意识，这一反省又反过来触发了自己对父辈一代历史的关注。然而，当这种意识清晰到成为行动力的时候，作者所要面对的现实却是，母亲的失忆与父亲讲述历史的困难、两岸亲人历史经验的断裂，还有集体记忆的被压制或缺失状况。龙应台从家庭历史的沟通困境开始讲述历史记忆的困境：它包括克服伤痛所造成的表达压抑、讲述者与听讲者的沟通障碍、情感记忆与理性记忆的歧义，还有疾病与死亡，这些因素都直接威胁着个体记忆与群体记忆的构建。如果说家庭历史传承的核心是经验中的代沟问题，那么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乃至个人与社会国家时代的共同历史感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那些可能性结构或要素究竟又是什么呢？研究生中一位前南斯拉夫移民后代说，自己的母亲常常唠叨她故乡的往事，他们都像龙应台童年时代那样对她采取“古希腊悲剧合唱队式”的揶揄态度，现在则会细心听她的故事。一位法国女生含着泪说，她的祖父曾在阿尔及利亚当警长，因为不忍虐待当地人而毅然辞去公职回国，但他跟家人从不说自己的故事，后代们知道这些事都是渐渐从别的渠道了解的。痛苦的历史很难讲述。所以

她很关心历史如何讲述和传授的问题。

龙应台凭其作家的敏感，在作品中反复呈现的是串联这些互不相关的个人在大时代中的命运共同点：离别、流亡、颠沛、死亡与求生的愿望，还有永恒的思念。这些母题以不同的形态、意象、声音与节奏，反复跳动在作品的不同章节中，在“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高华语）的同时挖掘了建构这一命运共同体的共性元素。

龙应台十分注重个体经验中能够产生共鸣的普遍经验，即高华所说的“人文”、“人道”史观，从这些经验的共鸣性出发去挖掘不同个人命运中的共性，如“母亲”在生死离别、离乡背井中所扮演的缺失的永恒意象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美君失去记忆，槐生珍藏一生的母亲手纳的鞋底，管管与小脚盲母的离别场面，迁台老人在儿女搀扶下去台北剧场听那出千年前的离别故事“四郎探母”……一位瑞士学生在研讨班上最后一节课上说，有人批评历史的文学写法，她从龙应台的书中看到的却是这种写法的力量，她说龙应台给她记录的每个历史事件、每个历史时刻赋予了一个具体可感的“容貌”，使历史的还原更鲜活更细腻。她决定选择这本书写她的研究论文。

可惜没有机会告诉高华这些了。

高华走了，我才读到他的这篇札记。从这篇札记的叙述中得知，他至少读了三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而且是在生命的最痛苦的时刻。

>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
> ……
>
> 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景。
>
>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依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

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
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
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高华的心情，南京的心情，大江大海的心情都交织成了这盈盈祈盼。2011年岁末，高华是带着这份期盼走的。想他走得不甘心，想他走得太年轻，让我们活着的人为这种期盼的实现继续努力前行！

作者为瑞士日内瓦大学汉学系副教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射日者

周实

我和高华仅一面之缘。那是2002年冬去春来的一月间，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作一短时间的访问。具体是哪一天，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一天，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熊景明把我叫住了：

“周实——高华！”

高华就站在我面前，瘦瘦的，中等个，和我差不多。后来，好多年之后，有天我看电视，见他已是满头白发，不由一愣，大吃一惊。我和他同年，他是一九五四年，我也是一九五四年。现在的我，和他一样，也是满头白发了，而且胡子都白了，而且眉毛都白了。

在此之前，我和他已有电邮联系了。我寄我编的《书屋》给他，他也将他在香港新出的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赠予我。我看了，很佩服。他那表述的语气，那么平静，那么冷静，无论他写什么人，那人都在他笔下，而不是在他的笔上。他将他们所做的事一五一十地勾勒出来，一丝半点也不躲闪，一丝半点也不退让，一丝半点也不回避，我佩服他的勇气。我想这个写作者，即使手无缚鸡之力，他心中的那股力量，也是非凡无比的。二是他的“私人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

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私人著史，独立写作，相对于国家项目而言，我以为是中国史家自古以来的一个传统，只可惜在解放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禁锢，被活生生地一刀斩断，他能承传这一薪火，开启当代的私人著史，在我看来是了不得的。三是他独具的眼光以及他的重构能力，他能将已公开的“碎片”一点一点地拼拢起来，重现逝去的历史画面，让当事者都哑口无言。他的这种穿透能力，这种把握细节的能力，这种能使把握的细节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而且左右逢源的能力，实在是非常难得的。

他为什么能这样？在我与他聊天中，我看到了我俩的相同也看到了我俩的不同。我俩同时小学毕业，且都遇上文化革命，都因为父辈的问题被打入了社会另册，但他却没放弃自己，还在读书，关心时事，看了很多世界名著，而我呢，则是把书烧得精光，白天爬墙，晚上偷鱼，要不就是打架生事，虽然后来也清醒了，那几年却耽误了。

那些天，我和他，聊得真的很愉快。

他要走了，前来告别，我要送他，他不肯，我执意，他也只好随我了。我记得，我送他，一直送到了红墈，一直将他送进车站。分手时，我说他有点像那射日的羿。他说我是调侃他。我说不，是真话，那是我的真心话。

作者为湖南作家

相识相知三十载

周永明

这两年的岁末成了不祥的日子。去年 12 月 27 日我刚在浦东机场降落，收到北大顾忻的第一条短信，告知杜克大学政治学系的朋友史天健逝去。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失语。去年暑假还和他在北京欢聚，事情发生如此突然，让我无法相信。昨日又接到高华学生的电话，老友高华已辞世。我对高华最近病情的变化知晓一二，几个星期前在意大利，还和朋友商量募款让他去台湾治疗之事。但噩耗传来，仍然觉得高华走得太早、太快。告诉妻子时，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为好。大哀无言，唯有一幕幕回忆在脑中跳跃飞转。三十多年的跨度，在那片刻，我只感到沉重和心痛。

我和高华 1980 年相识于南京大学。我读中文，他学历史，比我高两级。从小醉心历史的我，当时还在为被中文系录取感到些许懊恼，发现有个历史系的学生跑到中文系听课，当然很高兴。这个学生就是高华。而我呢，也时常跑去历史系听课。两个人似乎都对对方的专业更感兴趣，一来二去，我和高华就结成了“忘年之交”，因为他长我九岁，上学前就已工作过八年。熟悉之后，才发现高华的兴趣其实不在文学，而在新闻。来中文系听课的真正目的是为考新闻系研究生做准备。如今高华以治史名闻天下，知道他

当年这个爱好的人大概不多。

也许高华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毕业时他考新闻系研究生的努力没有成功。工作了两年后，他又考回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和我成为同届同学，相处的时间自然就更多了。八十年代初中期，国内思想学术界坚冰消融，堪称早春二月，当时青年学子对新知识新思想可以说是饥不择食地“通吃”，吞下之后再反刍消化。记得当时西方的社科著作主要通过港台的渠道传入大陆，一本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先通过渠道搞到译本，整本复印，再请一个老鞋匠装订成册，然后大家传阅。（要知道，当年复印机不多且所费不赀，更没有如今的装订技术手段，复印整本书是一个大工程）。我们读后高谈阔论，意气飞扬。也时常各抒己见，争个面红耳赤。同时还兴致勃勃地举办系列讲座，推介自己的囫囵吞枣所得。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环境使得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自我认同为天之骄子，大有世界之大舍我其谁的气概。记得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高华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位稍稍超然的“智者”，他的言辞没有激昂和情绪化的论断，而是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摆出各种看法，同时表明他的基本判断。读过高华著作的人，应该都熟悉他的这种思考风格。

1987 年高华和我毕业后一同留在南大任教，但我们作为同事的缘分被两年后的政治风暴生生打断。当年我的单身宿舍是青年教师们的聚会之所，高华常常来我宿舍，坐在床沿，点上香烟，然后在烟雾缭绕中款款阐述他对时局的分析。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6 月初的一天，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如何判断未来形势，高华似乎也失去了自信。我当时的决定是尽快出国，他也选择暂时回避，我们俩在南大的南园侧门道别，不知此生几时能再见，唯有相互嘱咐保重。三年之后，我回国做论文调查，在宁重逢，回忆往事，唏嘘不已。历史学家只能记录和分析完成时态的人与事，高华承认，重逢的时间比他当年的估计提前了许多。

1995 年至 1996 年间，高华在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学者，我曾专门从北卡罗来纳去华盛顿看他。他在美期间以自行车代步，我担心在闹市里骑

车不安全，特地买了一个头盔给他送去。高华后来对我说，那个头盔他还一直保留着。当时他正在构思写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个人旅居美国，生活压力很大。也许是他已年届不惑，而我又在异国他乡打拼，记得那时我和他长谈，谈论最多的不是学术，反而是对人生起伏的感悟，对命运无常的浩叹。没有生活阅历的积累，想要成为史学大家谈何容易！几年后高华变得满头白发，和他在艰苦环境下治学不无关系，但越发显示出他人生的沧桑和学者的睿智。

我在杜克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受聘到威斯康星大学任教。高华得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这么多年来，他对我的学术研究一直是鼎力相助。2002 年，我回国收集材料，准备撰写《历史视野中的网络政治》一书，高华热心地介绍我访谈思想家李慎之、网络写手安替等人，对我的写作大有裨益。我在英文版的序言里感谢的第一人就是他。2005 年左右高华告诉我他一度曾想去华师大任教，最终没有成功，其中原因之复杂，我听得惊愕不已。2006 年在香港见到高华，他还特意主持了一场我在中文大学的报告会。当时他雄心勃勃，和我详谈了今后几年的学术研究计划。不料 2009 年我突然听到他患病的消息。当年暑假我携妻女去看望他，被告知是误诊，当时为他高兴，暂时放下心来。

后来得到的消息愈来愈不乐观。今年秋天我在意大利教书，当年南大高华的挚友刘广明发来邮件，告诉我高华的近况。除了响应朋友们募款让高华去台湾治疗的行动之外，我本想利用休假回国的机会探望高华，看看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刘广明也买好了元旦去南京的车票，想再见老友。25 号圣诞节，我请学生们来家里吃饭，也叫上了在威斯康星访学的高华的一位博士生姜超。提到高华，我们祈愿他能继续坚持下去。没想到一天之后高华兄就驾鹤西去。上天这么薄情，不给我们再多一点点时间，看到三十年的老友这样离开，心有不甘啊！

高华是一位当今中国难得的学者。他具备思想批判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多重侧面。批判者的品质使得他以深刻犀利的眼光审视历史，鞭辟入里，

发常人所不能言。他的心血之作《红太阳》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独立思考学者的风采。理想主义者的一面使得高华对现实更持批判态度，愤不公之世，嫉低下之俗。凭心而言，高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似乎只能存在于不可及的将来和他的精神世界之中，这和身为史学家的他构成了无解的悖论。我曾和高华戏言，不论他身处何时何地，以其这种秉性，他永远注定了要充当让当权者感受不悦甚至愤怒的角色。

如今你已彻底超脱尘世，进入另一个世界。愿你现在的世界充满爱、智慧与真诚，因为那是你一生的理想。安息吧，我的三十年老友！

作者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人类学系教授

高山仰止

周志兴

27日上午十点，我突然接到了一个显示为“南京”的陌生电话，心里不禁咯噔一下，似乎有不祥的预感。电话是高华教授的家人小孙打来的，他果真带来一个噩耗：高华教授走了。

真的难以置信！尽管高先生已经病了五年多的时间，不久前也传来过他病危的消息，可是，我太太十几天前还到南京的医院病房里看望过他，先生还在电话里和我说了几句话，从她给他拍的照片看，他气色还不错，我当时还欣慰，以为他又躲过了一劫。我太太对我说，当时高夫人带了一位摄影记者，希望为先生拍几张照片，先生不肯，认为自己的状态不好，不能拍照。但是，我太太提出要拍几张照片给我看，他欣然同意。先生还亲笔题签，送了我一本他的新作《革命年代》。

这是12月14日的事情，距高先生辞世，只有12天！

和先生相识，是在《领导者》杂志创刊后不久，那时先生给了我们很多支持，为我们写了关于延安整风、贵州“四清”的文章，还有读《江渭清回忆录》的笔记等。他的如椽大笔，为新生的《领导者》增色不少。更为重要的，是他成为了《领导者》杂志的义务宣传员，常常有学者告诉我，

我们是从高华教授那里知道你们杂志的。先生是史学巨擘，可信度高，他的推广当然胜过广告。

后来，我们又办了共识网。这时，先生已经病重，但他在病中还时时关心着共识网，不止一次地对我赞扬，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十分重要的一个网站。当然，他也不遗余力地推广共识网。说实在的，他的余力已经不多了。也可以说，他是在用他的生命在推我们一把！

第一次见到高华先生是到南京出差时约他吃饭，那天，我们主要是聊家常，互相了解。他比我小两岁，基本上是同龄人，他当过八年工人，我当过六年兵，也有许多相同的经历。记得那天吃饭时，我问他，吃不吃螃蟹？店里正好在推广固城湖螃蟹，先生说：吃。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因为许多初识的人都会扭捏一番，或者“不吃”，或者“随便”，先生的表态，显示了先生的风格，从不模棱两可，恰似先生的治史。

先生是史学大家，能成大家，是因为他有科学的态度。

他的成名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透彻地分析了延安整风的起因和过程，以及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他得出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在延安整风时已经埋下了种子。

后来熟了，我问他：你写了这样一本书，和官方的尺度大不相同，你遇到过什么麻烦吗？他说：没有，我都是依据国内公开出版的资料作研究，怎么会有问题？这我才知道，作研究，也可以不用所谓的独家秘史，但是要从字里行间读出秘密来。

先生是一个宅心仁厚之人。

不久前，共识网和《领导者》杂志准备做一个读书会，我给先生打电话，请他做读书会的史学导读人之一，先生说：我的名字，你可以挂在你的机构的出版物和活动上，但是，我现在不能参加活动了。这使我想起几年前，先生到北京来，我说，我在香港买了一本你的新书《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里面是你在各个刊物上文章的合集。先生拿过书看了看，说，这本书我还没看到过。他的语调平和，没有愤懑不平。我当时想，先生真是

宽厚啊，换一个人，也许早就跳起来了。

那次到京，我太太带他到 301 医院做了一个较为彻底的检查，并且为他买了许多药，他一直记在心里。这次我太太到南京看望他，他再次感谢，哪天去的医院，买了多少药，都记得一清二楚。先生帮了我们太多，却把我们为他做的一点小事牢牢记在心里，真使我们思绪难平。

先生五年多以前检查出癌症。患病后，我到他家中去看望过他，他没有颓丧，表现了和病魔斗争的顽强意志，甚至在病中，还为《领导者》杂志写了稿子，还到北京参加过一次作者座谈会。每次通电话，我都会说上一句：你说话的底气很足，说明身体状况不错！

当然，我知道，病魔从来没有放过他。尽管在他患病五年时，我太太还对我说：癌症能存活五年，就算治好了，再犯就是新的癌症了。但是，朋友们不断传来的消息，还是让我们对先生的身体深深担忧着，也祈祷着。

这么多年与病魔的战斗，先生也辛苦了，该歇息了！先生走了，他留下的著作将永久流传下去，他的精神，也将永久流传下去，指导我们，陪伴我们，走过一切坎坷，到达光明的明天。

先生的华彩人生，令我们高山仰止。这句话中，恰好嵌着先生的名字。

先生千古！

作者为《领导者》杂志社长兼总编辑，共识网总编辑

叁 高华吾师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柴子文

有幸，此生在大学时代就认识高华老师；有幸，在夜晚的南大校园跟他散步畅谈；有幸，毕业论文得到他手把手的指导；有幸，常去他家书房听他娓娓道来人和史。

高华老师与南京大学，与南京，像一份无处可逃的因缘，几乎因此可以在聊起、忆起时，在脑海中浮起“南京高华”的水印。这四个字棱角清晰，方正干脆，也如其人。

南大的前身，是民国旧都的中央大学，校址所在是教会大学——金陵大学。赛珍珠在这里任教、居住了十年，在这里写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但以前的辉煌可以转瞬变为“身份的原罪”，越辉煌越深重，以致即使改革开放了，南大在高校官场的资源争夺中还是落尽末流。

这故意的疏离和流放，竟无意间也释放出一些松懈的空间。加上在这所朴雅低调的大学里，有许多老派的学者教授，在骨子里还是坚硬无比，保留着民国一脉的学统，虽已微弱，但仍可感。未必无心名利，却也甘心寂寥；未必不想当官，但仍首重师道。所以，在1978-1991年间的许多重要时刻，曾引发过五次重要思想事件。比如，1978年引发真理标准问

题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者之一即为该校教师，推动破除了“两个凡是”对毛的迷信。

一座这样的城市，一所这样的大学，它的遭遇和底蕴，似乎暗合着高华老师的人生和学术际遇。

我在南大政治系的第一堂课，老师就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写在了黑板上，让刚脱离高考梦魇的年轻人眼前一亮。虽然这样的“甜品”上得有点晚，比起一进大学就习惯性汲汲于学分的大学生，却也算是跨过了反向的“独木桥”。与辅导员、创办“思想的境界”网站的李永刚老师的相识相交，更像是打开了一扇窗。

我从李永刚那里得知了高华老师当时刚刚杀青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并很快在“思想的境界”网站上读到节选片段，以及高老师其他的单篇论文。节制而有力的历史论证方法，朴实但有节奏感的文笔，深深吸引了我。2000 年大三选课时，当看到全校选修课表上有高华老师的现当代历史课，就毫不犹豫地选读了。

高华老师的课，几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他的声音高亢而顿挫，有史家的豪迈与清凛。至今印象很深，他在课上总是提醒大家，任何言之凿凿的历史结论都为之过早，都是武断的。举例时，他信手拈来各种党史材料佐证，轻松如数家珍。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在写毕业论文时，找到高老师，跟他讨论选题方向，请他做指导老师，没想到他竟爽快答应了。以后，经常有机会去他龙江小区的新家，跟他讨论论文的写作，闲下来，就闲谈时事。高老师对时事和思想界动态的兴趣极浓，也非常乐意听我跟他讲网络上的新鲜事。对我的很多不成熟意见，他不会直接批评，而总是在肯定其中合理和可能的部分后，谨慎地提出他的不同意见和建议。这让年少轻狂的我感受到，思想是有尊严的，思想也可以在宽容中具备力量。

有两个不会忘掉的小细节，却是高老师的言传身教。一次是毕业论文终于进入最后的修改阶段，高老师提出从头到尾梳理一遍文字，他在电脑

前一句一句修改文本，突然转过头对我说，简洁晓畅才是文字的最高标准。另外一次我帮他代回一封电邮，他口述我记录，他对每一封朋友的电邮都极其重视，用词造句语气，都要用心推敲一番，保持自然和分寸。

《红太阳》一书给高老师在海内外带来了学术声誉，他慎重待之，从未停止过为修订收集新材料。但高华老师自己是很清醒的，有一次，他凝重地对我说起，喜欢看这书的人有两类，一类是真的反思毛害的，另一类是拿来学习毛的“成功经验”的，不少党政人士自己跟他说的这理由。

经历过疯狂革命年代，对偏激和左倾思想，高老师的反感和警惕很强烈。这也时常表现在他谨慎的性格以外特别率性的一面。记得他常说一句南京方言口头禅，叫“烦不了”。可以说，高华老师的历史研究动力之一，是以无可辩驳的历史材料和历史分析对“左的浩劫”展开反思，唤起更多人的反思和觉醒。是巧合也不是，他离开的日子，12 月 26 日，和他毕生研究和警惕的对象一样，在暗示和提醒中国人：红太阳的升起，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高老师在世的最后一个春节，我从老家无锡坐高铁去南京看望他。一路上，高铁车厢的电子显示牌闪动着每小时 300 公里的字幕，看着沿途飞速闪过的夕阳景色，眼泪止不住哗哗流出。见到他稍微瘦弱的身躯时，我来不及心生悲戚，他已笑容满面，开始聊天，仿若学生是来交作业的，仿若我从未真正离开他家的客厅。仿若，面对死亡的恐惧和痛苦，他在心里早已对自己狠狠地说过一句：烦不了！

万分惭愧的是，在他最后的日子，我犹豫徘徊很久，竟仍然没有勇气给他打电话，也许因为，不知道该在电话里怎么说告别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安抚被病痛折磨四年的心情。只能将无限哀思托付星空。但我知道，他睿智宽爱的笑容和铿锵跌宕的声音，此生此世，都将萦绕在我心间，以后每次回南京，这些声音也会跟随我，萦绕在那些大街小巷。

作者为香港《阳光时务》杂志副主编

传道 授业 解惑

黄骏

12 月 27 日早晨，打开电脑刚准备浏览新闻，突然接到高老师的儿子高欣的电话，他一字一顿地讲道："小黄，我爸昨晚走了。"听到这话，我顿时懵了。就在 26 日上午，我还在病房陪老师看电视剧。他当时神情虽显疲倦，可思路依旧清晰，仍像往常一样点评剧中的情节与人物。怎么不到十个小时，人就突然走了？太让人错愕了。

最初知道高老师是在 1997 年，他当时与历史系几位教师合开一门名为"马列史学名著导读"的专业课。课程名称很"主流"，内容却不乏味，老师从毛选版本学切入，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抽丝剥茧般地逐一剖析，讲述有如一台不断拉升的摄影机，叙事视角一再扩大，使人豁然开朗。他极富内涵的个性表达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几年后选择本科论文指导老师时，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

从指导本科毕业论文算起，再到硕士、博士，十年来我不仅在课堂上聆听老师的指导，还经常晚间登门求教，与热情好客的师母刘阿姨、生性好动的高欣也很快熟悉了起来。师母在南京一家企业工作，几年前退休在家，闲暇时除了拉手风琴、画国画，还爱看当代小说。高欣受父亲影响，

对历史有浓厚兴趣，床头放着各类人物传记，有事没事总粘着老师谈自己的阅读感受。我也不全然是他们父子聊天的旁听者，高老师有时会笑着对我说，“小黄，考考你的分析能力，这件事该怎么看啊？”我苦思冥想说出一二三来，刘阿姨、高欣见状也加入讨论，七嘴八舌总结出个看法，等待老师的最终评断——通常情况下，老师说“嗯，这只是一部分，其实还有……”

晚间播映《长征》、《延安颂》这类红色题材连续剧时，他常常会守在电视机旁看得津津有味。“某某某眼神空洞，与历史原型差别太大”，“他的动作夸张还不足，某某某就是个演员”。剧目每每成为他即兴讲史的素材，我听得过瘾，暗下决心明晚再来一遭。2010 年 1 月老师因手术住院，我探望时刚说没几句，他就问起了电视剧《红色摇篮》的放映进度。听完“宁都会议”的剧情描述后，他点头微微一笑，接着就引证共产国际 1930 年代档案资料，谈起了博古、共产国际、周恩来、任弼时与毛泽东的复杂关系，谁对宁都会议的召开起到了主导作用等等。那一刻老师仿佛不是重病在床，而是重回讲桌前，挥洒自如地谈论起那些早已烂熟于心的人物与事件。

老师对现代史有浓厚的兴趣与自身家庭境遇有关。他的父亲 1940 年代加入南京地下党，在组织安排下，成功打入了国民党军情系统的电台侦听部门，为革命默默贡献。革命胜利后，在阶段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他和许多地下工作者一样，以往冒着危险取得的功劳变为污点，被视为怀疑对象，调离原单位，分配去做一名小学教师。1957 年“大鸣大放”期间他已经了解了党的游戏规则，不曾人“帮助党整风”的圈套，但阶级斗争的需要，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仍然被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去做体力劳动。不幸中之万幸，他被送到南京附近的农场。如果去了兴凯湖、夹边沟之类的“右派”农场，活下来没那么容易。

家庭变故促成高老师形成谨言慎行的处世风格，也让他关注时事变动，对更远处的历史源流也有了强烈的探究兴趣。在政治挂帅的少年年代，他

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克里姆林宫学”，从报刊的字里行间去参悟背后的云谲波诡。今天公认老师对史料有着高度的敏锐感与洞察力，能准确“解码”材料背后蕴藏的信息，这种能力的可能与他自幼养成的揣摩字里行间意义的阅读习惯有关。

进入南大读书前，老师曾被分配到一家衫袜店工作过几年，“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假货”，他笑着对我说，“因为一发现假货，那就是阶级敌人搞破坏的铁证，那就是不得了的大事了。”老师去世次日晚间，重读他的文章《行走在历史的河流》，想起他当时在电脑桌前绘声绘色地笑谈自己青春岁月的情景，不禁满眶泪水。

老师在研究中国共产革命前，曾参与台湾当代史的集体写作，是八十年代学院体制下台湾研究的青年学者之一。2004年受聘赴台湾政治大学任客座教授，使他与宝岛再度结缘。彼时岛内选举热潮如火如荼，在媒体上相继发表了数篇文章，剖析政情演变。同时，他从对台湾社会的实地感受出发，比较海峡两岸各自体制运作上的异同，进而思考“五四”新价值的历史路向。回到南京后，老师关注台湾的热度不减，台湾作家王鼎钧的回忆录是他晚年最爱看的书籍之一。在楼下广场散步时，他常给我讲述书中的一些细节。读罢王先生的《文学江湖》,他写过一篇书评,载于台湾《思想》学刊2011年6月号。

老师因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享誉学界，被视为研究毛的专家。他本人对这一评价有着自己的看法。高层变动是他的研究所长，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同样也是他的兴趣所在。在他看来，重视和考虑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对于理解当代历史有着特殊的意义，每当得知学校图书馆有平民回忆录上架，他都催促我速速借来。几年间他大量阅读这类普通人的回忆文字,在课堂上亦用生动的语言为学生勾勒出时代动荡下的“普罗生活史”,可惜的是,他的这些思考尚未见诸专著,因为生病而被迫辍笔。

2007年4月查出肝癌，老师不得不改变人生规划，从此往返于南京、上海两地频频接受治疗。老师常说，不能被病情吓倒，不能窝在家中消极

下来。病情让他无法再从事大部头的写作，但不能阻止他阅读与思考。在生命的最后那几个月，老师依旧手不释卷，病房就像是他的书房。

看惯风云人物的落幕，历史学家对自己的生命也有超然的看法，老师说，“有自己的书在，就可以了。”我每次探望时都小心翼翼地绕开病情，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些社会新闻，倒是他有时直言不讳。2010 年 8 月老师在病榻上对我说，经过这次手术，出血问题得到了控制，可说不定有天会突然……说这话时，他一脸平静，似乎谈的不是自己。

老师热爱生活，喜爱话剧、摄影，尤其爱听音乐。景明老师送他一台 iPod，将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等大师的钢琴曲录进去放。每天散步时，那台 iPod 是必备品。台湾朋友知道他喜欢罗大佑的歌曲，特地寄来罗大佑的音乐光碟。罗大佑在《明天会更好》中唱道，“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老师的人生就像这句歌词，为自己写下和美的乐章，也为后来者留下了光辉典范。

老师，您的远行使人悲恸，您的音容笑貌将常在学生心中，愿您在另一个世界安息！

作者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逝去，如秋叶般静美

姜超

美国当地时间2011年12月26日傍晚，我打电话到高老师家中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他昨天晚上已经走了”。就在他去世的几天前，我还在想，除夕夜高老师能否从医院出来，和亲人共享年夜饭。但他在我毫无心理准备时溘然长逝。

几个小时前，他昔日南京大学的同窗好友、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的周永明教授，邀请学生去他寓所聚餐，庆祝圣诞节，我有幸参与其中。我们在车上谈起高华老师的身体情况。聚餐结束后已过晚上十一点，走到寓所门口时我向永明老师提出合影，主要是为了将照片寄给病中的高华老师。这张合影永远寄不到他手中了。

2002年，南京大学课堂上认识了高华老师，2008年，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有幸成为高华老师门下的弟子，从那时起我就常常来往于上海和南京两地看望他。病中的他对学术的热情依然不减，每当说到兴奋处，脸会微微泛红。这三年多是我得到他学术指点最多的一段时间，充分体会到他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史学功底。

攻读博士学位前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思想史，高老师认为我攻读

博士学位之初不宜立即开始着手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他推荐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史学论著给我，包括西方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及中国官方解释体系内的史学论著，以了解西方学者对近现代中国的认识与解释体系和中共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框架。在他推荐的论著中，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高老师看来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建构中共解释体系的源头。他希望我带着问题意识去阅读这些论著并撰写读书笔记，关于后者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股前后贯通的文气。"

我目前研究的课题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的中苏友好运动，这是高老师提出的建议，他认为上海在1949年以前是一个西方色彩浓厚的城市，在1949年后西方的角色就逐渐被苏联全面取代，这个过程的来龙去脉很值得研究。但这个课题是否能研究他当时并不确定，主要问题是相关史料是否足够。高老师非常重视这点，认为一切实证主义的研究都应该从史料出发，没有足够史料研究就无法展开。随着查阅档案的深入，我发现关于该课题方面的档案非常丰富。后来高老师还对查阅史料提出建议："抓梳材料、大量阅读、点滴归拢。"

高老师说，历史学论文有两种类型：思想类和传统史学类。他认为思想类论文重在思辨，要使用西方的分析模式，基本可以不需要去档案馆查阅一手材料，难处在于必须有很强的灵性及思辨能力，所以这种论文并不容易写。他个人倾向于传统史学类论文，这类论文虽然遵循史料路线，但已融入了新的概念，写作方式从事件、人物、史实入手，他自己遵循的就是这条路径。

高老师对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方面的论著惊人地熟悉。2011年1月曾在香港买了一批，包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晚年周恩来》、《将军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之子黄正著）等，但对于这些书的史料价值及可信程度我并不清楚，所以此后去医院探视老师时曾征求过他的意见。他认为《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可以翻看，但其中有不少杜撰成

分，写论文时不能将该书的内容作为信史来引用；《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曾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参与了《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毛泽东传》等中共官方史籍的编撰工作，接触过大量的内部档案文献，所以该书的内容基本属实；至于《将军永胜》一书，此前高老师也刚在病榻上翻阅过，认为此书没有太多的新鲜内容，如果对林彪问题感兴趣，他建议可以去阅读在香港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该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高华老师在史学研究方面已积累多年，正是出学术成果的黄金年龄，却因肝癌而过早辍笔，整日与医疗器械和药物为伴，不得不放弃了撰写《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该书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丛书中的一本。林彪是文革中的重要人物，1969 年到 1971 年是他个人声望从高峰跌落到谷底的一个过程，期间尚有众多疑团有待解答。如果这本书能够问世，相信一定会使世人对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复杂关系及文革期间中共高层权力博弈的认识加深一步。

2010 年 12 月，我和家人去上海东方肝胆医院附近的旅馆探视高华老师时，他和我们谈起当时因胃癌刚去世不久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蔡教授在中国民主宪政理论研究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实他们两人的经历颇相似：都是学术功底深厚、有良知和社会担当的学者，都不幸在学术的黄金年龄身患绝症。高老师感慨地说："蔡定剑得知自己身患胃癌后，反而更加忘我地投入到研究中去，仿佛是要尽情地燃烧自己，让自己生命在最后时刻发出更耀眼的光芒。"高老师说话时那种慷慨激昂和略带伤感的神情，一方面，是对蔡定剑教授由衷钦佩并对他的逝世深感惋惜；一方面，何尝不是高华老师由于肝癌而产生的百感交集心态最真实的写照？

高华老师成长在一个政治畸形发展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尤其经历过文革那段令人窒息的岁月。据他回忆，1966 年 8 月他曾从母亲手中抢救下正准备烧掉的杨绛翻译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十几本书籍。此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家附近有南京一所中学的留守处，这个中学已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仓库里，看管仓库的老先生允许他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书。在那几年他从仓库借阅了大量中外文史书籍，包括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等。1971 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他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阅读《鲁迅全集》。正是这些书籍给了当时的他许多温暖，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并支撑起了他的人文主义信念。

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后记中，高老师曾言："至今我还清楚记得 1979 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他一生与青灯黄卷为伴，任何东西都无法囚禁他那颗崇尚自由、追寻理想的心，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高华老师追求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崇尚的学术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曾向学生推荐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这篇文章给当时还是本科生的我以思想深处的触动，李慎之先生逝世后导师还曾撰写《李慎之先生，你为中国做的贡献已载入史册》一文来追思他，这些都反映出高华老师的价值关怀：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人道主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高老师在南京大学求学的那几年，虽然从政府到民间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经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客观评判，但"左"的思维方式依然存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就是为圣人避讳，或者是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高老师却在《红太阳》的后记中表达了对秉笔直书的写史方式的认同，并对春秋时期齐国太史公和晋国史官董狐颇为

赞许:“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高华老师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历史学在某种程度上有类似于宗教的功能,对人们起到了教化和引导的作用。”这也许就是历史学在中国的重要意义所在,历史中亦有微言大义,即太史公司马迁所谓“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

认识你，三生有幸

靳松

1991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在南京一家国营工厂，按24小时轮三班的“倒班”制，做了一年的轮胎，感到前途迷茫，一度动了报考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念头。因为曾经认识中心的美国留学生，听他们提到过高华，知道这位南大年轻讲师的文史课在中心很受欢迎。一天，下了早班，我就直接去中心敲他办公室的门。高华听了我的来意，让我坐着等一会儿，就去秘书那儿取来招生简章，和我一起逐条过了一遍。我发现自己不符合报考条件，就放弃了。但那以后我和高华渐渐有了交往。

去高华家一般是晚饭后，停好自行车，在窗口喊一声：“高老师！”听到有人应声，才跑到门前等他开门。他们一家三口和另一位老师合住上海路的一套南大宿舍，公用过道和卫生间，现在我还记得抽水马桶边挂了两个木头的坐垫，各有记号，一家一个。高华家是里边的一室半，大点的是卧室，陈设很简单，小房间是书房，两面墙的书架上立满书，地上也堆着书和成捆的旧报纸。进了屋，我自己搬个凳子，和他对面而坐。他把桌上的书稿挪一挪，腾出点地方放茶杯和烟缸。一般聊到十点半结束。有一

次，我对他说，工厂的领班如何欺负我，他当时就说，他骂你什么，你一定要骂回去。这是我对我们早期谈话内容记得最清楚的一次。还有那么多个夜晚我们都聊了些什么，某本书，某条新闻，还是某个朋友，都已淡忘。只记得每次离开他满是烟味的书房时，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骑车飞奔在去工厂夜班的路上，神清气爽地去机器轰鸣的车间里闻汽油和胶浆的味道。

1992 年底，我考入南京一家证券公司，很快被派去上海证券交易所常驻。周末回南京常去南大打篮球，偶尔从高华家绕一下，门都不进，打个招呼，就去打球。有时候聊得高兴，球也不打了，仍然是两杯茶，一包烟。记得有一次顺路带给他四只闸蟹，高华在门口问我手上黑色的塑料袋里面是什么东西，我笑着说“自己看！”就骑车走了。后来他告诉我螃蟹是两公两母，味道很好。儿子高欣第一次吃螃蟹，一人干掉两只。

我在高华家也常遇到其他访客，曾经遇到一个借宿的外地大学生，是北京的朋友介绍的，据说有武功。更多时候，遇见的是他当时和过去的学生。他总是介绍我是他的朋友，后来我就直呼他高华了。有一次，高华的美国学生桑慕雪约我一起去他家小坐，高华就穿着白色的老头衫、睡裤，坐在他家那把旧藤椅里，打着一把扇子，我和桑慕雪各站一边拍完一张照片后，他笑着对夫人刘韶洪说再来一张。高华蛮喜欢照相。

我结婚时，高华和桑慕雪来我们在镇江路租住的家，桑慕雪送了一个烤箱，高华的礼物是一本厚厚的婉约词。爱人在厨房忙了几个菜，那是我们第一次和高华吃饭。

我知道，高华那几年在写一本书，内地没办法出版。他说将来可以拿到台湾或香港出。后来他流露过去美国看看的打算。1995 年夏天高华顺利办了签证，机票也确定了。我建议他们一家先来上海住两天，玩一玩。那天我特意请假去火车站接他们。高欣当时还小，出门特兴奋，进了房间，在席梦思上又蹦又跳。晚饭后，我们从外滩沿南京路一直走到人民广场，坐在马路牙子上，看夜上海的车来人往，霓虹闪烁。

第三天早上，我和高华的一个法国学生皮埃尔一起送他们去机场。临

别，高华和刘姐彼此交待了几句，然后他就把儿子搂到怀里，高欣呜呜地哭了。进关前，他不住地回头招手，示意我们回去。隔着玻璃看着高华的背影，拖着个大大的包，再看看刘姐，心想高华以后得自己做饭了。算起来，那年他 41 岁。

一年以后，高华从美国回来，我们见面说起在美国的日常生活、见闻、朋友的变化，和想象以及期望的不一样。

转眼到了 1997 年，我在证券行业前后也做了五年，感觉人生没有了方向，很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我对高华提到辞职的想法，他略表惋惜，说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工作难找。当我说打算去德国念社会学接受正规的学术训练时，他说："你不要有学术神秘感，生活第一。可以出去看看，德国应该是个不错的地方，但是生活第一，随机而动 。"

1997 年 9 月我到南大旁听德语，一天午后跟高华约在南大主楼旁的草坪上见面，那天下午我第一次听到顾准的名字和生平，高华讲得兴奋，喝了两听我带的可乐。和他分手后我就跑到先锋书店找到了《顾准日记》，一口气看完吴敬琏和李慎之的序就掏钱买下了。

1998 年 12 月，我到了德国北部城市汉诺威。当我开始面对那些晦涩的德文原著时，觉得学术还是蛮神秘的，每页纸常有四五十个生词要查，一句话看了好几行才找到动词，明白了每个字的意思，完整的句子却不知所云。我确定自己不是学术的料，越来越多的时间耗在网上，政治的、娱乐的、色情的什么都看。终于，账户的余额把我逼出去打工了。有一天，我正在大众的流水线上拧螺丝，听到旁边的工人谈股市，忽然想起，自己曾经也是做股票的。此时不禁想起高华的话，生活第一。再后来，我做了导游，时而堵车在巴黎的环线上，时而站立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下，时而又面对免税店里汹涌而至的同胞。回国见面，我会告诉他，我在路上遇到的人和事，每每讲到精彩之处，高华都会说，你应该把这些事记下来，否则只是过眼烟云。

2000 年 12 月，我爱人来德国，一家团聚，生活慢慢安定下来。2003

年11月女儿出生，我继续奔波在路上，有近两年的时间没有跟高华联系。偶尔在网页上读到他的文章，知道《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在香港出版了，再后来我找到了这本书的电子版，一头扎进去。那些天的阅读，好像是一程长长的潜泳，越来越透不过气来，直到看完最后一个字。如果不是后记的提醒，我几乎忘了这本书的作者是自己认识已十年的朋友高华。那一刻，我意识到，当年那个冒失的青年，不晓得预约，时常打断了他的工作。而高华从没说过，这会儿正忙，改天再聊吧。上海路的那间小屋里，那些娓娓道来的夜晚，冬天有军大衣、油汀，夏天有电扇和蚊香，那些带着烟味的愉快回忆，无意间成了一段历史的见证。

直到有一天在天涯论坛上看到高华去华师大的帖子和他的照片，50岁的年纪，怎么头发一下全白了呢。随即网上给他留言，高华，别来无恙！？第二天收到他的回复，留了新的号码。电话打过去，听到高华的声音，仿佛还是坐在他上海路的书房里……

当年回南京就去看他，他说身体不太好，是心脏出了些问题。那次我们聊了他新出的书、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客座的经历，也谈及交游的学人和他们的著作。我也谈了我的近况，非常愉快！

2006年11月，高华来维也纳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想顺道在南德转转，不凑巧，我那时不在德国，就委托慕尼黑的好友江勇和杨阳夫妇陪了他三天，除了慕尼黑周边的景点，高华还特地去达豪看了纳粹集中营的旧址。他们彼此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本来高华还会有一次欧洲之行，我和爱人盼着他们夫妇到时能安排出时间，来我们家住几天。但是2007年4月，高华的肝脏查出有问题，听起来挺让人担心的。高华的情绪好像还好，告诉我，已经戒烟了，很冷静地分析自己的病情。那时候我已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每年都要回国三、四次，自那以后，每次回国都去看他。

2008年夏天，我和爱人去他家。当他听我说起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时，马上问我们第二天是否有空。次日晚上高华请客，我们见到

了仰慕已久的胡杰夫妇，两口子骑车横穿大半个南京城来赴会，给人印象深刻。

2009 年 9 月我回国出差，回德国前专程去上海看他。那时他情况很不好，即将在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动手术。那天上午高华要去中山医院请专家看片子，前一天夜里我在中山医院附近住下，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医院。9 点多，我站在门口，远远看见刘姐和一直照顾高华的小孙走在前面，面色凝重，高华步履缓慢地跟在后面，一头白发在人群里很显眼。我一边喊：高华，一边迎上去。看到我，高华很高兴，他说，靳松，你看我还蛮好的吧。简单的寒暄，匆匆告别，我们两个人紧紧拥抱，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不出话来。我心里想这大概是最后一面了，为了不让他看到我掉眼泪，扭头就走了。

高华手术后恢复得不错，有一次去省人民医院探望，道别时高华非要刘姐送我，临出病房我稍一迟疑，回头又看了一眼，高华一个人半躺在病床上，脸上的笑意尽褪，目光怅然若失。

2011 年 1 月的放疗几乎把他完全摧垮，不过 2 月份到 5 月份又觉得他渐渐好转。他隔天到南大医院挂白蛋白，是自费药，用的是国产的。我问高华怎么过去，他说坐公共汽车，打车要等，反而不方便。在南京的时候我陪他去过两次。高华的手背到前臂因为长期注射，静脉已不好找，两针都不见血，他把脸撇到一边，闭目不看。

5 月 28 日天气不错，高华想出门转转，刘姐、我和他的学生金晶一起陪他去了趟东郊，车一直开到紫金山上，高华扶着栏杆远眺良久，深深吸气，又招呼我们合影。回去的路上，高华情绪好极了，哼起歌来，还是俄文的！车过北京东路小学，他又回忆说曾经一度被分配在那儿当语文老师，“教低年级我不愿意，就走了，要不然啊……”“运气好的话，努努力现在就是小学校长！”我边开车边笑。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 11 月 3 日，回德国之前我去医院接他回家，车堵，他叫我直接在医院大门口等。不一会儿看见高华一个人出来，背双

肩包，听着 iPod，一脸笑意地打招呼。他讲到自己的病情，依然让我觉得，他是在说别人的事情。

12 月 21 日我给他打了手机，他的声音沙哑吃力，说在发烧。我有不祥之感，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说："高华，再见。"电话那头轻轻回了一声："好。"这是我们在世间最后一次交谈。

正如熊景明老师在邮件里所说，我们碰巧成了高华的朋友，三生有幸。

作者为高华生前好友，现居德国

师门受教琐忆

李巧宁

[一]

我的求学生涯中，最幸运是受教于高华老师门下，成为他首届五个博士生之一。

2001年秋季，高老师正好开始招收博士生，招生方向“当代中国史”正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于是报考。2002年三四月份，是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季节。考试前三天左右，我去拜访高老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比预约的时间晚了约十分钟，满怀歉意，高老师微笑着说，他担心我迷路了。我惴惴不安地把硕士学位论文复印件给他过目时，因为我对学术规范知之甚少，加之写硕士论文期间一直牵挂才两三岁的孩子，一手史料的查阅非常有限。高老师不可能看不出论文的薄弱，但他只微笑着说，探讨知青这个问题很有意义。正如张鸣教授对他的评价，“他的为人，更令人钦敬”，他不想去伤害一个投考他的年轻人的面子，不想打击她的自信心。他问起我考前复习的情况，我说，我只看了我所在的学校给学生用的北师大版、

王桧林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我甚至冒昧地说，所有的教材都大同小异，无论哪一套，知识框架都差不多。高老师依旧笑着，对坐在一边的周孜正师弟说："小周，你回去从图书馆把张宪文教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给李巧宁借一下，这套书她应该看。"他还嘱咐小周把他给硕士生讲的"当代中国史"笔记借给我看，说："李巧宁从西北地区来，信息闭塞一点，你帮帮她。"

第二天早上，周孜正师弟就给我带来了书和笔记，对我的考前复习很有帮助。

入学考试面试的时候，我紧张极了，站在楼道里双腿直打哆嗦。可是，一进入考场，高老师和蔼的面庞，令我镇静下来，不知为何，考完出门的时候很滑稽地做了一个抱拳拜托的动作。

[二]

2002年9月，我走进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正式成为高老师门下弟子。校园里的银杏树上挂满了果子，树叶绿中泛着鹅黄，既充满着生命的张力，又不失平和与安静。对未来三年的求学生涯，我既懵懵懂懂又无限憧憬。当我和几个同门师兄弟就选课问题去征求高老师意见的时候，他一一向我们介绍了几位当时开设博士生课程的老师：蔡少卿、张宪文、李良玉、崔之清等。在他口中，每位老师都是治学经验丰富的资深导师，讲课各有特色，希望我们认真去听。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身边的人用"资深"去描述同行，感到很新鲜，也对要选的课程无限向往。最向往的当然是高老师的"当代中国史有关问题"，一是因为我报考的方向是当代史，二是入学前我从网络上下载了高老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后记，对他能在一个浮躁的年代"十年磨一剑"的写作经历充满了好奇，加之读了他之前发表的"鞍钢宪法"等论文，虽然似懂非懂，但很想仔细聆听他对当代中国史的解读。

2002年至2005年初，我在南大共听过高老师面向历史系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和全校学生的课程共六门。每次走出课堂，心被高老师精妙的讲解打开了一扇扇窗户，豁然开朗；神却沉浸在课堂的场景里不愿出来。一切是那么新鲜，那么不可思议，又是那么合情合理。

我至今怀念不已的，是2003年上半年的“当代中国史的史料与方法”课后，我们几个同学总是意犹未尽，不时邀高老师一起坐在校园旁边的小饭馆里，继续给我们讲历史、讲学术，延续课堂的无穷精妙。

[三]

高老师讲课从不哗众取宠，从不言过其实，相反，他很谨慎，从措辞、语气到表情都从不夸张，只是娓娓道来。他的课堂颇为有趣：讲者很随意，不时点一支烟，不一定吸，但燃着，有时烟到了嘴边却没顾上吸，拿烟的手又放下了，旁观者不免为他没能吸上一口而暗暗遗憾。讲到有趣的地方，他会往后捋一捋理得很短的头发，偶尔，也会脱掉外套，随手放在讲桌上。讲到某个问题，他会不时以很轻松的口气询问同学们“了解不了解”，或点某个学生讲讲相关情况。对学生的回答，他最常用的评价是“不错”或者“好的”。听课者出奇地安静，似乎被一股从讲台上发的磁场吸引住，思绪停留在讲者描绘的场景中，形体却发呆了一般。

说到磁场，不由想起高老师讲到的一些“场”。一次是讲土改的时候，介绍张鸣关于土改中诉苦的“剧场效应”，他说，张鸣教授认为诉苦形成了一种“场”，在那个“场”中，人不由自主地被同化，情绪随“场”而动。一次是讲毛泽东，说毛是一个人格魅力型的领袖，他有一股“场”，许多普通人一靠近他就被“场”的力量吸引了，甚至深深地震撼。他说毛泽东的理发师是有很大定力的，那手只要一抖，就会出事。他还提到，有一次毛泽东坐火车外出视察，到了一个地方，火车停下来，车上的人下车活动、

休息，火车司机也下来活动筋骨，车快要开的时候，司机正准备上车，转头一看，毛泽东在不远处也正要上车，司机一下子软了，手脚都不知该怎么动了。

对毛泽东这样一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难以绕开的人物，高老师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有时他只用一句话，甚至一个词语，就把毛的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说到毛身边的卫士回忆毛艰苦朴素，拖鞋、睡衣补了又补，高老师说，毛的穿着和"朴素"没有关系，这样评论是风马牛不相及，他身边的卫士哪里能理解，他是不好这个，对穿着不在乎，他是"大自由"，哪里在乎穿什么。提到毛泽东身边的人，位高如周恩来、刘少奇等建国后常常做检讨，高老师说，谁见过毛做过几次检讨，他至多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自己对出现的严重困难"也是"有责任的，毛是不轻易"下罪己诏"的，哪个有实权的皇帝轻易"下罪己诏"？

最让我佩服的，是高老师总能在不经意间以谈家常的口吻道出一个个关于历史的精妙讲解，留给听者无穷的回味。有一次，在硕士生的课上，高老师讲到了延安时期的"大灶"、"中灶"、"小灶"制度，他说，如陈学昭这样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出于统战的需要，延安优待他们，每个月特供鸡蛋。一般的普通群众都吃"大灶"，连小米都稀罕，当然重要领导人是"小灶"，甚至有的能每月吃一只鸡，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吃到鸡是多么令人向往。他接着说，在延安的某次座谈会上有人质疑"大灶"、"小灶"制度，一位中央高级领导人解释说，重要领导人的健康比普通干部和群众的健康更重要，所以这个制度是必要的。他信手拈来一系列相关的资料。正当听者个个凝神屏气之际，高老师带着一丝遗憾说：哪个同学如果有时间，把这些资料串起来，就可以写成一篇论文——《中国共产革命中关于"鸡"的叙述》。

还有一次，提到二十世纪中国共产革命中女性的革命化，他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词语——"粗鄙"，来描述蜕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外壳乃至心灵，转变为"高度政治化"的"战士"、螺丝钉的女性的生活习惯：故意着装工农化，有的甚至冬天腰间系上草绳；不刷牙；头发乱蓬蓬的……

他甚至提到某革命女性六十年代下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时，故意让脚上的皮鞋显得破旧。他只几句话，就勾勒出一幅活生生的革命女性素描。

[四]

课堂是短暂的，但高老师展现的历史的多重面相使每一个听者仿佛置身于历史风云的诡黠之中，让人不由想去探索。我开始嗅到历史的味道，体会到研读历史的乐趣，常常带着满脑子的感叹号和问号，流连在图书馆的书架前，读韦君宜《思痛录》、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于风政《改造》、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贺熊飞主编的“黑马文丛”、史景迁《天安门》……

高老师也让我们感受到一位位杰出学者的光辉：秦晖、朱学勤、许纪霖、萧功秦、李慎之、张鸣、杨奎松、沈志华……他介绍他们的观点、作品，尤其讲他们的特色。记得高老师说起秦晖教授的时候，以极敬佩的口吻说他是当今罕见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举例说他对中国每一个省有多少县、每个县的地理与人文等都了如指掌；还说某次去澳洲，和秦晖教授同行，车子过一个桥或其它什么标志性建筑，秦晖教授立马就说出下一个要经过的标志性建筑是什么，同车的人都以为他曾到过此地，原来秦教授只看过地图。高老师仿佛无意间的介绍，却让我们深深浸染在学术的魅力和学者的光辉之中。

他对章诒和的介绍，我亦至今难忘。有一次，大概是在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出版前后，高老师说：“有个叫章诒和的女性，你们在网上搜一下，她写了一系列民主党派人物建国后的遭遇，最近圈子里的人在传看。文笔之好，令人惊叹，两、三万字的长文，我都是一口气读完的。”那天从课堂出来，我就迫不及待回宿舍打开电脑，一头扎进章诒和的文字里。

高老师和学生在一起，几乎不谈自己。不谈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包括他求学和做史学研究的过程、他的作品，他只讲课，只问学生们的情况。

我对高老师过去的了解主要是来自《红太阳》的“后记”和他后来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上的《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两文。只有一次，他算是从侧面谈到自己上大学时期的情况。好像是2003年冬天,有一次是晚上上课，天气很冷，高老师很随意地问：同学们知道八十年代初南京的大学生是怎么取暖的吧？大家摇头，他笑呵呵地说：“用医院里挂完水的瓶子，那种玻璃瓶，往里面装上热水，上课、看书的时候抱着或拿在手里。”他眼神里似有某种怀旧的味道。

我只偶尔从他口中听到过《红太阳》。一次是我在博士生入学考试前拜访高老师时，主动问起在哪里可以买到该书，他带着些歉疚说在大陆买不到，他只从香港带回来二十多本，给朋友们一送，他自己手头就只有一本了。另一次大概是在2003年春，律师朱元涛因为从香港带回的《红太阳》被北京海关没收而开始打官司，高老师当时有些忧虑地说：“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父母替我担心，他们毕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担心我的处境。”

作为高老师的弟子,我们也受人羡慕呢。我入南大读书的第一个学期，有个同级的学政治学的女生同住六楼，当她得知我是高老师的学生时，几乎带着夸张的口吻说：“哇，真羡慕你！”她说，她在河南某个大学读硕士期间，她的导师就讲起过高华老师，对他的学问和为人敬佩不已。还有一次，大概是2004年的一天，在图书馆一层的工具书阅览室里，我正为学位论文的写作查找资料，忽然一个高大的男生很友好地跟我打招呼，我一看，并不认识，很疑惑地看着他，他说：“你是高华老师的学生，有一次代他上过大课的，我很崇拜高华老师！”

[五]

入读南大期间，我比较满意的论文《农业合作社与农民心态》，一定程度上是高老师催出来的。2003年，师弟周孜正为了搜集硕士学位论文

的资料，有空就扎在江苏各地的档案馆。高老师多次对我说："要多学学小周，多看资料，不能光看别人的研究成果，要自己接触史料。"2003 年下半年开学后，位于青岛路的江苏省档案馆成了我每天必去的地方，白天一卷一卷地看档案，晚上坐在电脑前整理白天的笔记。日子仿佛很单调，却让我兴奋不已，因为我看到了许多我以前根本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它们在我脑海里展现了极其丰富的 1950、1960 年代的生活图景。正是在这些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我尝试着写了这篇小论文。论文写好后，我于 2004 年 1 月 3 日寄给高老师，他一周后回复我"论文写得不错"，并很快向《浙江学刊》编辑部写了推荐信。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正忙着为 2 月下旬赴台湾政治大学五个月的讲学做各种手续上的准备，也为其它的事情在北京和南京之间奔波。

2004 年春天，正是台湾大选的日子，3 月 25 日，身在台湾的高老师通过电子邮件寄来了他写的两篇台湾政治观感，《侃之：试看不久之台湾，山河一片"绿"色》和《台湾处在政局动荡中》，让我们和他一起感受台湾大选的氛围，一起关注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不希望学生们把学问做"死"，或者做"死"学问，他希望的是在关注现实中做学问。

2004 年下半年，我多次去高老师家向他请教论文写作中的种种问题。有一次谈到新中国的中苏友好宣传产生的影响时，高老师说，他记得以前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的回忆，里面提到五十年代初毛泽东视察黄河途中，到一个小山村去了解民情，村里的一位小脚老太婆赶来高兴地招呼毛泽东："毛主席呀！您来啦！……毛主席呀！斯大林来了没有哇？"他说，这就是说明中苏友好宣传效果的很好的材料。我到图书馆借来王鹤滨《在伟人身边的日子——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的回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年版）仔细翻阅，果然找到了这则材料。难怪师母当时在一旁说："高老师记性好，你回去查查看，应该有这么一回事。"

2005 年 4 月下旬，学位论文的预答辩中，答辩委员们提出许多非常尖锐的意见。我虽然理解他们是为了我把论文改得更好，但依然忍不住委

屈的泪水，仿佛自己辛辛苦苦一年多的努力被指为一文不值。那天中午，高老师在答辩结束后就去南大校医院打吊瓶。午饭后，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校医院看望高老师。得知我流眼泪，半靠在病床上的高老师带着些严肃，但口气比较平和地说："李巧宁，委员们都是为你好的，你不应该哭的……"他接着就怎样修改论文以准备正式答辩给我一些具体的建议。我清楚地记得那天高老师说，医院是不给门诊输液者安排床位的，让坐在椅子上，但医院的某个医生照顾他，给他找了一张床让他躺着。言语中，充满着对这位医生的感激。吊完水，他和我们一起出来，在马路边和我们边说话边吸了一支烟，然后穿过马路进了校园的大门。

五月，学位论文正式答辩结束后，我匆匆去高老师家道了别，就离开了南大，算是结束了我三年的读博生活。

[六]

离开南大的几年，高老师的邮件、"高华个人学术网站"、高老师发表的只言片语，都是我的精神家园。每次打开"高华个人学术网站"，就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感，有如远嫁的姑娘回到了娘家。

与高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2011年12月14日。13日下午，我和同级的师兄弟一行四人去医院看望高老师。他当时状态很不错，正捧着郑也夫的《半开放社会》看。见我们进去，很高兴地一一打招呼。对于病情，他很轻松地说，只要脸上的黄褪去就好了。他还是那么轻松、那么温和，只是不时口干，需要喝点水润一润。那天他和我们谈韩钢主编的《中国当代史研究》，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谈《墓碑》，谈杨奎松的《读史札记》，谈自己的学生……

为了能和高老师多呆一会儿，14日早上，我和周锦涛师弟又去高老师病房坐了一会儿。前一日他叮咛师母从家里为我们带来他的《革命年代》，

高老师坐起来，在一张报纸上一边很认真地试笔，一边说，手臂上吊液体时间长了，手僵硬，不灵活，然后签名送我。

高老师走后大约半个月的一天晚上，我梦见他躺在床上，淡淡的笑容依然、带着南京方言味的男中音，兴致勃勃地说这说那。我在梦里想，我要把高老师说的话录下来，要不以后再也听不到了。早上醒来，努力地回忆梦中高老师说的话，却什么都记不起来。

梦境是虚幻的，我怀念高老师的情怀却实实在在。一个多月来，我脑子里总回旋着受教高老师门下的点点滴滴，在家里也总不由自主地说起高老师生前的片断。一沉入这种情感，好久都走不出来，也不愿走出来，独自呆坐叹息。

作者为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系教授

知遇之恩

李永刚

自从十二年前母亲病逝，生命逝去的悲恸对我而言淡了许多。可是，在得知高华老师离去消息的瞬间，在灵堂跪谢的时刻，在追悼会上告别的当口，眼泪好多次止不住夺眶而出。原来高老师在我心中，已然有了亲人般的位置。

虽然和高老师同在一所大学，但真正开始接触，始于母亲病逝的那一年。当时，我在操持一个学术思想网站，在各种压力之下，身心俱疲。某天，突然收到高老师的电邮，热情表扬我网站做得好，有意义。此后，每当有学界重要人物造访南京，高老师总是热情引荐，让我这个无名小辈既受宠若惊，又获益良多。

2000 年秋天，网站因内容敏感等原因关闭。黯然之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发来了访问邀请函。之前，我与这家著名机构并无来往，缘何受到他们的垂青？后来才知晓答案，原来是高老师牵线搭桥。从那时起，我与 USC 结下了不解之缘，与高老师的师生情谊也进一步拓展。

2001 年 3 月，正在 USC 访问之际，高老师也来到了中文大学。恰逢

金观涛先生给本科生开设中国政治思想的课程，而且正好讲到“延安整风运动与共产党文化模式”。高老师和我前去旁听。这是一幕有趣的场景。坐在教室里倾听的高老师，乃是延安整风研究的“头牌”权威，他对“红太阳”如何升起的透彻挖掘，穿越重重迷雾，为我们展现了一段绝不同于官方描摹的历史轨迹。而金先生的旨趣，则重在阐释权谋与时势之下“道”的演变。课堂之上，两位高手并未交锋。倒是在周末的行山活动中，禅机不时流淌于他们精彩的对话之间。

几年之后，金先生开始谋划以民间立场主编一套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几乎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顶尖阵容。高老师应邀撰写其中的第七卷《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就像我们以前开玩笑的那样，高老师命中注定要着手揭示“红太阳”落下的秘密。

然而，就在这项令人期待的新著启动不久，2007 年 4 月，在学校的例行体检中，高老师被查出患有肝癌。在病魔袭来的最初日子里，高老师也如常人一样的焦虑不安，愿意听成功抗癌的故事，也满心期盼这是一次误诊。但事实确定后，高老师很快稳住了阵脚。每次去见他，他都精神饱满，顽强乐观。

很多年来，我一直钦佩高老师的功力。他阅读广泛，视野开阔，不受门派纷扰，没有成见固执，总能在蛛丝马迹中发现重要线索，又非常擅长辨析重组诸种线索来还原现场。即便在病榻上，如数家珍的历史叙述仍能精确到某一天，对风云事件当事者的观察揣摩直达心底。

高老师不仅为史学研究趟出了一条路，还为年轻一代重新审视百年中国打开了一扇窗。由于病情没有好转，原定的国史专著写作被迫搁置。在思想最敏锐、积累最丰硕、洞察最深刻的巅峰时刻，一位杰出历史学家试图解构的大人物、小人物、大格局、小事件，不幸之至，全都被残酷的命运永久封存。

这几天，重温高老师的演讲视频。其中一场在香港科大的文革讲座，

讲到六十年代初期，由于严重饥荒，中国进口了很多伊拉克蜜枣，这些蜜枣细菌较多，造成了国人肝炎流行。当时他还小，也吃过这样的枣子，印象很深。听到这里的时候，心里猛地一痛。也许，这疾病的因果，那时候就埋下了根。

本来说好元旦就去探望他，然而高老师没能多呆几日。他患病四年多以来，我从未想过这一天真正来临。在高老师离去的第三天下午，我才克服内心的不安去他家里祭奠。高师母给我翻看杨奎松夫人寄来的影集，看到高老师清晰的样貌一下子跳出来，我们俩都掉头不忍目视。师母说她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高老师正在发言，身边各位学者凝神静思。我辨认出，那是 USC 四十年庆典，中文大学祖尧堂中的场景。

我在香港与高老师相处的日子，竟然多过在南京的同城记忆，念及此，悲从中来。宽厚的高老师未必介怀，我却深深自责。

遥望夜空，斯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作者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你为我们开辟混沌，照亮内心

刘握宇

在大学里，对一位老师上课的评价，往往会在同学中口耳相传，甚或于学长和学弟间“代代相传”，如此，便会影响到这位老师讲课“上座率”的高低。说到南大“上座率”高的老师，历史系的高华教授当仁不让。

高华教授的课堂，始终是热闹的。他的全校公选课，上百人的阶梯教室每次必是“人满为患”；他的研究生课，几十人的教室常被挤得满满当当，几乎无插足之地；他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春秋两季的课程，受到国际学生的普遍欢迎，不少人更是慕名而来，这使他在“中心”也成为高“上座率”的教授之一。

这自然缘于高华教授上课的吸引力。你可完全以放松的心情来到他的课堂，不必担心点名，也不必担心冗长的作业，只随他进入那扑朔迷离的历史隧道。顶好是听他讲复杂的历史事件，千头万绪，他交待得一丝不乱；来龙去脉，他讲个清清爽爽，一定使你听得兴趣盎然，如沐春风。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从不妄加褒贬，往往只一两句生花妙语，如点睛之笔，其中滋味，难以对外人道。由此而得人生之启迪，洞察世事之能力，受益不尽，享用终身。高教授的课堂上，听众年龄分布之广，盖应为此吧。每

每讲到会心处，听者或颔首微笑，或奋笔疾书，或凝神思考，或彼此轻声感叹，这种种情形，于高华教授的课堂上，司空见惯。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高华教授之所以能将课堂上的“戏”唱得有声有色，实因为他平时下了大量的“功”。这“功”又可分为“硬功”和“轻功”。所谓“硬功”者，乃“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的中国传统史家精神。高教授常说，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治史者说话，最忌空无凭据。他是这么要求学生的，自己更是谨守这条治学原则。他写的每一篇论文，所提出的每一个论点，无不是建立在大量史实基础之上的。要做到这一点，说似简单，做起来却非易事。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浩如烟海，要想穷尽，虽耗毕生精力犹恐力不能逮，不少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因此望而却步，更多时候是在史料的搜集与应用上显得功力不足。惟其如此，高华教授在史料运用上的严谨态度和扎实功力，方显得尤为可贵。他平时极重阅读，大量的阅读，使他不仅积累了雄厚的“史料资本”，也能及时掌握学术研究的最新动向。正因为他对史料了然于胸，运用起来方能调动自如，将它们一条条安置得贴切妥当；正因为他随时关注学界动向，他的研究能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让人常看常新。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硬功”。

至于“轻功”，非人人可以练得，多为天赋也。其实，做什么事不需要天赋呢？高华教授在治史上有天赋，这么说怕是不会错的。历史在后人看来，就是一样样的史料。同样的材料摆在那儿，有的人只能看到东西本身，有的人却能从中还原出历史来。造成这种差别的，除了后天的努力，还有天赋的因素，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治史者，不光要有爬梳史料的耐心，更需有感觉历史的“慧心”。无此“慧心”，至多只能在文字的平面上打转，哪能参透历史人物形形色色的复杂心态，又何以悟会林林总总欲说还休的历史记录？有了这颗“慧心”，治史者便能深入历史的立体空间，游刃于黑白文字经意或不经意的记载之中，体察各色人物的心灵悸动，与历史的脉搏齐跳跃，写出有血有肉亦有情的历史，为后人揭示出一幅幅虽旧还新的历史景象。这“慧心”即是对人情的练达，对世事的洞察，这既

是人生阅历的积累，又是天赋的一种灵性。以此“慧心”来触摸历史，即便未亲历其事，写出来的史，亦能处处透着身逢其时的感觉，令当事者读了心有戚戚焉。高华教授的研究著作，令许多至今健在的“老同志”十分惊讶，他的论证，竟然和这些亲历者的切身经验，如此吻合。

这内外兼修的“功”，成就了高华教授的“史”。他实证主义的严谨、朴实的学风，得到海内外诸多学者的赞誉；他新颖深刻的研究成果，在学界、知识界等领域引起广泛关注；他谦虚平和的性格，使初见他的人倍觉亲切。他的朋友中，包括大陆的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和学者，香港、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的许多同行，也多与他长期保持着亲密、坦诚的友谊。2001 年杨振宁博士访问南大时，曾特别提到高华教授，对他的学术成绩和学术能力予以了高度评价。

高华教授是如此卓有成就的一位历史学家，可你如果把他想像成个大学究，那就错了。在他学生的眼中，他既是在学业上于人于己严以要求，常为一个词斟酌半天，追求每一个注释都完美的教授，又是坐在沙发上，一边吸烟一边随意聊天的长辈和朋友，而许多隽永的思想和为人处世之道，正是在这一圈圈烟雾中悠悠荡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身边的人。与他接触，你不难发现，他对周围事物的了解往往超过了许多埋头读书的学生，什么“东北人人活雷锋”啦、什么“刘老根”啦，他说起来竟那么顺溜，惹人捧腹。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强大的接纳能力，使他始终保持着活力，这活力渗透进他的著作中，写就一篇篇鲜活的史，这活力与他的冷静观察和深刻思考相结合，便是一位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关注。此外，你还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兴趣和知识实际大大超越了历史学的范畴，他可以如文学教授般对你大谈西方文学，又会将欧洲的大导演及其经典作品，如数家珍般向你娓娓道来……总之，如此有色彩的一位教授，我们今生不可能再遇到……

附记:

以上是差不多十年前写的一篇小文，如今读来，当年与老师相处的情景又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

2011 年 11 月底与高老师的另一位学生周孜正兄通了越洋电话，得知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那一晚的梦中都是老师的身影，次日醒来枕边全是泪渍。12 月 25 日，终于在冬日的南京街头与正兄会合，他的眼睛红红的。我们一起去医院看望老师。出乎我的意料，老师虽然消瘦了许多，面色有些蜡黄，但依然目光明亮，思路清晰，与常时无异。他和我们、还有师母刘阿姨、范骏师兄谈笑风生，从社会百态聊到历史掌故。当回忆起年轻时为儿子高欣编的小故事，老师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孰料，仅仅过了一天，12 月 26 日晚便突然接到正兄发来的噩耗！我立刻想起这一年夏天我返回美国前到老师家告别，恰巧那一天，老师的父亲在卧病数年后离开了人世。在有些昏暗的客厅里，老师眼含泪花，喃喃低语道："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毕竟从此阴阳两隔了。"此时此刻，这句话不断在我耳边回响，竟成了自己的心理写照。

从 27 日到 29 日安葬前的几天，前来老师家吊唁的客人络绎不绝。直到夜阑人静时，我们几个学生才能静静地守候在老师的灵前。那晚，我望着狭小客厅里堆积如山的花篮，不由想起大约十年前，也是 12 月的一天，我们几个学生帮老师从上海路搬到如今龙江的这个家。那一晚，我们买了一只小花篮送到老师的新居，祝贺他乔迁之喜。而后，像往常一样，我们围聚在温暖的客厅里，听老师娓娓道来说不尽的历史秘辛。谁承想，十年后的今天，同是这个客厅，竟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篮，而讲故事的主人却已一去不返。按照习俗，灵堂的门窗皆不可闭，我们枯坐无语，任寒风穿堂而过，吹干眼角的泪水。

这些天，在我的脑海里，老师的形象已与龙江和上海路的两个家融为了一体。他时而在上海路的家中用拖把清洁着嘎嘎作响的地板，时而在龙

江的客厅里和我们一起兴致勃勃地看着连续剧。有时，他出现在上海路的小厨房里，一边吃着再简单不过的午饭，一边将收音机的天线拉得长长的收听新闻；有时，他又坐在龙江的饭桌旁同我们共进晚餐，桌上必然少不了刘阿姨为招待学生特地买来的南京烤鸭。傍晚时分，老师或是披一件衬衣站在上海路大院的高坡上，和我们边聊天边望着马路上的车来人往，又或是与我们并肩在龙江的广场上一圈圈地散步，而刘阿姨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周围健身的人群中。如今，上海路的庭院静谧依旧，龙江的广场热闹如常，可哪里都不能再寻见老师的身影了。

随老师远去的，还有我们这些学生的青春年华。大约十三年前的春天，我还是南大文科强化班的大三学生，需要从文、史、哲中选择一科作为日后专攻的方向。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正当我举棋不定时，某一天的傍晚时分竟在南大浴室与老师不期而遇。其实那时与老师并不熟，仅上过他半学期的课，而老师却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于是，我便趁机向他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出乎我的意料，老师并没有推荐历史，而是要我根据自己的兴趣及日后就业的前景来决定。现在想来，老师当时正处于修改书稿的最后阶段，深知从事历史研究的艰辛，因此并不愿他的学生贸然踏上这条荆途。

与老师的对话虽只寥寥数语，却促成了我立志学史的决心。此后的时光真是令人愉快而兴奋。犹记当年一边为老师录入文稿，一边倾听他讲解如何行文运思、推敲字句；他不仅在课堂上春风化雨，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客厅里为我们妙语释疑；我们还时常随老师出入各色书店、讲座，又一起流连于校门口的那几家碟店，翻捡着帕索里尼、阿莫多瓦等大师的经典作品。此外，我们更在老师的客厅里结识了许多背景各异、但同样热情、纯真、向往自由与真理的年轻人。

十几年来，老师客厅里的年轻人走了一批又一批。直到 2011 年岁末，我们从四面八方再次相聚南京，送老师最后一程。很多当年的学生如今已过而立，但忆及往事，老师的一言一行仍那么清晰生动，历历如昨。追悼大会上，透过依稀的泪光，凝视着躺在鲜花丛中的老师，我总有一种幻觉，

觉得只要回到龙江，便可以看到老师如往常一样埋首于堆满斗室的书丛中，间或燃一支烟，在客厅里踱步，等待学生的来访。我甚至有股冲动，想拨通老师的电话，希望再听一听他那温暖而富有磁性的声音。然而，毕竟是阴阳两隔了，耳畔又响起老师的叹惜。

其实，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在最需要启蒙的时候遇到了老师。您犹如高擎火烛的摩西，为我们开辟混沌，照亮内心。如今，请让我们逝去的永恒的青春伴随您一起去往天国，而您的教诲将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继续照亮我们的前程。

作者为美国爱荷华大学历史系博士

你的远行使人何等伤痛

刘彦文

我总是比别人迟钝。

当 12 月 26 日午夜，同门想尽办法告诉我先生逝去的消息时，我因晚间莫名的不安无法静心做论文而早早关掉了手机入睡。27 日一早打开手机，看到这个消息，我怔怔地愣在床上。26 日下午，由刘阿姨转发给我们华师大的同门“去看高老师时，尽量 3 点以后再来”的短信，还在手机上。原本打算 28 日去看先生的，只几个小时，便阴阳相隔。

当先生的朋友、学生在报刊、网络上以各种文字述说他们与先生交往的种种细节时，我只是默默地将这些文字复制、粘贴、保存，却不知如何将自己对先生的敬仰诉诸纸笔。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先生的讲课录音，认真地整理、做笔记，他的声音穿透时光的隧道，就如在我身边一样，而我，从未如此认真过。

我将先生的书放在随手可及的地方，那本《革命年代》扉页上先生苍劲有力的大字“彦文雅存，高华 2010 年 9 月 29 日於南京”将我带到了那一天。其实去的那天是 10 月 5 号，但是先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将日期签成了 9 月 29 号。记得当时的他精神矍铄，那一天我们照了合影照，照

片上的他安详、从容，带笑的眼角眉梢给我父亲般的温暖。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是给先生上香，屋里飘渺的香薰总让我沉醉，我便幻想，先生该是闻得到的。我才明白什么叫“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如今的我，只能藉此遥寄哀思！

还是在三年前我准备考先生博士的时候，我将他的邮箱来信单独设立了一个文件夹。如今我每一次打开邮箱，都会看到名为“高老师”的文件夹，只是，我再也收不到他的邮件了。

与先生交往的场景，久久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挥之不去。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2009 年 6 月底由华师大召开的第一届国史研讨班上，他那时还未第二次确认患病，做的讲座题目是“近代民间的当代史书写”，按照杨奎松老师的话“是压轴的一场”。他拿折扇，娓娓道来，我从不知有人可以将学术讲座做得如此生动。

可惜 2009 年的暑期他便再次确认患病，但他是那样的积极乐观，并决定配合医生做手术。于是 2009 年的 10 月份他在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做手术，我与同门每周都从闵行赶到杨浦看他。虽然去一次要两个多小时，但是每当我看到病榻上的他与陪伴在侧的师母，总是有回家的感觉，这让刚到上海的我觉得特别欣慰。他病榻旁边总是放着书，在没有做手术之前，他精神很好，经常会跟我们谈笑风生。

他好像一点也不害怕手术。记得他动手术的前一天，刘阿姨发短信给我，说明天动手术，高老师很好，但她很紧张。于是我又从学校跑到医院，我甚至带了牙刷，想晚上陪陪刘阿姨。我到了医院以后没多久，刘阿姨和他们的儿子、义子就去跟主刀医生谈动手术的事情，还有手术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先生的手术得到多方的帮助，进行得很成功，但其间的痛苦可能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动完手术，我和同门去看他，他说，小刘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肝胆欲裂，那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他只是个普通人，会疼痛的普通人；可是他又不是个普通人，一刹那的脆弱，即刻被刚毅的内心克服。

2010年的1月份，先生去东方肝胆医院复诊，我再次去看他，经过几个月的恢复，我甚至觉得他脸色红润，一点不像患病的样子，红色的滑雪衫衬着一头白发，看上去好美。那一次见面，他不忘对我的指导，跟我确定了现在的博士论文题目。我越钻研这个题目，越感叹先生的睿智，只是天资愚钝，达不到先生最初的要求，时常心存愧意。

2010年的春节，我听说有一个去台湾访问的机会，但是时间截止是2月份，那时我已经回到家。我很想抓住机会，想请先生推荐，请陈永发老师做我在台接待的指导老师。有先生的帮助，陈老师爽快地答应了。可惜因我自己的疏忽，那个基金会的资助计划有变故。我依照前一年度的资助要求准备材料，孰料依照新的资助计划我是没有资格的，麻烦了陈老师，却未能成行。先生对此很是遗憾。第二年我的师弟想申请赴台，说请陈老师做指导老师，他一听就着急了，说陈老师是再不能麻烦了！并解释了因为我去年云云。我想其实陈老师可能未必介怀，但是先生的个性却是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从这个小事情也可看出他为人处世之方式。

2011年元月份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进行为期五个月的访学，先生早早跟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的熊老师打好招呼。其间，熊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除夕就是在她家里度过的。到了香港更感受到先生的影响力，我也因自己身为“高徒”而自豪。那几个月我大部分时间都在USC度过，那里良好的学术氛围是我在大陆任何一个学术机构都难见到的。翻阅中心所藏资料的时候，我心里想，高老师他都一一翻过，也更感叹他对共和国史研究点的敏锐性,他利用中心收藏的“内部参考”写出对大饥荒时代“代食品”现象的论文，研究了“四清”运动起源与大饥荒关联。

我6月份刚回到上海，隔天便去南京看望先生，他老说自己觉得挺好的，虽然隔几天便要去医院一次，对康复很有信心，只是那时候先生看起来已经有点瘦了。10月份，先生再次开始住院了，我也开始忙碌自己毕业论文的撰写。虽然时常打电话过去问候，但我总想得太简单，竟看不懂刘阿姨讲的“情况不太好”。我总是太乐观，总觉得先生虽然生病，但是

离逝去还很遥远。我心里想，我一定要在高老师手下毕业，我要赶紧做论文。每一次论文做不下去的时候，我便翻看先生的书，《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里的文章，每一篇都那么精彩，好像先生在提示我论文该注意的地方。

就在2011年12月20号，我发短信给先生，说自己获得了华师大研究生的最高奖学金，几日后有个颁奖仪式，届时学生将为辛勤培育的导师献花。我说我过几天去南京为您献花，先生还回短信给我，说好的。可是那束花，竟然换成了白玫瑰，放在了先生的灵前！其间的悲哀难以言说！

准备葬礼的12月27日到30日，我作为先生唯一一个在读的女学生，晚上陪师母睡在一起，自然那几日都是在先生家里度过的。花篮将不大的客厅塞得满满的，很多来吊唁的人都没地方坐，站着说几句话便离开了。师母白天要应付很多事情，有时晚上脑子也停不下来，便跟我讲话。她总是说因为生病，高华对我们华师的学生指导不够，他自己也觉得非常遗憾；说你们都是懂事的孩子，都很努力。我告诉她，与先生不多的交谈中，只字片语都会成为我做论文进行不下去时的良药；每一次细细咀嚼先生的文章，都会让我有不一样的感受，从而从不同的角度启发我；而他对待病魔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更是我一辈子的榜样。

就在他去世的两天前，我还将毕业论文的新提纲发给他，只是我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难以应付了。刘阿姨发短信给我，请我谅解高老师暂时不能看我的论文提纲、也不适宜长时间通话了。我才意识到先生的病情之严重。因为之前的每一次，遇到学习中大的问题，我发邮件或打电话给先生，他总是不厌其烦尽力帮我。可是这一次……于是我们华师的同门便约定了去南京看他。可是，一切都来不及，我赶不及见先生最后一面，而且最后还给他带来了麻烦，制造了遗憾，这成为我心里永远的痛。我觉得自己是最傻的傻瓜。

后来才知道，早在两个月前，医生便已下了病危通知。他在便血的时候，也已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可是他，谁都不愿意麻烦，不愿主动让人去看望他。刘阿姨说先生咳血去世的当晚，久久地，眼睛都没有闭上。他

带着多少遗憾多少不舍啊！高老师，你是否知道，我们这边的学生对你多么不舍？

2003 年 4 月 23 日，李慎之先生去世的后一天，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纪念李老的去世，文章写道“李慎之先生，你的远行使人们何等伤痛！你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已载入史册！”于我们，先生，您的远去何尝不是如此？！愿您在天堂安息！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

高老师，来生还为你带饭

张一文

高华老师与世长辞，中国痛失一代良史。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同志的生日，也是高老师的卒日，不论是生日还是卒日，都已成为了忌日。

历史惊人巧合。高老师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书的作者，被称为是“毛泽东研究的排头兵”。

高老师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来附庸风雅干什么？不，我和高老师有关系，我曾经为他带过饭。高老师，如果有来生，我还为你带饭！

当看到凤凰网记者第一时间连线高老师的生前好友时，当看到搜狐网等大型门户网站在显要位置刊出讣闻时，当看到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连发三条微博以示悼念时，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哀思。我在微博里贴了两张和高老师的合影，转发了一些人的悼念微博。这些微博无不高屋建瓴，从“宏大叙事”的角度，缅怀了高老师的学问与人品。他们是有理由、有资格这么写的，因为他们都是专家学者、学术大腕。

而我，不过是个普通的打工仔，沉浮在社会的最底层，我拿什么来缅怀？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

我常被人提起的故事就是去香港研究、传播打工文学。

2006年4月3日至5月2日，我应邀并受资助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内地学者访问研究计划”，研究课题是《中国打工文学创作主体与阅读对象研究》。4月26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表演讲“打工文学研究”，与来自美国、加拿大、印度、台湾、香港和内地的学者与听众一起，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接受海外媒体的现场采访。5月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新闻”版，刊登该报香港特派员易锐民先生的专栏文章《让“打工文学”在香港开花结果》，对我所从事的研究进行了报道。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打工文学纵横谈》一书，把我去香港研究、传播打工文学总结为中国打工文学发展史百余件大事之一，羊城晚报因此称我为“中国研究打工文学较早的专家之一”。突然之间，我好像偷偷溜进学术殿堂。

就是在这时认识了高华老师，成为了他的“私淑弟子”，帮他带过几次饭。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被称为香港20个地标之一，令无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神往。中心以不算丰厚的财力，资助着海内外众多对中国问题进行的实证研究。我有幸受到邀请，在那儿度过了难忘的一个月。

彼时，高老师在中文大学历史系做客座教授，平时就在中心看资料。他在中心的工作室在我的隔壁。我经常看到他抱着一大堆书籍资料，进入工作室，半天不出来。

中午，我就跟着这些专家学者，去中心对面的餐厅——范克廉楼吃饭，分享他们的研究心得。晚饭后，我们往往不急着回雅礼宾馆、也就是我们在中文大学的“家”，而是到赛马会宿舍楼附近的体育场散步，边散步边探讨学术问题，那是真正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来自不同国家的中国问题专家，互相“洗脑”、相互“碰撞”，很多思想火花就在这种交流中

产生，成为日后的研究引信与写作素材。

经常参与散步聊天的，首推高华老师，还有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的高峥教授、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政治系的朱毓朝教授、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的谢政谕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吴毅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金大陆研究员等。学者有时也会互相“抬杠”，互不买账，争个水落石出、面红耳赤，但都是谈学问，谈观点，从不涉及人身攻击，所以最后大家都能求同存异、和谐相处。

记得某学者有点讨巧地对高华老师说：“您研究‘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中共党史专家啊！”我这样的外行心目中，谁要是被称为“中共党史”专家，那身价立刻翻倍，比一般的专门史专家要吃香，那可是一顶亦官亦学的红帽子啊。谁知高老师非常认真地说：“我不是党史专家，我不专门研究党史，我就是个历史学教授。”现在，看到不少悼念微博和媒介，还把高华称为“党史活字典”什么的，我想高老师九泉有知，一定不会答应。

学术界缅怀高老师的圈子，我走不进去，我却十分想表达一个有幸与他结识，之后对他不能忘怀的普通人的敬意和哀悼。高老师在我的印象中，是个很和蔼的师长，他常会跟我们小字辈讲他的故事。

他年纪并不算很大，但是早生华发。我问他为什么不把头发染黑，他笑着说：“有这个必要吗？”他有心脏病，内地医生要他做手术，心脏搭桥挂个起搏器什么的，他不盲从。后来也好好的，他常常为此很得意。

应香港大学钱钢老师的邀请，高华老师从新界去港岛吃饭看电影，把我也带上了，由此我有机会一睹《唐山大地震》作者的“庐山真面目”。出发前，高老师反复叮嘱我把西装外套带上，因为香港的电影院冷气的威力之大，如置身寒冬。果不其然，在电影院外面，我们都热得只能穿短袖，进了放映厅，西装外套穿在身，还多少有点美丽冻人。

他常常关心我的家庭，有时也会说起他那个学计算机的儿子。谈到打工文学，高老师认为，打工者现在还很难界定，其实不是做老板就是打工，不在体制内的都可以说是打工者……他希望我不要辜负中心的资助，多出

研究成果，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以及打工文学贡献绵薄之力。他还鼓励我硕士毕业后考博士……可惜我辜负了高老师的希望，研究工作没有太大进展，博士也没有考上，依然在社会的最底层彷徨。

星期天，中心不开放，学者们都在宾馆也就是“家”里做功课。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学者们你叫我，我叫你，一起去食堂吃饭。高华老师常常不忍心放下手头的书本，或者不愿中断正在写作的文章，于是，他就喊：“小张，过来，麻烦你帮我带个饭，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把饭带回来了，开始有点不好意思接他的饭钱，但是高老师毫不客气地给我“饭票”，不接不让我走。有时候是16元一份的饭菜，他找到15元，还有1元没找到，我说1块钱就算了。他非常认真地拦着我，直到他从某个裤袋里找出了1块钱。这种废寝忘食、这种执着认真，都让我感觉出自己的“小”来。

斯人殁矣，其道犹存。高华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作品、人品，都将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激励着我们不要浪费人生。

作者为广东教育杂志社编辑

先生最后的时光

周孜正

十八年前，十八岁的周孜正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期间，他最大的收获是四个字：高华吾师。高华病后，孜正频频奔波在南京和他的居住地无锡之间。高华不仅是他的良师益友，也似亲人。

12月25号，高华去世前一天，我打电话过去，孜正在病床侧。次日，他回顾两天来高华的言谈，写下来打算传给我看看。刚写毕，正准备发出，收到高华太太的电话……

高华情况恶化后，口很干，电话来了，都由太太代答。这天他接过电话，问我，圣诞节到哪里去玩。然后让我问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将一个个名字念出来。我是那么笨，完全没有想到他是道别，失去最后的机会告诉他：高华，我们爱你。

——熊景明

2011年12月22日 星期四

昨天办好调休，今天可以安心从马山去南京。一路匆匆，汽车火车出租车，下午2点25分才到省人民医院门口。

因为来过，所以很顺利找到老师的 28 床。我一出现在门口，师母刘阿姨就看到了，开心地对高老师说："小周来了！"高老师见我来了，也挺高兴的。我到病床前，他就关切地问："小周怎么会来南京的？什么时候到的？"

担心高老师知道我特地过来陪他，我就讲事先准备好的说词："12 点多就到了，去省 H 局办事的，快年终了，去送点挂历什么的，正好今天就不回去了。明天我调休一天，后天周末，可以在南京陪老师和师母几天！"老师蛮开心的，又不经意问了一句："省 H 局在什么地方啊？"我一下子无语，转而一句搪塞，"就在省政府旁边。"他哦了一下，就不再多问这事，转问："饭吃过了吗？"我意识到，我的好意他领会了，也知道我不是来南京出差的，他的洞察力真是时时刻刻！

我拿出准备的小礼物给他，一本圣严法师写的《智慧 100》，书中有很多丰子恺先生画的插图，是高老师自学生时期就喜欢的，他翻了一下放在床头。一串开光手珠，他戴到手腕上试试，说："佛珠比较大，抓起来蛮舒服的。"上次来医院我观察到，他去做手术的时候，不挂水的手一直握着佛珠，这个珠子也许能够给他多一点支撑。还有一袋惠山油酥，他让师母打开让他尝了一个。高老师吃饭的习惯是快且简单，如果一定要说食物方面有点爱好的话，仅是一点能够填饱肚子的小零食。我和同门师兄弟聊过这个，大概是老师以前老是深夜写作，肚子饿了，就补充一点此类的麻饼、京枣或者饼干垫垫饥。我硕士毕业之后去无锡工作，增加了一项"油酥"。可惜老师身体已经不好，不能多吃此类食物了，今天尝一个也就是改换一下口味，让嘴里有点滋味而已。这些小零食总是勾起我对 1995 年初夏那个夜晚的回忆，高老师第一次约了我们班六七个同学去他的小书房聊天，聊到有点晚时，他出乎我们意料的拿出招待客人的好饼干（1995 年的南大，饼干是蛮高级的零食了）给大家做夜宵，师生边吃边聊社会、聊人生、聊毕业后的未来……那一刻，他既是循循启蒙、照亮我们内心的恩师，也是怕学生肚子饿、请吃

精致 cookie 的班主任，那个场景，我毕生怀念！

高老师的脸色比上次我离开时，稍微好一点，没有那么黄了，他告诉我最近病情的发展情况，然后就转向师母说："小周今天就住在我们家吧，书房的床太小，让他睡房间的大床好了！"我赶紧说："大床我嫌软，我还是睡书房的小床吧，小床硬一点！"老师又叮嘱我晚上开空调，别冻着。

我和高老师聊了会最近看的书，当我感慨解放初毛泽东指导黄克诚对付北京资本家的基本方针时，高老师提示我："关键看革命实力的增长，革命实力弱的时候，需要资产阶级帮忙，就对资进行支持，帮助中共发展经济。"他特别强调"中共也需要发展经济！"另外让我回去在他的书房电脑桌上找《当代中国史研究》三册，是华东师范大学刚刚邮寄给他的，要我仔细读读其中的文章。上次来，高老师知道我对中国近代的佛教历史感兴趣，就特地送给我学愚教授写的《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的书，也是告诉我在书堆中的某个位置，我回去一找果然是。

高老师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读书，最近我来他却屡屡送我他的非重复版本的书，可见内心是做什么准备了。我一听到送书，心里面既难过、无奈，又非常感动。不过高老师送书时神态却如平常，好像想起我论文中某个问题，叮嘱我要去参考他的哪本书一样。

高老师这几天持续发热，师母说今天下午体温还算好，高老师小睡时，我乘空轻念一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大悲咒》。6 点多，我们把老师的晚餐准备好，他吃了一点，就催我们早点回龙江，医院有护工老王师傅就可以了。出医院门时，已近 7 点。南京的冬夜天冷且干，等了许久来了辆公交车，人多没挤上。出租车也辆辆满载，好久等来一部空出租车，我弯腰进车时，卸下行李，感觉累得已经快散架了。回到龙江，师母热饭热菜，简单烧了一个汤，总算可以安静地吃晚饭了。

晚上我一人睡在书房，书果然在电脑桌上。书橱里面几千本书按照人物、作者或事件各个专题有序地排列着，高老师居然能一一记得他们的位

置，真是不容易。书房空调坏了，很冷，我翻来覆去很晚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和老师在书房聊天的场景总是在眼前浮现。

2011年12月23日 星期五

一大早我就听到师母起来了，她急急匆匆开门下楼去买菜，回来后，除了给高老师准备饭菜汤水之外，还赶紧准备我、高欣和她三人的（午）晚饭。然后我们匆匆吃早饭，收拾好带给老师的东西就一起去医院。自从老师住院，师母差不多天天6点起来，晚上7点多甚至更晚才能到家，只有晚上回来后，才能安静地吃一顿饭，其他两餐就凑合了，所以准备的菜也是能反复热一下的鸡翅膀之类。到家之后，还要接听晚上来找高老师的电话，帮高老师去朋友处买便宜一点的必用药、准备明天的高老师的午饭等等，杂事可谓是一桩接一桩。

这次我一来，师母就特地买了桂花鸭，这在高家也是不错的菜了。高家人多年来，在吃饭上几乎没有什么讲究。而如果有学生（包括外国学生）来了，师母总会特地添个盐水鸭、烧鸡块之类的美味款待我们。

一到医院，高老师就问我三册《当代中国史研究》有没有找到，我确定地告诉他，找到了，昨天晚上还翻看了一会，但他说话很吃力。果然是昨晚和早上都发热，而且肚子很疼，脸色也不好，和我说完几句后，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想必是疼得说不出话，他这一天几乎都没有多说什么。

中午我去和历史系的老同学，还有同门付启元师兄一起吃饭。吃饭时候，师母给我来短信。说她中午就不离开医院了，要我回病房的时候带几个面包给她，凑合吃顿午饭就可以。饭后我和付师兄一起去买了新鲜面包和奶茶，去医院看高老师。高老师看到付师兄，稍微说了几句话，就让师兄早点离开了。我送师兄下楼，一出电梯门，他眼圈就红了，匆匆离去。

高老师接下来整个下午也几乎没有说话，护士来量体温：39度1，仍

然较高。5 点多的时候，高老师稍微好一点点，我知道他是忍了好久了，才轻声对在旁边的师母说，今天一天都疼，各处肌肉都疼。师母没有想到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发高热、肚子疼了，而是全身疼痛，很心疼他，建议他打止痛针。高老师不肯打，他真是耐力惊人！老师说："打了止痛针，性质就变了。"师母听了只有暗自叹气。我看看情况不是很好，就和高老师及师母说，我决定推迟一天，到周日晚上再走。高老师问我车票的事情，我说请袁建新网上订票即可，他才放心。

高老师的持续发烧让我揪心，我就去管床的张医生那里问情况，他给我看了高老师几天发烧的医疗记录，分析说高老师的发烧情况有整体下降的趋势，明天会好一点的。我赶紧过去和高老师汇报这个事情，告诉他体温最近一定能够降下来，人会舒服一点。我怕高老师不能起信心，又请张医生到病床边来和高老师再具体说一下情况。高欣下班后就过来陪父亲，所以高老师让师母和我早点回家。

我和师母刚刚到家没有多久，就接到电话。七时许，高老师吐血。我们匆匆赶去之后才知道，高老师晚餐时因为吃了一点点汇源果汁，引发胃部反应而吐血，去后发现高老师还是蛮镇定的，说医生已来看过了，已稳定下来了，他只是想清楚地知道为何出现这个情况。

吐血是老师病到此时，病情恶化的必然结果，但是现场我们还是把原因归到那个果汁上，因为有点凉，胃受了刺激才导致这个情况。另外我们又请张医生也和高老师解释一下，这次吐血的原因是果汁刺激了胃，而不是其他原因，张医生真好，完全同意。

高老师又让我们回去，留高欣继续陪他，晚上一直保持手机畅通，有事情及时联系就可以。出了病房，我对不甚放心的师母说，我们回去也好，这样也让老师安心和宽心，要让他觉得情况还是稳定的，没有什么特别严重。

2011 年 12 月 24 日 星期六 平安夜

师母昨天电话里面已经知道张鸣老师要来，希望能够早点去医院，所以早上起来后更加紧张。12 月南京的天气，阴冷入骨，而且常是阴霾一片，空气质量很差。我们站在龙江那个 91 路站台望眼欲穿。那个地方在草场门大桥下，两组高楼之间，正好是个大风口子，我冻得都麻木了。我想请师母打车，但南京的早晨一辆车也打不到，全是满的，这样的情况师母说天天如此，不论周末还是平时。

我知道老师家这几年连续看病，很多癌症用的特殊药品、中药滋补品都是无法报销的，经济负担很大，也谈不上买汽车。等车将近半个多小时，我可能被风吹得也麻木了，就稀里糊涂问了师母一句，怎么不买个电瓶车？话一出来，又觉得失言，师母也不会骑电瓶车，何况路途也不近，路上危险，每天充电，防止被偷等，也是一样麻烦。大概除了买书，时时注意节约开销，是老师家很多年来的常态。又过十分钟，误点的车终于来了，那样的等车真是让人只有无语。而师母这几年却时时如此，提着好几个怕汤水漏出来的饭菜盒、营养汤碗、中药罐等，晃晃荡荡去等车、挤车。

张鸣老师 9 时许到医院看望高华老师，带来许多水果和一大束漂亮的百合，两人聊得很开心。从香港中文大学的事情，聊到两个人的父亲，一个是“黑五类”家庭，一个是红色地下党的家庭；联系两位父亲的人生，谈到现在的中国状况。期间又聊了几个好玩的教授的趣事，高老师笑了好几次，他基本以听为主。张教授直至 11 时余才离开。我看的出来，聊天时高老师曾剧烈疼痛几次，但仅仅是皱眉，没有结束和张鸣老师的谈话。师母送张教授出门，张鸣在电梯口特地和师母说了一会话，安慰师母，要她多保重。

十五分钟后，我的同学袁建新来，送来平安莲一束！祝高老师平安夜平平安安！高老师微笑说谢谢，这个蓝色莲花真漂亮！

高老师从张鸣老师走后就开始便血，从中午到晚上连续六次，加上早上一次共七次，每次平均在 100ml 左右。不过确如张医生预测，不再发高烧，没有昨天那样的热度了。医生要求不能吃非流质的东西了，免得脆弱的食管受到损害，引发大出血。一个下午几乎都在便血之中，我只有助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边帮忙收拾，希望高老师能够从容面对。

我乘间隙念诵《金刚经》、《心经》各一遍，回向给高老师。他听了《金刚经》，颇觉有意思，还把我的经书拿过去，看看其中的文字。不过便血又来，不及细看。后来他看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小段，聊及对人生态度的看法。又看了"如如不动"一段，一起聊及历史学研究的方法，研究者的取向可以用"如如不动"的态度去实现，佛学和历史学两种学问自有相通之处吧。他又问我印度佛教的衰亡原因和南传、日本佛教与汉传的不同之处。

下午 5 时后，便血停了一会，我在高老师枕头边，轻声读圣严法师《智慧 100》中解《法句经》的一小则文字，经文曰：无乐小乐、小辩小慧，观求大者，乃获大安。我对高老师说，高老师一直是持大历史观，注意历史的延续性，从大处着眼看透历史，难怪内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静坚强的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谓"乃获大安"。高老师躺在那里笑了。

晚 7 点师母快回家之前，高老师从值班医生那里偶然知道自己的便血是柏油状时，就和师母聊起孙中山得肝癌去世之前的状况，孙抵北京后，在医院也是连续出血好几天，然后突然不出血了，孙的部下很高兴，其实是大崩溃的前兆，6 天之后，又大出血，然后逝世。师母只能问："你怎么读历史其他不看，却看这一段呢？"高老师大概是怕吓着师母，就说："我也不是特意看的，就是眼睛顺便扫到了。"

很是佩服高老师的镇定和超然，虽然便血不止，到晚上第六次的时候，还是和高欣、我开玩笑，又来了，又来了，还来势汹汹……呵呵！从容面对，高老师倒是精神很好，一边在床上便血，还一边就新播的《新亮剑》和高欣、我讨论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彭德怀、林彪、胡琏、邱清泉等历

史人物，后又谈到东北战役国军的失败，陈辞修的清廉和迂腐。

晚9点40分，他催我回，我又去找医生问问血浆的事情，400ml血液输入后，是否还要再添一点，答复是考虑心脏的承受力，今天就400ml。帮助高老师吃拉米夫定一粒后，我被其要求早点回家。又去问医生，药怎么吃，医生说明天最好打碎吃。出门时已经十点多。

（第二天早上去，医院护工老王和我说，我走了之后又便血了2次，我刚刚走之后的一次最厉害，二百多毫升。）

2011年12月25日 星期日 圣诞节

早上高老师又便血一次，血量也是有200ml。今天便血仅仅早上一次，后面有一次小的便血，直到我晚上6点多离开之前，就没有再出现大量便血的情况。

高老师今天精神很好，早上我们到医院时，他头发也整整齐齐，也许是便血之后，高热退掉了，腹水也少一点了，肚子也没有原来疼了，人反而精神。一大早师母的大姐夫、大姐（70多岁了），一起来看高华，我记得还是1997年时候见过一次师母的大姐，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一眼还是认出来了。他们和高老师聊些往事，也谈谈高老师那本书的独立之可贵，大姐夫说司马迁的书里面最后也有点说汉朝好话的内容，而《红太阳》没有，高老师听了浅浅一笑。早上阳光很好，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让人忘记是身在医院。

刚刚送走客人，香港熊老师来电话，高老师特地往上起来一点，半靠着枕头，竖起一点身体接电话，方便和熊老师聊天。聊了会这几天的病情，张鸣老师来医院之类的事情，我没有想到高老师会转而问熊老师：“圣诞去哪里玩了？”高老师这几天在病房总是问候你，关心他，不觉得他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让我感怀！

高老师的妹妹、妹夫来，送来一个漂亮的金发圣诞娃娃，挂在床头吊水的支架上，娃娃的眼睛极大，很可爱，高老师开心地笑了，他喜欢这个意外的圣诞礼物。

11时，刘握宇师兄短信来，问我高老师在哪里，我到医院门口去接他。是一个月之前我告诉他高老师的情况，他来电问我情况，声音哽咽，并取消了以前冬天不回国的惯例，圣诞一放假，就从爱荷华转机芝加哥飞回来了。我见到握宇之前，心里面不由一阵难过，每年他回来，我们总是约好，一起从扬州和无锡去看高老师，大家聊天吃饭，多少快乐时光，仿佛一家人，今年却是这样的情况。来宁三天我一滴泪也没有掉，此刻竟然夺眶而出。匆匆擦干泪，不让师兄知道。他见到我还是一贯的从容和镇定。刘是最得高老师真传的，连气质也像。这样也好，样子如平时，就不会给高老师突兀的感觉。师徒见面，倒是如每年回国一样的聊天，高老师还是关心刘师兄，问在美国找工作的事情，是否联系上常成等。

12时许，我和握宇下楼吃饭，然后一起回龙江熬米汤和桂圆汤给高老师。医生已经要求不能吃任何食物了，只允许喝稀一点的流质。我们二人均会煮饭，一起合作，一会就弄好了。期间章慕荣去看高老师，我在龙江给他电话指路。章原是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的研究生，以前每次高老师开夜课，他总是有办法溜出管理严格的学校，骑车来南大听课，慢慢和我们也成了朋友，毕业后还是不时去看看高老师。这是高老师另外的魅力，本校的政治、哲学、法律等系的学生，外校的理工文科、从学飞机制造到学服装设计的各色人物，都有来南大串堂听高华课的。

我们下午3时余回到医院，范骏博士来，他是高老师学生中最会笑谈中国社会种种底层现实状况的学生，虽然不是高老师自己的博士，但是对高服膺至深。此段时间几乎常常来，就是陪高老师说说话，让他住院舒服和开心一点。大家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天，高老师是点评者。下午的电视在播放朝鲜各界吊唁金正日的新闻，大家的话题自然就集中到朝鲜。高老师

说金日成喜欢去南京、扬州。谈及朝鲜的昨天，还说到七十年代，他在南京浦口买过一件尼龙衫，当时是很时髦的，那件衣服就是北朝鲜出口中国的。这样的历史解读，总是绘声绘色，角度独特。这就是典型的高式历史解读法，他总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我们常常忽略过的史料，在他却是好材料。

谈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师母还聊起高家的往事。回忆那年生高欣，南京下了几十年来没有的大雪。高老师也笑着回忆，在高欣小时候，他教高欣唱儿歌；新街口刚落成了金陵饭店，他骑 28 型号的大自行车特地带儿子去看饭店的喷泉等等。我听大家回忆着这些往事，场面虽温馨，但是总是有种隐隐心疼的预感。回忆的深处，是久久的依恋……

聊天到六时许，高华催我和握宇回去。师母一定要我带上点心在路上吃。我对师母说，我元旦期间会再来，让她安心一点。刘握宇也准备回扬州取点换洗衣服，隔天就来照顾高老师的。我已经订了晚 8 点回无锡的车票，只能依依惜别，高老师还是躺在床上向我们挥挥他的大手，提醒我们带好钱包钥匙等。在南京—无锡的火车上，我总是在想着这 18 年来那些往事，和高老师一起去买书、看电影、听讲座，历历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复。

2011 年 12 月 26 日 星期一

晚上一直在写昨天没有写完的日记，准备给关心高老师的熊老师邮去。快要结束时，23 点 28 分收到师母的短信："小周，高老师走了，今晚他十点一刻去天堂了！"

我马上给刘握宇转过去，师兄回我电话，师兄说，昨天精神蛮好的，也许是回光返照，他明天就再去南京。我们一边说我一边潸然泪下。

我很快挂断师兄的电话，说给师母致电一分钟，师母声音还是蛮镇定

的，对我说，今天一天还是蛮好的，刚刚十点多大口吐血，就过去了。她又说，我这里事情很多，回头再说。

学生祝高老师一路走好，在天堂永远幸福平安！来世还做我的老师！

哲人其萎，天妒英才！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

异化不了的学者

甘思德

我所认识的中国学者中，高华的英语能力可能是最差的。但他大概是我在中国碰到的学者之中，甚至我在世界任何地方接触过的学者中，最杰出的一位。尽管高华无法说出简单的英语短语，但他对西方和世界历史的知识与理解却令人惊叹。他毕生致力于对重大问题的实证研究，展示了彻底的人文主义精神，他的研究与精神超越了文化与国界。从柏林到波士顿，从希腊到悉尼，高华的崇拜者遍布各国。

我初次认识高华是在1991年9月的一天早上，当时我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学生，选修高华的现代中国思想史课程。在此之前，我曾经到中国学习过中文，后来又到台湾继续学习一年，然后开始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开始我的硕士课程。去南京之前，我已经在华盛顿校区完成了一年的政治学与经济学课程。到南京前的那个夏天，我结了婚，在台北呆了两个月，和新婚妻子Mary Beth在那学习中文并教授英语。到南京后，我和她分开了：我和室友住在中美中心，而她住在城市另一端的南京航空学院。

“中美中心”相当独特，是两国间第一个专注于中美两国研究课程的

合作项目。"中心"拥有当时中国唯一的开架式图书馆,中英文藏书少而精,学生可以自由阅读研究资料。

但严格地说,"中心"并非一个和谐、充满学术自由与文化理解的地方。它不过是中国社会大环境与复杂的中美关系的一部分而已(尽管有几位非美国籍的国际学生,整个"中心"强调中美关系研究)。中美室友往往成为朋友,但也偶尔会有强烈的分歧,而且存在大量的文化误解。中国学生们喜欢自己一起活动,在学校餐厅吃饭,而美国学生也更愿意一起到校外吃饭。

"中心"也被政治所涉及。中国学生必须定期参加政治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干部维持秩序。两年前,即 1989 年,"中心"的中国学生参与了政治行动,使得中心的领导非常不满意。另外我也确信中美两国的安全部门当时很关注中美中心。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走进了高华的世界。我曾经学过一些中国历史课程,但高华的课让我感到惊叹与兴奋。我们学习现代中国的各种思想辩论以及其历史背景。中国从晚清到二十世纪末经历了巨大动荡,其影响最为重大。在高华的课上,我们的讨论与辩论多过当年其他任何的课程。即便在 1990 年代,关于 1850 年代或 1920 年代的辩论,不仅对中国人意义重大,对我们寻求改良美国社会的美国人来说也依然重要。

二十多年后,我已经不记得所有的辩论与观点,但是那场 80 年代早期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辩论让我记忆犹新。高华布置我们阅读苏绍智探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苏认为,"早期的马克思"强调在资本主义下,人被"异化"成机器,而人必须从异化中解放出来。

毫不意外的,我们讨论的问题之一是:"异化"是否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是否也可能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作为一位学者和一个人,高华的理想是消除"异化"。他的作为超出了他应尽的责任。

课程本身仅仅是一个开始。高华不仅在规定的办公室接待时间与学生讨论,也邀请学生和朋友到他在上海路的狭小宿舍里做客。他的宿舍严重

的年久失修，厨房小得难以容下两人，卫生间让人不想多呆。陈旧的陋室中，狭小的书房却别有洞天。几个书架上满是书刊，一摞摞的《新华文摘》和《读书》杂志堆在门口。一个小录音机，用来听古典音乐。

每个月我差不多拜访高华一两次，有时他邀请，有时我不请自到。他一边抽着香烟，我们一边聊，内容从课程到海阔天空。如今我自己也是一名教授，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时间，我实在无法想象当年高华为那么多的学生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也许对他而言，学术不仅限于研究，更是传道解惑，建立学术社群。

我在“中心”最重要的经历是在高华指导下完成关于“新权威主义”的独立研究。“新权威主义”者认为中国要发展经济就需要权威主义，当时该思想日渐流行——这一思想至今仍大行其道。高华热心地介绍上海学者萧功秦给我认识。我的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次访谈就是对萧的访谈。必须承认，高华对我的报告并不满意。我在报告中加入了我对当时中国政治状况的感受，使用了一些严厉的言辞。高华说，重要的是态度要冷静、事实为重点、分析要准确。这样，读者会理解，也会尊重你的想法。

与其他许多学者不同，高华既是我的导师，也是我们全家的朋友。他邀请我和妻子到他家做客，故也认识了他的夫人刘韶洪和儿子高欣。他们对我和 Mary Beth 都相当友善。那不是出于礼貌，而是真诚地关心我们全家每一个人。我们离开南京前的最后一天，我们两家人一起吃“长寿面”，相约永远保持我们的友谊。

1992 年 6 月我离开了南京，但高华从来没有从我的世界中离开。此后的十九年时间中，我们通过信函、电话和见面保持联络。这十九年中有美好的时光，也有令人不安的日子。

1994–1995 年， 高华由约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邀请来美国访问一年。我原来期待这对他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虽然高华也访问了几位学者。不过提供给他的生活补贴少得可怜，而且邀请方也没有给他提供办公室。结果他也只去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几次。他住在华盛顿

最糟糕的一个街区的一个狭小昏暗的小公寓里，可能比他在国内的宿舍还要恶劣。有一次我开车送他回住处，发现军警在街头布防，警灯通明。基本上可以说军警与犯罪分子处在战争状态，他们必须出现在街头以维持秩序。这就是高华所亲身经历过的美国。更糟糕的是，高华的一个室友在送中餐外卖时遭遇事故，被公交车撞死。高华不得不负责后事，与中国大使馆联系，将室友的骨灰送回中国。

尽管这些经历很艰难，我相信他都有准备，因为他不仅熟读历史，而且他曾经历过毛时代和文革中最黑暗的岁月。所以他能积极地面对、忍受几乎任何考验。

高华坚韧不拔。在我 1991 年到南京前，他就已经开始对延安时期的研究。十年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终于出版。这是一部真正的巨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剖析中共党史上关键的一幕。当然，这本书并不能讨好官方，甚至他自己的大学。不过，这些人并不是他期望打动的读者。在此后的研究与写作中，高华继续保持着最高的学术水准。

作为最优秀的学者，高华赢得了巨大的尊重。作为一位学者与个人，高华的真挚堪称楷模，令人景仰 。

今日中国处处陷于“竞争”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竞争发展，中国人与其他中国人竞争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房子，更好的手机，更奢华的服装，与更美好的未来。竞争无所不在，以至于人们有时遗忘了最根本的一点 ：大家都是平等的、相互依存的人。

虽然高华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消除人类社会与学术圈的“异化”的理想将长存。我们所有曾经有幸认识高华的人都有责任让他的理想薪火相传，为了他，为了对他的纪念。

作者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肆 痛失高华

南京追思会发言节选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10 点，高华的追悼会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举行，高华的亲友家属、国内各地知识界人士、南京大学师生数百人为其送行。南京大学副校长杨忠教授、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朱庆葆教授出席了追悼仪式，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陈谦平教授致悼词。

下午，从各地赶来的高华生前好友及学生，自发组织了追思会。会上播放和宣读了冯兰瑞、傅高义、程巢父、周锡瑞、何清涟等海内外学人追思高华的文字。

参加追思会的有：

陈　佳	陈　磊	陈映芳	邓伍文	杜　兴	范　泓
胡　杰	黄　娜	江芬芬	姜击波	江荣生	蒋　瑞
景凯旋	孔令琴	李蓓蓓	梁晓燕	刘　擎	刘炎迅
罗　建	马颖南	秦　晖	邵　建	王吉陆	王珏磊
王晓渔	萧功秦	谢海涛	许纪霖	徐明明	严搏非
杨奎松	于明静	张　鸣	周　帅	周志兴	朱学勤

（按姓名音序排列）

朱学勤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华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杰出代表。这一代人有两件事无法回避，一是文革，二是改革，这是我们的生命底色。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写，后代人也可以写，但文革的历史，必须由我们自己来交这个答卷，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不能交白卷。

我们通过各种文本、各种方式，陆陆续续地交出了答卷，但在众多答卷中，我以为高华这一份是最为出色的之一。他深刻挖掘了文革得以形成的老根——中共党内生活之渊源。文革发生已经有四十多年，到现在还是一个聚集风云的话题。在历史上，它还会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命运一样，让多少代人持续不断地争论下去。但无论是后面有多少代人参与争论，它绕不过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者所交出的答卷，绕不过高华这个人。

1977 年恢复高考、研究生考试，我们这一代人进入历史系有很多人，但对于党史专业，基本上是回避或拒绝。高华毅然敲门，破门而入，最让我感佩，因为这需要勇气，需要担当。20 年前，在那个年代选择历史专业，进入这个大门以后，再去敲党史这第二扇门，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

今天的学术氛围没有根本变化，只是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多了，开始是人抢钱，现在是钱抢人，大学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其实是人民币淹没，能耐住寂寞不申请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谓课题的人几乎没有了。2002 年我与高华参加夏威夷国际会议，为节省经费，会议安排我们住暑期空出的夏威夷大学学生宿舍。我们俩人住同一房间，曾为此

感慨并预感学术氛围在表面繁荣的假象下更为崩坏，八十年代最后一年开始形成的“第二学术圈”将逐渐瓦解，被体制内“第一学术圈”分化吸收，我们的日子将更为艰难，只能相互打气，文雅的说法叫“共勉”。但高华坚持下来了，我们可以去查高华在南大的学术履历，在取得如此学术成就、获得海内外高度赞誉的同时，他是否申请过一个“国家课题”？高华留下的这一成就，对那些动辄以是否取得国家课题来量人度己者是一个有力回击。

高华用他一生的经历回答了我的困惑，第一，在最不可能出成果的地方，他出成果了；第二，还不是一般的成果，一个大大的成果，一鸣惊人！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他交了一份非常漂亮的答卷。我们今天在追悼会上看到，余英时先生也写了：“读过高华先生的书，很佩服。”

今天上午校方主祭时，回避提及高华的这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的学术成就，上下两代人，同时交口称赞。上面一代人，我以现在党内所谓“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方老先生为例。他最近写了《党史笔记》两本，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高华这本书。我与何方老先生有两次交谈，一次在上海交大，一次在北京他寓所，两次都谈到这本书。他曾对李慎之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坦率批评，慎公是有傲气的人，对同代人非常挑剔，但慎公曾对我说过，党史这一块，他重视何方的意见。而谈到高华这本书时，何方竖着大拇指，连声说好。让一个延安整风的过来人，而且是有高层阅历的过来人，来承认一个后代人完全靠资料——而且是公开的资料——写的延安整风，是一部信史，不容易。

我问过下一代人，我教过书或者有交往的晚辈，党史这么多书，你们看过哪些？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说看过《红太阳》。当然，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复印，不是看的香港原版。高华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版，传播发行都受到限制，但在中国大陆，上中下三代人，该看的还是都看到了，仅此一点，作为一个学者，高华就足以自慰，足以傲视体制内蝇营狗苟的众多伪学者。

这本书开辟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空间。说得低调一点，是一个

标志性事件，说得稍微满一点，在毛泽东研究、延安整风研究，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历史研究，这三块当中都具有里程碑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高华选择12月26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走了，他走而无憾，无论是这个人，还是这本书，都永存史卷。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高华走了，我们最难受的一点，是跟我同道并且从事同一工作的人，又少了一个。学历史的人很多，研究历史的大家也很多，但是真正从历史学的方法来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共史、比较系统地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人，却极少极少。到今天为止，可能也就只剩下四五个了，而且都五十多岁，后面的年轻人基本上还没有跟上来。多数还只是在做个案研究，或微观研究，或比较小的问题的研究。

我们真是很难寄希望于年轻人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研究。他们要谋生活，他们要求学位、求职称，要养家，每年必须要想办法发表几篇论文，而且还必须要在国内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必须申报和完成这样那样的课题，必须要在国内出版通过审查的专著。只有这样，他们在学术上才能得到认可，才能评职称，但这样他们也就首先必须要政治正确。

我们这些人走到今天，现在已经不求这些了，也不怕别人认不认可了，也不担心生存方面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做。但这并不等于我们真的能够改变什么。所以，

今天在这里纪念高华，我个人最希望的是我们还能有年轻人，来继承我们未完成和无法完成的工作。

严搏非

民营出版人

最近这两年，我们这一代走的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我们的时间不多，很快就要走向生命终点。

在中国近当代历史领域，尤其是在中共党史这一块，会出现像高华、奎松、志华这样出色的研究群体，出现这样几个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和高华认识也有二十来年，最早是在八十年代，高华到上海来。当时上海也还有一些朋友也在做党史研究，但真正一直往前走的，就这么几个人，就像刚才奎松讲的，“空前绝后”。但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是何等重要，它告诉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是怎么来的。如果不能够认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往前走？

记得是2008年，病中的高华在上海对我说，他想做一件事情，就是重新修订《红太阳》，大致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需要改动，他说已经准备了十几万字的材料，而且不仅是简单的修订，不仅是增加材料，还包括一部分叙述的改变。高华的生命，很可能象征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们可能被注定了要抱憾终身。但是一代人还是要做一代人的事，对于我们而言，时间紧迫，有想做的事，有想说的话，尽快去做。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跟高华认识，并不是从学术问题开始的。他于我不只是一位纯正的学者，更是一位温暖的兄长、亲切的友人。很难用言语转述他真切的品格与情怀，缅怀在香港中文大学共度的日子,点点滴滴让人感念,令人唏嘘。高华兄走了，心添一份寂寞，隐隐作痛，驱之不散。

那时候，我在中大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他则经常来访问。当时,我其实并不了解高华的学术成就有多重大，因为严格说来我跟他不是同行，我是做西方思想史的。但是一下子，我就被他的人格精神吸引。我这人其实跟人相处蛮挑剔，我对人很客气，但是要成为朋友很不容易，而我们在一起，吃饭也好，爬山也好，很融洽。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一起看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首映式，结束以后，我们和导演、景明一道讨论这个片子，我们俩没有商量过，却对这个片子有完全一致的看法。

高华先生读书很多，他跟我讨论的都是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有关的。他书中几乎看不到引用的影子，但他其实非常关注这方面。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在中国当代史学界这么重要的一个学者。他非常谦逊，非常诚恳，对知识没有任何做作。他是个有真性情和赤子之心的人。我是在认识高华好多年以后，才认真去读那本《红太阳》的。他那种见识和感悟，一方面是天才、才干，另一方面其实跟他读很多大家看不到的书有关系。

我觉得在人生中有高华这样一位兄长、朋友，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失去他，我感到很痛心。

景凯旋

南京大学教授

我和高华认识有 27 年了，当时他刚刚进入南大历史系，我也进入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我能和他走得近，可能就是价值观相同。我们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但都有一个情结，就是虽然文革过去了，越来越远了，但是好像永远都缠绕在我们心头。这是一笔账，也是一个金矿，要把它挖出来。那个时候，中国开始传进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谈，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东西，我们这代人对不起中国这段历史，也对不起中国十几亿人民。所以他一直做的研究，是令人感佩的。但我后来心里也有感叹，古人说“察见渊鱼者不祥”，他做这个工作，除了材料的问题，其实是研究一个非常黑暗的东西。他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去做这个东西，要面对的人格上的冲突和矛盾非常难。我自己就躲避了，读研究生的时候，读古代文学去了。而他却能够直面这段现实，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文革历史。他后来生这个病和这个还是有关系的，长期地研究这些东西，身心会交瘁，我自问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溃的。

高华为了他所钟爱的事业还是坚持做下去，这仿佛是他的使命，是飞蛾扑火般的命运，实际上他写出来的东西证明他超越了自我，超越了他本来的那种性格。所以他的书是可以称得上非常伟大的工作，就是捍卫记忆，寻求真相。而这恰恰是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括以后几代人应该继续做下去的工作。

现在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盛世”时代，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面对很多当下的事情。应该说，对年轻人来说，要不断地积累知识、开阔视野，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则应该把自己长期思考的东西赶快吐出来。

最近又在悼念哈维尔，他们那一代人当时提出，“现代最大的危机是意义的危机。”这是一个意义消失的时代，而知识分子则应当要坚守意义。他们那代人坚守了意义，而且看到了成功。所以我相信我们坚守意义，也会看到成功。我想几十年，几百年，哪怕就是在等待戈多吧，还是会等来的。

邵建
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我个人和高华的接触，并没有在座各位朋友多。但我很认同高华的价值取向，也很欣赏他的精神人格。尤其是高华的走，我很痛心，头脑里反复就是两句话：同道中人，同龄中人。萧功秦说高华是儒家文明和自由主义结合的典范，我听了真的很动容。

最后，我想对高华说几句话：高华兄，一路走好。前面是天堂，天堂里没有红太阳，天堂里也没有肝炎病。愿你在另一个世界安息并永生。你没有办完的事，我们接着做。如果我有幸看到中国宪政转型那一天，一定到你坟头上一柱香，告慰你。

王晓渔
同济大学副教授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我大概送给朋友十几本盗版或复印本，有段时间，见到朋友就会送一本。不好意思，侵犯了知识产权，但这本书的正版很难获得，只能如此。我觉得《红太阳》出来以后，“红太阳”就彻底陨落了，这本书彻底地澄清了毛的思维。从立场上对毛有批评，并不困难——对历史有些阅读之后，很快就会意识到毛的错误；但是从思维方面对毛进行比较彻底的反思，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在网上看到有人转述高华先生的一些观点——我个人

非常同意——他说，虽然大的“毛”没了，但是中国有无数个小“毛”。他还说，很多人读《红太阳》，但往往是两种人，一种是检讨和批判历史，另外一种，很多是政府官员，想从里面学习“红太阳”升起的经验。

这提醒我们，作为读者，不能一边反毛的行为，一边延续了毛的思维，不能用毛的逻辑来反毛。彻底了解那套组织方式，并且与毛的思维保持距离，这是我个人认为《红太阳》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不是反思的视角，而是要学习和继承毛的方式，说明没有读懂这本书。

对每个人而言，不仅是批判历史中的毛，还要不断反思，怎样驱逐内心中毛的种子。一个学者，怎么理解研究对象，同时又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特别困难。高华先生虽然一生研究毛，个人经历受到毛的影响，但是他在日常生活和学术讨论中非常温和、宽厚，彻底告别了毛式的思维方式，相比之下，我们很有可能在观点上是毛的批判者，但是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行为却是毛的继承者。这是我们与高华先生的距离。

杜兴

《看历史》编辑

作为读者，我从高华老师的著作中获益良多。作为《看历史》杂志的编辑，高华老师这两年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高华老师对“国家记忆2011 · 致敬历史记录者”这样一个民间论坛的支持，是促使我们做下去的非常大的动力。

我在这里讲两个片段。去年 12 月初，我来南京看他，当时他躺在病床上，笔记本电脑放在床边，因为很重，平时要用时都得压在腿上。当时我要发邮件，就拿出 iPad。他很好奇，说你这个电脑非常好，非常轻便。他拿过去，爱不释手，说等这次手术完之后也去买一个。所以我刚才看到许纪霖老师拿着 iPad，念熊景明老师传来的邮件的时候，特别难受。

第二个片段，大概是三周之前，有天晚上十点多，他很着急地打来电话。当时我很惊讶，因为他很少那么晚打电话。他说《南方人物周刊》做“中国魅力 50 人”评选，有学生告诉他，他是候选人。电话里，他说非常不安，除了著作之外，任何评选他都觉得没有必要。他不希望让人觉得高华是一个英雄，也不需要去感动中国。他当时非常着急，而且很严肃地告诉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去掉。后来我找到主编电话，主编承诺把他去掉，他才安心。

我之前对高华老师做过一些采访，很惭愧都没有写成稿子。因为我觉得把握不好，对于他以及他的著作都把握不好。但除了采访之外，感动我的都是一些很小的片段。

会议录音由财新记者谢海涛、实习记者周群根据发言整理，由本书编者节选

北京追思会发言节选

继南京追思会之后，2012 年 1 月 5 日下午，高华北京追思会在北京大学未名楼酒店未名厅举行。

参加追思会的有：

陈义欢　程仕才　崔卫平　江荣生　金　雁　刘　瑜
卢跃刚　尚红科　沈文璟　史小今　韦　雯　吴稼祥
武克钢　吴　思　王海光　王晓林　徐庆全　徐友渔
岳德明　章立凡　张　鸣　张小劲　周　濂　周志兴

（按姓名拼音排序）

金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我这两天做梦老是梦见高华，梦见他抽烟的姿势，梦见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路上，梦见他在学术研讨会上以详实的资料和缜密的逻辑驳倒对方，梦见他开怀大笑的样子……因为南京的高华追思会我没有去，有些心里话没有说出来，我就觉得高华在不断地跟我对话，不断地和我讨论问题，好像是在交代没有做完的事情一样。

我跟高华同岁，想到高华已经离我们而去，而我们还坐在这里，心情无比沉重。

我跟高华认识是200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当时他那本《红太阳》已经出版了，高华专门跑到中大出版社买了一本送给我。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一样。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对文革中产生的一些问题有共同的思考，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学术偏好。他是在了解中共“被俄化”的状况，我是在了解俄共影响中共以后，产生了一些什么变化，这些领域使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可以说在香港的时候，第一次跟高华认识以后，就觉得我们是有心灵感应的。后来还有一两次我们同时在香港，经常在大学服务中心走回到雅礼宾馆的路上谈起各种话题，既有对俄罗斯文学作品的认识，也有读“灰皮书”时的启蒙，以及对当下社会现状的看法，很多时候他说的正是我想说的话，我表达的意思还没说完，他就明白了。他对我所从事研究的理解，超过很多人，甚至在我跟秦晖辩论的时候，高华仍然能够理解我想要表达的意思。

讲这些，并不是仅仅想跟大家表白，我跟高华有什么样的交情，那是太肤浅的东西，我想高华一定不需要这样的“追思”。

高华从事的党史专业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在苏联模式的国家，那是一个只能“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的专业，是一个必须要“和党保持一致”的学术“包装站”，在那里“党中央是最高的裁判员”（葛罗米柯语）。“意识形态纪律不允许”让老百姓获得“知情权”，“潘多拉的盒子”是不能打开的，因为讲真实的党史会让人们看到丑恶的一面，会让人们发生质疑。苏联人就是这样干的，斯大林在谈到为什么要写《联共（布）党史》时说：“中央在出这本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这是一本统一的、有固定形式的、经过中央审定的、得到中央批准的教科书，是统一的教科书、是统一的指南，这是中央编的，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编的。”这样就定了调子，以后的党史书就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另一方面是“为了消除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产生的脱节现象”。斯大林说：“我认为马克思的某些原理与《联共（布）党史》相比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比如《共产党宣言》已经有些过时了，我们对恩格斯有些大不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类国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屏蔽真相，遮盖真相，歪曲真相，以记忆模糊叫人遗忘，以谎言代替真相。极权力量不会放过对真实历史的控制，尤其是不会放过对党史的控制。赫尔岑说，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另一半会随着时间的“半衰期”而流失，到了新的一代、再下一代人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或者说把小说家演绎的历史当成真正的历史。斯大林在贯彻他的话语权的时候，首先需要在史学界来一个“意识形态净化运动”，清除掉那些“以档案说话”的史学家，只有以“党性原则”、“党的意图”作为准绳，才能保证臆造出符合统治者口味的历史。斯大林自负地认为，天下都可以打下，左右历史、驾驭历史、改造历史和按照统一的口径教诲民众，是保证统治者合法性的关键步骤。这第一步是要下大力气改造史学队伍，把他们训练成“为尊者言”的史家。

在这样的“剪接历史”、“编造历史”的氛围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真

实缺位”。经过几番整肃和“史学改造”工作，党史学家都学会了在强权下趋利避害，千篇一律的重复和解释以《联共（布）党史》体系为指导的《苏共党史》，比如以“十月革命”为题材的著作以数十万计，但剧变以后一部都不能用了，这倒不是意识形态障碍，主要是在史实上歪曲得太厉害。国际史学界认为苏联对这俄国革命的描述，“缺乏逻辑、太贫乏无力和残缺不全了”，可信性丧失得一干二净。苏联党史专家都知道，谁在政治上失势，谁就在史书中被除名或成为反面教员。“党史”是为了从党内斗争删除一个个参与者的“非难过去政治”的历史。其实，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其他人只不过是他的“弥缝者”和“脚注者”。一位历史学家说，在《联共（布）党史》说教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档案解密后的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梦幻中苏醒过来”。人们提出：苏联历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过去我们是生活在真实的历史里还是生活在被欺骗当中？

当时《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党性与客观性是一致的，要求史学家必须改变不分青红皂白刨根问底地穷追“真实性”的传统，而对史学家来说“意识形态纪律”就是最高原则，“和党保持一致”与追求“客观性”是不矛盾的。个别历史学家竟然对党的历史说三道四，这是令人发指的“缺乏意识形态纪律的行为”。八十年代末剧变前夕在苏联最热门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历史，据说在一百五十多项重大历史研究中有突破性的发现，当时在人群中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这就是真相，就是真实的历史。一时间“历史热”弥漫民间，填补“空白点”和“写真实的历史”成了推倒苏东剧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所以我们从底线

后退一步离真相就会远一点，我想这是我们悼念高华的意义所在。

另外，东欧持不同政见运动中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当有人先“走”一步的时候，大家都要提到“接力棒”的传递，提到“生者与死者之间是有契约的”。在七十年代的苏联东欧政治高压的时候，很多人被捕，很多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很多人提前离世，所以大家都牢记这样一句话：“活着的人永远受那些死者的委托，欠死者一笔债务，委托和债务是生者和死者之间的一份道义契约。”生者作为幸存者，有责任承担起死者给人们留下的巨大的精神债务。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离开我们的人。我认为，每一个祭奠高华的人都有义务签下这份生死契约。大家知道，萨哈罗夫是物理学家，可是他说，物理这个行当，我不做自然会有人去做，在苏联航天工业和军工业这么发达的国家，肯定还会涌现出很多人从事这个职业。而如果他不站出来大声说话，恐怕就无人替代了，他最主要的职业不是物理学家而是与全世界大声对话。索尔仁尼琴也说过，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我坚守的最起码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假如我们连不参与撒谎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们就真的一钱不值了，我们这个民族就无药可救了。

我觉得我跟高华之间有一份生死契约。他没有做完的那一份，我们剩下的人要接着做，要以更大投入去做。高华的离开对我的触动很大，本来我性格一直很散淡，自己的研究做得懒懒散散的，属于一种“无聊才读书”的“敲边鼓”型。但是意识到与高华有这样一份契约后，我就患上了时间恐惧症，我害怕等到见到高华的时候，无法和他交代，难道我能对他说，由于我的懒惰我没有能够完成本该履行的契约?

2011 年 11 月我和吴思等人去德国，德国人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国家机器是没有灵魂的，只会执行命令，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只会根据指令转动，这一点在共产专制国家体现得最为突出，所以要打破这种局面，必须要建立起个人责任的社会。刚去世的东德著名的作家沃尔夫，文章中到处都可以见到个人挣扎，“我到底是谁？”“是什么不能让我成为自己？”“是

做螺丝钉还是做自己？”她1959–1962年在“为了我们国家”的口号宣传下成为斯塔西的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负责向国安报告同行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不利于政府”的动向。斯塔西有十分之一的线人，18.9万人，185公里的卷宗，销毁剩下的被撕碎的档案多达1.55万包。我们努力就是让我的档案只属于我自己，我不再成为斯塔西卷宗里的控制工具。2010年6月沃尔夫出版了新书《天使之城：弗洛伊德博士的外套》，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回溯这段风波，把这段潜藏的记忆裸露，告诉人们这段耻辱的历史是怎样吞噬灵魂的。

国家机器企图利用个人的恐惧心理和自我保护的弱点，把社会划分成整人和挨整的人，划分成告密者的线人和被监视者，划分成一个个装在档案卷宗里的东西。德国知识分子反思说，人类文明是一条羊肠小道，旁边充满了沼泽、陷阱和歧路，稍不留神就会走到岔道上去，所以我们要不断地警示自己从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走出来。糊里糊涂地向前看，最大的问题是会重犯过去的错误。只有在过去的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对一些重要问题表态，才能预设对未来的规划，这种民族警觉是非常可贵、有价值的历史审视，它本身就暗示了该怎么办的答案。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丑恶的部分。那么像高华这样把历史的真实面告诉大家，就是让我们警惕不要重复这些丑恶。我觉得高华的意义，以及追思高华的意义，就在这里。

我想我们在这里说的话，高华的在天之灵一定能听见，他会关注我们，看着我们如何完成这份“契约”。这样，等我也到了“那边”见到高华的时候，我还会接着和他讨论我们没有谈完的话题。

江荣生

北京荣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华生前多次跟我讲过没有课题经费的问题。我们能不能以高华的名义成立一个基金会，来支持一些人来做这个研究？在南京追思会，就有人提议这个事，当天杨奎松在会上讲得泣不成声，说我们现在后继无人。我的理解是，高华和杨奎松做的这个事情，某种意义上叫作“挖祖坟”，也有朋友叫“射日”，是要恢复历史真相，官方很不喜欢，所以在很多方面就打压。我希望克钢兄来领头，我们大家支持，把这件事做起来！如果大陆不行，我们在香港注册，成立一个基金会，每个企业拿点钱，这个事情就做起来了。

《红太阳》这本书为什么由高华写出来？我的看法：第一，高华在史学上有天才。他对中共党史，可以说犄角旮旯的事情都很了解，这让我特别惊讶，因为那是非常海量的信息。过去没有互联网，但我有时候问他一个小问题，某某地下党里一个人，比如上海市比较中间层的一个人，他都知道，前前后后都能讲出来。他去世，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损失。我一直讲，高华是我们国家的财富，他是一本活的词典，中共党史的词典，很多人不知道的他都知道，像个历史侦探似的。

第二点，虽然他很谨慎，但他对这种集权体制其实是充满仇恨的，所以要把这个体制里一些最根本的东西，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尤其是毛泽东，给解构掉。他是八·一九苏联政变那天下决心写这个东西，写作的时间很长，将近十年才出版。他的准备是很充分的。他对做这样一件事情的风险非常清楚，因为他对集权体制知之甚深。他是把这个集权体制给人格化了，对这个集权体制所有的神经他都非常了解。他为了保护自己，在各方面都非常小心。据我所知，好多媒体评他为公共知识分子，他都拒绝。包括《南方人物周刊》他都打电话，一定要把他从名单里面去掉。他非常小心，要把自己区隔开来，也是为了能继续从事这个研究。所以，在写作方面，他下手是比较到位的，力度也够。

刘瑜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我就发一发 70 后的声音吧。我其实只见过高华老师一次，是在去年冬天的时候，从林达老师那里听说，高华老师重病，我觉得我必须去看一下他。然后就和尚红科、许知远,还有当时《新京报》的一个记者刘晋锋,一起去看望。纯粹是一个读者，想去看一个作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读者对于一个给予自己很多恩惠的人的答谢。

我之所以决定去看他，也是因为在智识上，我受惠特别多。我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博士，2003 年左右，决定博士论文写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并不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更多地从政治分析的角度。当时,我完全是一头雾水,因为史料太多了，而我对于很多问题还不是太了解。当时有两本书让我获益最大，一是国外的学者 Robert Lifton，写了一本书《思想改造和全权主义心理:中国的洗脑研究》;还有一本书，就是《红太阳》。

很多老师也都说过了他的道德勇气，我觉得道德勇气当然是非常可贵的，但我也特别同意，高华老师除了道德勇气之外，还有作为专业学者的严谨。很多人讲到他有特别好的直觉和第三感，但我觉得，所谓直觉和第三感，本质上还是来源于他在历史资料方面掌握得极其深厚。就是因为你对史料已经烂熟于胸，看到两个看似无关的，比如回忆录里的细节，才能够把它们勾联出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特别同意,高华老师是一个国宝级的史学家,因为在今天中国的学者里面，能够兼具道德勇气、专业上的严谨、极好的记忆力和知识积累、洞察力的学者，实在

是太少了，是很难复制的。哪怕我们有一天，有各种历史研究的基金，砸到这个方向去，也很难“打造”出这样一个百年难遇的学者。

在这一点上，对于我们更年轻的学者来说，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习。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将来自己做学问的时候，能够像高华老师那样，深入到矿井的最深处去，不但要有勇气跳进矿井，而且要有技术把油田给开发出来。我也希望将来，能够沿着高华老师的这条路，再往下走一点吧。

吴思

《炎黄春秋》总编辑

无论官方或大学怎么评价高华，即使冷落、边缘化他，仍然有一个共同体，不管是学术共同体还是价值共同体，对高华有一个相当独立的判断，对评判价值有一种共同看法。而且这种看法，既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根底，也是和历史形成的主流价值观接轨的。这样的判断、赞扬或者批评，构成了一个选择中心。我们知道，不管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都在环境中生存，都要适应环境，在环境中优胜劣汰，环境就是选择中心。这种环境形成的取向和筛选，对物种的发展方向，对人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影响。

现在，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小环境：无论是在追思会上，还是网络上，还是日常交流上，在这样的环境里，有的人获得了大家衷心的称赞和肯定；有的人可能有很高的学术称号，但大家却不以为然，不把他当回事，去世了无声无息，像泡沫破灭了一样；还有人可能并没什么官方荣誉，他的去世却能引起那么大的震动。我看到，最近悼念高华，有一个形容叫“备极哀荣”，这些都是社会自主环境的诞生。这个环境的诞生，形成了一种影响取向的价值标准，具有优胜劣汰作用的标准。在中国这个官方独大的格局中，形成了一种新的选择取向和激励机制。有了这个环境空间，中国的文化发展就有了新的更加多元的取向。刚才说到天黑天亮，怀疑中国是不

是隔绝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就冲着这种环境，这种取向，这种共识和共同体的存在，中国就是一个大有希望的社会。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悼念高华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这种含义。

大概在一两个月前，我和卫平在何方老先生家，谈到何方老先生的《从延安一路走来》和《党史笔记》。谈话间，就议论到高华。一说到延安的研究，总是避免不了谈到他。高华是我们这代人中研究延安、研究延安整风的顶尖高手。和何方老先生比较起来，何老的优势和长处在于，写延安整风时有血有肉，他是亲身经历的，而且是主动投身延安，一直跟着走了很久。于是，在何老先生的书里面，我能特别清楚地看到，除了《红太阳》描述的权力运作的那一面，还有事业的感召力的那一面。毛泽东究竟在什么地方，吸引了一批当时的精英人物？我当时的感慨就是，写这种东西吧,这个人得“左”过。我就“左”过,何方老师更“左”过。其实“左”过的人写“左”的事,就容易写透,一回身，很多微妙的感觉都能把握好。

高华没“左”过。高华一直是一个异己分子的状态，可能处在受打压的一个家庭，知识分子、右派，处境是不利的。我能体会到，他即使想“左”也“左”不进去，进不了那个圈。我就想，要是高华能把这个延安写透，其实对他的要求就更高。需要在学术上，在体谅上，在推理上，在同情的理解方面，有更多的投入。如果是一直挨整的话，很容易有一种带着敌意的投入，这样一来对他的要求更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高华写好这么一本书，对他的才干，对他的胸怀，要求得更高。高华基本做到了，这也是让人敬佩的。这也让我对写左的人要“左”过的看法发生了一

些改变：冷峻理性的审视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高华与何方先生的不同之处，不同角度，又恰好可以构成互补关系。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同一个运动，可以构成更完整的画面。

除了这本书之外，高华很多文章，更有精彩之处，一篇一篇透彻见底，让人看了以后觉得心服口服，比读《红太阳》还强烈。比如前几天，我读到他谈林彪的文章，感觉特别好。顺着历史娓娓道来，几句话点破要害，而且梳理得清清楚楚，真有炉火纯青的感觉。

徐友渔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记得二十年前，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想做关于毛泽东的选题，把我们一些人从全国各地请到上海，商量策划这个选题，我就在那次会上认识了高华。

几天下来，令我对高华颇有好感，他不为生活小事计较，与人相处宽容大度。讨论时，高华全然成了会议的中心。几乎谈任何一个问题，涉及最重要的观点和材料时，大家都只有听高华发言的份。当时参会的，上海方面有朱学勤、许纪霖、萧功秦，还有从福建赶来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汪澍白老先生，都是大名人。我们开了两三天，谈毛泽东，谈中国革命史，谈中国近代史，最有意思的话都是高华说的。朱学勤每次开会都要说一次——大概说了三五次："有高华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发言了。"某位很霸道的人，在高华面前也没有话语霸权，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高华接触，感到他做历史不仅是学问好，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境界和底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纯粹的学者，同时，他对中国命运有一种整体关怀。我不是说，他把研究历史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我一点也不是这个意思。他由于自己从童年起的经历、遭遇，把自己的命运和祖

国的命运，和全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和其他只是学问做得好的历史学者，是不一样的。

高华还特别关心现实。对于今日中国处在什么阶段，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如何，中国知识界中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高华对这些分歧和争论很熟悉、很关注。他对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说法非常反对。我现在手上就有一篇高华发表在《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性’”，这篇文章我非常欣赏（当然我首先喜欢《红太阳》）。汪晖等新左派，尤其是崔之元，一贯说，毛泽东那套实践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的人轻易地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宝贵遗产，他们要去打捞鞍钢宪法、大跃进、学大寨这套东西里的“有价值”的因素。在对这种论调进行驳斥时，高华发出了致命一击。他点名批评崔之元，说他们那套后现代的、左的东西，否认了中国的民主宪政的追求，他们的观点建筑在一个虚构的历史神话上。针对崔之元鼓吹毛泽东提倡的所谓体现经济民主的“鞍钢宪法”，他把毛泽东的“鞍钢宪法”及其“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到底是怎么来的，最后的惨败后果是什么，写得清清楚楚。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平稳，材料扎实。他最后总结说，崔之元等“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象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这篇文章出来后，我观察到，新左派对毛泽东的很多说辞不敢说了。在这之前，甘阳、崔之元等说得非常多。在这方面，高华做学问，谈问题，不仅关注具体的现实，而且背后是对中国当代命运的关注。

高华最大的优点，是在解释历史时，受到现有意识形态污染最少。他几乎没有受到污染，他的很多解释并不是

非常复杂的、高深的。首先，他不用什么历史哲学的理论来解释历史现象，他做历史从来不引证比如克罗齐是怎么说的，汤因比、科林伍德是怎样讲的。有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以为说得越深就越高明。他的立论基于事实和常识。

如果做个比较，把高华和某些同时做中国现代史、也掌握发掘了大量新史料的学者做比较，他们在解释毛泽东的政策、解释现代中国历史重大问题上，真有差别。高华更纯粹一些。我感到，中国有些思想上最勇敢最深刻的人，其实还没有完全摆脱所受教育中意识形态灌输的影响，也怪不了他们，从幼儿园、小学起，听的、看的全是这些，中国人其实很容易生活在一种意识形态中。

我很少能够看到，有人像高华那样晶莹剔透，完全没有受意识形态污染。也许，有人比高华更有才华，对历史解释更有洞见，但是我觉得，高华没受任何意识形态污染，忠实于事实，他写的东西最真实、最可靠，这一点就够了，足够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

章立凡

近代史学者

我们身边有很多杰出的人，甚至伟大的人，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特质，只把他当一位朋友；只有在他走后，才突然发现他的杰出和伟大之处。谈谈我理解中的高华：史景迁先生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历史侦探学”；我觉得高华治学其实有这种特质。他很会做拼图，可以对很多日常公开的资讯进行综合解析，看到它们背后的秘密，这是一种特殊的治学方法。有人说，英国人特别适合做间谍，因为英国教育注重培养历史、文化的素质，高级情报人员不一定要像 007 那样行动，他们在利用公开资讯和档案综合分析上占据优势。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们搜集各种报纸

和公开发行物，用一把剪刀、一瓶浆糊，就能把资讯组合成拼图，解析出背后的真相。进入互联网时代，资讯呈几何级数式爆炸，也成为一个问题，要从海量的资讯中去筛选真相。

我读高华的书有这样的体会，他在资料资讯把握上非常到位。例如,很多人留下了回忆录,其中有的内容不可信,使大家对回忆录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觉得肯定只讲好的，不讲对自己不利的。但是高华可以从各个角度综合分析各种回忆录，找出真相的公约数来，这是他治学的高明之处。刚才有朋友说他是党史研究的开先河者，在这个最缺乏真相的领域，我也很认同高华的治学特色。

高华是能耐得住寂寞的人。过去在我所在的近代史所有一句所训，即老所长范文澜先生的“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已经没有这样的学人了。回忆我自己刚进研究所的时候，还能勤勤恳恳抄卡片；有了电脑之后，情况起了变化，有了互联网之后变化更大了。上世纪末我与郑也夫聊天，展望二十一世纪，我说未来的治学模式将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有了电脑、互联网等便捷的科技手段之后，组合一篇论文将变得何等容易。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粗制滥造的学术成果比比皆是，而像高华这样严谨地利用资料，用独特的方法进行分析、比较、归纳、演绎，最后得出无法推翻的结论。这样做学问的学人几乎已不可复制，这是令人非常痛惜的。以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今后很难再复制出一个高华了。现实体制不允许你再变成高华这样的人，这正是最大的痛苦。

过去很少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死。高华走后，留给我的思考非常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做不完了，想做的课题可

能没有时间了，只剩下愿望了。

这也给我们以惕厉：想做的事，想说的话，得赶紧说，赶紧做。如果来不及做，是不是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有哪些需要协作，把该做的工作赶紧做了。

张小劲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我和高华的交往，大约是在1996年或1997年。起因是高华的一篇来稿，讲延安整风的。发表之后大家都很感慨，说没想到在自由来稿当中有这么好的稿子。后来我借去南大历史系的机会去找高华。那时南大好多人不认识他，几经周折，终于在一天晚上把高华找来了，我们谈了两个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华用历史零散的片段，还原出一个整体上的框架，研究如何从历史的事态事件，逐步演化成为固定依赖，变成制度化的东西沉淀下来。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政治学上形成的一个话题。在某种意义上，我后来仿造、学习了他的技法，写出了一篇关于中共的历史体制的文章，也是用公开资料，试图还原中共历史上形成的一直延续至今的一些非常本质的东西。

后来和高华交往不多，大概一年一两次。但是他的文章都读到，也非常感慨，有时候会模仿做一做。去年2月我们去延安做一个党史的实地调查，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年毛在枣园的那个住处，实际上是见客的住处，他真正的住处还在另外一个更加隐秘的地方，一般人不知道，党史上是不见正史记载的。所以说，我们又回到中共野史上，我们过去从中共野史推到正史，经过不同的路径进入学术史，所以我们想从正史、野史、学术史三条路径走。野史主要是谈资，大家以一种谈资的需求来做，但是我觉得从学术史上来做是高华开创出来的。我也在这条路上稍微地走了走，

尽管走得很差。

我们政治学这个行当，与政治史是不可分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华是一个开创者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我把他看作中共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一个标杆式的人物。应该说，在他之后，这样的文章开始多一些了，特别是在善用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上。这些回忆录本身可能确实有些偏颇夸张扭曲，但怎样用一个史家的辨析方法把它联系起来，我觉得高华是一个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他人走了，但他做的事情留在这里，他的路子已经走出来，也放在这里。所以从长久来看，他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现，以至于我们将来回头看的时候，可能会给他一个更恰当的评价。

会议录音由财新记者谢海涛、刘芳、实习记者周群整理，由本书编者节选

悼词

陈方正等学者联名

高华教授久病辞世，噩耗传来，本港、大陆、台湾及海外学界同仁闻讯，莫不同感伤悼。高教授治学勤奋严谨、有魄力，为人热诚乐观、意志坚强、是非分明，他在行将成大学问、步入黄金收获季节之际溘然长逝，这是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巨大损失，也为相知朋侪带来无限悲怆和长久遗憾。

高教授在家国动荡中长大，自学成材，文革结束后考入南京大学攻读史学，其后留校在历史系任教多年，1995年－1996年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访问，发表多篇论文，是他与海外学界交往之始。自1998年以还，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并应邀到该校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问；2000年将巨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交由中大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制作，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是高教授受个人痛苦经历刺激，以及思考国家巨变有所感触的发愤之作，酝酿二十载，辛勤七个寒暑而成，构思宏大，论证綦详，笔触绵密周至，

寄意深远，出版后迅即引起各方注意，一时洛阳纸贵，广为传诵，由是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地位，也开拓了他在海内外进一步发挥才华的空间。讵料天妒英才，四年半前他罹患肝癌绝症，虽然以乐观精神和不屈不挠气魄与病魔顽强抗争，日前终告不治，识与不识，莫不痛惜。

至此，我们不免记起孔子的感喟“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但高华所为我们留下的，却不仅仅是痛惜和感喟，而更有他的发愤，他对生命的热爱，他在绝境中的乐观和顽强精神，以及他从勤奋深思得来的历史真实。他走了，但这一切都将长久留存，我们将为此深深感谢他，永远惦念他。

陈方正　陈永发　甘　琦　冯　客 (Frank Dikotter)
顾　昕　关信基　金观涛　李伯重　李连江
李　杨　李中清　梁其姿　林　达　刘青峰
龙应台　钱　钢　钱永祥　苏基朗　吴逢时
熊景明　许倬云　余英时　周保松

李连江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26日下午，熊景明老师转达了高华的问候。她特意说，这一次，高华在电话里一一点出了朋友的名字。晚上，我给熊老师写了个邮件：“听你转达高华对我的问候，我非常不安。……几次探视，让我对看望生命末期的亲友极为畏惧。上周我去了一次杭州，网上订票后才知道高华病危。不好

意思改订机票，因为会给邀请者制造麻烦。看来，这次只能是留下深深的遗憾了。”

第二天上午 11 点半，在办公室打开电子邮件，有熊老师刚发来的邮件：高华去世了。

记忆中的高华，整齐的白发，永远的笑容。除了曾经不嫌麻烦地走出中大校门抽烟，高华的举止言行没有一点让我觉得他洞悉延安整风运动最隐秘的真实。善良宽厚的人，往往少有机心，如鲁迅先生笔下的柔石：“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高华的温良恭俭让，却与大史学家的严谨和智慧并存。一双看穿阴谋阳谋的慧眼，时刻关注的是芸芸众生无穷无尽的苦难。透过车窗，他能留意到可能危及朋友安全的微小细节。这真是个谜。

高华走了，留下无边遗憾。刚过知天命之年，就不得不中断国史研究。他的独特历史感，他对人性善恶的把握，本已远远超出文字的载力，而他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条件笔谈口述。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正需要高华这样的圣手，梳理数千年病史，剖析躁郁虚浮的脉理，为根除折磨亿万生民的沉痼寻找妥善的药方。然而，他走了。

高华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不会放弃未竟的事业，他的弟子们会传承他的道、他的德、他的智慧、他的慈悲。

高华吾兄，一路走好。

严搏非
民营出版人

2011 年 12 月 19 日，哈维尔去世。

当天，重读“萨米亚特”版的《哈维尔文集》时，用红笔在“无权者

的权利”第十一节中划下了如下一段话：“我们能不能认真地讨论一下对制度是革新呢还是改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这是一个伪问题。许多痛苦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论是革新还是改革，本身都不能保障什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无论根据何种信条，它看起来是被‘革新’还是被‘改革’，对我们来说差别不大。我们所关心的，在于是否在这种社会里尊严地生活。”

一周以后，12 月 26 日夜，高华去世了。

高华的葬礼安排在 12 月 30 日上午，离这多事之年的终点只剩一天。29 日下午，我和刘擎、纪霖、小孔、陈映芳、王晓渔还有几位上海的朋友乘高铁往南京，到南京已是晚上。先去高华家拜祭，遇萧功秦，后又遇周志兴。高华家中放满了花圈花篮，很多学生在帮着张罗。高华的夫人小刘看上去还算平静，儿子虽神情忧戚却也显出沉稳。我们在高华那狭窄的书房里坐了一会儿，书桌上还放着几本高华三个月前在家中读的书。当晚，有一些南大官方的消息传过来，一说是第二天追悼会上，所有的祭文都要经过审查，二是说不允许学生参加。我们住在南大的招待所，当晚，梁晓燕、秦晖分别赶到，第二天一早，在食堂又遇见了杨奎松夫妇和韩钢，他们是昨晚从上海赶来的。

初冬的南京万木萧疏，清冷的空气中夹杂着一点煤烟味。1966 年文革初起时，当时我串联的第一站就是南京，也在清晨的空气中闻到过这股煤烟味，不意竟留到今天。葬礼在上午九点开始，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广场上已经站满了给高华送行的人们，常常会见到一些熟悉的脸孔，但名字却想不起来了。南大还是来了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一脸沉静地等候在广场上，看来校方的禁令对学生没起

作用。还有一些与高华不相识的人闻讯而来，他们就是想对高华表示敬意，感谢他那出色的、近乎于无畏的工作。灵堂里挂满了挽联，除了花圈花篮上挂着的，在墙上还贴了很多用大张的毛边纸写成的挽联。

深色的人群开始慢慢移动，默默地，有股令人震撼的无声的力量。人太多，大部分人只能留在灵堂外，等待着人群的缓慢移动。葬礼进行得很快，南大来了位副校长，悼词里基本上是标准的话语，但和真实的高华没什么关系。向高华告别的时候听到里面有些骚动，后来知道，是张鸣喊了一声："高华，天会亮的！"

这一声喊注解了前面所引哈维尔的那句话："我们所关心的，在于是否在这种社会里尊严地生活。"尊严的独立的存在，这是后极权时代知识分子唯一道德的存在方式。高华去世，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突然显示出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的尊严。几周以后，一位看了关于纪念高华去世报道的朋友说：这场对高华的纪念，是三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表达他们的集体尊严，而这一表达尊严的仪式，在张鸣喊出"天会亮的"时候完成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形，至少在那个时刻，人们由衷地自觉地站在了权力者的对面，宣称了自己作为公民的尊严。

当天下午有三场追思会，我参加的一场是由《看历史》杂志组织的，南京的邵建是实际的安排者。先放了一段胡杰为高华拍的纪录片，胡杰是民间著名的独立制片人，前几年拍过一部关于林昭的片子，以"萨米亚特"的方式在知识界中流传。接着，几乎每一个参加者都说了话，无论他或她与高华是否相识。这些发言带着发言者的个人经验，各自的意思都不一样，但都无一例外地以尊严的方式表达着对一位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敬意。追思会上充盈着的，是一种哈维尔式的自下而上的道德力量。

2011 年年尾，后极权下的一切，"突然成为可耻的、不合法的和不可忍受的"了。自觉的道德意识开始成长，这种道德是在极权下面对真相的勇气，是每一个个人在权力者之前的尊严的存在，是在普遍长期的冷漠以后，突如其来地对"厌倦"本身的厌倦。哈维尔对后极权时代的分析，对

我们今天的状况是完全有效的。一方面，尽管意识形态瓦解但极权的组织和控制依然存在，甚至更强，另一方面，革命乌托邦的解体则导致了普遍和弥散性的道德崩溃，这种从上至下的道德崩溃亦包含了整个知识阶层。而哈维尔的方案就是每一个个人无视于极权的荒谬而坚持独立尊严的公共生活。也就是说，在政治体瓦解之前绕过政治体直接地先重建公民社会。

高华的个性是谨言慎行的，但他的认知却是无畏的。而高华之死，则成为懦弱的中国知识界突然地表达集体尊严的宣言。我相信，它将成为2011年最重要的一个政治预言。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祭高华

风起钟山，哲人其萎，凛凛雪雨，草木凋零。今我来兮，斯人已去。哭君壮岁，英年早逝，经纶满腹，更与何诉？哀君事业，中道崩殂，历史真相，何由得明？怜君家人，孤孀弱子，大树摧矣，何枝可依？伤君门生，痛失良师，庭训堂听，寂寂无声。忆君，惜君；念君，哀君；思君，痛君；哀哉高华！惜哉高华！痛哉高华！伤哉高华！高华之后，更无高华！君去之后，国有难事，谁与相析？我有佳文，谁其击节？重九登高，使君不在，遍插茱萸，更少一人。雪夜围炉，君其逝矣，促膝晤谈，永稀哲音。君逝之日，天黑如墨，鬼蜮成阵，遍地狼犬，深巷警笛，文网

深密，靡有孑遗。无良当道，阿谀成风。良士遭难，佞人乘龙。斯世斯景，君去天堂，我留人境，忍待天明。

天丧英杰兮，上苍不公。朋辈成鬼兮，怒向刀丛。欲聆君教兮，天人永隔。斯人其逝兮，再无知音。长歌当哭兮，泣不成声。天地惨然兮，共我一哭。哭天，哭地，哭南大，哭我良朋。谨以馨香一束，香草几枝，鲜花数瓣，献于君前。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爱德华 · 弗里德曼 Edward Friedman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I loved Gao Hua. I sent a message to the family. The son replied.

One of Gao Hua's students from ECNU is with me this year. Gao Hua told me to take the student. So I did. I was happy to do whatever Gao Hua told me to do. I trusted him totally. I greatly looked forward to my annual visit with him for three hours of chatting and, for me, learning. I felt fortunate that he was willing to give me the time. His knowledge, his research skills, his analytical acumen, his humanity, his empathy, his insights — a treasure. A loss. I lack the words to express how deeply I feel about a person of such integrity in a regime system with so little integrity.

我深爱高华，惊悉他去世的消息，我写信向他的家人表达了悼念。

我完全信任高华，乐意听从他的意见。高华曾推荐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来美交流，我就欢迎他来威斯康星大学。我原本期待像以往每年一样去拜访高华，每次三小时的畅谈对我来说都是学习，对此我深感幸运。高华如同珍宝：他的学识、洞见、分析与研究能力，还有他的悲天悯人的

善与爱。他的逝世乃一大损失。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对高华的感情：在一个几无品格可言的体制下的一位高洁的人。

华安澜 Alan M. Wachman
塔夫兹大学佛莱契尔法律与外交学院副教授

I am not alone in having known Gao Hua from a common association with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 and am not the only foreign friend he invited to his apartment. However, one memory of that visit has haunted me. Gao Hua invited me specifically to see his university-assigned apartment (in 1994 or 1995), but I am not sure why. The building in which he lived was one of those dank, dark, and poorly-maintained cement "walk-up" apartment structures of indeterminate age that looked overcrowded and forlorn. I had visited several other faculties in their apartments and none was living in as miserable a condition as was Gao Hua. The entirety of his apartment would strike any visitor from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as barely large enough for a single family. I was, therefore, astonished to find Gao Hua and his family sharing the conspicuously constricted warren of tiny rooms with another family.

As I recall, each family had a single bedroom and there was one additional room — nothing more than an oversized closet, really — that Gao Hua used as an astoundingly cramped study, lined, floor-to-ceiling, with books and reeking of cigarette smoke. There was a single, small kitchen and a single bathroom that both

families shared, each family with its own gas heater that had to be ignited before the stove or hot water was wanted. Gao Hua made a point to show me that in the toilet stall, there was one toilet, but two toilet seats hung on the wall, on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oilet for use by one of the two families.

This seemed emblematic of something, although I am at pains to say precisely what it is. Surely, the living conditions seemed demeaning to my bourgeoise sensibilities. What I cannot recall is whether Gao Hua characterized this arrangement as reflecting the inadequacy of Nanjing University's faculty housing in that era, or whether he hinted that his family's lot was one way the university bureaucracy reacted to his political posture and outspokenness among foreign students, punishing him for flirting with impropriety while providing a tangible incentive for him to tow the line and be reassigned to more commodious quarters.

At the time, Gao Hua's English was about as limited as my Chinese and, so, our capacity to communicate with subtlety or nuance was hobbled. Yet, he succeeded in conveying immense integrity and a determination to live by his conscience, regardless the consequence. He was quite an inspiration.

由于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关系，我与高华结识。大约在 1994 或 1995 年，作为他的外国友人之一，我曾经受邀到他的宿舍拜访，这段经历让我至今难忘。他的宿舍楼是那种阴暗潮湿、拥挤不堪，而且年久失修的水泥建筑。在此之前我也曾经去过其他几位南大教师的宿舍，但是没有人的房子像高华的那样不堪。在我这样的访客看来，这样的整套宿舍给一家人住也相当勉强，然而高华一家必须和另外一家来共用如此狭小简陋的一套宿舍。这让我相当震惊。

我清楚地记得，每个家庭各有一个卧室，还有一个仅仅比衣柜大一点的房间—那就是高华的书房，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书。两个家庭共用卫生间，高华还带我去看卫生间，墙壁两侧各挂一个马桶坐圈，一家一个。

当然，对我布尔乔亚式的神经来说，这样的生活环境实在是有辱人格。当时我觉得这样的环境仿佛有其象征意涵，虽然不能准确地指出来。我记不清高华是如何解释这样的状况的：这反映的是当时南京大学教师宿舍供给不足的普遍现象，或是大学当局对他的政治立场以及在外国学生中大胆敢言而采取的惩罚，暗示他假如接受官方路线就可以获得更好的居住条件。

遗憾的是，当时高华的英语和我的汉语一样的有限，所以我们对微妙讯息的沟通并不流畅。尽管如此，我感知到高华高大的人格，和他不惧后果，坚持良知的决心。高华令我深受鼓舞。

傅高义 Ezra Vogel
哈佛大学教授

With the passing of Gao Hua,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has lost one of its most outstanding scholars. He combined thorough research into original materials with well-organized presentation. His work on Yan'an has permitted us to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era.

Gao Hua made excellent use of all the materials available to him. I remember having a long talk with him in Hong Kong while he was using the University Service Center collection. He was intellectually stimulating, generous in sharing his knowledge, and modest in discussing his own achievements. He was a model scholar, and the field will miss him.

高华逝世，当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失去一位最杰出的学者。高华善用迄今可获得的资料，将史料的原始素材，如此完美地建构为学术表述；他对延安时代的研究，令大家重新认识了这段历史。

本人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幸见到高华，与之促膝长谈。他的见解充满智慧，发人深思；他慷慨地与人分享所知所闻，谈到自己的成就，谦虚诚恳。高华为学者作出典范，将受到学术界同仁至深的缅怀。

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历史系讲座教授

I was deeply saddened to hear the news of the death of my esteemed colleague Gao Hua. Among many other things, his death causes us to reflect on the fragility of life, and his passing forces us to reflect on how we make use of the limited time we have. In a way, the ultimate question is: Does our life make a difference?

Gao Hua made an impact. Gao Hua made a difference. Gao Hua enjoyed the highest respect of his colleagues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most creative historians are, by definition, independent and critical thinkers. They are not propagandists; they are not state functionaries; they are not the mouthpieces of political parties. Most of us fail to rise to these sorts of standards, but Gao Hua's efforts to do so were inspirational. I never met a colleague or graduate student who did not express profound admiration for his tireless quest for dignity and respect.

I once had the honor of serving as a formal discussant for a conference research paper written by Gao Hua. The subject was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ynamics of the Civil War period (1945–1949) in Republican China. I was stunned by the freshness of the paper and the brilliance of the argument. Gao Hua rejected

teleology. The concrete evidence, he argued persuasively, showed that the outcome of the Civil War was by no means inevitable. The source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intriguing complexities and multiple contingencies. Whenever I read a new work of research, I always ask myself if the work has forced me to see major issues in new ways and to rethink my own assumptions. Gao Hua's work caused me to pause and reflect. His posture as a professional historian was extraordinarily admirable. He made a difference — a big difference — and he will be sorely missed as a scholar and, more importantly, as a person of great integrity.

惊悉我尊敬的同事高华逝世，我深感悲痛。他的殒逝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让我们思考如何来利用我们有限的生命。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生命能否真的产生影响，带来不同？

高华产生了影响。高华带来了不同。在中国和海外，他受到学界同仁的最高尊重。最具创造力的历史学家应该是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思想者，他们不应该是宣传家，不是国家职员，亦非政党喉舌。现实中，我们大多数人往往达不到这些标准，但是高华的努力堪称楷模。我所认识的同仁和研究生无一例外地对高华表示深深的景仰，特别是对于他对尊严与尊重的不懈追求。

我曾有幸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担任高华论文的评论人。该论文探讨中国内战期间的政治军事动态。高华推翻了历史必然的观点，立意新颖，论证精彩，我备受震撼。他使用可靠的证据，显示了历史诡谲的复杂性与多重的偶然性，令人信服地说明内战的结局远非必然。每当我阅读新的历史研究，我都问相同的问题：该研究是否使我重新认识重

大问题，重新审视我的假设？高华的著作令我驻足反思。高华的治史态度令人高山仰止。他产生了影响——相当重大的影响。人们将深深地怀念学者高华，更重要的是，人们将深深地怀念这位卓然高洁的人。

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历史系讲座教授

I never had the privilege of meeting Gao Hua, and I will regret that missed opportunity to my own dying day. I was acquainted with him as a person mostly through my graduate student, David Chang (常成), who knew him well and visited him last year in hospital. But I knew his work well, especially his monumental and path-breaking study of Mao's rise in the party:《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A product of prodigious research in a vast range of documentaries, memoirs and archival sources, his book is the best account we have of the deep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in the 1940s. It is at once the work of a committed intellectual seeking to understand the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Mao's China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vironment in which he grew up, and a true model of dispassionat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实事求是). One can only hope that scholars in China and abroad will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is courageous scholar, embracing the conclusions that ineradicable facts lead them to, and not remember Professor Gao Hua only as a historian who wrote a book that could not be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我从未有幸认识高华教授，这将是我一生的遗憾。我对高华个人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我的博士生常成，常成与高华熟识并且探访过病中的高华。但是我熟知高华教授的著作，特别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部开创性的著作意义相当重大。高华深入研究惊人数量的文献、回忆录与档案，

该书对整风运动的深刻历史根源做出了最好的解释。作为一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他在著作中寻求理解毛时代中国的组织原则,包括他所成长的文革时期。该书也是客观冷静、实事求是的典范之作。我希望人们并不是仅仅记得高华是一位著作不能在大陆出版的历史学家，而希望中国和海外的学者能学习高华这位无畏的学者，勇敢地接受由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得出的结论。

古安鼎 Andrew Green
美国国会参议员经济法顾问

我是一位高华老师在中美中心的美国学生，最近听到高老师去世了，想表示我对高老师的尊敬。他教了我现代中国思想史与现代中国文化史，这两门课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到现在（十多年之后）我还记得我们所学的历史。最近我在华盛顿市工作，做美国参议员的经济法顾问，内容离中国历史比较远。不过我偶然会想到一些高老师所教我们的真理，超过时代、文化和国际的真理。全世界追求真理者都会想念他。

本辑英文悼词由常成翻译

智者不死 只是在远处关注着我们
史家有志 求信求真求直言
书生报国 曰智曰情曰担当

——段小光

半点星火，让红太阳黯淡无光
一介寒士，为真党史呕心沥血

——冯兰瑞

惜乎天丧斯文麒失其时遂令春秋绝笔
恸也国无净土凤飞之日尽教华夏泣声

——郭玉闪

宏文刊行秉笔直书正本清源尽显凛然正气
遗作传世披肝沥胆挥洒心血书写不朽人生

——胡多佳

公独射日，九州几人传董狐笔
天不永年，四海万众悲太史才

——李大兴

史笔卷苍茫，汗青都带风云气
大江流日夜，猿鹤犹闻呜咽声

——卢家明

挽联

秉笔直书青史垂范
高山仰止华宇同悲
——文晓明

天才止于中寿，应与任公同不朽
信史流传九州，不因义宁让当仁
——陈远

高山流水英名留于青史间
华章锦卷雄文难再红太阳
——成岗

射日成高手
启蒙著华章
——董健

忍见斯人独憔悴
但凭青史著高华
——杜骏飞

君去黄泉音独存容犹在有文字长流天地间
友来泣拜忆过往读遗篇续正气还见真文章

最忆秉烛夜纵横论史余音绕耳人犹在
爱读先生文发微洞见于无声处写文章

——徐士进

毕生沥血春秋笔敢为苍生问不公
壮志未酬身先去泰山其颓待后生

——杨奎松 黄娜

高士名著传寰宇
英才早逝恸中华

——杨振亚 沈汉 奚金芳 黄宗华

神聊定交你抽烟来我喝酒奈何烟酒日月竟有期
胡侃学问天掌灯兮地为床悲哉灯床空余人无觅

——张鸣

斯人有斯泪一朝穹宇逍遥羁卧庙堂烦厉鬼
青史待青烟半世阳燧磨砺炳燃社火化凶神

——章立凡

一灯说法，忆追陪，几度江风暮雨，岂料弦歌成薤露
五夜招魂，诵遗文，十年字血句泪，剩有信史著琳琅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1级本科生

命才恨相妨，惧良史乎？求微书微，求真书真，只留汗青传千古
弟子惭肯构，慰恩师者：有力食力，有艺食艺，未与学术造浮荣

——南京大学历史考古班2002级全体学生

谤书非秽史，青灯不灭，鉴古知今继司马
直笔无虚言，绛帐遽空，大贤中寿等濂溪

——南京大学文学院部分教师

上九天逐红日，谁谓纸墨无后羿
下三山觅清流，此去谈笑有董狐

——谢白 黄正明 王咏 法志清

高山仰止红日如何冉冉升
华世送别肝肠岂不寸寸断

——徐明明 马颖南

铁笔写春秋，红烛照天地，披肝沥胆，赤县终有天晴时
信史传万世，雨露润桃李，鞠躬尽瘁，梧桐泪洒送君行

——轶名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叹人间从此惜年少
家徒四壁，生计九流，问天意何时纵斯文

——轶名

高山仰止，红太阳升起终会落去
华章既成，太史公虽亡千古不朽

——轶名

曲钩不求，直刀刻竹胜寒柳
青莲无染，丹心醒世践横渠

——轶名

先生虽去，而思想长留矣
红日渐陨，唯皮囊不朽耳

——轶名

有上帝安排后世，且尽华年行正道，教授先驱，陕北心思，昔日整风识大陆
用雄文展示良知，只将天赋对真如，学生晚辈，南京面向，满身飞雪送高人

——轶名

读大块文章一点骚心一点血
听满城风雨半悲人老半悲君

——章诒和

高见，高才，高德，著作阐明真史现
华章，华彩，华励，育人解惑大师成

——轶名

生于贫贱长于贫贱秉良知著信史承太史公之衣钵
爱也中国恨也中国祛鬼魅启民智新大中华之灵魂

——轶名

固知红日升陕北
却恨文昌坠江南

——轶名

曰黄昏以为期兮，乃弃余而先驾
悟相道之不察兮，勉余生以继踵

——轶名

红太阳升起，由隐到显，君是最佳见证人
真历史湮灭，从有到无，天不怜见读书人

——轶名

附录：高华生平及主要著作

生平：

1954	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
1961—1963	南京市逸仙小学
1963—1967	南京市青石街小学
1967—1970	南京市人民中学
1971—1978	南京市扬子衫袜店
1978—1982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
1982—1984	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1984—1987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
1993—1998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
1987—2011	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
2005—2011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

海外讲学经历：

1995—1996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访问学者
2004 年 2—7 月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客座教授
2006 年 1—6 月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学术著作：

《高华历史笔记》
广东人民出版社（待出）

《革命年代》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 月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6 年

《身份和差异：1949—1965 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 年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年

主要论文：

《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主要原因》
《历史教学》中学版，2011 年第 6 期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育》
杨天石、黄道炫主编：《中日战争共同研究之三：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 2 月

《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
《炎黄春秋》，2008 年第 4 期

《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
《领导者》，2007 年第 17 期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炎黄春秋》，2006 年第 10 期

《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 年 10 月号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社会科学论坛》，2006 年 8 月上半月期

《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改造、制度创设与政治运作》
《领导者》，2006 年第 2 期

《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 年 2 月号

《如何认识毛泽东时代？》
《文艺研究》，2005 年第 9 期

《难忘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
周晓虹、谢曙光主编：《中国研究》，2005 年春季卷第 1 期

《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
许纪霖、刘擎主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在历史中求真实》
《世纪》，2004 年第 3 期

《略论胡绳晚年的思想变化》
《江西社会科学》，2004 年第 5 期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五十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南京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横看成岭侧成峰：发现当代史的多重面相》
《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 年第 3 期

《李慎之先生，你为中国做的贡献已载入史册》
《怀念李慎之》论文集，2003 年

《1960 年“持续跃进”中的江苏省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与黄骏合作）
《浙江学刊》，2002 年第 5 期

《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2 年 8 月号

《初读〈杨尚昆日记〉》
《南方周末》，2002 年 3 月 21 日

《延安教育的演变：教育是目标还是手段？》
《中国的自由教育》，朗文香港教育出版社，2001 年

《论孙科在制定“五五宪草”过程中的思想变化》
《江海学刊》，2000 年第 4 期

《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 年 8 月号

《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性”》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 年 4 月号

《试论延安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江苏社会科学》，1999 年第 6 期

《肃“AB 团”事件的历史考察》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9 年 8 月号

《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 年 4 月号

《从“再造”国民党到“以党治国”：论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孙科的政治主张》
《民国档案》，1998 年第 3 期

《大跃进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 年 8 月号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南京大学学报》，1998 年第 2 期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战略与管理》，1995 年第 4 期

《论抗战后期孙科的“左”倾》
《民国研究》第二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7 月（收入《革命年代》时，又名“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兼论孙科的‘多变’”）

《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及其困境》
许纪霖、陈凯达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初版；学林出版社，2006 年再版

《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 年秋季号

《毛泽东与 1937 年的刘、洛之争》
《南京大学学报》，1993 年第 4 期

《关于国民政府南京十年的若干问题》
《南京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

《大革命时期的孙科》
《江苏社会科学》，1991 年第 5 期

《台湾文化的危机及其未来发展之展望》（与茅家琦教授合作）
《南京大学学报》，1990 年第 5–6 期合刊

《非经济因素与台湾经济现代化之分析》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版），1989 年第 3 期

《论李敖与六十年代初台湾的中西文化论战》
《社会科学》（辑刊），1989 年第 1 期

《社会进步的标志与近代文化现象》（与茅家琦教授合作）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版），1989 年第 3 期

《台湾社会思潮中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冲突》（上、下）
《上海理论》，1988 年第 1、2 期

《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
《南京大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

《近代中国社会与民生史观》
《南京大学学报研究生专刊》，1986 年

《救国会派在八年抗战中的民主活动》（与姜平教授合作）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版），1985 年第 4 期

书评：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
台湾《思想》，2011 年 6 月号

《一个“外逃者”眼中的苏联——关于雷光汉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苏联流亡记〉》
《领导者》，2011 年 4 月号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台湾《思想》杂志、《领导者》2010 年 6 月号同步刊登

《解读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的三边关系——评〈博古和毛泽东〉》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9 年 6 月号、2010 年 2 月号

《“思想”的累与痛——胡伯威〈青春·北大〉读后》
《博览群书》，2006 年第 5 期

《在史料的丛林中——读陈永发新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9 年 6 月号

访谈：

《革命叙述的兴起——高华访谈录》
《中国改革》，2011 年第 10 期

《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高华访谈录》
《中国改革》，2011 年第 11 期

《旁观者高华》
《南都周刊》，2011 年第 15 期

《高华专访：国共战争与民族主义制高点》
《私家历史》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年 4 月

《延安：一个社会改造的样本》
《南方周末》，2003 年 3 月 20 日